



不是中興之主，乃是亡國之君

# 走向帝制

## 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余杰 | 著

**集權、反腐、鎮壓、爭霸**

對內維穩、對外擴張的「習近平主義」

將帶來中國的崛起，還是全世界的危機？台灣與香港又該如何因應？

# 走向帝制

## 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余杰 | 著

## 名家推薦

人類歷史經驗、政治科學法則和個人反思自省能力是我們人類政治共同體避免災難、向上攀升的知性基礎。立足於這樣的堅實基礎，作家余杰以其獨特的豐富想像力見微知著，描繪出人類地平線上已經顯現並正在向我們走近的一場大災難：習近平在他的粉絲群的擁簇下，正在把中國推向類似「反右」、「大饑荒」、「文革」和「天安門大屠殺」的全局性災難。如果中國人和世界各國的政治家任其肆虐，習近平的美夢最終會成為全體中國人的噩夢。繼《中國教父習近平》之後，余杰現在推出又一論述習近平的力作。兩部姊妹篇相得益彰，可以成為當下中國人的必讀書籍，幫助每一位心存幻想、尚未夢醒的中國人邁出「拒絕主動作惡、拒絕成為犧牲品」的第一步。

—美國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

夏明

中國不少異議知識分子，不管對政權多批判，總會帶著帝國時代士大夫對帝皇的愚忠和對邊地鄰國的鄙視。余杰先生，是難得沒有這種士大夫習氣、完全繼承西方啟蒙運動傳統的新一代中國知識分子。他的這部新書，再一次體現了他對權貴的蔑視和對台灣、香港自決理想的支持。他毫無禁忌的尖銳分析，乃是言論自由的最佳試金石。

—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社會系副教授

孔誥烽

余杰這本新書竭力揭露習近平政權「外強中乾」。習近平正在從事保衛共產黨政權的大博弈，也攸關他個人權位與身家安危。情況是否如余杰所推斷，我們大概可以在未來幾年看見端倪。

—中央研究院社會學研究所副研究員  
吳介民

習近平上台好幾年了，但是還是有一些人對他抱有幻想。我建議這些朋友讀讀余杰的這本書，你會看到真實的習近平。

—中國八九民運學生領袖  
王丹

細緻刻劃習近平政權的窮途末路，大膽揭示中共亡黨亡國前的醜態。

—國立成功大學政治系教授  
梁文韜

余杰的筆是顯微鏡，是解剖刀；是槍桿，是子彈；是中國的良心，是當代的警鐘。

—台灣「想想論壇」主編  
賴秀如

余杰深入剖析習近平集權獨裁、反腐權鬥、鎮壓公民、爭霸世界等各種殘酷事實，以及對中國、台灣、香港、新疆、西藏，以至人類文明與自由的深遠禍害，值得讀者認真思考。香港人在雨傘運動後如何面對

獨夫與暴政，迎難而上，捍衛自由，爭取普選，自決未來，料可從書中獲得啟發。

—政治評論人、香港執業律師

桑普

序（原香港版代序）  
歷史的向後進行曲  
—從漢武帝到習近平的集權鬼靈

香港獨立評論人  
盧斯達

## 歷史的倒退

人類曾經相信，歷史總是向前、進步的。即使歷史不一定在演進，但總不至於退步。他們是如此想的。但要是我們的心靈夠強硬，我們可以直視那些黑暗的真相—世界和歷史在倒退，自義大利鬆散自由的商業城邦所滋長的啟蒙時代以來，人類建立起來的脆弱文明，搖搖欲墜。

在歐美乃至亞非，情報部門無孔不入監察人民；國家機器豢養的特務，以各種科技、金融、體制內的方法迫害異己，歐威爾式的極權社會就在眼前；伊斯蘭國的崛起，中東戰火不息，大量難民湧入歐洲、恐襲重創巴黎，神權正在復興。

世界不一定越來越世俗，越來越包容，事情可以向相反的方向走。在東亞，俄國正在普丁的「神人」政治下走回蘇聯帝國式的擴張主義；至於中國，高速的經濟增長，並無帶來西方人一廂情願的中產崛起、自

由化改革，而是出了習近平，一個加緊集權的大有為君主。

## 古典中國的專制土壤

余杰的《習近平的噩夢》（香港版書名）首章說到，習近平自視為普丁加毛澤東，而我則看到漢武帝。中國人視漢武帝為明君，而我不以為然。在制度史、思想史上，漢武帝都是開創性人物——向壞的方向。如果秦始皇是開啟了中國二千年物質和國境「統一魔咒」的千古一帝，則漢武帝對中國人的統一魔咒，是下到每個人的靈魂當中。

劉邦打贏項羽建立他的漢家國，但經歷秦政和漢楚之爭，國家經濟困頓，劉邦之後都是採取休養生息，發展經濟的無為政術。漢武帝上台之後，為了排除崇尚「無為」的舊朝權臣，轉而培養他的「私人」，以開創一個以他自己為政治核心的新制度，儒生以及被改造、神道化的儒家，就成了他的武器，也成了二千年來所有帝皇都遵從的道路。

所謂制度史的開創，乃是漢武帝本人，對歷代想要集權、獨斷的帝皇，都是一個模範（role model）。中國疆域廣，但制度鬆散，即使到了明朝，民國史學家黃仁宇仍稱之為「數字上不能管理」。皇帝的權力，一般會被三公節制（之後的相權），不是一個人可以話事的現代獨裁。

然而，漢武帝示範了對古典分權制度的變異改造——他起用低級官員、太監，組成一個又一個直接聽命於皇帝的「決策小組」，統稱為「內朝」；以往司掌大小政事的朝廷，突然成了「外朝」。由於宰相屬於外朝，無法出入內廷，所以政事核心一旦遷入內朝，過往朝臣可以分擔、節制的皇權，便不受監控。

書中提到毛澤東和習近平沿用的「小組治國」，便是漢武帝的翻版。而毛澤東愛讀中國歷史，一定知道這一筆，也依樣實現在治黨之上。一般的權力架構，是金字塔，至上的皇帝，拿到的只是很小一塊；但極權主義，則是八爪魚，一個獨大的元首，控制每一條很小的觸手，他的權力伸展到每一個地方，哪怕是你的床頭。中國的政治發展，要用歷史退化觀來看，它的治術越發深密、奴役人民之術越來越強，皇帝越來越像呼風喚雨的神人。

## 既是天子，又是權臣

中國共產黨統治中國一甲子，它的組織一定變得龐大又笨重。越後期的皇帝，就越受到組織的節制，變得難以發揮。古代的皇帝，或今日的中共領導人，仍無法擺脫這個基本定律。一個性格大有為的元首，想要舉全黨之力去做某些事，或者單純固守自己的權位，都要在常規體制外，創造更快速、更直接向元首負責的小機構。書中提到的路易十四，太陽王，有他的文藝機構；或者現代的希特勒，有戈培爾將他塑造成「神人」，至於漢武帝，則有董仲舒等儒生，用儒家的意識形態，將天下私有為家國、將家國私有成皇帝的私產。

漢武帝不甘只作皇帝，而要同時成為權臣。因為古遠的皇帝，實權很難說很大，他更大程度上是國家的象徵、代天行道的選民、司掌國家禮儀的人。每年春回大地，帝后要親耕，以示國家以農立國、鼓勵生產；或者拜祭皇祖、修建陵墓，示天下以孝道。

至於實際政務，一個皇帝，還是要靠其他人，國家的治權實際上是落入他家他姓手中。「內朝」的建立，本質是皇帝任用私人，跳過任免

人選的準則、公議、輿論和制度。漢武帝就像習近平，不甘只當幕中的皇帝，他想大有作為，想管到我們的床前。

如果你在香港，就會看見很多芝麻綠豆的小官說出極為大膽的「極端言論」，例如說香港特首有超越三權（即超越司法）的獨特憲制地位之類。這班無日無之的傳聲筒，在中國共產黨的制度可以是不入流的。但他們就是可以站得住，最高調、最主動的也是他們。我們很難不想，他們直接向習近平的小組負責。

京城很遠，但香港的事情，習近平大概是直接過問的。因為習近平上台之後，我們可以從香港特區政府的統治風格，變得更加粗野、橫蠻、固執，看到習近平的身影。例如不動如山、壓碎雨傘革命，下手的是梁振英，但那肯定是習近平會愛看的。

## 習近平：血管裡奔流著毛澤東的血

例如黎智英和《大紀元》，或者很多泛民主派，在習近平上台前後，甚至近年，仍憧憬他是一個改革者，會有「習李新政」，而梁振英胡作非為，很快就要落台了——但現實上，梁振英是不動如山、大位坐得穩穩的。

梁振英羞辱香港人，肆意踐踏香港那個軟弱而對中國充滿幻想的中產公民社會，難道血管裡奔流著文革和毛澤東血液的習近平會不愛看嗎？梁振英是得到習近平全力支持的，我甚至看到，梁振英是習近平特意拿來羞辱香港人的。習近平在鬥爭香港，在教訓香港人。他在說，你們香港人，你們西方的什麼核心價值、自由和民主、公義與普世，你看，我一腳就踩碎了，有什麼了不起？

而習近平肯定認為，這種鬥氣，也屬於一種「建設」，是建設中國自外於「西方」的主體性的不二法。而習近平反映的，只是中共的主流看法。劉曉波被判入獄，是當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在西方則為聖誕節，是歐美世界最大眾和神聖的節日，他就要在這個日子判他入獄。他越抗議，他越高興。當時掌權的是胡錦濤。

## 民國的法西斯遺產

很多人傾向將文化 / 歷史的中國，與今日的黨國體制分開，這對香港的老舊泛民來說，則是「我愛國不愛黨」的嚙語。這是他們不學無術又欠缺通盤視野的明證。

中國的集權乃至極權，在漢武帝啟用「內朝」已經開始—鹽鐵利益收歸國家、與民爭利，已經開黨國體制之聲。在中、港、台均留下遺產的孫文，一手壓碎了以廣州為首的聯省自治主張，打垮陳炯明，蔣介石消滅軍閥，將中國重新「統一」，化為「一個領袖、一個黨、一個（中華）民族、一個國家」的新中國。

民國和中共，在政治本質仍是現代專制極權國家。民主當然說不上，領袖大量使用「小組」，即特務、黨軍、秘書形成的極權、恐怖、神人統治，從漢武帝到蔣介石，從毛澤東到習近平，是一個中國古以有之的中央集權趨勢。

## 華人慣常豢養出暴君

歐洲開啟了「現代」，其菁英也最早預言了「現代」對人的奴役。卡夫卡、歐威爾，都是其中的代表。現代科技、大眾傳播技術、電影、黨政組織的發達，是極權主義的物質條件。國共兩黨，是借助現代法西斯政術（來自蘇聯）強化的東方專制主義，從本質來說，國共雙方的領袖實現了秦始皇「統一天下」的夢想，只是秦始皇當時沒有衛星、電報、電腦、電視、收音機，不能向天下臣民將自己粉飾為神。

但統一天下，是通往奴役之路。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也不只是習近平自己，而是東方專制主義的必然產物，是華人對「集權統一」的執迷所產生的幽靈。即使你打倒了他，下一個習近平，下一個漢武帝也會捲土重來。

武帝漢儒之後的華人，總是迷信集權統一，乃國家強大的不二法門。然而天下生靈塗炭的惡果，他們沒有想到。中國人，乃至香港人，乃以為國家衰弱，是因為皇帝不夠權力，是朝中小人、地方貪官得權所致，只要有一個習大大，手握無上大權，就可以幫我們反腐。這種渴求明主的心態，養成一個又一個權力不受節制的暴君。

## 天下人的天下vs君王的家國

本來各有稜角、各有分別的中原各地，權力歸一、成為一塊疆土之後，天下臣民便成皇帝私產，開啟中央集權之禍，一直到明朝滅亡，明遺民中的知識分子才開始沉痛反省。黃宗羲在《明夷待訪錄》高舉「天下」、貶斥「集權」，不只是中國人的教訓，也足為人類全體所戒。

影響極廣的政治電影《V怪客》曾經有一段由V朗讀的台詞，正是描述這種心態的絕佳範本：「這是怎樣發生的？要怪誰？當然，有部分

人需要負上更大責任，他們會付出代價的。但我要說出真相，如果你想找出罪人，你只要看看鏡子。我知道你為什麼會這樣。我知道你害怕。誰不害怕？戰爭、恐怖、疾病……無數的問題，腐蝕了你的判斷和常識。恐懼控制了 you，當你恐慌時，你就去寄望元首。他承諾你秩序，許諾你和平，但同時要你保持沉默、服從。」

《明夷待訪錄》中的「原君」篇，這樣說中央集權：

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前未得之也，荼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向使無君，人各得自私也，人各得自利也。嗚呼！豈設君之道固如是乎？古者天下之人愛戴其君，比之如父，擬之如天，誠不為過也。今也天下之人，怨惡其君，視之如寇仇，名之為獨夫，固其所也。而小儒規規焉以君臣之義無所逃於天地之間，至桀紂之暴，猶謂湯武不當誅之，而妄傳伯夷、叔齊無稽之事，乃兆人萬姓崩潰之血肉，曾不異夫腐鼠。豈天地之大，於兆人萬姓之中，獨私其一人一姓乎？是故武王聖人也，孟子之言，聖人之言也。後世之君，欲以如父如天之空名，禁人之窺伺者，皆不便於其言，至廢孟子而不立，非導源於小儒乎？雖然，使後之為君者，果能保此產業，傳之無窮，亦無怪乎其私之也。既以產業視之，人之欲得產業，誰不如我？攝絨滕，固扃鑰，一人之智力，不能勝天下欲得之者之眾。遠者數世，近者及身，其血肉之崩潰，在其子孫矣。

中國不一定在習大大治下「血肉崩潰」，然而那總有一日發生。因

為君主專制使天下人不再擔當天下興亡的責任。明朝滅亡前夕，京城的所有富商收起自己的財寶，而朝廷卻國庫空虛，兵甲無法調動，因此加速滅亡。

中國一旦和哪個國家打起仗，你們認為中國的權貴和子弟，是留下，身土不二、奮戰到底，還是拿著外國護照趕緊逃命？君主專制大一統的中國，永遠不會有未來，因為他們恨君主、恨政府、恨國家，國家毀滅的時候，他們必然袖手旁觀。

## 習近平的權力觸手伸到香港

習近平與前代元首相比，是一動一靜的關係。鄧、江、胡三代，中國的問題是她自己的，是中國人自己受苦。但習近平將會爭霸，將國內的問題向外輸出。中國式的反啟蒙思想，將會向外擴張。例如以經濟力量脅迫鄰近地區的出版業，使其不敢出版與中國主旋律違和的書籍，香港出版業已經身受其害。二〇一五年十月，香港一間異見出版社股東、「銅鑼灣書店」的老闆桂民海，據報在泰國度假屋中被身分不明的人士擄走，現在下落不明，傳媒又指曾有「特工」到桂的住所搜查。

在傳媒的報導中，桂民海是「一個善於挖國家領導人物內幕的人」，雖然作風低調，但終究還是中伏。又有報導指，歐美不少傳媒公司，因為新自由主義的風潮，有奶便是娘，最後搞到出版社的大股東原來是中共。中國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改變世界的「遊戲規則」。

香港晨鐘書局出版人姚文田，因為出版《河蟹大帝胡錦濤》及《中國教父習近平》等書，而被深圳公安拘捕，之後控以「走私罪」重判入獄十年。習近平的專制主義狂熱（即使共產黨是罵不倒的，境外的力量

對一般中國人也沒有什麼影響力，也要殺雞儆猴），大概純粹是為了好玩，宣示威勢。殺雞儆猴，也包括香港。不要以為香港很安全，香港是無掩雞籠，中國的特務自出自入，這也算是一種香港受到「外國勢力」侵擾的鐵證。在香港，不一定安全。

最慘的是，香港大部分人，尤其是「公民社會」，世界觀仍停留在二十世紀末的英治末期太平盛世，他們不知世變，在中國張牙舞爪、壓迫港人的時候，他們仍留戀著自己的議席，一邊高呼「議會失效」，一邊辯稱「議會路線」仍有意義；他們最看重的，還是自己的好學生形象，批評「激進派」（其實一點也不激進）、批評港獨分子破壞「民主運動」、破壞「雨傘運動」，而不知道自己已經淪為中國殖民香港的幫兇——他們阻止受苦受難的人民起來反抗，站在當權者的一方譴責港人反對中國走私賊，他們已經受到人民的唾棄，因為他們很怕激怒共產黨，怕得自己先來阻止香港人抗爭。

泛民主派，與建制派一樣，心中有一個神像，那就是「中國」，這個神像一天不打倒，香港無從建立自己；不搗毀偶像，凡人無從建立起對自己的尊崇。中國人不搗毀對青天大老爺的敬畏，他們一天無法當家作主。

## 對偉大領袖「除魅」

余杰寫了幾本關於習近平的書，我認為它們除了滿足一般人對習近平的好奇之外，還有更深的人文意義。當世界在神化習近平的時候，余杰直指習近平有心理問題，他行事殘暴、專制、自大，這是對習近平這權力鬼靈的「除魅」（disenchantment）。現代人所尊崇的價值，是建

立於除魅之上的。啟蒙時代的人文主義，是對宗教神權的除魅；二戰之後，是對權力、國家和領袖的除魅。

因此，自由世界的人視戲謔政治領袖為平常，英雄見慣亦凡人，何況是由人民選出來的公僕？而習近平的自我神化，無疑是一種歷史的倒退。神人政治的鬼靈一日不除，世上沒有自由人。無論他這一刻有多少財富，仍是被奴役、毫無保障，因此他們都趕去拿外國護照。

忘了是哪個作家談過，我們覺得某人崇高偉大，只因我們屈膝而跪。過去路易十四不是太陽王，今日習近平也不是習大大。

余杰附註：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我批判習近平的新書完稿，計劃參照上一本《中國教父習近平》的模式，分別出版香港版和台灣版。香港版請年輕而銳利的香港獨立評論人盧斯達作序。隨即，我與香港開放出版社商量出版事宜，初步達成出版意向，並展開編輯工作。在二〇一五年聖誕節前夕，完成書稿編輯、封面設計等前期所有工作，預計元旦開機印刷。

然而，十二月三十日，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李波在香港人間蒸發，成為該書店「被失蹤」的第五人，香港出版界因此風聲鶴唳、噤若寒蟬。

二〇一六年一月三日，開放出版社總編輯金鐘發來電郵告知：「香港政治書籍出版的困境，已成為國際關注的焦點。身陷其中的業者，遭到巨大驚恐壓力，無不趨吉避凶，以防成為下一個。我亦接到家人與朋友許多電話勸告。為此，我們再三斟酌，決定暫停大作的出版，以待未來。因未簽約，後續不複雜。但誠盼得到您之諒解。前此勉出《教父》，但今非昔比，愚亦無力承擔巨大後果。未能效終，深以為憾。」

得到這個不幸的消息之後，我為此書在香港的出版作最後努力，先後聯絡香港的五、六家出版商，均遭婉言謝絕。至此，這本新書在香港

出版的可能性完全斷絕。我充分理解出版方所遭遇的壓力與危險，在香港的歷史上，這種情形前所未見。

我要譴責的是以習近平為代表的中共政權，這個政權是香港乃至全球的自由、民主、人權、法治等普世價值的公敵。

故而，在台灣版中，我特別保留盧斯達為原香港版所作之序言，並保留幾篇專門為香港版所撰寫的關於香港的評論。對於香港的沉淪和中國天朝主義的步步緊逼，台灣不可漠視與倦怠，而當有唇亡齒寒之感。

第一卷

皇帝登基紅樓夢  
流氓闖入鏡花緣

——論個人崇拜



變態辣椒 / 繪

## 從路易十四到習近平：探究獨裁者的美容術

我們可以明顯看出，國王的威嚴是由假髮、高跟鞋和斗篷等等組成的……而我們所崇拜的諸神，其實是理髮師與鞋匠製作出來的。

—薩克萊

英國史學家彼得·柏克（Peter Burke）寫過一本名為《製造路易十四》的專著，這是一本剖析路易十四在世時，其公眾形象如何被塑造的歷史社會學和傳播史著作。以現代詞彙來說，這本書討論的是「推銷路易十四」，如何以意識形態、宣傳與民意來包裝君王。

專業的史學家經常用「神話」這個術語，指稱一個「虛假的故事」。但彼得·柏克並不關心路易十四神話之外那位「真正的」路易十四。相反，他關心的正是「神話」這個事實，它對媒體之外世界的影響——對外國人，對臣下，對國王本人也不例外。

「造神運動」古已有之，長盛不衰，正如作者所說：「十七世紀君主與二十世紀領導人之間的對比，並非虛飾與真實之間的對比，只是兩種不同風格的虛飾之間的對比。」在十七世紀，路易十四藉由印刷、油畫、雕像、紀念章和儀式呈現其形象給大眾；二十世紀的統治者越來越倚重照相、電影、收音機、電視機，以及新興的網路媒體。儘管技術手段和傳播方式有所不同，但「造神運動」的本質是一樣的：統治者總是想方設法地將其形象推銷給被統治者，讓被統治者對其臣服、崇拜、忠誠、熱愛，從而使權力鞏固與穩定。

不過，或許囿於篇幅所限，作者未能仔細甄別當今民主社會的「領導人推銷術」與獨裁體制下的「領導人推銷術」之間的差異。前者不得不面對諸多挑戰、冒犯乃至顛覆的觀點，在一個有言論自由和新聞自由的社會，不可能再出現「半神半人」的領袖；後者則將十七世紀的君主專制升級換代成極權主義，「進化了獨裁者」的「美容術」，讓路易十四亦望塵莫及——其中，中國統治者習近平的「形象工程」就是一個可供解剖的範本。

## 「國王史」：從他人操刀到親自撰寫

路易十四號稱「太陽王」，國王代表整個國家。當法國人提到路易十四時，他們的意思是說他無所不知、戰無不勝，像神一般等等。他是完美的君主，代表黃金時代就要重返。

路易十四設置了「處理一切與純文學事務相關的委員會」，俗稱「小學會」，用今天的話來說就是「頌揚委員會」。其成員有國王的心腹大臣、詩人、畫家、建築師、舞蹈老師、典禮主持人等。它監督國王公眾形象的製造，所有關於國王的文稿要經過其修改後才能發表。他們檢查掛毯和紀念章的設計，並為其題詞描述。他們也負責撰寫路易十四時代的歷史，尤其是國王的赫赫戰功。委員會成員們共同努力，將路易十四在位期間的重大事件活靈活現地再現出來，呈現出生動一致的「國王史」。當時，形容君王有一套標準的形容詞，被後人定義為「膨脹的修辭」，類似於鋪陳誇張的中國漢大賦。當然，路易十四本人是這個委員會的最高主宰，他是導演，也是男一號主角。親自見過國王本人的聖西門公爵說：「沒有人比國王更清楚如何推銷他的言語，他的微笑，甚

至他的眼神。」

這個委員會不僅負責對內的推銷，還要將國王的威名傳遞到歐洲各國。「對皇上的名聲來說，頌揚他的話必須顯得自然，為了顯得自然，這些頌揚必須在他的權力範圍之外印刷發行。」路易十四慷慨資助很多外國的作家、藝術家，讓他們創作了大量以路易十四為主人公的作品。受到外國人的讚美和擁戴，似乎是一件更加光榮的事情。

路易十四在生前炫耀其文治武功，但他本人並不以作家名世，或許他認為親自著書立說有損其神聖性和神秘性。而習近平除了他人操刀其「國王史」之外，他本人赤膊上陣，親自撰寫有關章節。習近平倒是跟蘇聯領導人布里茲涅夫有一比，布里茲涅夫亦「勤於」著書立說，有多卷本的長篇小說問世，並給自己頒發作為蘇聯最高文學獎項的「史達林文學獎」。

習近平打破了「後毛澤東時代」領導人退休之後才可出書的黨內傳統。在二〇一四年的上海書展上，習近平二〇〇七年出版的《之江新語》重新包裝上市，被擺放在浙江館、社科精品館等多個展館的明顯位置，這本書也是上海書展「重點推薦圖書」之一。同樣受到熱捧的習近平的著作還有《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讀本》、再版的《幹在實處，走在前列：推進浙江新發展的思考與實踐》、再版的《擺脫貧困》等。二〇一五年，又有《習近平關於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論述摘編》、《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等相繼出版。前者發行三百萬冊；後者在海外賣了四十萬本、在國內賣了一千七百萬本，卻有網民揶揄說：「八千七百萬黨員，起碼還有七千萬人應掏腰包。」習近平的書極少是黨員自發購買的，絕大多數都是公家單位訂購後發給眾人，至於是不是有人認真閱讀，就只有天知道了。不過，被學者鍾祖康考證出抄襲而來的博士論文，習近平大約不敢將其出版問世。

習近平著述的一系列書籍，在短時間內密集佔據媒體的版面，國際媒體稱習為「中國新晉暢銷書作家」。習的智囊已開始籌備把「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放進中共黨章，黨媒開足馬力宣揚「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精神」如何構成「對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的充實、豐富和發展，是對馬克思主義生動而具體的發展」云云，名為「習近平總書記系列重要講話研究中心」的專門機構也在黨校和若干大學建立起來。

有趣的是，習近平這些擺在書店最顯著位置的書籍，人人都可以購買，並非「黨和國家機密」，但當外國人購買時，卻受到有關部門「關注」。英國廣播公司（BBC）中國總編輯凱瑞（Carrie Gracie）在Twitter上透露，她到北京王府井書店買了幾本習近平的著作，結果被公安截查。大概安全人員懷疑她動機不純，她難道想從習主席的書中挑刺？凱瑞自嘲說：「或許因為沒別的人買，讓我成了疑犯？」網民則調侃她說：「這種書都買，肯定有問題。」

## 從「劇場國家」到「習家包子鋪」

彼得·柏克在書中引用美國人類學家葛茲提出的「劇場國家」的概念，逐一分析「太陽王的劇場國家」裡的各色人等如何參與塑造「太陽王」的浩大工程。路易十四本人有時也會使用這個隱喻，「他們習慣把這個世界，看成一個舞台」。

對於路易十四來說，吃飯是彰顯王權至高無上的表演之一。彼得·柏克寫道，國王每日的起居是儀式般的，他的進餐行為是在眾人注視下的表演行為。即便是比較不正式的餐點，至少有三道主菜，且每一道菜

都有許多盤式供選擇。對臣下而言，能目睹國王進餐，是一種榮耀；在國王進餐時被他提到，是更高的榮耀；能為國王端菜，或與他同桌，則是最高的榮耀。在場除了國王之外，每個人都得戴帽子，但是除非正在進食，否則在國王說話，或得到國王主動開口詢問時，則必須取下帽子。

中共沒有歐洲王室和貴族的悠久傳統，在禮儀上不太講究。毛澤東剛進中南海時，甚至改不了隨地大小便的惡習，警衛員攜帶鏟子跟在後面，隨時整理其排洩物。後來，中共朝廷也像劉邦建立漢朝時那樣，任用儒生建立禮儀規範，逐漸有了「漢家氣象」。

與路易十四向貴族階層公開展示進餐過程相反，中共領導人如何吃飯、吃些什麼，始終是「不足為外人道」的黨國機密。唯有擔任過毛澤東私人醫生的李志綏在回憶錄中描述過毛及周圍的大臣們的飲食習慣，即便在大饑荒的年代裡，毛依然滿桌子山珍海味。

到了近些年，中國領導人意識到，到各地視察時，偶爾吃一次工農大眾天天吃的粗茶淡飯，可以顯示自己簡樸、親民。溫家寶到井下與礦工們一起吃餃子，李克強到地震災區與災民一起吃泡麵，成為官媒上反覆渲染的佳話。

在此類「與民同樂、與民同食」的報導中，從來沒有一件能像習近平到慶豐包子鋪吃包子那麼驚天動地。新華社「新華視點」二〇一三年十二月二十八日微博報導，習近平在慶豐包子鋪月壇店購買了二兩共六個豬肉大蔥包子，外加一碗炒肝、一盤芥菜。此次包子秀跟以往中共領導人的親民宣傳不同，不是通過央視、《人民日報》等權威媒體發佈，而是通過網路社交媒體發佈；而且，有關照片非御用攝影師拍攝，不夠「高大全」，而是由「現場群眾」（當然也是官方安排）拍攝的，場面略顯凌亂，卻更具「真實感」。

從此，習近平被譽為「慶豐帝」或「包子帝」。慶豐包子鋪的董事長隨即下令，推出二十一元一份的「主席套餐」，將習用過的那張桌子搬到公司總部，用玻璃罩保護起來供來賓參觀。領袖臨幸過的桌子，從此不再是桌子，而成為價值連城的文物。

慶豐包子鋪本來籍籍無名，習光顧之後，頓時名聞遐邇。儘管習使用過的那張桌子已不在原地，前來同一家店吃包子的民眾仍絡繹不絕，愚昧的人們抱著沾一沾仙氣的心態前來朝聖。北京的旅遊部門打出新口號，「不吃慶豐包子，不算到了北京城」—慶豐包子取代長城，成為北京的標誌。習大大喜歡吃他家的包子，誰敢嫌它不好吃？我多年前吃過慶豐包子，確實不喜歡，他們的包子太鹹了。

近期，又傳出慶豐包子鋪要打包上市、登陸股市新三板的消息。即便中國股市一路狂瀉，也阻擋不住其上市的決心。證監會在股災中停止所有公司的上市申請，卻一定不敢駁回慶豐包子鋪的上市申請—若不給包子鋪面子，就是不給「包子帝」面子。

慶豐包子鋪的總經理高文慧表示，規劃在二〇二〇年要建設五大物流基地，連鎖門市一千家。慶豐管理學院暨包子文化研究中心也於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揭幕，「該管理學院將聘請北京數所大學的教授和知名企業同行擔任講師，而同時成立的包子文化研究中心則擔負著包子技藝傳承和創新的重大使命」。目前，各門市在售的基本都是豬肉大蔥等傳統餡料，現又研發出二十多種新口味，包括從未在「包子家族」出現的芝士、咖哩雞肉等餡料。

故事還沒有結束，關於慶豐包子鋪的一則更為荒謬的新聞是：廣西桂林電視台副主任曹高權踢爆桂林有一家「慶豐包子鋪」，實為北京「慶豐包子鋪」的山寨版。山寨包子鋪竟向法院提起訴訟，迫使電視台將曹解僱。明明是幫助慶豐包子鋪打假，也是維護習近平代言產品的聲

譽，卻不小心踩到「今上」的尾巴：你竟敢讓慶豐包子鋪陷入負面新聞，你想不想活了？習近平不能批評，慶豐包子鋪也不能批評，連幫助慶豐包子鋪維權也不准許！

當然，這場「包子秀」的最大受益者，並不是慶豐包子鋪，而是「包子帝」習近平。神州大地是習的舞台和劇場，不用花一分錢廣告費，他就能製造一個萬人空巷的好話題，讓親民形象深入人心。美國總統歐巴馬要羨慕死習近平了——歐巴馬表演過類似的親民秀，跑到華府唐人街中餐館打包「左公雞」回白宮與家人分享，但美國主流媒體不認為是一個有價值的新聞，大都不予報導。歐巴馬沒有宣傳部，只能在家中跟妻子自娛自樂。

習近平居然吃尋常人家也能吃的包子，屁民們哪個不感激涕零？有趣的是，「反江不反共」的法輪功宣傳機構《大紀元》日報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三日也發表了關於習近平的頌歌：「他是難得的好人，厚道，質樸，在家裡不多亮一盞燈，不多用半張餐巾紙。」乍一看，還以為是《人民日報》的海外版。

### 習公主是習皇帝的幕後形象設計師嗎？

在路易十四時代，繪畫和雕塑是展示國王光輝形象的最佳方式。那時，義大利各城邦的繪畫和雕塑水平高於法國，路易十四不惜重金聘請義大利藝術家到法國為其服務，甚至開出更好的價碼跟羅馬教宗搶奪藝術家。在繪畫和雕塑中出現的路易十四，永遠是威風凜凜、雄姿英發，大多數都騎著英俊的戰馬，以掩飾國王矮小的體型。國王的表情則熱忱、尊嚴且不輕易露出微笑。其他裝飾還有華服、鎧甲、寶劍、雷電、

戰利品等等。

彼得·柏克在書中還收入一張頗具諷刺意義的油畫：路易十四剛剛去世，藝術品商人就將路易十四的畫像取下來，裝入箱子，放入地下室。可見，無論權勢如何顯赫，也抵擋不住時間的利器，當權力發生轉移的時候，油畫中的主人公也悄悄換人了。這幅畫實在可以做為所有活著時過於迷戀權力的獨裁者的殷鑒。

習近平是第一個使用專業形象設計團隊的中共領導人。路易十四時代的繪畫和雕塑，在習近平時代換成了歌曲、照片、影像和動漫。

習的妻子彭麗媛是家喻戶曉的歌唱家，歌曲便成為塑造習形象的首選工具。個人迷信的神曲《習大大愛著彭麻麻》，像毛時代的《東方紅》一樣廣為傳唱：「中國出了個習大大，做夢都想見到他！中國還有個彭麻麻，最美的鮮花送給她，興家興國興天下！男人要學習大大，女人要學彭麻麻。」或許，這首歌可以取代早已老掉牙的《義勇軍進行曲》成為中國的新國歌。那些歡天喜地歌唱《習大大愛著彭麻麻》的人民，就是習近平理想中的被統治者。習希望中國的年輕一代都是這樣的愚民和順民。

妻子是「賢外助」，女兒習明澤也披掛上陣。習公主一向行事低調，網路上找不到一張她成年後的照片，宛如「羚羊掛角，無跡可尋」，這本身就說明中共對中國社會的控制跟毛時代一樣嚴密，中國遠非「開放社會」。據外媒報導，習明澤留學歸國之後，親自負責父親的形象設計團隊，很多「新式美容術」都是女兒送給父親的禮物。習公主塑造習皇帝，當然輕車熟路，更何況她有在美國生活的經歷，知道如何用西方人「喜聞樂見」的方式傳遞信息。比如，用動漫形式闡釋習近平的各項政策，在央視上播放主席辦公室的陳設（此前，中國領導人極少公開辦公室的佈置），甚至公開一張習近平多年前騎著自行車、載著女

兒玩耍的生活照。

每一次習近平出訪前夕，背景神秘的「復興路上工作室」就會發佈預熱短片，幾乎成為慣例。各片風格各異，從動漫、快閃、微電影、街頭採訪到模擬新聞發佈會，每次都有新意。自二〇一三年十月出現至今，該工作室已先後推出《領導人是怎樣煉成的》、《中國共產黨與你一起在路上》，以及「跟著習大大走」之博鰲篇、萬隆篇、巴基斯坦篇、俄羅斯篇、美國篇、英國篇等系列時政宣傳短片。這些短片均以英文為主，利用主流視頻網站推廣。以俄國篇為例，用網路語言和流行元素呈現上合、金磚峰會，還模擬習玩微博的場景。片中有多處「習普會」的鏡頭，兩個動畫版的領袖，一起踢足球、玩自拍、在草地上並肩散步，還在遊樂場開著碰碰車不斷碰撞出「idea（點子）」。有觀察家認為，「互聯網+動漫」的形式，已成為中國政治傳播和對外傳播的新常態，「體現本屆政府更為開明的姿態」。該工作室的做法呼應了習近平的指示—「要精心做好對外宣傳工作，創新對外宣傳方式」，「講好中國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將習的形象卡通化，若非習本人首肯，宣傳部門不敢擅自行動。

二〇一五年九月下旬，習近平訪美前夕，《人民日報》海外版的網站上放出一段視頻。來自日本、韓國、喀麥隆、美國等國的在中國留學生，深情表達對習的喜愛之情。片中多次出現「他好英俊」、「可愛的臉」、「睿智的領袖」等讚美詞彙，有留學生說「似乎人人都喜愛他」、「太有魅力了」，一名韓國留學生甚至說「如果我未來丈夫也像他一樣的話，我會幸福」。

然而，這段官方宣傳視頻的宣傳效果「慘不忍睹」。在被放上視頻網站 YouTube 三天後，視頻獲得近九萬次點擊，只有一百三十四人點讚，卻有七百八十六人表示不喜歡。評論區更是負評如潮，有人將這些

學生稱為「洋五毛」，也有人責問「這些人究竟收了多少錢才拍的這個視頻」。

獲得讚賞最多的一條評論說：「這是我見過最愚蠢的視頻。」有在片中亮相的學生出面辯解說，他們在接受採訪時，並不知道是為了製作這樣的視頻，沒有想到視頻製作者從他們的長段講話中剪出一兩句話，讓他們有被綁架之感。更具諷刺意義的是，該視頻網站在中國是被封鎖的。

## 異端特質的漫畫是如何被趕盡殺絕的

習近平的偶像塑造方式不斷升級換代，習允許手下製作動漫或視頻，卻不容忍異端性質的漫畫損害其偉大、光榮、正確的形象。近年來，發生許多起運用警察力量迫害漫畫家和網路轉發者的事件，僅舉四個典型案例就讓人嘆為觀止。

第一起，中國微博大V「變態辣椒」被迫流亡日本。「變態辣椒」真名為王立銘，在微博上擁有幾十萬粉絲。二〇〇三年十月，他被三名警察從家中帶走傳喚。人民網「強國論壇」發表文章〈看清「變態辣椒」親日媚日的漢奸相〉，十幾家官媒同步轉載。王立銘在赴日本旅遊時決定暫時不回國。他認為，自己被中國嚴厲封殺的原因是「習近平正謀獨攬大權，比胡溫政權時期更嚴厲封殺不同政見」，「習近平政權抓人不再是抓一個，而是抓一群，所以我很反感有些海外輿論總把習近平說成『被權力鬥爭綁架』，我認為根本就是習近平的主張，你可以從他的一些言行中找到依據」。

第二起，廣西柳州網民羅鳴因轉發一幅貌似徐才厚和習近平的諷刺

漫畫，被柳州警方定罪為造謠滋事、擾亂社會秩序，要對其處罰。為羅鳴辯護的隋牧青律師表示：第一，該漫畫人物無法認定指誰，公權不可妄自對號入座；第二，即使認定漫畫人物指誰，但無虛構事實，不能認定造謠滋事，更談不到侮辱誹謗、擾亂社會秩序；第三，即使確認對習、徐有貶諷之意，公民有批評監督公權人物的憲法權利，該案應由受害者（習、徐）提起民事訴訟或刑事自訴，警方不應介入；第四，轉發漫畫圖片是言論自由範疇，如無即時重大社會危險，並不違法。幾個月後，隋牧青律師在官方對人權律師的大掃盪中被捕，再也無法幫助羅鳴了。人權律師比他救助的對象先進監獄，這就是習近平時代的奇觀。

第三起，上海藝術家戴建勇因為發表一張合成的疑似習近平的照片被刑事拘留。戴建勇早前以在社交網上刊登搞笑照片而受到關注，他把自己的臉擠成菊花狀，被稱為「麻痺哥」。後來，他將習的照片 P S 成菊花狀，並加上一瞥小鬍子，還把該頭像做成貼紙送給朋友。這樣一個小小創意，讓戴建勇被控「尋釁滋事罪」，遭到刑事拘留。監禁幾個星期之後，他才重獲自由，警方命令他不得接受外媒訪問。網路雜誌《石英》（Quartz）評論說，中國政府一度對現代藝術家持寬鬆政策，但在習執政下，藝術家的生存環境明顯受到遏制。

第四起，長期從事維權活動的姜野飛，二〇〇八年底逃亡泰國，已被聯合國難民署批准為政治難民。在泰國期間，他創作了一系列諷刺中國時政、特別是諷刺習近平的漫畫。他的作品在 Facebook 和 Google+ 上廣受歡迎，點擊量達數百萬。二〇一五年十月初，警察找姜野飛在國內的弟弟談話：「告訴你哥在外面動作小些，他的行動已經嚴重涉嫌顛覆國家政權，上邊準備引渡他回國。」十月二十八日下午，曼谷警方不顧姜野飛握有聯合國難民署的保護信，聲稱他是中國的「通緝犯」，將其拘捕。泰國警察的言語顯示，他們在代中國政府執行任務。半個多月

後，已經被加拿大同意接收為難民的姜野飛卻被泰國引渡回中國。在央視關於該案的報導中，姜野飛被強加以「組織偷渡」的罪名。出現在電視畫面中的姜野飛，面目青腫，說話困難，外界猜測他有可能遭受嚴重的酷刑。

當年的路易十四對不順從他的作家、藝術家尚且網開一面；而以上四個案例表明，習近平連一張漫畫都不能容忍，習一絲幽默感也沒有，更沒有胸襟和氣魄面對不同意見。習瘋狂抓捕漫畫家，跟製造《查理周刊》血案的伊斯蘭恐怖分子有何區別呢？

彼得·柏克在書中專門設置了一個名為「紀念章的反面」的章節，收入法國宮廷在打造路易十四的同時，法國民間和國外的種種批評和反對的聲音、觀點和作品。這支「異議管弦樂團」主要攻擊的主題是路易十四的野心、不道德、違背宗教信仰、暴政、虛榮等，在路易十四權力臻於巔峰狀態之時，儘管法國的武力強大、王室的財富豐盛、「製造路易十四」的團隊人才濟濟，仍然不能消滅反對者頑強的聲音。

習近平可以將桀驁不馴的漫畫家們逮捕或放逐，卻無法瓦解所有反抗者的意志。中國黨史研究者高文謙在〈習近平是亡黨之君，還是開創新局？〉一文中指出：「習近平生逢末世，心高命薄，雖想力挽狂瀾，但志大才疏，缺少歷史的大視野，囿守一黨之私，沒有勇氣開創新局。……習近平雖然不想做亡黨之君，但明顯逆歷史潮流而動，已經把上台時的一盤好棋走成死局，照這樣下去，能不能撐到中共建黨一百週年，只有天曉得。」總有一天，習近平會被放置在與希特勒、墨索里尼、史達林、毛澤東、波爾布特、金正恩等人並肩而立的「獨裁者的恥辱牆」上。

## 「習近平主義」的草蛇灰線

暴君只是無知的產物，而無知來自暴君所蹂躪的奴隸。

—洛威爾

由於中共的領導人選拔機制秘不示人，每當新領導人登場時，國民及海外媒體都會不約而同地發出「他是誰」的追問。而「他是誰」這個問題更可轉化為「他的執政方針是什麼」，或者「他的主義是什麼」？

曾任趙紫陽秘書和中央政治局常委會秘書的鮑彤，如此分析習近平的施政思路：在政治上，習要加強中央的集權，要把流失到地方的權力收歸中央，改變此前「政令不出中南海」的局面。在文化上，習要加強對文化、思想、教育和輿論的控制。對整個社會，習要加強黨對社會的治理，以黨治國。

唯有在經濟上，習並不希望回到毛時代的計劃經濟，而願意繼續鄧時代的「權貴資本主義」。習為何要保持不符合馬克思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的「權貴資本主義」呢？首先，若經濟回到毛時代，太子黨家族就得散盡萬貫家財，而這是不可能的；其次，人之本性是「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習無法說服中國人回到毛時代過「一窮二白」的貧苦日子；第三，若無雄厚的經濟實力，無法支撐習在國際上與美歐日爭霸的野心。故此，習努力保持經濟奇蹟，在一黨領導之下造成一個自由競爭的市場，「這個市場是自由的，但一定要服從黨的領導」。

這就是呼之欲出的「習近平主義」。香港親北京的智庫「中國力研

究中心」副主任文揚在 B B C 發表了一篇題為〈習近平主義早晚亮相成必然〉的評論文章，從外圍為「習近平主義」造勢。文章指出，十八大以來，被稱為「科學理論指導和行動指南」的「一系列治國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戰略」，就是可和「馬克思主義」、「毛澤東主義」並列的「習近平主義」。作者聲稱：「中國是當今世界大國唯一的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國，以及前第三世界人民共和國集團中唯一的世界大國，這樣一個特殊國家的特殊道路，正是『習近平主義』所代表的。」驕奢狂妄之心，躍然紙上。作者最後得出結論：「當『以人民為主體的發展主義』成為一個時代潮流，『習近平主義』也就成為了一個應運而生的必然事物。」然而，作者難道看不到「個人崇拜」與「人民主體」之間的截然對立嗎？

「習近平主義」是馬克思加孔夫子，以及毛澤東加普丁？

江澤民的「三個代表」、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雖然寫入中共黨章（這兩個人算是有了某種「歷史定位」），卻無法形成言之有理、頭頭是道的「主義」。習近平要超越江湖，就得打造出一套支撐其統治合法性的「習近平主義」。普世價值和西方文明都不是習近平願意使用的建築材料，剩下的水泥、石灰、沙子，就只有馬克思和孔夫子、毛澤東和普丁了。

習近平一邊翻馬列主義的舊帳，一邊從和中國儒法互補充的傳統文化的「醬缸」中淘寶，甚至不惜一切代價讓這兩具殭屍起死回生。

首先是為馬克思主義注入活力。北大在近代最早引入馬克思主義，不妨讓其繼續承擔此使命。中央向北大投入巨資，修建宏偉的馬克思大

樓，整理比「儒藏」更浩如煙海的「馬藏」—匯集一百多年來全球研究馬克思的著作和資料。二〇一五年十月十日，自蘇聯崩潰之後，全球規模最大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在北大舉辦，來自五大洲的四百多名學者與會，此後將兩年舉辦一次。大會組委會主任、北大黨委書記朱善璐表示，舉辦「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有利於「提升中國馬克思主義研究的世界影響，佔據馬克思主義理論研究制高點」。

與會的哈佛大學教授、中國當代史專家麥克法夸爾（馬若德）在主題演講中，對中國重振馬克思主義雄風的企圖表示強烈置疑。他認為，馬克思主義在普通中國人中的影響已經式微，中國現行的「社會主義」早已脫離了馬克思主義。他直言，馬克思主義還不如中國儒家思想的影響力大，否則為何那麼多人熱衷稱習近平為「習大大」—這是儒家「君父」思想的反映。他指出，習近平所說的中國復興說「在智識上是一個不連貫、不廣泛、缺乏力量的理念」，不足以與西方思想抗衡。但《環球時報》把他的話改成「中國夢將會對人類發展做出巨大貢獻，發揮積極影響」。麥教授在一封電子郵件中譴責說，這個引述「完全是捏造的」。之後，《環球時報》被迫刪除了這句話。中共官媒的造假已經到了明目張膽的地步。

其次是為孔夫子重塑金身。孔夫子重新被抬出來，孔子學院開遍全球，成為統戰海外中國研究領域的重要工具。當局鼓勵民間創辦私塾，宣講四書五經，各大學創辦國學院，大學生在畢業典禮上穿戴不倫不類的「漢服」，甚至有女青年自告奮勇地在自己身上試驗如何纏足。習近平在講話中頻頻引用儒家經典，曾經將孔夫子鞭屍的中共政權搖身一變成了儒家文化的忠實繼承者。

第三是讓毛主義復活。習近平在毛時代度過青少年時代，毛語言和毛思維對其世界觀的形成影響巨大。在意識形態上，習是鄧小平以來最

左的中共領導人，也是對毛主義最熱衷、最追捧的中共領導人。國防大學政委劉亞洲上將在《人民日報》撰文，稱讚習「傳承了中共革命先賢勇於拋頭顱、灑熱血、救中國的紅色基因」。文革結束四十年了，這群高幹子弟仍然信奉血統論，如彭麗媛的歌中所唱，他們唯一的信仰是「打江山、坐江山」。

第四是到海外尋找榜樣。習近平上位之後，環顧全球領袖，唯有敢說敢幹的俄國總統普丁讓他心存敬意。普丁在全球石油市場疲弱、俄國經濟陷入困境的狀態下，不顧西方的經濟制裁，出兵克里米亞，乃至打著反恐旗號扶持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空襲敘利亞反對派，讓迷信威權的俄國人視之為沙皇彼得大帝轉世。習近平企圖仿效普丁，以煽情的民族主義宣傳掩飾國內矛盾，甚至準備在南海或東海大幹一場，說不定能一舉推倒美國在亞洲的優勢地位。從中俄兩國關係史來看，中俄之間有深仇大恨，但習近平寧願跟普丁結盟，兩者實力相加方可對抗美國、日本和歐洲。

馬克思、孔夫子、毛澤東和普丁，成為「習近平主義」的四大支柱。組成習近平理論的四種材料倒是齊備了，習近平及其文膽卻始終無法將它們捏合成一套高屋建瓴、吸引人心的理論體系。從「中國夢」到「四個全面」（「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嚴格治黨」），官媒渲染為絢麗煙火，民間卻視之為一地雞毛。網上有一位無名才子用一副對聯概括「習近平主義」，比所有御用文人挖空心思草擬的文稿都更加形象和精準：「江山是老子打的，誰叫你開口民主，閉口民主；龍位由本黨坐定，且看我今天抓人，明天抓人。」若用學術化的語言描述，正如美國學者伊莎貝·希爾頓所論：「如今中國的黨國體制是傳統官僚、儒家社會規則、共產主義說辭和國家資本主義的古怪混合體。法律架構自毛澤東時代以來有所發展，

但法規含糊，程序無常，而且全都受到政治上的控制。黨把許多政府職能據為己有，使自己立於不敗之地，而讓政府機構淪為缺乏最終權力的傀儡。」

習近平以為，踩在馬克思、孔夫子、毛澤東、普丁的肩上，就成了巨人，就能像林書豪那樣嫻熟靈巧地打籃球了，這是一種「打腫臉充胖子」的錯覺。《南德意志報》評論說：「與毛澤東的意識形態清洗不同，如今的運動只有一個攻擊的對象：西方及其價值被定義成敵人，同時中共卻無法提出具有說服力的替代價值。中共唯一可以期待的是人們順從的姿態。」習近平的刀把子發出閃閃寒光，其筆桿子卻軟弱無力。

中共在意識形態上的匱乏，無法透過將馬克思、孔夫子、毛澤東、普丁攪拌在一起來加以解決。美國學者馬暘（Damien Ma）、葉文斌（William Adams）在《匱乏》一書中指出，表面上看中國經濟日新月異，實際上中國在土地、能源、糧食、勞動力、食品安全、教育、福利、房屋、意識形態、價值觀和自由等領域的「匱乏」，讓習的「中國夢」不可能實現。今天的中國政府必須包容被統治者巨大的新期待，而非對抗先進的技術。以猛烈的經濟成長和不斷膨脹的經濟大餅，來換取被統治者的忠誠，這樣的舊式「大交易」正在瓦解。越來越多的中國公民正期盼新的社會契約——將個體的尊嚴和自由放在首位。

## 從「次法西斯」到「天朝主義」

在對外的面向上，「習近平主義」又有哪些表現？澳大利亞《雪梨晨鋒報》國際版編輯彼得·海切爾（Peter Hartcher）對中共政權的性質及其外交政策有較為全面的論述。在題為〈俄羅斯，中國，所謂的伊斯

蘭國政權都是法西斯〉的社論中，海切爾指出，法西斯有三大決定性特徵，首先是專制，其次是權力高度集中，第三是國家高於個人。就以上三個政權來說，俄國的普丁妄言「西方打算拔掉俄國熊的爪子和牙齒」，並試圖恢復「俄羅斯的偉大」；中國企圖克服西方帝國主義帶給他們的「百年恥辱」，一直對孩子們進行愛國主義洗腦，讓孩子們「勿忘國恥」；ISIS則宣佈要恢復哈利法，恢復伊斯蘭教的偉大。以灌輸仇恨、鼓動民粹、訴諸暴力而論，三者與德國法西斯何其相似！文章得出結論：「雖然在政體表面上三家各有不同，但實際上它們都是法西斯主義實體，它們放棄民主自由，追求暴力，對外擴張不願受道德與法律的約束。」

海切爾並非發現中共政權趨向法西斯化的第一人。早在二〇〇四年，中國獨立學者余世存就發表了一篇題為〈次法西斯時代的國家、社會和個人〉的長文，梳理了當代中國的政治生態和精神現象。毛時代之後，中國演變成「四不像」的國家。在某些方面，它相當資本主義；在某些方面，它又極端社會主義。有時，它慷慨資助那些意識形態上與自己近似的「小兄弟」，比如奉行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的北韓和古巴；有時，它又瘋狂地煽動民族主義思潮，聲稱要向近代以來欺壓過中國的西方列強展開復仇計劃。它一邊宣稱要弘揚毛澤東思想，一邊又抬出孔夫子和佛教來裝點門面、收拾人心，急迫之下甚至顧不上這些觀念、思想和宗教之間難以彌合的矛盾與裂隙。如何「定義中國」，對於中國知識分子和研究中國問題的外國學者而言，成為一個莫大的難題。

余世存認為，在全球範圍內，只有大陸中國，在內政的基本觀念、外交的基本原則上跟自由民主世界格格不入。這個文明古國在數千年間充當過東方世界的發動機，如今它倔強地保持另類、個色，它不合群。那麼，人們該怎麼談論它，怎麼稱呼它，怎麼指望它呢？余世存的概括

是：「這個時代同極右專制的法西斯主義類似，而在精神氣魄、社會動員能力、對外輸出等方面不如遠甚，稱之為次法西斯時代也許最為精準。」

余世存所提出的「次法西斯主義」的概念，適應技術官僚的江和胡的時代；到了習時代，就要將「次」字刪去了一正在成形中的「習近平主義」，在處理對外關係時，就是崇尚鐵與血、貨真價實的法西斯主義。習利用近代以來中國被列強欺凌的百年悲情，煽動狂熱的民族主義情緒，進而打造「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之夢」，如同希特勒利用德國在一戰中戰敗的悲情讓德國全民皆兵、人人都想報仇雪恥。

習近平大大提升了對民眾「仇恨教育」的烈度。對內，如同希特勒將猶太人、基督徒、社會民主黨人當作內奸和叛徒，習將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人權律師、非政府組織、各類宗教信仰者和各少數民族當作不穩定因素和危險分子加以整肅和迫害。對外，如同希特勒將西方民主國家和蘇俄當作勢不兩立的外敵，習近平將美國、日本當作未來「必有一戰」的敵人（黨國宣傳機器特別將民主體制成熟而穩固的日本妖魔化為「軍國主義復活」的國家）。經過長期洗腦教育，許多中國人一提起美國和日本，就牙齒發癢，恨不得「壯志飢餐胡虜肉，笑談渴飲匈奴血」；一說起新疆、西藏、香港和台灣，就夢想著大軍遠征，如同秋風掃落葉般地將「叛逆之地」夷為平地。

習近平秉持的「具有中國特色的法西斯主義」，亦是中國傳統的「天朝主義」的復活與升級。習的「天朝主義」超越了納粹德國的「日耳曼民族優越論」和日本帝國的「大東亞共榮圈理論」，成為法西斯主義的升級換代版。中國官方以「亞洲是亞洲人的亞洲」的說法欺騙亞洲各國，試圖阻止美國主導泛太平洋事務，其骨子裡思路卻是：習近平執政是「天命」所在，「朕即國家」在中國依然適用；中國不僅是世界

的「中心之國」，更是代表做為文明世界的整個「天下」。

習近平認為，「大國崛起」的事實決定了中國是亞洲乃至世界的主宰，與之相比，當年日本人「大東亞主義」的視野和胸襟不夠宏大。如今，亞洲以及世界，只能遵循中國制定的國際秩序和規矩，比如對領海的定義、對自由貿易的定義，都得由中國說了算。蘇俄學者 L. Perelomov 和 A. Martynov 在《霸權的華夏帝國》一書中指出，中國人秉持「中原」為中央、「蠻夷」為邊緣的宇宙觀，「不僅排除世界上另有文明中心存在的可能，也排除其他民族有維持獨立國家的能力。中國人認為宇宙和政治秩序的中心和源頭都只可能有一個，而這個中心就是在天朝的首都」。中國統治者的外交就是千年不變的「朝貢」體系，中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都是其「儀式性的附庸」。

習近平的「天朝主義」初露端倪，不少御用學者為之鍍金抹粉。最具代表性的是新左派學者汪暉的「理論概括」：習近平的一帶一路策略「是一條超越冷戰格局、克服新自由主義的未來之路，一條突破近代以來形成的霸權體系及其新形式的解放之路，一條以深厚的歷史文明及其近代歷程為背景的、綜合當代各種先進經驗的繼承創新之路」。在晦澀的新左派理論中打滾多年的汪暉，為了迎合習近平，終於說普通人都能聽懂的「人話」了。可惜，字裡行間瀰漫著濃郁的血腥味道。

「習近平主義」呼之欲出，對中國、亞洲乃至世界而言，是禍非福。西方世界缺乏像冷戰時代的美國總統雷根（Ronald Wilson Reagan）那樣高瞻遠矚的政治領袖，中國本土則尚未出現當年波蘭的團結工會那樣強大的、能與中共抗衡的力量。在此情形之下，每個人都挺身而出向習近平高聲說「住手」，是唯一能戰勝這個惡魔的方法。

## 誰是習近平的精神導師？—讀夏明《紅太陽帝國》

中國政治正在變得日益個人化，我們看到了「魅力式領導力」的回歸，這再次讓人想起毛澤東時代。

—凱利·布朗（Kerry Brown）

如何定義今天的中國，海內外知識分子莫衷一是：是共產主義，還是威權主義？是權貴資本主義，還是裙帶資本主義？是極權主義，還是後極權主義？似乎沒有哪個概念像一件合體的衣服，可以穿在中國的身體上。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以「紅太陽帝國」來命名之，雖然這不是一個嚴格的學術概念，對中國現狀的描述卻栩栩如生、繪影傳神。仍是人治的中國，領導人的性情與心理特徵對政權模式影響甚大。中共建政以來，想當「紅太陽」的中國領導人，除了毛澤東，就是習近平。毛果然成了熾熱的紅太陽，烤焦了整個中國；而習正在成為紅太陽的路上，他的敵人和朋友都在拭目以待。所以，夏明在《紅太陽帝國》一書中對中國現狀的分析，首先就從對習近平的分析開始。

有人萬分崇拜地將習近平看作中國和中共的救星，也有人輕蔑地將其當作小丑和笑話。這兩種看法都離真實的習近平甚遠。若要透視中共官方尚未出台的「習近平主義」，可將問題轉化為「習近平的精神導師是誰」？我曾將「習近平主義」概括成馬克思加毛澤東，以及孔子加普丁。香港評論人盧斯達敏銳地發現了習近平與漢武帝在創制個人專權體制上的相似性，而更多網友乾脆用「習特勒」的綽號表明習近平是「中

國版的希特勒」。在《紅太陽帝國》的序言中，夏明如此分析說：「習近平做為一個沒有理論根基、沒有意識形態完整體系的機會主義者，關心的是自己和他所代表的黨的權力，因此他會雜糅人類歷史上最黑暗和殘暴的權力術。對他來說，不僅毛和鄧的三十年可以打通，毛主義、鄧學說、馬克思主義、列寧主義、史達林主義、希特勒的納粹主義、墨索里尼的法西斯主義、東條英機的軍國主義都可以雜交生良種。這是習近平最大的破壞力所在，值得人們警惕。」夏明發掘習近平帝國的特性，集中在習近平的三個精神導師身上：朱元璋、東條英機和施密特（Carl Schmitt，德國法學家、政治思想家）。

## 習近平與朱元璋

文革以後至今，中共政權形成了一個新傳統，用習近平的說法就是「後三十年」，比如集體領導、最高領導人兩屆任期限制、軍方不再有常委代表、各大山頭尤其是元老家族均分肥缺等。江澤民和胡錦濤謹守鄧小平的遺訓，習近平卻不甘心「蕭規曹隨」，第一屆任期還未過半，以上新傳統就被其一推翻，用夏明的話來說，這是一場「憲法政變」。

夏明指出，這場「憲法政變」包括兩個方面。首先，「全面顛覆中共自己制定的八二憲法，十八屆三中全會基本廢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總理的權力交給國家主席」。關於「十三五」的經濟發展規劃，一反此前由總理出面報告的慣例，改由習近平赤膊上陣，從頭講到尾。據說，就連本應由李克強主持的國務院會議，習近平也常常突然出現，趾高氣揚地發表「最高指示」，讓李克強在一旁沉默不語。李克強雖然還在

位，但總理的傳統權力基本被剝奪殆盡。

習近平從李克強手上奪權，跟朱元璋借助胡惟庸案廢除宰相制如出一轍。朱元璋留下的遺詔中明確宣佈：「自秦始置丞相，不旋踵而亡。漢、唐、宋雖多賢相，然其中多小人，專權亂政。今罷丞相，設五府、六部、都察院、通政司、大理寺等衙門，分理天下庶務，事皆朝廷總之。以後嗣君，毋得議置丞相，臣下敢以此請者，置之重典。」明朝的制度與漢唐宋相比，最大的不同就是君王親自獨裁。然而，宰相沒了，並不意味著政治就清明了。朱元璋廢寢忘食處理政務，倒還能勉強維持龐大帝國的運轉；而此後他的後代大都是不肖子孫，把權力委託給太監頭子，遂釀成大禍，正如明史學者孟森在《明史講義》中所說：「太阿倒持，終不可免，權相之外，又有權閹，事固有出於所防之外者矣。」

其次，習近平以中紀委為鐵拳，掀起反貪運動，震懾官僚集團。這跟明朝的皇帝任用宦官主管錦衣衛、東廠和西廠等特務機構，控制文武百官非常相似。明朝的皇帝認為太監沒有子孫後代，故而忠心耿耿地為朝廷服務。習近平信任中紀委書記王岐山，也是因為王岐山沒有子女，故而可以做到鐵面無私（毛重用沒有子女的周恩來也是如此）。但是，明朝的皇帝重用特務機構，踐踏法制，擾亂行政系統和軍事指揮，帶來更大的弊端。孟森評論說：「明以詔獄屬錦衣衛鎮撫司，遂奪法司之權，以意生殺，而法律為虛設，蓋弊在詔獄，尚不在緝事也。至設東廠以宦官領緝事，是即所謂皇家偵探，其勢無可抵抗，誣陷栽贓，莫能與辯，其所謂有罪，即交錦衣衛治之。於是詔書獄超法律之外，東廠緝事又絕裁抑之門。成化中以一東廠為未足，更益以西廠，而緹騎倍之，校尉所至，遍南北邊腹各地，又絕非都城地方巡徼之事任。此所以為明代獨有之弊政也。」

今天習近平掀起運動式反腐、選擇性反腐，同樣無法拯救黨國的衰

亡。當官僚集團失去理想與方向、深陷於貪腐的泥沼，最高統治者不是啟動民主與憲政改革，而是不斷設置新的監察和特務機構，於是，公檢法、監察部、反貪局之外，還有政法委、中紀委，乃至又設置國家安全委員會。疊床架屋的特務機構之間彼此爭鬥無休無止，將所有人都當作敵人對待，這就是警察國家的「維穩」特徵。最後，法治的根基被破壞無遺，整個政權不可遏止地走向自我毀滅。

夏明點出了習近平與朱元璋在施政上的相似性，而這種相似性也來自於兩人極為類似的早年經歷。美國歷史學家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西方將主宰多久？》一書中論及朱元璋時指出：「朱元璋的所有詔令聽起來都好像與他糟糕、貧窮和暴力的幼年生活有關。」習近平何嘗不是如此？習近平顛沛流離的少年時代，使他成年後始終沉浸在驚弓之鳥的感覺當中，這種深深的不安全感，讓他每每以攻為守、先下手為強。

## 習近平與東條英機

夏明所謂的「紅太陽帝國」有兩重涵義，一是文革時代的毛澤東帝國，二是軍國主義的大日本帝國。習近平打著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的旗號在北京大閱兵，等於向世界宣佈，他是日本軍國主義和「大東亞共榮圈」理念的繼承者。

夏明從習近平的重要智囊、已成為政治局委員的王滬寧的文章中發現了這個秘密。毛時代的文膽如陳伯達曾躍升龍門，位居五大常委之列；但在鄧小平時代之後，只會搖動筆桿子的御用文人一般很難再成為「黨和國家領導人」，王滬寧是唯一的例外。他先後服侍過江澤民、胡

錦濤和習近平三個主人，堪稱不倒翁。他被習近平重用，不僅因為他是新權威主義的鼓吹者，更因為他是「紅太陽帝國論」的始作俑者。

夏明發現，王滬寧在其早年的著作《美國反對美國》的最後一章中，論及八十年代日本對美國的新一輪挑戰，並斷言美國的個人主義、享樂主義和民主主義必然輸給以日本為代表的亞洲的集體主義、忘我主義和權威主義體制。然而，十年之後，日本在經濟泡沫中倒下，美國依然是唯一的超級強國，王滬寧的判斷成為泡影。不過，王的另一個判斷，「在下一個世紀裡，必然會有更多的民族也向美國提出挑戰」，則由今天習近平執政的中國來實現。王滬寧隱藏在文字背後的心思意念是，中國將替代日本，以紅太陽帝國的態勢，「試圖把美國，或者說美國賴以立國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的箴言，推向危機和失敗」。這個想法，與習近平不謀而合。

二〇一四年五月，習近平宣佈了由中國主導的「亞洲安全觀」，其內容包括「四個安全」：「共同安全」、「綜合安全」、「合作安全」、「可持續安全」。也就是說，要建構和西方主導的安全觀相反的「中國價值觀」和「中國模式」，並進一步延伸為「亞洲觀念」。習近平以「三個歸根」總結：「亞洲的事情，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辦；亞洲的問題，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處理；亞洲的安全，歸根結柢要靠亞洲人民來維護。」有分析家說，這有點像當年美國的門羅主義，但實際上它更像日本的「皇國史觀」和「大東亞主義」。

日本「皇國史觀」之核心思想是：神化大和民族、日本天皇和日本宗教及文化，宣揚「自存自衛」和「解放亞洲」的「聖戰」、「正義之戰」。它由持國粹思想主義之學者如大國隆正之流打造，進而演變成類似中國民族主義般、自命為高人一等之天朝觀念。而東條英機只是一個被這樣的思想觀念洗腦的無知軍人而已。

近年來，許多日本進步知識分子對大東亞共榮圈背後的極端民族主義和民粹主義做出深切反思。比如，日本學者堀幸雄在《戰前日本國家主義運動史》一書中指出：「席捲日本的瘋狂，其最大的源泉是從近代延伸下來的日本主義思想。」他認為，日本主義的問題在於不能做出邏輯性解釋。這種導致日本破滅的國家主義運動，一方面旨在通過建立國家社會主義來改造國家；一方面，連綿不斷地維持著日本精神的日本主義驕橫跋扈之時，所有的人都被瘋狂的波濤所吞滅。

又如，日本思想史家子安宣邦致力於破除東亞這個概念的迷思：「東亞絕非不證自明的地域概念。它於一九二〇年代的帝國日本做為文化的地域概念被建構起來。從一九三〇至一九四〇年代，伴隨著帝國日本對以中國為中心的亞洲地區展開的政治、經濟、軍事，還有知識上的經營策劃，東亞成了一個具有強烈政治意味和地緣政治學色彩的概念。為了得以重構這個東亞概念，我們必須弄清楚與帝國日本一起誕生的此概念的譜系，必須看清楚它的消亡過程。不如此，我們就無法保證新興的東亞概念，不會成為由帝國日本主導的亞洲廣大區域之幻想的死灰復燃，不會再出現帝國亡靈式的話語。」子安宣邦對「東亞」這一充滿帝國主義色彩的概念的批判和解構，不僅是針對日本，亦是針對中國。

可惜，從王滬寧到習近平，都不願傾聽這些逆耳之言，而寧願重蹈東條英機之覆轍。習近平以東條英機為師，在處理南海問題時，耗費比新建三峽大壩還要多的軍費修建人工島，罔顧國際公約和國際法庭，使得南海成為第三次世界大戰的引爆場，學者楊魯軍置疑說：「我真的不知道耗資巨量南海工程的真實目的和綜合價值究竟何在？為什麼不將這筆錢用於七千萬中國人的脫貧？」

## 習近平與施密特

二〇一四年十一月，中國社會科學院宣佈成立國家意識形態中心，其目的是「打贏新三十年意識形態的鬥爭」，特別要壓制和打擊近年來網路新媒體中佔上風的自由派言論。此前，中共官方的宣傳機構在習近平的默許之下，推出若干御用學者充滿文革遺風的種種謬論。其中，特別突出的是夏明稱之為「新四論」的荒誕言說：楊曉青的「憲政屬資（資本主義）論」、劉亞洲的「黨性神性論」、《解放軍報》的「宇宙真理論」、劉小楓認毛為父的「新國父論」。而復旦大學教授蘇長和甚至致力於「將西方民主知識從普世降為地方級別」的學術研究。

八十年代率先將西方基督教思想引入中國而在學界享有盛譽的劉小楓，突然華麗轉身，尤其讓人矚目。當然，這不是劉小楓一個人的問題，同樣華麗轉身的還有甘陽等人。單單從「被招安」的利益訴求來分析他們的突變是不夠的，還需要有更細密的學理層面的分析。劉小楓的轉變，從他十多年前鍾情於納粹法學家施密特就開始了。這也是夏明的一個疑問：為什麼八十年代中國知識分子熱捧倡導「開放社會」的英國思想家波普爾，而最近十多年來，德國的施密特卻成為中國思想界的新寵？

夏明對施密特的思想體系做出四點簡明扼要的概括：其一，施密特認為個人主義和國家利益形成內在矛盾，議會民主議而不決，無法打造強大的國家；其二，憲政需要「主權者」行使決斷權，「緊急狀態權力」則成為一種超憲政權力；其三，「敵友之分」是政治的核心概念，政治的目標就是阻止「敵人」獲得政權；第四，主權者或領袖成為滿足上述要求的重要條件。所以，施密特會義無反顧地為希特勒服務，甚至在第三帝國灰飛煙滅之後，也從不認罪和懺悔。

毛時代之後，中共無法生產出富有活力的意識形態，鄧小平的「不管白貓黑貓，只要逮到老鼠就是好貓」和「摸著石頭過河」的「貓論」和「摸論」，只是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的常識，不足以構成激動人心的「精神原子彈」。虛榮浮誇的江澤民提出「三個代表」、謹小慎微的胡錦濤提出「科學發展觀」，都只是在鄧小平給他們劃定的疆界內「守成」而已，他們沒有動用巨大的資源營造一套自圓其說、乃至向西方普世價值挑戰的「江澤民主義」或「胡錦濤主義」。但習近平跟他們不一樣，習有重塑中國官方精神符號和意識形態的雄心壯志。

為了成為人民的精神導師，習近平首先需要塑造「習近平主義」或「習近平思想」。他不僅向中國兩千年專制主義傳統汲取養料，不僅從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中尋求幫助，也不排除向施密特這樣在西方被唾棄的思想家取經。於是，做為施密特代言人的劉小楓，從在西方漂泊的邊緣人成為在北京享受高等華人待遇的「紅人」。劉小楓與王滬寧之間是否建立起一條「思想熱線」，外人不得而知。但王滬寧顯然從劉小楓和施密特那裡拿來若干思想資源，呈送給習近平，並被習近平轉化為中國新法西斯主義的思想原則。當年，蔣介石拼命向希特勒學習，卻畫虎不成反類犬；如今，習近平從施密特那裡拿來納粹的思想精華，或許能夠讓枯竭多年的官方意識形態重新生機勃勃。

至於「紅太陽帝國」最終能否在習近平手上打造成形，我和夏明的回答都是否定的——當中共宣傳部的內部文件中命令，將「習以為常」這樣的成語做為「禁用語」的時候，以習近平為代表的、沒有任何道德底線的「不義之徒」，不可能帶領中國平安地「出三峽」。夏明通過梳理習近平與朱元璋、東條英機和施密特三個精神導師的傳承關係，點中了習近平的死穴。

## 是勝利閱兵，還是末日狂歡？

正步是世界上最令人厭惡的景象之一。這簡直就是對赤裸裸的權力給予肯定；故意甚至蓄意地給人一種用腳踩在臉上的畫面感。

—喬治·歐威爾

以紀念抗戰勝利七十週年之名舉行的北京大閱兵，其實是包子帝的登基大典。在持續一個多小時的閱兵時間裡，習近平表情凝重而愁苦，彷彿不是穩操勝券，而是大禍臨頭。在其空洞無物、聲嘶力竭的講話中，唯一的亮點是宣佈裁軍三十萬。習以此顯示中國是世界和平的倡導者和捍衛者。然而，媒體很快披露，裁撤的軍隊將轉移到武警部隊，駐守新疆。做為準軍隊的武裝警察（宛如黨衛隊）和國保警察（宛如蓋世太保）膨脹的速度，超過軍隊減少的速度。裁軍並未改變中國的軍國主義和警察國家的本質。

紀念抗日戰爭勝利，是習近平操辦大閱兵的由頭和幌子。然而，很多抗日老兵孤苦無助，若干抗日將士陵墓荒草淒涼，數以千計倖存的日軍慰安婦靠民間人士的接濟存活，抗戰研究隸屬於中共黨史的一部分並被當作宣傳工具利用，在此背景之下，「紀念」該從哪裡開始呢？中國流傳一個段子—老師：「請用『竟然』造句。」小明：「一個一九四九年成立的國家，竟然在一九四五年成為了戰勝國。這國在國慶六十六週年之時，竟然閱兵慶祝勝利七十週年。」老師：「滾出去！」

弗朗茨—史蒂芬·加迪在〈耀武揚威的國家愛閱兵〉一文中指出，

歐洲對閱兵式的影響體現在當今亞洲國家閱兵式的行進方式上，士兵的步伐通常是由普魯士正步（Steckschritt）演變而來。這種正步在中國、俄羅斯和朝鮮尤為流行。「參加過閱兵式的人都無法否認，踏著軍樂節拍、以完全一致的步伐前行時，產生的那種激動人心卻麻木頭腦的感覺，以及士兵與觀眾之間建立的讓人陶醉的詭異聯繫。」於是，除了有檢閱之權的獨裁者之外，士兵和觀眾都成了哈羅德·羅森堡所說的「獨立思想的羊群」。

習近平在閱兵式上的講話中，使用頻率最高的詞語就是「和平」，他先後重複了十六次。這跟希特勒一模一樣：對於獨裁者來說，「和平」的真實涵義是「戰爭」。因為，和平的標誌，是鮮花，而不是坦克；和平的保障，是每一個能夠獨立思考和表達的個體，而不是像烏雲一樣壓過來的人體方陣。正如弗朗茨—史蒂芬·加迪所論：「儘管閱兵式非常誘人，給人造成有力的視覺衝擊，但它體現的卻是軍國主義，這種危險的事幾乎是所有主權國家的核心。英語的『parade』一詞源於拉丁語『parare』，意為準備。縱觀歷史，『閱兵式』（military parade）都是在幫助公民準備面對戰爭。」

中國大閱兵的真實用意，北京軍區王健中將在二〇一五年八月三十日《人民日報》上發表文章說得清清楚楚：參與閱兵的一萬兩千名官兵，「練的是隊列，鑄的是軍魂」，閱兵訓練是忠誠訓練，閱兵是忠誠宣誓，「閱兵首先檢閱的是三軍將士對黨中央、習主席的無比忠誠和堅決擁護」。這就是真相：習以法西斯式的大閱兵，紀念反法西斯戰爭勝利七十週年，堪稱當今世界最大的黑色幽默。這是過去三十年內唯一一支向平民開槍的軍隊，在犯罪現場向自以為是皇帝的獨裁者宣誓效忠，只要獨裁者一聲令下，就可再次殺人放火。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習近平以儒家理念和毛澤東思想包裹的法西斯

主義，卻無法讓三心二意、「有奶便是娘」的中國民眾引以為絕對信念。北京大閱兵放假三天，國人爭先恐後赴日本旅遊和「掃貨」、「爆買」，連馬桶蓋子和電飯鍋都不放過。還不如當初中國在汪精衛的領導下當日本的殖民地，國人每天使用的就全是「日本製造」，不必千里迢迢跑到日本「掃貨」、「爆買」了。

更讓習近平「不開心」的一個事實是：在閱兵式上，中國的電視台和攝影記者使用的攝影機、照相機等器材，全都是索尼、佳能等日本品牌。跟他站在天安門城樓上同一排的前中共政治局常委、主管宣傳事務的李長春，也手持一台高級佳能相機拍得不亦悅乎。習近平那偉大光輝的形象，居然要靠日本的產品來記錄並傳播，抵制日貨、堅壁清野看來是一個遙不可及的幻想。

## 陳瓊書與習近平：一場巾幗與鬚眉的戰爭

皇帝閱兵，百姓遭殃。據河北《燕趙都市報》報導：為配合北京閱兵，河北各地紛紛出台減排措施。安新縣三台鎮要求在九月一號到九月三號的三天內，各家各戶一律不准生火做飯。為了落實變霧霾為藍天，鎮政府給各家各戶的灶台貼了封條，並撻下狠話，不遵守就拘留！網友感慨說：「就算我發揮了自己所有想像力的極限，就算我用最大的惡意來揣測這個朝代的荒唐，我也無法想像：為了保障這次大閱兵的空氣品質，竟然限制老百姓生火做飯？還要封灶台？真是瘋了！」

這則新聞揭示了兩個真相：一是中國北方農村大部分民眾使用柴禾生火做飯，生活在兩千年一以貫之的「前現代文明」之中，現代的天然氣、煤氣和電力離他們遙遠之極。這樣的中國，能趾高氣揚地宣稱已然

「崛起」嗎？其二，北京的獨裁者無視民眾的基本權利，將百姓當作任意欺凌和壓迫的螞蟻，為滿足獨裁者的虛榮心，不惜讓民眾餓肚子。這一做法，是毛澤東當年製造大饑荒餓死三千多萬農民的暴行的延續。所以，「閱兵藍」就是「法西斯藍」。

不僅不讓生火做飯，還不准看病和生孩子。北京當局此前通報，位於閱兵式核心區的北京的協和醫院（東西院區）、中醫醫院、世紀壇醫院、口腔醫院、人民醫院、阜外心血管醫院、同仁醫院等醫療機構，要在閱兵期間停診，保障閱兵順利進行。有網民表示，由於閱兵當日長安街的醫院全面停診，臨盆的產婦全改在前一天剖腹產子，有醫生更一連為九名孕婦剖腹接生，忙得不可開交。還有網民透露，醫生告知身邊一名懷孕四十週、但仍未有動靜的孕婦，一定要捱過九月三日閱兵過後才能安排生產。看來，習近平將毛澤東的名言「人定勝天」活學活用，他可以控制孕婦生產的時間！

在法西斯暴政的高壓之下，還有人敢公開反對大閱兵嗎？在威風赫赫的閱兵之外，有另一場巾幗與鬚眉、正義與邪惡的戰爭正在悄悄地展開，那就是陳瓊書與習近平的戰爭。

在舉國癡狂中，一個巾幗英雄站出來，她就是我的鄉親、四川成都溫江出租車司機陳瓊書。此前，陳瓊書因參與維權活動，被以「擾亂社會秩序罪」判刑十六個月。在刑期還剩五十天左右被判緩刑，釋放回家。她不顧自身安危，在網上發表置疑大閱兵的言論：「習主席，你拿全國納稅人的錢搞這麼大陣勢的閱兵，要準備打日本收復釣魚島嗎？花這麼多錢閱兵也不願解決老百姓的問題，花這麼多物力人力財力，聚集這麼多人閱兵，讓天安門周邊的單位、工廠、學校、居民、店鋪，不能正常通行、工作、學習、生活，難道這些證據不正證明你在聚眾擾亂社會秩序？」這個帖子一發出，當局立即收回緩刑決定，重新將她抓進監

獄。

習近平可以不費吹灰之力地將陳瓊書關進監獄，卻無法迴避此一鐵的事實：公民陳瓊書的挺身而出，乃是獨裁者垮台的開端。習剛掌權時，論及蘇聯解體、蘇共被宣佈為非法組織的歷史，說了一句「竟無一人是男兒」。這句話是從後蜀亡國之後，花蕊夫人所作之詩句化用而來：「君王城上豎降旗，妾在後宮那得知？十四萬人齊解甲，更無一個是男兒。」其實，這句話應當由陳瓊書來說：偌大的中國，居然「萬馬齊喑」，只剩下一個弱女子說幾句真話，並付出牢獄之災的代價。這究竟是中國人的榮幸，還是中國人的悲哀？

大部分中國人已淪為「奴在心者」，春秋戰國時代的血性和原氣早已蕩然無存。中國再也沒有荊軻、聶隱娘、專諸那樣「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的刺客與俠客。那些精挑細選的「被操」官兵，尤其是飛行員，祖宗三代都用放大鏡檢視過，個個家世清白、根正苗紅，本人一定安於做奴隸的命運。

十三億中國人，大都像動物莊園裡的豬們，習慣了、適應了豬圈中無憂無慮的生活。習近平在大閱兵中展示數十種先進武器，包括據說可以一舉擊毀美軍航母的新型導彈——至於是不是「豆腐渣導彈」，除了徐才厚、郭伯雄之外，大概只有習近平一個人知道真相。不過，真相在中國並不重要，習近平要與民同樂，人們也興致勃勃地討論這些武器的型號和性能，暫時忘記了股市的出血和房市的飄搖。

於是，我的眼前出現了一幅激動人心的圖畫：一群豬在豬圈裡興奮地議論時事。一隻豬宣佈：「聽說主人又搞到一把很牛的殺豬刀……」其他的豬七嘴八舌地評論起來——「威武！」「牛逼！」「看誰還敢欺負我們……」

## 誰是大閱兵的第一配角？

習近平一個人閱兵，覺得形單影隻，不足以顯示天朝神威。既然紅花要綠葉襯，到哪裡去找綠葉呢？中國頭一次慷慨大方地向全天下發出英雄帖。民主國家的首腦不會前來為習近平的軍國主義典禮背書，接受邀請的客人全都是跟習近平狼狽為奸的獨裁國家的首腦。義大利《共和報》分析指出，參與北京閱兵與否，將世界劃分為兩大陣營，一方以中國與俄羅斯為首，一方是親華盛頓的美歐、日本、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等。兩個陣營涇渭分明。

習近平是閱兵的男主角，第一號配角是誰呢？是站在他左手邊的江澤民、胡錦濤、李鵬等前朝元老嗎？當然不是。江澤民白髮蒼蒼、行將就木，胡錦濤雙手發抖、疑似患上帕金森氏症，李鵬據說是打了強心針才能站立得住。這幾名老賊掙扎著站在一邊，只是為了向世人顯示他們還沒有被「打倒」，他們的子女也不會成為習近平反腐運動的目標。

那麼，這場閱兵的第一配角，是站在習近平右手邊的俄羅斯總統普丁嗎？普習結盟，世人見怪不怪，成不了大新聞。是唯一一名歐洲民主國家的元首捷克總統澤曼嗎？在習眼中，這個國家或許太小了。是潘基文和朴槿惠嗎？聯合國秘書長這一「世界首席公務員」以及韓國民選總統前來參加閱兵，似乎是習近平最大的收穫。但是，在當年韓戰的戰場上，韓國是中國的敵人。如今，這兩個韓國人參加北京閱兵，只是迎合韓國民間的反日情緒，以及出於經濟貿易方面功利主義的考量。他們的內心深處未必將中國當作值得信賴的盟友。更何況，朴槿惠雖是民選總統，卻是獨裁者朴正熙（同時也是日本殖民時代的日軍軍官）的女兒，她的這一身分對抗日主題未必能增色。而白俄羅斯總統盧卡申科、埃及軍政權總統塞西、委內瑞拉總統馬杜羅、越南國家主席張晉創、巴基斯

坦總統侯賽因、北韓勞動黨書記崔龍海等人，個個都是獨裁者或其幫凶，那就更等而下之、上不得檯面。

誰也想像不到，國際媒體報導最多的習近平的客人，是因反人道罪行受到國際刑事法庭通緝的蘇丹總統巴希爾。習近平的第一號配角，無疑就是黑面羅剎巴希爾。巴希爾的出現，讓更多西方媒體報導被刻意冷落的大閱兵，對於習而言，是不是「失之東隅，收之桑榆」呢？

據「人權觀察」組織指出，巴希爾早該被送到海牙受審，他不應被任何國家奉為座上賓。由於蘇丹政府軍在該國西部達爾富爾地區長年犯下殺人、強暴及其他重大國際罪行，國際刑事法院已對巴希爾發出兩項逮捕令，其一是二〇〇九年的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其二是二〇一〇年的種族滅絕罪。前述逮捕令的法源出自二〇〇五年的聯合國決議案，聯合國那年將達爾富爾案件移送國際刑事法庭。當年安理會表決時，中國投了棄權票。而聯合國這項決議則要求所有各國合作，協助國際刑事法院調查巴希爾一案。

從此以後，巴希爾只到訪那些非國際刑事法庭成員國。中國不是國際刑事法庭簽約國，巴希爾無需擔心在中國旅行期間遭到逮捕，更何況，他是習近平的貴賓。國際媒體批評說，北京邀請巴希爾出席紀念閱兵式，不但有損中國做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信譽，更顯得諷刺、漠視國際正義。不過，習近平從不在乎國際媒體的批評，「我行我素」是獨裁者的「英雄本色」，用四川諺語說就是「虱多不癢，債多不愁」。

巴希爾在達爾富爾地區的屠殺，跟日本軍隊在中國的屠殺，本質是一樣的。習近平將巴希爾安置在天安門城樓上，不正表明習認同其暴行嗎？或者說，巴希爾身上吸引習近平的地方，就是殘暴與專橫。他們彼此成為對方的一面鏡子，「對鏡黏黃花，相看兩不厭」。

## 「連爺爺」朝拜「習大大」，國民黨融入共產黨

閱兵，亦是閱人。若干香港影視明星在閱兵典禮的貴賓席閃亮登場，並「翻牆」到中國上不了的臉書上抒發愛國情懷，聲稱國歌一響便「熱淚盈眶」，戲子的言論自然當不得真。比影帝影后更有趣的人物，是雖然上了天安門城樓，央視卻吝於給其鏡頭的國民黨前主席、中華民國前副總統連戰。「烈士暮年，壯心不已」的連戰再度披掛上陣，繼十年前的連胡會之後，又參演連習會。中國的網路上，一片「連爺爺又來了」的打趣之聲。

沒有收到請柬的馬英九，萬分嫉恨之下，嚴令有關部門強力阻止連戰成行。就連郝柏村也放話說，有關人士不宜成為中共的統戰工具，並對退役將領說了重話——「跑到打敗你的那邊看人家閱兵，這算什麼？」還正告說，若想站到中共閱兵台上看閱兵，就應該放棄退休俸。這一次，連戰遭到台灣島內藍綠兩大陣營的共同杯葛。

然而，連戰為了給去年敗選的兒子尋找出路，不惜拼了一把老骨頭。陸委會無可奈何地宣稱，並無切實辦法阻止連戰成行。時任國民黨主席的朱立倫對媒體表示，國民黨亦無能為力。

在中國最大的入口網站之一的騰訊網製作的閱兵專題中，就有「解放軍新式武器攻島3D視頻」供大眾觀看。所謂「攻島」，遠的是日本，近的是台灣。國民黨出了一個汪精衛還不夠，還要出一個連戰——「連爺爺」不僅親臨西湖邊上的秦儉跪像，學習觀摩如何賣國賣得更徹底；還笑容滿面地欣賞將兩千多枚導彈對準台灣的解放軍導彈部隊，就像猶太人興沖沖跑去觀摩納粹閱兵一樣，也可以跟被晉國俘虜之後「樂不思蜀」的劉阿斗相媲美。

若說國民黨是一個空曠的房間，那麼連戰似乎成了「房間裡的大

象」。朱立倫這個黨主席當得太窩囊了，假裝這頭大象不存在。二〇一四年年底的選舉大敗之後，國民黨快刀斬亂麻地開除了多名有改革思想或異議立場的立委、議員及名流之黨籍，卻無法處理綁架整個國民黨投靠中共的連戰，可見這個黨無藥可救。

國民黨並非只能對連戰束手無策，最好的約束機制，我早在十年前連戰邁出「兩岸破冰之旅」時就建議過：以開除連戰之黨籍為最後通牒，看連戰敢不敢「出國民黨、入共產黨」。

連戰說不定就此加入中國共產黨，或者組建一個類似中國豢養的「八大民主黨派」（其中有一個就叫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簡稱「民革」）那樣的新政黨，成為中共領導之下的第九個「民主黨派」，其黨章的第一條一定是「擁護中國共產黨的領導」。

對於國民黨來說，開除連戰之黨籍，乃是順理成章之舉。連戰的媚共行為，不僅出賣台灣、出賣中華民國，亦是出賣國民黨。國民黨若不處理，必將引發效仿浪潮，會有更多「身在曹營心在漢」的大佬冒出來。那麼，國民黨乾脆就改稱「共產黨台灣支部」算了，前兩次國共合作失敗，這一次一步到位，合二為一，豈不皆大歡喜？

連戰之智囊宣稱，連戰此行，是為了捍衛抗戰歷史的闡釋權。這個說法真是自欺欺人。就抗戰而言，台灣不同族群、不同背景、不同世代和不同政治立場的人物，各有不同的認知及史觀，本無可厚非。然而，當某些媒體和人士攻擊和辱罵李登輝的「日本史觀」時，卻對連戰赴北京朝聖、匍匐在「中共史觀」面前保持沉默。中共長期跟國民黨爭奪抗戰史的闡釋權，如今更在電影海報中將參加開羅會議的中國領袖從蔣介石換成毛澤東。習近平大概看多了《來自星星的你》之類的韓國穿越劇，下令將抗日劇拍成穿越劇模式。為此，習近平親自穿越時光隧道，到七十多年前的世界走一遭，將毛主席從延安搬運到開羅。連戰敢於當

面揭露習近平的造假嗎？在閱兵式上出現的少許國軍抗戰老兵，不被允許穿上國軍服裝，這是偽造歷史外加人格羞辱，難道連戰老眼昏花全都沒有看見嗎？

國民黨縱有千般不是，當年在抗戰中確實有所貢獻。真正有資格站在主席台上閱兵的，不是一九四九年才成立的獨裁政權的元首；而是當年為自由、獨立和尊嚴浴血奮戰的將士們。昔日身經百戰的國軍官兵，大部分都留在中國，多年來淪為賤民，被逮捕、關押、殺害，存活者百不足一。即便如此，中共仍然使用卑劣手段羞辱少數倖存者。中共宣佈發給參加過抗戰的老兵每人五千元補助，這點牙縫裡的錢只要從徐才厚、郭伯雄的私人金庫中拿出少許就可以應付了。然而，中共小肚雞腸，念念不忘加一句「但書」：凡參與過國共戰爭的國軍人員，皆不能領取此獎金。可見，在習近平眼中，打過共產黨的國民黨，永遠是敵人；唯有像連戰這樣「不戰而降」的國民黨，才能放心大膽地當作奴才使喚。

這個世界上，還有真國民黨人嗎？中國民間抗戰史研究者章東磐在《父親的戰爭：中國遠征軍滇西抗戰田野調查筆記》一書中，記載了若干遠征軍將士在中共統治下的悲慘遭遇，「他們一概衰老、貧病、孤寂地苦度著自己的風燭殘年」。比如，曾經在怒江東岸防線上任炮兵連長的張子文老人，抗戰勝利後即回鄉教書，並未與共軍交手。一九五六年的某一天，剛授課完畢，他就被找去「談話」。沒有機會告別妻女，甚至談不上審判，就被投入勞改農場，罪名是「歷史反革命」。從此，是長達二十六年的牢獄之災，劫後歸來時已垂垂老矣。

留在中國遭中共政權凌虐、殺害的抗日英雄，比戰死沙場者還要多。張子文老人是真國民黨人，是真民族英雄。台灣那些自詡「深藍」的人物，哪一個有張子文老人這麼「藍」？哪一個在這位老人面前不羞

愧萬分？

連戰若要登陸，首先就應當以中華民國卸任副總統、卸任行政院長以及國民黨前主席的身分，尋訪還健在的國民黨老兵，向他們鞠躬道歉，將億萬家財（本來就是不義之財）捐獻一丁點出來，幫助老兵過上稍稍安逸的、有尊嚴的晚年。

連戰不願也不會這樣做，他只敢站在晚輩習近平身邊，察言觀色，低眉順首，以維持「大連艦隊」在兩岸政商集團中搖搖欲墜的最大份額。而國民黨不敢開除連戰的黨籍，是因為在連戰背後為之撐腰的，是習近平。國民黨派系鬥爭你死我活，但只要被習近平「開過光」的大佬，其他人在其面前都自覺矮了三分，連馬英九和朱立倫都退避三舍。那麼，藍營中還有誰敢跟連戰這個「太上黨主席」為敵呢？

習近平不會不知道，連勝文在台北市長選舉中一敗塗地，已經表明以連家為代表的國民黨買辦階級在台灣已經聲名狼藉；但是，為了滿足統領天下、恩澤台灣的虛榮心，習近平就掩耳盜鈴地將連戰當作台灣的代表，連戰的叩首，就意味著台灣的歸心。

## 習近平有陸克文想像的那麼聰明嗎？

扔掉你聽來的有關他們多麼傑出、多麼前瞻的所有說法吧。從他們目前的拼命掙扎來看，他們對自己在做什麼一無所知。

—保羅·克魯格曼（Paul Robin Krugman）

澳大利亞前總理陸克文（Kevin Michael Rudd）在紐約的亞洲協會發表演講，針對喬治·華盛頓大學國際關係教授沈大偉（David Shambaugh）「共產黨在中國統治的殘局已經開始」的觀點，做出嚴厲批評：「我認為沈大偉的看法完全沒有道理，用中國話說，這是胡說八道。」

想像著也是中國問題專家、中文流暢的陸克文將「胡說八道」這個不文雅的詞語脫口而出的場景，我不禁感到好奇：一向風度翩翩的陸克文，為什麼為了遙遠的中國議題大發雷霆？人家又沒有批評你在澳大利亞執政期間的糟糕政績，即便是唱衰北京，似乎不值得你大動肝火—真正該發火的應該是習近平，什麼時候，陸克文當上了習的宣傳部長？

猶記得十年之前，我到澳大利亞參加國際筆會的會議，會後去位於坎培拉的澳大利亞國會拜訪，與多位議員探討中國人權議題。那一次，我與陸克文有過一面之緣。那時，陸克文只是在野黨的國會議員和影子內閣的總理。我聽說他是較早研究西單民主牆和中國民主運動的西方學者之一，便向他介紹中國的人權狀況。然而，他似乎對人權議題興趣闕如，倒是津津樂道於他的寶貝女兒在上海做交換學生的經歷，並對中國

經濟的發展做出極為樂觀的評估。

這一次，陸克文自告奮勇充當中國政府和習近平的辯護士，辯才無礙、口吐蓮花。他認為，中國經濟放緩是正常現象，未來中國經濟增速為百分之六。「儘管中國經濟的自然增長可能甚至達不到百分之六，但中國有足夠多的金融政策能力以增強其增長速度。」他表示，對中國未來六到七年的展望是比較樂觀的。

中共領導人可不敢如此樂觀：胡溫時代，信誓旦旦說要「保八」，彷彿保不住八就要大禍臨頭；習時代，則改口說增長率為七是「新常態」。習近平在十八屆五中全會上，將「十三五（二〇一六年至二〇二〇年）」時期經濟增長預期目標下調至百分之六點五。

實際上，中國的經濟狀況更糟糕。國際經濟諮詢機構正在完善衡量中國經濟增長的方法，學者們普遍認為，中國可能不只是硬著陸，而是經濟崩盤。Fathom Consulting 使用發電量等最不容易混亂的標準衡量中國經濟增長，預測二〇一五年中國經濟增速僅為百分之二點八——這是一個讓人震驚的數字，通常人們認為增速降到百分之六以下就是「硬著陸」。

陸克文的樂觀，建立在他對中國政府以及中共領導人的正面評估之上：「中國政府不是傻瓜，中國政府有很多很聰明的人，他們知道哪些因素會影響增長速度，他們也知道什麼時候加以干預，他們還有三十五年這麼做的經驗。」然而，習近平絕非陸克文想像的「聰明人」，習教育程度有限、知識不足，不懂經濟，偏偏又要干預經濟政策，必然像毛「瞎指揮大躍進」那樣，帶來致命後果。

陸克文又從四個方面駁斥沈大偉的「中國政治經濟崩潰論」。在我看來，他的這四個論點才是畫餅充饑、無稽之談。

## 地方債務的泥潭有多深？

陸克文的第一個論點是，中國地方政府的債務危機並沒有沈大偉說的那麼致命。陸克文說：「中國政府瞭解這一問題並採取了重大措施」；「中國的問題不像很多國家欠了外債，所有這些中國地方政府欠的都是內債，因此，不能用一國欠外債的邏輯來分析這一問題。」他指出，按照債務佔GDP比率計算，中國中央政府的債務低於美國政府的水準，中國政府有能力解決債務問題。

與盲目樂觀的陸克文截然不同，中國重要的入口網站搜狐網對中國一百名經濟學家做問卷調查，超過八成的經濟學家認為地方債將引發危機。陸克文只是一個熟悉澳洲政治的政客，對中國經濟狀況的瞭解恐怕不會超過中國的這一百位經濟學家吧？

二〇一五年五月八日，麥肯錫全球研究所公佈最新報告，中國的債務總額已達GDP的百分之兩百八十二。其中，又以地方政府債務居首，約二十萬億。實際上，這個數字仍然可能縮小，發改委官員李鐵曾對外公開表示，地方債務上報數（十八萬億）不及實際債務的一半。

二〇一五年七月，《日經新聞》在題為〈中國式「泡沫接力」〉的報導中指出，中國經濟的「弱點」是地方政府的債務問題。例如，遼寧省二〇一五年一至三月經濟增長率僅為百分之一點九，固定資產投資下降近百分之二十，增長率比上一年同期放緩了五點五個百分點，包括土地出讓在內的總收入也減少了大約百分之三十，公共投資難以獲得資金。

歷史學家黃仁宇曾指出，中國歷代王朝走向衰敗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政府沒有學會「數字管理」，今天的共產黨政權也是如此。官方的統計數據不能當真，這是人們研究中國問題時的「共識」，也是李克強公

開承認的真相；由於中共當局嚴密封鎖相關資訊，即便是西方智庫和媒體發表的關於中國的經濟數據，也不能完全相信。

如陸克文所說，地方債務不是外債，不會被外國逼迫必須在某一時間段內全部還清，進而出現像希臘那樣國家破產的結局。但是，龐大的地方債務並不意味著中央可以從容地「化大為小，化小為無」。

由於很多地方政府全靠土地財政，除了賣土地之外，找不到別的生財之道，這個巨大的債務泥潭，仍然回到中央政府那裡，令北京感到頭疼。被陸克文看好的習近平，也拿不出什麼妙手回春的藥方。近期李克強提出的經濟政策，又繞回到刺激房地產的老路上，可見其黔驢技窮。靠發展房地產來解決地方債務危機，只能是飲鴆止渴——當房地產的泡沫越來越大，未來中國經濟整體崩盤的可能性也就越來越大。

## 「泛歐亞大陸基建計劃」是中國經濟發展的新亮點嗎？

陸克文的第二個論點是，中國貧富差距懸殊可以由「一帶一路」政策解決。他認為，中國的地區收入差別是隨改革開放由沿海到內地順序自然形成的。現在中國的「一帶一路」發展戰略——他翻譯為「泛亞歐大陸基建計劃」——的實施，將使西部省分獲得較大優勢。

如此樂觀的想法，恐怕連習本人都不敢拍胸脯、打包票。如果習真的有心，幹嘛不直接投資西部省分、提升西部地區民眾的生活水準，而要捨近求遠、惠及他國呢？此前十多年，經濟沙皇朱鎔基權力如日中天時，就全力推行西部大開發戰略。然而，西部大開發成效相當有限。西部地區經濟基礎薄弱，基礎建設、技術和觀念落伍，不可能實現比沿海地區還要快的「跨越式發展」。在貧瘠落後的西部省分，掙扎在貧困線

以下的民眾超過三億之多。經過西部大開發的喧擾，東部與西部之間的差距不僅沒有縮小，反而繼續擴大。

跟當年轟轟烈烈的西部大開發戰略相比，習近平高調推出的「一帶一路」計劃更是望梅止渴。

首先，中亞各國民主轉型未能完成，民族與宗教問題糾葛甚深，政局大都不穩定。中國在新疆對維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族的殘酷鎮壓，使得伊斯蘭世界對中國並不友善。中國貿然在這些國家投資，尤其是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恐怕很難迅速得到回報，很多投資會打水漂。

其次，中國西部地區的勞動力，已經習慣去東部沿海地區打工，願意去自然條件惡劣、安全堪憂的中亞國家淘金的，畢竟是少數。那些地方連人身安全都得不到保障，近年來中國工程師和工人在中亞國家被恐怖組織綁架的消息不絕於耳。這趟「順風車」不會那麼舒服。

再次，陸克文所謂的「泛亞歐大陸基建計劃」未必能貫徹始終。即便是被習近平視為盟友的俄羅斯，也不願看到中國勢力進入中亞，歐美等西方國家更會杯葛，中國不可能在中亞這個過去並未深耕的區域一枝獨秀。當習近平碰到鐵板時，只能如縮頭烏龜般退卻。

總之，想要靠「一帶一路」解決中國的地區落差和階級矛盾，宛如異想天開，習近平本人也未必相信，偏偏陸克文信以為真。

## 「國進民退」之下，私有經濟有多大的發展空間？

陸克文的第三個論點是，國有企業改革雖然難以進行，但私有經濟未來會有更大發展。「如果中國發展新模式成功，更多市場份額給了私有企業—這正在一步步發生—私有企業將在未來推動經濟增長中起越來

越大的作用。」

這個看法跟習近平的雄心壯志背道而馳：習從總理李克強那裡搶過經濟大權，加速胡溫時代「國進民退」政策。其反腐運動波及央企主管，並削減大型國企高管的收入，並不意味著習要對國企動手術，乃至推動私有化政策。相反，習在反腐的同時，提出合併一批央企，打造國企「航空母艦」的計劃。尤其是在能源、通訊、交通等國民經濟命脈部門，國企的壟斷程度將大大提升，不給民營企業留下發展空間。

在此情形之下，中國的民營企業老闆普遍感到，中國國內的經營環境日益惡化，政策上的歧視使企業步入難以突破的瓶頸。許多民營企業老闆將資產轉移到海外，以規避未來的巨大風險。最具代表性的是李嘉誠拋售在中國的資產，引發中央級媒體破口大罵，使「李超人」淪為「萬惡的資本家」。

少數依然風生水起的民企，如阿里巴巴、萬達集團等，其背後的合夥人無一例外都是一群頂級太子黨。馬雲、王健林等人的崛起，靠的是綿密的政商關係，而非技術與管理上的優勢。這些「偽民企」日進斗金，不能表明中國經濟多麼健康、多麼有活力，反之，它們本身就是中國經濟模式畸形與不平等、不公正的標誌。在中國管理嚴格的金融領域，阿里巴巴憑什麼可以經營準銀行式的支付寶？在地方政府賴以締造亮眼政績的「土地財政」之下，萬達憑什麼能在每個中心城市的黃金地段低價獲得地塊？中國任何一個小老百姓用腳丫子都能想得出背後的答案：不就是官商勾結嘛！

另一方面，習近平進一步加強對民營企業的控制。比如，近期在小米公司內成立黨支部，要將毛澤東開創的「黨支部建在連隊」的傳統向企業界輻射，讓共產黨像章魚一樣掌控社會的每一個角落。八千多人的小米公司只有一百零四名中共黨員，這個黨支部在中共體系內幾乎可忽

略不計，但組織部進入前沿的互聯網企業仍是一個震撼性的消息。評論人士鄧愷指出：「這是中共這樣的列寧式政黨從體制內往外延伸，如果更嚴峻點說，也可以叫『IT行業體制化』。」再比如，廣東抓捕民營教育產業的先行者、自由派公知信力健，表明中共不允許民營企業家討論政治議題。民營企業家連人身安全和財產安全都得不到保障，又如何能實現「永續經營」？

## 服務業能讓中國經濟絕處逢生嗎？

陸克文的第四個論點是，有人認為中國的服務行業將不可能像製造業那樣提供那麼多工作崗位，但他舉了阿里巴巴的例子，指出針對十三億人的電子消費規模巨大。

中國經濟的困境能靠阿里巴巴這樣專門賣假貨的的企業解救嗎？網上購物的新興消費方式，固然帶動物流業迅猛發展，但數百萬靠騎單車送快遞的農民工，只是掙扎在溫飽線上的現代奴隸勞工而已，他們能創造中國經濟的新增長點嗎？

我在北京生活時，住在遠郊，從網上購物，比如從卓越亞馬遜網買書，常常是衣衫襤褸的送貨人靠人力單車或電動單車送上門來。從倉儲中心到我家二十多公里，他們在路上要花兩三個小時。這些送貨員大都是沒有受過基礎教育、來城市打工的農民，很多人都不會網上購物。他們的薪資每月只有一千多人民幣，在北京只能勉強維生。他們雖然在號稱高科技的網路公司上班，但所從事的具體工作毫無技術含量，也不可能帶動中國經濟的高速增長。

第三產業應當是智慧產業，而不是低端的、利用廉價勞動力的「勞

動密集型產業」。然而，在中共一黨獨裁的政治體制下，不能容忍資訊自由流通，為智慧產業的發展設置重重障礙。二〇一五年七月，中國通過新版的《國家安全法》，該法要求對包括網路信息技術產品和服務在內的科技行業，以及外商投資進行「國家安全審查」。該法還要求支撐重要領域的技術「安全可控」。跨國企業和行業組織稱，這個口號可能會被用來逼迫企業設立「後門」—即允許第三方進入系統的手段—提供加密密鑰，乃至交出源代碼。這些強硬的規定在全球科技界掀起了波瀾。

中共政權是網路的死敵—它疑心重重、患得患失。在其心目中，網路是一種可怕的、具有顛覆性的力量。習近平親口講過，互聯網控制不牢，就可能遭致「亡黨亡國」。黨國為了在網路的論戰中佔據上風，豢養大量傳播「正能量」的「五毛黨」，這倒提供了數百萬工作機會；但是，當所有公民的想像力和創造力都受到空前壓抑之時，在中國不可能出現蘋果、谷歌、臉書、推特這樣的科技巨頭。換言之，在未來決勝與技術和創意的競爭中，沒有基本資訊自由的中國不可能有勝出的機會。當習近平的心腹、中國主管互聯網的高級官員魯煒堅決地為中國越來越嚴厲的管控政策辯護時，流亡美國的中國媒體人龍燦評論說：「如果中國按照現在的速度繼續封鎖網路，不出十年，中國的科技實力就會在現有的發展速度上，再倒退一半。如果沒有自由的網路，其學術的交流和基礎人群的數量，都會有巨大的衰減。」

## 千萬不要高估中國獨裁者的智商

陸克文在演講的最後指出，問題的關鍵是：「我關心的是中國政府

是否已認識到這些問題？有沒有掩蓋這些問題？他們沒有。」他指出，雖然他並不知道中國政府什麼時候能成功解決這些問題，但「可以看到應對計劃已經到位」。陸克文的結論是「在每一個我提到的領域裡，中國政府都有足夠的政治意願、足夠的處理這些有關中國長期發展模式的重大問題的政策方向。」

然而，習近平不是陸克文，習近平不是民眾選舉出來的領袖，從來不需要對民眾負責，從來也不能接受逆耳之言。

《紐約時報》專欄作家保羅·克魯格曼（Paul Robin Krugman）如此批評習近平試圖操控股票市場，並將中國股市猛跌歸罪於西方陰謀的做法：「最近，中國官方媒體正在把股市大跌的罪責歸咎於外國對中國的陰謀，這其實比你也許能想像的更沒有道理：中國長期以來一直嚴格控制股票市場，實際上把外國人排除在中國股市之外，你很難賣掉當初你從來就不能擁有的資產。」這種尋找替罪羊的做法，連普通網股民都不會受騙上當了。

如今，多年來一直看好中國的經濟學家張五常都變臉了。財經網登出張五常題為〈中國的經濟有多危險？〉的講稿，張劈頭就說：「中國這幾年的經濟非常不好。我是對中國最樂觀的人，我跟進了三十五年，以前的三十年我都很樂觀，最近的五六年我轉到悲觀了。」他指出好幾個近年中國經濟政策及工作嚴重失誤之處，包括：重要行業因保護主義出現壟斷或寡頭壟斷，效果非常惡劣；搞金融自貿區拖拖沓沓；「縣際競爭在二〇〇七年的時候還非常好，現在搞得一團糟」；高等教育慘不忍睹，學術自由跌至最低點；經濟數據長期以來有大問題，充斥造假；用貨幣政策去打救經濟，是病急亂投藥。

對於保羅·克魯格曼和張五常的批評意見，習近平一如既往地置若罔聞，他只願意聽陸克文的讚美。陸克文如此讚美中國當局和習近平，

彷彿習是料事如神、手到病除的神仙。可惜，他心目中的習跟現實中的習是兩個人。

要瞭解中國的真相，陸克文不能只看央視的「新聞聯播」以及《環球時報》，久而久之，就變得跟他們一樣愚蠢。我建議陸克文去中國訪問時，向中共提出去獄中探視劉曉波、許志永、高瑜、浦志強、李和平等人，去聽聽這些人的心聲。這樣，才能認識真實的中國。

邱吉爾說過：「獨裁者騎在老虎身上來來回回，不敢下來。老虎現在正是餓的時候。」大部分中國民眾對中國政府和習近平的評價，會跟陸克文截然相反。對於中國面臨嚴峻的經濟、政治和社會危機，習近平何曾公開、坦率、誠懇地與中國民眾討論過？習更沒有解決這些問題的秘方。他唯有不斷地掩蓋事實、欺騙和麻醉民眾。

研究中國長達三十多年之久的澳大利亞國立大學中華全球研究中心（Australian Center on China in the World）的創始人暨主任白傑明（Geremie R. Barm）指出：「我喜歡把習近平稱為中國的『C O E』——全抓全管的老總（Chairman of Everything）。……『習大大』時代的一個缺憾就是枯燥乏味。面帶戚容的宣傳主管劉雲山、令網民掃興的魯煒和習近平本人一起，讓中國的文化和學術生活沉鬱了下來。與此同時，由黨掌控之下的國家也在極力吹捧自主創新和創造力。這樣的矛盾統一，難道不會讓一個半毛主義的國家陶醉不已嗎？」然而，陸克文似乎從未向白傑明請益中國問題和習近平問題，而只是沉浸在一廂情願的幻想中。

陸克文自告奮勇地充當說「皇帝的新衣真美麗」的吹鼓手——赤身裸體的皇帝會給吹鼓手什麼樣的獎賞呢？

## 習近平打左燈往左轉

紅衛兵發明了「紅五類子女」、「黑五類子女」的說法和一副對聯「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並且對一大批所謂「家庭出身不好」包括被整肅幹部的青少年實施迫害。在北京八一學校，不但該校領導被「鬥爭」，十三歲的六年級小學生習近平也遭到毆打，還被「遊街」，因為他父親習仲勳是「反黨集團」成員。四十七年後，習近平成為中國的最高領導人。

—王友琴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在去世前夕曾經發出一句天問：「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文革），怎麼辦？」這句話不僅是習仲勳鑒於自己在毛時代無辜下獄十七年的慘痛經歷而發出的，更是有感於鄧小平等元老調動野戰軍屠殺學生和市民卻沒有任何制度可以制約而發出的。然而，習仲勳萬萬沒有想到，他的兒子習近平會成為毛那樣的強人，而且堅持要搞新型的文革。

## 習近平回延安背後的玄機

二〇一五年春節前夕，習近平帶著「婆姨」（陝北方言，意為妻子）彭麗媛及獨生女習明澤，回到四十七年前當「知青」的延安。衣錦

還鄉、何其威風，宛如元曲《高祖還鄉》中的熱鬧場景。

當年，不滿十六歲的習近平背負著「反革命子女」的屈辱，來到延安市延川縣梁家河村「插隊」，直到一九七五年秋天離開這裡。

官媒一如既往地渲染習近平如何平易近人，如何尊老愛幼，如何富貴不忘本。其中一個細節是：「這次習近平帶著夫人彭麗媛一起回到了延安，跟鄉親們見面時，習近平專門用陝北方言介紹：『這是我的婆姨。』彭麗媛也跟老鄉們頻繁互動交談。過年帶著老婆孩子回家，是中國人的傳統。」

習近平此次「回延安」，絕不單單是為了懷舊和炫耀。他的延安之行背後別有玄機。

首先，延安是共產黨割據時代的紅色首都，沒有延安，也就沒有北京。雖然今天的延安依然貧窮而骯髒，但它被視為共產黨的「龍興之地」。中國的初中語文課本選入紅色詩人賀敬之的長詩《回延安》，每個學生都被要求朗朗上口地背誦。這次習回延安，是要顯示他是毛澤東的崇拜者和毛主席的執行者。習行程中最為重要的一個環節是，到延安楊家嶺「瞻仰」中共七大會址。官媒報導說：「站在中央大禮堂內，習近平指出，黨的七大將毛澤東思想確立為黨的指導思想，在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為黨領導人民奪取抗日戰爭勝利和新民主主義革命勝利提供了堅強保證。」這一幕極具象徵意義。

其次，習另一重要行程是「向陝甘邊革命根據地英雄紀念碑敬獻花籃」。上世紀三十年代，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和劉志丹、高崗等人開創了陝甘寧邊區這個「國中之國」。毛率領的中央紅軍，則是「鳩佔鵲巢」的後來者。習仲勳非毛之嫡系，不被毛所信任，五十年代即慘遭整肅，成為繼高崗之後第二大「反黨分子」。由盡享榮華富貴的高幹子女墮入死有餘辜的「黑五類子女」之深淵，乃是習少年時代最慘痛的經

歷。如今，習向陝甘寧英雄紀念碑獻花，是要表明自己是根正苗紅的「紅二代」，並努力彌合父親及其戰友與毛之間的分歧，營造出「紅二代」大團結的景象，以此擴大同盟軍，在激烈的政爭中才有十足的勝算。此後不久，高崗獲得一定程度的「平反」。

第三，跟江和胡相比，習與延安的淵源更深。江、胡養尊處優，沒有當過農民，有趨於「修正主義」之苗頭；習在延安的山村當過知青，延安是其「第二故鄉」。習炫耀說：「上山下鄉的經歷，使我增進了對基層群眾的感情……使我形成了腳踏實地，自強不息的品格。」青年時代的苦痛，因著時光的距離，在回憶中變得無比美好。

鄧小平時代（包括可以納入「後鄧時代」的江和胡統治時期）的中國，是「打左燈往右轉」；習近平希望開拓一個屬於自己的時代，其標誌是「打左燈往左轉」。此次延安之行，已然釋放出足夠的信息。

## 習語錄勝過紅寶書

中共中央黨校推出「習近平語錄應用軟件」（App）。該軟件內容包括習近平的系列講話和相關著作。據《新京報》報導，此款軟件的獨特之處在於它把知識數據庫轉換成一個帶經緯線的地球儀，可以根據用戶所選擇的時間、地點和提供的關鍵詞查詢出習近平在全國不同地方、不同時間的講話。

習近平是讀著毛主席的紅寶書長大的，他想讓自己的著作像紅寶書，被人民隨身攜帶、倒背如流。此一「網路互動版」的習語錄，剛一問世，便應者雲集。新浪微博平台用戶馬曉明掏心掏肺地表達了對習的崇拜：「習主席一句頂一萬句！」變毛為習，一字之易，與時俱進。被

譽為「西朝鮮」的天朝，果然是個「神國」。網路時代的習語錄，勝過紙媒時代的紅寶書。習哀帝趕超毛太祖的野心，昭然若揭。習近平多次赴湖南韶山朝聖，並發表講話說：「中國出了個毛澤東，這是韶山的驕傲，湖南的驕傲，全國人民的驕傲，中華民族的驕傲。」那麼，中國出了習近平，又是誰的驕傲呢？

五四運動將近一百年了，中國人心中仍不能沒有皇帝。原以為溥儀是末代皇帝，殊不知毛澤東這個打天下、坐天下的「光棍」，成為朱元璋加希特勒的超級皇帝，其殺人之多、禍國之深，更是冠絕古今、傲視千古。

「文革」結束之後，一直坐不穩奴隸位子的中國人，以為今後可以坐穩奴隸位子。在毛的淫威下倖存下來的中共元老們，一致宣佈說，從此杜絕個人崇拜、實行領導人集體負責制。

殊不知，習近平上位之後，並不滿足當「集體總統」之一，而要做獨一無二的真命天子。九龍治水，礙手礙腳；獨斷朝綱，豈不痛快。早在二〇一一年九月底，美國《國家利益》雜誌就發表了波特蘭州立大學政治系助教布魯斯·吉利（Bruce Gilley）文章，題目是〈見識新毛澤東〉。文章預言說，習近平是個「新毛澤東」。這幾年來習近平的言行證明，果然如此！

近代以來中國之梟雄領袖，青年時代都曾淪為社會邊緣人，即學者王學泰所說的「遊民」。蔣介石曾為上海灘的青幫弟子，毛澤東曾為湖南農村的痞子流氓，而青年時代被拋出生活常軌、不得不「上山下鄉」成為知青的習近平，也沾染上知青一代好勇鬥狠、唯利是圖、蔑視一切道德倫理的惡劣品質。

在語言方式上，比起矯揉造作的江和照本宣科的胡來，有過底層生活經歷的習像毛那樣有一種霸氣。不過，習對毛東施效顰，更等而下

之。習在中央黨校畢業典禮的講話中，屢屢重複毛的講話，要求官員認真學習毛著，「抓住重點，掌握精髓」，確保政治立場堅定。習即便對外國媒體和外國領導人講話，也盡顯粗鄙野蠻之「英雄本色」。習如同一隻蝴蝶標本，被毛主義的銀針釘在看板上，偏偏他還以為自己在展翅飛翔。

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說過：「神要使一個人遭難，總是讓他忘乎所以。」古希臘的悲劇家們都受到希羅多德影響，並對此做出充足的演繹。較為出名的是古希臘悲劇作家歐底庇德斯的重複見解：「神欲使之滅亡，必先使之瘋狂。」如今，這句話又應驗到習近平身上。

## 文藝工作者再次「上山下鄉」

法國學者拉布呂耶爾說過：「做暴君既不需要藝術也不需要科學。」這句話是對習近平的精準素描。習近平仿效毛澤東的延安文藝座談會，開了「北京文藝座談會」，並發佈了一份意義非凡的上諭：文藝工作者必須「上山下鄉」，尋找新題材，為黨的文藝政策服務。

習近平說，藝術應該為人民服務，這是在繼承毛澤東七十年前的觀點。毛澤東曾說藝術家需要與群眾「打成一片」。新華社引用兩位北京文藝座談會的與會者、劇作家嚴蘇和中國作協主席鐵凝的話說，「此次座談會讓人回想起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的精神」。習式文革，雷聲隆隆；御用文人，喜形於色。

不過，習式文革只能算半個毛式文革。習近平縱有毛澤東大鬧天宮的潑猴本領，也不可能消滅他的家族亦深陷其中的權貴資本主義，更不可能讓中國退出經濟全球化和放棄「世界工廠」的地位，讓中國回到毛

時代的計劃經濟乃至「三線建設」的鬧劇。習式文革，不會觸動中國的經濟格局，大致侷限在意識形態領域，其目標是奪回在意識形態領域喪失的主導權。

在江和胡執政期間，基本放棄在意識形態上推陳出新的企圖，而以赤裸裸的實用主義填充之。當局勸告全黨全民，一切向錢看，悶聲發大財；並讓中宣部嚴密控制媒體和網路，不讓任何異議有發表和傳播的機會。

習近平不滿足於此種「消極防禦」的策略，他要主動出擊。江吹拉彈唱，戲子本色，人們大可一笑了之（面對更加嚴酷的習時代，不少中國人甚至懷念起隱喻江澤民的「長者文化」和「蛤蟆文化」來）。江沒有狂妄到自認為是文學大師乃至諾獎評委，可以教導作家如何寫作、科學家如何做實驗。與之相比，習掩飾不住要當全能冠軍、宇宙主宰的野心，正如蘇俄歷史學家沃爾科戈諾夫對史達林的評價：「史達林幾乎對所有知識領域都可以武斷地進行評價，從政治經濟學到語言學，可以教訓電影和林業方面的專家，可以在軍事和歷史學領域做出決定性的結論。」這也是習的心態：不僅要佔據權力頂峰，還要扮演先知和導師。

改造頹唐奢靡的文藝界勢在必行，號令文藝工作者「上山下鄉」是第一步。在二〇〇三年，習接受央視《東方之子》專訪，回憶了那段歲月：「扛兩百斤麥子，十里山路不換肩。」二〇〇五年，時任浙江省省委書記的習近平接受延安電視台《我是延安人》節目採訪時說，當年在延川農村插隊，過了「五關」的歷練：跳蚤關、飲食關、生活關、勞動關、思想關。如今，習如法炮製，讓文藝工作者當一次知青，使他們不僅能與黨「同甘」，更能與黨「共苦」。

上山下鄉是御用文人的殊榮。反之，對不聽話的、標榜獨立和自由的人物，則是大棒伺候、大肆抓捕。二〇一四年年底，作家和編輯徐曉

突然被捕，就連地產大亨任志強也在微博上驚呼，「現在連會講英文都有可能成為危害國家安全的罪證了」。習近平借助徐曉案給中國知識界傳遞一個明確的信號：不是我的奴才，就是我的敵人。不跪倒在我的腳下，就等著被我消滅。中國再也沒有桃花源了，再也沒有陶淵明了，人們做夢都要跟習近平一模一樣。

## 習近平能打贏「英雄保衛戰」嗎？

每個國家都有其「英雄系統」。美國好萊塢電影中的英雄系列，包括美國隊長、超人、鋼鐵人、綠巨人、雷神等等，是男孩子們耳熟能詳的人物。關於這些人物的各種玩具，滿坑滿谷、多如牛毛，在每個男孩子的臥房裡都能找到一大筐。

習近平不願中國的孩子迷戀美國的英雄，他從毛時代的寶庫中找來雷鋒、邱少雲、黃繼光、劉胡蘭等英雄模範，掃去他們身上的灰塵，為之重塑金身，讓其成為孩子們的「新寵」。

這場「英雄保衛戰」，花再多錢都不在乎。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四日，《雷鋒》雜誌在北京創刊，這是第一本在全國公開發行，傳播雷鋒精神的專業雜誌，由人民出版社主管。其編委會常務副主任、總編輯陶克在接受澎湃新聞採訪時稱，其起步發行量是五萬份。在傳統報刊雜誌經營困難的今天，這是一個驚人的數字。一般認為，這份雜誌不會有多少人自費訂閱，只能與《人民日報》等黨報黨刊以及習近平的著作一樣，由上而下安排公費訂閱。

這本雜誌具有軍方背景，顧問為遲浩田等參與過六四屠殺的退役將領，總編輯陶克則具有少將軍銜。陶克認為，網上對雷鋒種種細節的追

問和調侃，用心險惡，「一方面源於敵對勢力意圖摧毀國人的信仰，具體行動從抹黑影響全民族的人物開始」。他還說：「如果否定了雷鋒，就是否定了我們歷代國家領導人抓的道德工作，就否定了千萬相信雷鋒的人和一批批道德模範。」陶克特別指出，雷鋒不是一個普通的戰士、不是可有可無的歷史人物，雷鋒與中共歷屆領導人緊緊地聯繫在一起。換言之，如果雷鋒垮掉了，中共歷屆領導人就垮掉了，中共的紅旗就落地了。

《雷鋒》雜誌的新鮮出爐，得到習近平的支持。此前兩任中國領導人江和胡，對革命話語興趣不大，在意識形態上採取守勢，只要不威脅到政權的生存，對於那些調侃和解構毛時代英雄人物的言論一般視而不見。而在習眼裡，捍衛共和國前三十年的制度和思想遺產，是其從父輩那裡繼承的神聖使命。既然雷鋒是毛欽定的英雄人物，習就要將其塑造為新時代的精神典範。

《雷鋒》雜誌創刊之時，《人民日報》同步發表長篇報導〈社會各界「捍衛英雄」行動綜述：我們和英雄在一起〉，歷數官媒對黃繼光、邱少雲、董存瑞、劉胡蘭等英雄人物的保護和捍衛，並猛烈抨擊民間置疑和否定的聲音。《人民日報》引述中國傳媒大學研究生張毅的網貼稱：「戰士們負責在前線保家衛國，我們新一代大學生負責在網路上保衛英雄！」

這一場英雄保衛戰，主戰場還是在網路上。《中國青年報》發表社論，論述用官方意識形態佔據網路的重要性。社論強調說：「現在，網路替代了廣播，成為了西方反華勢力進行所謂的民主、憲政和普世價值傳播的主管道。他們通過網路製造焦點議題、誤導公眾輿論、抹黑人民英雄、虛無國家歷史，實行對社會主義國家的『文化轉基因』，並千方百計地推動網上聚集向街頭抗議的轉換，直接污染和威脅著青少年一代

的文化成長環境。」社論炫耀說，習鼓勵共青團的做法：「習近平總書記特別對共青團引領團員青年就網上侮辱邱少雲烈士的現象進行抨擊提出表揚，稱讚團員青年的行動壓住了歪風邪氣，弘揚了正能量，做得好。」對於習近平來說，捍衛英雄頭上的神光圈，比捍衛公民的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更為重要。此前，曾有網友因為對雷鋒等中共歷史上的英雄人物的事跡發表異見，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或擾亂社會治安的罪名逮捕入獄。

習近平有上千萬五毛黨可供驅使，卻無法打贏這場「英雄保衛戰」。近日，圍繞中共宣傳的所謂英雄邱少雲真假問題，網路上掀起一場口水戰。共青團系的官微輪番上陣，對質疑邱少雲的網路大V「作業本」謾罵圍攻，並設立個投票「『作業本』如此說是否合適？」未曾料到，九成以上網民投票說「合適」，團中央只好悄悄地撤下這個投票。

## 走了俞可平，來了周小平

在中共十八屆五中全會閉幕之際，傳出中央編譯局副局長俞可平辭職的消息。俞可平對媒體表示，「我應當帶頭能上能下，我啥都不要，就想做個教授」，他將回到母校北京大學，擔任新組建的政治學研究中心主任和講席教授。

一個副部級官員的辭職，本來不會成為新聞，但俞可平是一個標誌性的人物，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兩朝擔任高層智囊，多次發表支持民主和改革的言論。早在二〇〇六年，他就發表了〈民主是個好東西〉的文章，引發國際社會關注。在其辭職之際，財新網亦發表其新作〈鄧小平與中國政治的進步〉，這篇文章從思想解放、徹底否定文革、民主與法

制建設等五個方面分析鄧小平在中國政治進步上的貢獻。針對當下中國的現實，褒貶之意，一目了然。

俞可平是貨真價實的「學者型官員」，其政治學博士的含金量遠非習近平偷竊而來的法學博士能比擬。二〇一三年四月二十八日，俞可平在香港「中國政治改革」研討會上透露，「可以想像」習將推動更大膽的改革，習、李的改革將「沿著鄧小平路線前進」。然而，此後習的表現卻明顯是擁毛而抑鄧，並試圖重塑馬列原教旨主義之權威，讓俞可平深感失望。而且，前一任中央編譯局局長衣俊卿是主管意識形態的常委劉雲山之心腹，為習量身打造「三個自信」的理論而深受器重，卻因為爆出性醜聞被免職。衣俊卿落馬後，俞可平仍未被扶正，處於閒置狀態，故而萌生退意，「仕而敗則學」。

習近平小肚雞腸、鼠目寸光，不會重用俞可平這樣有真才實學之人——若俞可平站在他身邊，不就襯托出他的淺薄和愚昧嗎？習只會重用周小平這樣與之臭味相投之人：習近平欽點「網路作家」周小平出席北京文藝工作座談會，並親切叮囑其多寫「正能量」作品。周小平當面獻媚說：「我可以叫您習大大嗎？」習近平金口一開，當即收其為「乾兒子」，說不定日後還會招贅為婿呢——雖然出身貧寒，但又愛國又英俊，也配得上習家公主了。隨之，《參考消息》用整整一個版面刊登周小平的三篇舊文〈夢碎美利堅〉、〈飛吧，中國夢〉、〈他們的夢想和我們的旗幟〉，少年文豪閃亮登場。

有什麼樣的國王，便有什麼樣的裁縫。當年，毛身邊的弄臣，是陳伯達、康生、姚文元、胡喬木等才華橫溢的大惡人。習是山寨版的毛，只能選拔周小平這種不入流的裁縫為之裁剪衣服、裝點門面。習近平用周小平而不用俞可平，不足為奇——在這場比賽誰更左的大賽中，沒有道德底線的周小平當然比俞可平更有機會勝出。

以前，我閱讀安徒生童話《國王的新衣》，感嘆國王為何如此愚蠢，堂堂一國之君居然被騙術低劣的騙子玩弄於股掌之上。後來，我才慢慢明白，國王一點也不蠢，國王比所有人更聰明。不是國王被騙子所欺騙，而是國王利用騙子的騙術來檢驗臣民對他是否百分之百地忠誠——他說自己穿上最漂亮的新衣，臣民就必須重複同樣的謊言。只有這樣的順民，才是如磐石般穩固的統治基礎。

所以，對習近平而言，俞可平無用，周小平才有用。

## 彭麗媛要做江青第二？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由習近平夫人彭麗媛擔任藝術指導的新版大型歌劇《白毛女》在「革命聖地」延安上演，拉開全國巡演的序幕。官媒報導說，該歌劇還將赴太原、石家莊、廣州、長沙、上海、杭州、濟南、長春、北京等地巡演，總演出場次達十九場。

就在一週之前，新華社全文發佈習近平在一年前所作的「在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並發表《中共中央關於繁榮發展社會主義文藝的意見》。《意見》指出：「弘揚中國精神、傳播中國價值、凝聚中國力量，是文藝工作者的神聖職責。」《意見》要求集中力量、集聚資源，推出一批「有筋骨、有道德、有溫度、藝術震撼力強的大作力作」。習近平話音剛落，彭麗媛就閃亮登場，夫唱婦隨，如同江青充當毛澤東發動文革的馬前卒。既然習近平以毛澤東為父，彭麗媛就以江青為師。

《白毛女》的重演，不是一個普通的文化事件，其背後有深刻的意識形態意涵。中共當局亦毫不諱言這一點，《中國青年報》發表評論指出：「在新時期復排歌劇《白毛女》並進行廣泛傳播，具有重大的現實

意義和深遠的歷史意義，不僅關係到《白毛女》這部經典民族歌劇的傳承，關係到中國歌劇事業和民族聲樂的傳承，還關係到黨的文藝方針、文藝路線和文藝為誰服務的問題。」換言之，這是習近平的文化政策全面左轉的重要信號。

《白毛女》是中共革命文藝的代表作，它取材於上世紀三、四十年代在山西、河北一帶民間的「白毛仙姑」傳說，改編後的《白毛女》則講述地主強佔民女、青年村民加入八路軍後回鄉為民報仇雪恨的故事，其主題一言以蔽之：「舊社會把人變成鬼，新社會把鬼變成人」。一九四五年，在毛澤東「延安文藝座談會講話」發表三年後，《白毛女》做為魯迅藝術學院創作的第一部新歌劇，在延安中央黨校舉行首演，為中共七大「獻禮」，轟動一時。

《白毛女》在中國家喻戶曉，是在文革前夕，江青介入文藝政策和實踐，將其打造成八個樣板戲之一。江青發表《談京劇革命》，並組織、參與、經手京劇現代戲的改編、排練，樣板戲被打上「江記」標誌。《人民日報》隨即發表社論〈革命文藝的優秀樣板〉，確定了八個革命樣板戲：京劇《智取威虎山》、《海港》、《紅燈記》、《沙家濱》、《奇襲白虎團》；芭蕾舞劇《紅色娘子軍》、《白毛女》；交響音樂《沙家濱》。樣板戲是那個時代中國文化專制和文化貧瘠的標誌，在其出籠過程中，若干文藝工作者遭到殘酷迫害、家破人亡。巴金在《隨想錄》中曾說，他一聽到樣板戲就心驚肉跳，成為一種典型的記憶創傷。

彭麗媛與《白毛女》早有淵源。她曾在一九八五年版的歌劇《白毛女》中飾演過「喜兒」，繼王昆、郭蘭英之後，被稱為第三代「白毛女」。那也是彭第一次出演歌劇，並獲得首屆「梅花獎」。這一次，彭由女主角變成藝術指導，有主席夫人掛帥，當局投入巨資，打造舞台效

果非凡的3D大銀幕。如果江青沒有自殺，親眼看到她當年連戲服上的一個補丁都不放過的《白毛女》，如今在彭麗媛手上重獲新生，一定會倍感欣慰。彭麗媛不是有良知的文藝工作者，六四屠殺之後率先為屠殺民眾的戒嚴部隊演唱，如今為「二次文革」當吹鼓手也不在話下。

《白毛女》妖魔化地主階級，是為中共消滅地主和富農的「階級屠殺」尋求合理性和合法性。中共尚未奪取全國政權之前，土改就已在「解放區」展開。執行土改政策最殘暴的地方官員，如康生、李井泉、劉少奇等，日後都受到毛的重用。中共對地主的全面虐殺，堪比納粹對猶太人的屠殺。僅舉一例就可說明：歷史學家趙儷生在《籬槿堂自敘》中寫道：「我的老同學牛蔭冠（此人解放後擔任過幾個省的財政廳長，還當過財政部的副部長）家是山西興縣最大的富戶，土改時，牛是土改組的組長，坐在上邊，他父親跪在下邊。遊街時用鋼絲像穿牛鼻一樣穿了他父親的鼻子，由牛蔭冠牽著。」此後，地主成為中國賤民集團「黑五類」（地、富、反、壞、右）之首，且累及子孫後代。

土改不僅消滅地主階級，而且將中國傳統的土地私有制變為公有制（實際上為共產黨所有制），至今仍然讓中國人無法擁有真正的土地財產權，成為中國步入民主自由社會的巨大障礙。在這個背景之下，習彭夫婦對《白毛女》的張揚再次表明，他們要打毛的旗幟，走毛的道路。

## 獅身人面新偶像，沐猴而冠紅太陽

專制是一種習慣，它必定會逐漸形成一種疾病。

—陀思妥耶夫斯基

沒有皇帝就沒有辦法安穩地生活，這是中國人根深蒂固的集體無意識。江澤民和胡錦濤缺乏皇帝的魅力，人們總是覺得有所欠缺；輪到習近平君臨天下，總算有了「人君」的模樣，中共宣傳機器也掀起了新一輪的造神運動：在二〇一五年的春節聯歡晚會上，演員們以習近平的大投影頭像為背景載歌載舞，齊聲高唱「把心交給你」；每天晚間黃金時段三十分鐘的央視新聞聯播，有關習近平的消息有時超過二十分鐘，其他政治局常委的活動成了可有可無的點綴；官媒總結出習近平治理國政的八大品格—充滿自信的戰略定力、直面難題的勇者擔當、綱舉目張的大勢把控、嚴以修身的主體鍛造、哲學智慧的頂層設計、抓鐵有痕的剛性執行、夢想引領的力量凝聚、改革清障的問題倒逼，並吹捧說：「習近平總書記治國理政的八大品格，將使我們的黨純潔健康、我們的國家文明富強、我們的人民幸福美滿，也將推動世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新秩序。」

中國正在蛻變為一個皇帝君臨天下的帝國。當年，羅馬共和國蛻變為帝國，標誌是屋大維自稱奧古斯都大帝，獲得半神半人的地位，取締一切與共和國有關的機構和印跡；如今，習近平儼然一副「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的派頭，不僅要成為中國的皇帝，還要成為亞洲乃至世

界的霸主。中共的宣傳機構全力配合這一新形勢，開足馬力將習大大這一新偶像「植入」十三億民眾大腦中—就好像《動物莊園》中的豬首領「拿破崙」、《一九八四》中的老大哥以及電影《瘋狂麥斯：憤怒道》（Mad Max : Fury Road）中的「不死老喬」，習近平開始志得意滿地享受萬民之頂禮膜拜。

## 習近平要恢復終身制？

海外媒體披露，二〇一四年八月，習家開過一次家庭會，習近平以「旁觀者清」為由，向家姐問政。齊橋橋對弟弟的用人政策提出批評，「你喜歡用和你共過事的人，因為知根知底，但全國你只有福建、浙江、上海三省市有舊下屬，選擇面不是太窄了嗎？」

這篇報導將習家隱秘的家庭會議寫得繪聲繪色，彷彿記者在一旁列席並記錄。最耐人尋味的一幕是，齊橋橋建議弟弟破格用人，例如習視為軍中臂膀的張又俠，因年齡問題在十九大上恐難提升，齊橋橋說：

「規矩是為人服務的，只要對事業有利，就應打破常規！」既然張又俠可破格留任，那麼掌管廠衛、打虎不止的王岐山更可破格留任。如今，科技和醫療進步，人均壽命不斷延長，領導幹部的退休年齡亦可延後。

姐姐的建議，習近平從諫如流。與這則報導對應，四個多月之後，中組部在習近平的授意之下，下發一份題為《二〇一四～二〇一八年全國黨政領導班子建設規劃綱要》的文件。時間跨度涵蓋二〇一七年的中共十九大，文件的核心精髓是強調「領導班子年齡結構方面，堅持老中青相結合的梯次配備，不簡單以年齡劃線，不搞領導班子成員任職年齡層層遞減和『一刀切』，不把換屆提名年齡做為平時調整的年齡界

限」。

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這份文件要解決的不僅僅是張又俠、王岐山的超齡留任難題，更是放出習近平企圖在兩屆任期結束之後繼續掌權的信號。與中國歷史上稱帝的野心家的故事一樣，民間的「擁戴輿論」已經出現了：在嚴厲管控的微信上，許多呼籲習近平連任至二〇三〇年乃至擔任終身主席的言論廣泛傳播，這些「妄議中央」的言論沒有被刪去，「妄議者」也沒有被國保約談，顯然是「上面」有意網開一面。

文革結束後，中共高層鑒於毛澤東晚年胡作非為造成十年浩劫，遂提出「廢除黨的領導幹部職務終身制」的設想。然而，老人政治未成絕響，鄧小平等老人雖然卸下大部分職務，仍然以普通黨員身分「八老治國」。

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形成了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的不成文慣例，最近二十多年來的四屆常委，包括做為最高領導人的江澤民和胡錦濤，無不遵循此慣例。

如果此慣例成為「緊箍咒」，習近平只能連任兩屆，他要當終身皇帝的願景就落空了。習近平最擔心的是，他是否能全身而退。他以反腐為名將二、三十位退休常委整得服服貼貼，焉知他本人退休之後，新一代領導人不會「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

因此，習近平悄然撬動黨內達成的關於任職期限的「共識」。在二〇二二年的中共二十大上（如果還能順利召開的話），習或許會讓出黨的總書記和國家主席的交椅，但將保有軍委主席和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這兩個（或後一個）更有實權的職務。這樣，他就能以非政治局常委的身分，如太上皇一般凌駕於所有常委之上，既然國家安全仰賴於他，那些後輩常委的人身安全更仰賴於他。這是習恢復終身制的小算盤。

## 習近平不僅是皇帝，還是巫師

在 A P E C 的開幕致辭中，習近平花了好幾分鐘談論北京的空氣質量：「這幾天我每天早晨起來以後的第一件事，就是看看北京空氣品質如何，希望霧霾小一些，以便讓各位遠方的客人到北京是感覺舒適一點。好在是人努力天幫忙啊，這幾天北京空氣品質總體好多了。」

莎士比亞有一句名言：「台上演戲的人不能保守秘密，他最後什麼都會說出來。」習近平在台上說的百分之九十九都是謊言，上面這段話卻不經意地洩露出一兩句真話：乾淨的空氣，「寧與友邦，不與家奴」。北京的空氣質量稍有好轉，習立即向洋人表示感謝——讓人納悶的是，這些遠道而來的賓客何德何能，為改善北京的空氣質量做出怎樣的貢獻？

洋人的命比中國的命值錢，洋人的感受比中國人的感受重要，這是聲稱民族主義者的習近平媚外的一面。中共從來「內外有別」。既然習要感謝外國人，老百姓更要向外國人三跪九叩——此前，即便數十萬北京市民在霧霾中染上肺癌，習仍無動於衷；如今，有一群外國元首到北京開會，「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悅乎」，習便竭盡全力讓客人感覺「舒適一點」。對照之下，該邏輯鏈條是成立的：若非此次大會，習不會下決心治理霧霾。

習近平又說：「也有人說，現在北京的藍天是 A P E C 藍，美好而短暫，過了這一陣就沒了，我希望並相信通過不懈的努力，A P E C 藍能夠保持下去。」如果你不知道什麼是「無恥之尤」，聽到這句話就一清二楚了。「A P E C 藍」這個嶄新的中文詞匯，明明是掙扎在死亡陰影下的中國民眾對當局片面發展經濟造成的環境毀滅性破壞的激憤諷刺，習居然認為是人們對其執政能力的充分肯定，並在大會上引用。

美國《時代週刊》再次將習近平當作封面人物。這一次，《時代週刊》對習的命名是「習皇帝」，習近平是受之有愧，還是認為恰如其分？與其說習是皇帝，不如說是巫師，他連天氣都能控制，不是巫師又是什麼？北京的天空要變藍，只要習一聲令下，就可以車輛禁行、學校放假、人去樓空。不僅北京，周邊五個省分，全都工廠停產、工地停工。老天爺束手就擒，由灰變藍；萬國來朝，皆大歡喜。

其他東西習近平都能享受「特供」，但他只要到室外，呼吸的就是跟普通市民一樣的「劇毒空氣」，出於自身安全的原因，他不得不關心空氣質量問題。毛曾狂妄地宣佈「人定勝天」，習稍稍謙卑一點，承認先有「人努力」，才有「天幫忙」，而唯有他一人是有資格跟上天對話的祭司或巫師。巫師縱然神通廣大，巫術未必立竿見影。習話音剛落，客人還沒有登機離開，「報復霾」又黑壓壓地鋪天蓋地而來。

## 習近平是活佛製造者？

中國官方媒體報導，西藏再有二十五名新轉世活佛到拉薩參加第二期西藏自治區「新轉世活佛培訓班」。培訓為期十一天，內容包括佛教義理教育、民族宗教政策法規宣講、形勢和時政教育等，培訓形式結合課堂學習、座談交流、參觀考察。

聖經中說，凱撒的歸凱撒，上帝的歸上帝；習近平偏偏說：共產黨員歸共產黨管，藏傳佛教以及其他所有宗教也都歸共產黨管。習近平對西藏尤其是藏傳佛教的控制，到了嚴絲密縫的地步。二〇一四年，西藏自治區宗教工作領導小組制訂計劃，打算在未來十年內培養一百名「愛國愛教」的藏傳佛教各教派活佛、高僧大德，創立一支「政治上靠得

住、宗教上有造詣、品德上能服眾」的藏傳佛教高層代表人士隊伍，促進藏傳佛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的融合。

中共這個信奉無神論和唯物主義的政黨，毫不臉紅地壟斷活佛的命名權。早在二〇〇七年九月一日，北京就出台《藏傳佛教活佛轉世管理辦法》，規定活佛轉世不受境外任何組織個人的干涉和支配，轉世必須申請報批，有重大影響的還應報國家宗教事務局乃至國務院批准。這個法令針對的是流亡海外的達賴喇嘛—西藏境內活佛的轉世和認證，不受達賴喇嘛節制，必須由中共說了算。聽話的，欽定為活佛；不聽話的，送進監獄成為囚徒。緊接著，中共還投入巨資，建立藏傳佛教各類活佛的網路數據庫。

不僅如此，活佛認定之後，還要學習中共設定的「必修課」，才能袈裟上身。這些課程是中共洗腦教育的「精品」，是對藏傳佛教傳統的羞辱和扭曲。這批接受愛國主義培訓的活佛，要先向習效忠，再一起咒罵達賴喇嘛，才能拿到「畢業證書」。而這群背叛信仰的假活佛的真面目，被上百名藏人自焚的火光照得纖毫畢現。

另一方面，中共也加強了對追隨達賴喇嘛的流亡藏人的統戰、收買和招安。二〇一五年九月，中國西藏網報導，達賴喇嘛的傳記作者、曾在西藏流亡政府擔任要職的安曲活佛，經四川省人民政府批准，從印度西藏流亡政府所在地回到四川阿壩定居。報導指出：「安曲活佛親眼目睹了祖國的快速發展和家鄉的巨大變化，心海蕩起波瀾。他認為，中國的民族宗教政策很好，寺廟、文物、民族文化保護得也很好。」中共利用安曲活佛葉落歸根的願望，實現了對他的策反，更讓習覺得：有錢能使「活佛」推磨。

習近平是「無知者無畏」的無神論者，更是凌駕於各宗教之上的「一代天驕」。歷史上如此驕狂的人物，唯有希特勒。希特勒曾強迫德

國福音派教會統一為「國家教會」，納粹稱之為「積極的基督教」，不服從者送入集中營。所有教會和信徒都必須接受「一個民族、一個國家、一個元首」的原則，對上帝的敬拜被對希特勒的敬拜所取代。在今天的中國，五大宗教一齊跪拜習近平的景象，也被定格成歷史的一部分。

習近平不是活佛製造者，他與希特勒一樣是自掘墳墓者。培訓和冊封活佛的鬧劇，凸顯出中國是一個沒有宗教信仰自由的國度。美國開國之父傑佛遜說過：「宗教自由、新聞自由、處於人身保護權之下的人身自由以及公平選舉的陪審團所作的審判—這些原則形成了閃亮的耀眼星群，走在我們前面。」我相信，這些原則必將在中國和西藏實現，而未來民主自由的中國和未來民主自由的西藏，必定是沒有共產黨、也沒有習近平的中國與西藏。

## 習近平的體重是國家機密

中國鄭州市的一名九歲男孩給習近平寫了一封信，說他觀看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北京峰會的電視報導後，覺得「習大大」是中國領導人的典範，但可能有些胖了。「習大大，您可以減減肥了，」這個名叫牛孜儒的男孩寫道。「不用像歐巴馬那麼瘦，像普丁一樣就可以了。」

男孩的父親看到這封信後，轉給朋友看，本來只是炫耀一下孩子的早熟和聰慧—小小年紀就知道關心國家大事，以後一定可以出將入相、光宗耀祖。沒想到，地方報紙《鄭州晚報》注意到這封信並做了報導。編輯心想，這個小故事或許可以展示習大大的親民形象，也算是一則佳話。

之後，各新聞入口網站對這篇報導廣泛轉載。但在一天之內，又閃電般地予以刪除。對此，香港《南華早報》評論說：「文章沒有提到習近平對這條建議的想法，但有件事可以肯定：宣傳機器並不覺得它有趣。」熟悉中共的宣傳紀律的人都知道，封殺令一定來自最高當局。即便不是習近平本人，至少也是隸屬於「習辦」的、習近平身邊的形象設計師團隊。

封殺令顯示，獨裁者什麼都不缺，最缺的就是幽默感。獨裁者是開不起玩笑的。明朝的時候，開國之君朱元璋當過和尚，便禁止天下人說「禿頭」這個詞語；清朝的時候，有個詩人隨手寫了一句「清風不識字，何必亂翻書」，稀裡糊塗地陷入文字獄，掉了腦袋。旅美作家江南則因為寫作《蔣經國傳》，被國民黨派遣的黑幫分子槍殺。如今，君臨天下的習近平，同樣不喜歡老百姓拿他的體重說事。

獨裁者又是懷疑主義者。其權力不是由人民授予的，而是以暴力和謊言維繫的，天天生活在風聲鶴唳的氛圍之下，一句民謠、一個段子，就讓他們如坐針氈。善於體察上意的宣傳部，奉旨辦事，保證不出一點紕漏。即便是歷史題材的電影和小說，若有影射之嫌，也要立即下線、下架，統統封殺，所以姜文那部講民國故事的新片亦不得公映，秦暉寫辛亥革命的論著《走出帝制》也被查禁。

習近平與胡錦濤行事為人迥異：比起謹言慎行、瞻前顧後的胡錦濤來，習近平天馬行空、虎虎生氣。網友將胡形容為「面癱帝」，胡常常面無表情，從來不在公共場合表達其內心的喜怒哀樂；網友卻將習戲稱為「包子帝」，習到慶豐包子店排隊就餐的那場親民秀，可入選奧斯卡獎最佳外語片單元。

這個寫信給習大大的九歲孩童，其實是中共洗腦式宣傳教育的犧牲品，以為給領袖建議是關心國事的體現。若習真有海納百川的心胸，不

妨給孩子回一封信，謝謝他的建議，並承諾從此以後少吃飯、多運動，三五年便可以像普丁那樣開飛機、玩柔道，上山打虎、下海擒龍。如此，便可成就一段元首與孩子之間的佳話。而這個領袖「愛民如子」、子民視領袖為「救星」的故事，亦可編入小學語文課本，代代傳誦。

不料，真理部容不得庶民大眾「妄議」領導人的體型和體重。習的體重是國家機密，有關數據唯有主席辦公室的少數心腹知曉，就連保密局都茫然無知。無知小兒，又豈能拿國家機密開玩笑？這一次，只是封殺有關新聞報導，對此少兒及其父母稍示申誡；下一次，如果再有人敢這樣做，或許就要以「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跟周永康一起被關押在秦城監獄了。

習大大的「親民」是有限度的。關於減肥的話題，唯有彭麗媛可以吹一吹枕邊風，其他人一概不得多嘴。

## 習近平不是一個合格的縣委書記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習近平在北京接見一百零二名優秀縣委書記，並在講話中要求他們「做政治的明白人，對黨絕對忠誠，始終同黨中央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動上保持高度一致」。習近平在講話中強調，郡縣治，天下安。「縣委是我們黨執政興國的『一線指揮部』，縣委書記就是『一線總指揮』，是我們黨在縣域治國理政的重要骨幹力量。」

共產黨缺少什麼，就會強調什麼。習近平反覆要求各級官僚與黨中央（也就是他本人）「保持一致」，表明他對別人不與他保持一致深懷疑慮。習的選擇性反腐，使得各級官員消極怠工。習希望通過接見和勉勵縣委書記，提升基層官員的工作熱情。

習近平如此重視縣委書記的職能，並非無的放矢。首先，在中國兩千年中央極權的大一統格局中，郡縣太爺是維繫中央政權安危的關鍵環節。在中共的體制下，縣委書記更是重要的基層官員。雖說是「七品芝麻官」，但其三權合一、統管萬有。中國有的縣分擁有超過百萬人口，有的縣分面積廣達十萬平方公里，縣委書記在其轄區內是一手遮天的「土皇帝」。他們不是由縣民投票選舉的，而是由上級官員任命的，不必在乎民眾之好惡，只需討好上級，就可在這個位置上穩如磐石乃至獲得升遷。

其次，習近平自己做過縣委書記，有過基層生活的歷練。比起江和胡兩位沒有做過縣委書記的前任來，他更有底氣強調縣委書記的重要性，並現身說法給縣委書記們訓話——只要你們好好幹，就有可能像我這樣幹成最高領袖。習有過擔任縣、地區、省三級行政區首長的完整履歷，被新加坡的鄭永年和台灣的朱雲漢等學者吹捧為「中國的菁英培養模式優於西方選舉式民主」的重要證據。

然而，仔細檢視習近平在河北正定縣擔任縣委書記期間的政績，就可以判定，他是一個營營苟苟的庸官。當時，習近平與文革紅人、已被降格為縣委副書記的呂玉蘭打得火熱，用他自己頗為肉麻的話說，在兩人一起工作的三年裡，「建立起了同志加姐弟的情誼」（彭麗媛看到這樣的話，不知會不會吃醋）。習還大興土木修建仿古建築「榮國府」，但這一粗製濫造的建築群並未成為旅遊熱點和影視基地，不久即荒廢頹敗。

習近平的吹鼓手們編造說，八十年代柯雲路風靡一時的小說《新星》中，主人公「李向南」的人物原型是習近平。實際上，真正的人物原型是時任山西原平縣縣委書記的呂日周，呂的政績遠非習所能媲美，可惜呂後來仕途不暢，在山西省政協副主席任上退休，壯志未酬。

習近平好大喜功、能力平平，當時的河北省委第一書記高揚很不喜歡他。雖然擔任中央書記處書記和政治局委員的習仲勳多次示意高揚提拔習近平，但高揚不為所動，召見習近平時還當面斥責。習仲勳發現兒子在河北升遷無望，便安排其轉赴老部下項南任省委書記的福建任職。高揚的耿直，導致他在中央黨校校長任上退休後晚景淒涼，在二〇〇九年去世時，中央級媒體橫眉冷對，葬禮異常冷清。與高揚有深交的作家任彥芳透露說，這是貴為政治局常委和總書記接班人的習近平的刻意報復。

習近平不是優秀的縣委書記，連合格的縣委書記都算不上。他卻「鯉魚跳龍門」，成為中國的新領袖，可見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是「劣勝優敗」的「逆向淘汰」機制。

研究中國基層政治的學者楊魯軍，多年來以福建為研究對象。他在福建遇過好幾位當年在習手下工作的官員，除了千篇一律的讚美之外，也有人悄悄地說：「現在的習總書記真的是當年在我們福建工作的習省長嗎？」對方欲說還休，楊魯軍刨根問底，答案讓其大吃一驚：現在在中央的習與當年在福建的習除了外表相似，其他方面判若兩人，以前的習憨厚溫潤，如今的習強悍霸氣。

此種「前恭後倨」的變化，不知習近平本人是否意識到？獨裁體制不僅戕害被統治者，也使得獨裁者本人性情大變，變得蠻橫乖張、自以為是。希特勒若不是獨裁者，或許是性情溫和的畫家；史達林若不是獨裁者，或許是性格羞怯的修士。與之相似，習近平若不是獨裁者，或許是隨遇而安的七品芝麻官。

習近平能榮獲諾貝爾和平獎嗎？

中共在香港的宣傳機構《大公報》在國台辦的新聞發佈會上提問，中國人民大學教授王義桅致信挪威諾貝爾和平獎委員會，推薦習近平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其中一大原因是「習馬會使兩岸和平不可逆轉，為台海地區和平穩定做出了貢獻」。那麼，國台辦發言人對此有何回應？

有趣的是，國台辦新聞發言人安峰山說，對於這種假設性的議題，他沒有評論。《大公報》本來想拍馬屁，結果一不小心拍到馬腿上，碰了一鼻子灰。緊接著，中國入口網站新浪網，以〈諾貝爾和平獎應授予習近平？國台辦不予置評〉為題，報導了此事。但很快又將標題改為〈國台辦回應馬習會相關問題〉。

可見，「諾貝爾和平獎」在中國仍然是「敏感詞彙」。儘管習近平成了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但真正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卻被中共當局關在監獄中，是當今全球唯一一位被關押的諾獎得主——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此前長期被軟禁在家的緬甸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不僅早已獲得自由，而且領導其政黨在大選中獲勝，即將成為最高領導人。中國網友紛紛議論說：「緬甸能，中國為什麼不能？」

最早發佈王義桅致諾獎委員會信件的，是左派網站「觀察者網」。在薄熙來垮台之後一度偃旗息鼓的左派網站，觀察到習近平原來是「升級版的薄熙來」，又開始興風作浪了。該網站全文發表王的信件，王認為習獲獎有三大理由：第一，習提出「一帶一路」的倡議，解決了內陸國家被海洋主導的全球化邊緣的歷史遺留問題，並且以和平方式解決中國的產能過剩問題。第二，習宣佈裁軍三十萬，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關係。第三，習馬會改寫了六十六年來兩岸政治領導人從未見面的歷史，消除了中美台海爭端而爆發衝突的根源。

王義桅不僅是人大教授，也是中國「大外宣」的成員之一、中共意

識形態的主要吹鼓手。這一次，他以推薦習近平為諾獎候選人名噪一時，估計有希望擠進次年由中國網友評選的「人渣榜」。然而，偏偏中共當局對此漠然視之，王義桅未能獲得習近平的青睞，也未被欽點為「南書房行走」。因為，自從諾獎授予「國家的敵人」劉曉波之後，諾獎委員會也被中國官媒貶斥為「西方反華工具」，如今何必去討「反華勢力」之歡心呢？

顧炎武說過，士之無恥，是為國恥。既然習近平有癡迷個人崇拜的「寡人之疾」，中國知識界遂爭先恐後地溜鬚拍馬。除了王義桅提名習為諾獎候選人之妙論，還有清華大學社會學博士楊三材創作《主席贊歌》：「偉大領袖習主席，人民群眾全愛您；英明神武治國家，百姓幸福貪官泣。騎著毛驢去北京，自釀美酒只為君。此生有幸見到您，願做犬馬給您騎。」楊三材甚至建議將習近平的家鄉陝西富平設為直轄市——如此異想天開，跟毛澤東的孫子毛新宇在政協會議上建議將湖南湘潭及周邊地區改名為「毛澤東市」相映生輝。

習被提名為諾獎候選人，在網上成了人們「戲說」和「妄議」的笑料。其實，習近平不是沒有機會獲得諾獎。當然不是因為「黃禍西引」的「一帶一路」，也不是因為偷梁換柱的假裁軍，更不是因為像「馬戲會」一樣的「馬習會」，而是像當年的諾獎得主、南非總統戴克拉克（Frederik Willem de Klerk）那樣邁出民主化的步伐——戴克拉克擔任總統之後，與非洲人國民大會和平協商，釋放曼德拉及宣佈解嚴。一九九一年二月，廢止種族隔離制度，六月廢除人口登錄法、原住民土地法等法規。一九九三年，戴克拉克與曼德拉一起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一九九四年四月二十七日，南非舉行首次不分種族的大選，曼德拉由囚徒成為總統，戴克拉克則出任曼德拉政權的第二副總統。

那麼，習近平會釋放劉曉波嗎？習近平會開放報禁和黨禁嗎？習近

平敢於參加全國大選嗎？諾獎不會頒發給一名將另一位諾獎得主關進監獄的獨裁者，諾獎只會頒發給推動民主、自由、人權、和平等普世價值的偉人。繼續關押劉曉波，繼續殘酷打壓人權活動人士，習近平只能讓自己遺臭萬年；而釋放劉曉波及其他人權活動人士，啟動中國的民主轉型，是習近平問鼎諾獎的唯一契機。

# 儒家文化醬缸中的林佳龍、江宜樺與習近平

中國的知識分子從別人那裡得到尊敬，並不是因為他們為了別人的幸福做過什麼，而只是因為他們獲得、佔有了相當的知識。事實上，他們中的大多數只不過是一群僅僅通曉考試，卻從不關心真理和道德的食客。

—蘭德公司報告

華人世界的主流意識形態是普世價值、自由民主嗎？非也，仍然是儒家專制主義。中國與台灣的三個政黨—紅色的共產黨、藍色的國民黨、綠色的民進黨—都是喝著儒家文化的「狼奶」長大的。三個政黨中的很多政治人物，即便擁有博士、教授頭銜，甚至留洋鍍金，仍自認為是孔子門徒，自己深受其害，還要用狼奶毒害下一代。如柏楊所說，只要一天走不出儒家文化的醬缸，兩岸華人就無法過上心靈自由、精神獨立的現代人的生活。

## 林佳龍為何推動讀經運動？

據台灣《自由時報》報導，二〇一五年五月二十四日，由中華經典研究學會、中華華夏文化交流協會（其背後為宗教團體一貫道）推出的經典會考，在台中公園冒雨舉行。該活動約三萬人報名，考生各科分為

秀才、進士、狀元三等次，以背誦、口頭接龍方式會考，完成會考的考生，可以戴狀元帽、敲狀元鑼、過狀元橋。

民進黨中生代要角、台中市長林佳龍親自主持該活動，並當場背誦《禮運大同篇》。曾參加會考、戴過狀元帽的林佳龍說，將推動校園讀經，帶動民眾或學生自主品格教育。他在大會上說，這些經典都是聖賢留下來的智慧，透過背誦經典，除了讓人學習先人文化結晶外，更讓文化傳承；同時能讓讀經者自主品格教育，做為自己生活上的準則，得以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

這篇報導還採訪了不少陪同子女冒雨挑戰會考的家長。有家長說，雖然現在孩子未必理解經典內容，但讀經之後性格變得較穩定、專注，盼未來經典內容能陪伴孩子們發展成品格良好的人。

《自由時報》正面報導此一事件，讓我震驚不已。雨中背經的那一幕，對台灣的未來而言是禍非福。死記硬背的填鴨式教育並不利於培養兒童的想像力和創造力，只會批量製造出獨裁者最喜歡的、「聽話」的乖乖孩—這些不求甚解的孩子，長大後就是奠定專制體制根基的順民和臣民，而不會是太陽花運動中的反抗者們。

白色恐怖時代，國民黨利用儒教在台灣實行專制統治，雖然如今台灣解嚴多年，人們仍然對這一精神毒害毫無警醒。在台中市議會上，居然有女議員邱素貞在議會質詢時為孔子母親「抱屈」，指台中孔廟崇聖祠祭祀十五人，六人是孔子先祖，其他是孟子等人的父親，看不到女性角色。台灣推動性別平等，孔廟的傳統也要與時俱進，不能再「獨厚爸爸、無視媽媽」，要市府「改進」。面對此荒唐提議，林佳龍居然表示，過去男尊女卑，現在子女連姓氏都可選擇；孔子有教無類理念代表男女平權，孔廟讓孔子父母同祀很有意義，相信孔子在世也歡迎這點子，將研究辦理。倒是在台中教育大學台灣語文學系任教的民俗學者林

茂賢說，偉人入祀是感念其豐功偉業，如果家人都要入祀，媽媽要拜，太太是否也該拜？這樣下去沒完沒了。林佳龍這樣一位曾留學美國、獲得耶魯政治學博士學位、滿口民主自由價值的民進黨中流砥柱，居然沉淪在儒家專制文化的醬缸之中，誤把糟粕當精華，卻將毒藥當補藥，更讓人莫名驚詫。

我不得不指出，某些民進黨人在意識形態上混亂到不可思議的地步，在精神上與國民黨形成可怕的「同構」與「共生」關係。這種價值觀層面上「民進黨的國民黨化」，尤其讓人憂慮。國民黨利用儒家專制主義思想綑綁、束縛、扭曲、毒害台灣人的心靈，大獲成功。即便是林佳龍這樣留學西方的先進人士，亦未能擺脫早年洗腦教育之毒害。

若是遵循儒家文化的教導，以君父之是非為是非，以君父之好惡為好惡，甚至用唐太宗的說法，「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既然國民黨高高在上以君父自居，民進黨為什麼堅持不懈地反抗其威權統治呢？若只是為了爭權奪利，缺乏進步和高尚的價值，民進黨不就成了國民黨第二嗎？連林佳龍這位當年野百合世代的學生領袖，也毫無甄別能力地全盤接受來自中國的黑暗文化，表明民主轉型中台灣所必須具備的公民意識和自由價值遠未成型。

## 江宜樺要用儒家思想糾正自由主義？

就在林佳龍在台中倡導讀經運動之後的第三天，曾任行政院長的江宜樺在香港發表演說，強調「儒家思想今天仍然是影響華人社會的重要因子，扮演關鍵角色」。這是「英雄所見略同」嗎？

江宜樺在演講中表示，人類社會曾採用多種政治制度，有封建制

度、代議制度、極權統治、軍事獨裁和憲制民主等，而從儒家思想的主張看，它最可能與憲制民主銜接。他認為，儒家理論可以彌補自由主義過度強調個人主義的缺失，其賢能政治主張又可以加強民主的行政效能，兩者結合可能創造出人類文明發展的新願景。

江宜樺還說，台灣和新加坡已證明華人社會可以發展民主，也說明儒家文化不必然排斥民主，甚至可以彌補自由主義或民主的缺點。

江宜樺將台灣與新加坡並列，真是大錯特錯。新加坡不是民主社會，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多黨競爭，沒有新聞自由，也沒有三權分立。李光耀死掉後，傳位給兒子，宛如封建王朝。

李光耀「駕崩」之時，一名十六歲的少年人余澎杉在網路上歡呼獨裁者「終於死了」，立即被逮捕。候審期間，被囚禁在重症精神病房，連續幾個星期被拷在鐵床上。此後，余澎杉被判監禁四個星期。余母在社交媒體上書寫心聲，向兒子道歉：「對不起，曾告訴你，你在最安全的國家。你現在卻感到十分不安全與害怕。對不起，曾說過我們的政府會給我們最好的福利。對不起，曾鼓勵你要有創意和敢於發表意見，你卻被當成叛逆與瘋癲。」

在余澎杉出庭時，有中年人衝上去打他耳光，法警袖手旁觀。這是一個奴才凌虐清醒者的國家。曾在新加坡大學任教多年的何啟良教授，以「麻木不仁」形容新加坡社會：「新加坡有識之士（所謂精英）在不義中一片沉默，媒體負面報導，極力貶低余氏，反而外界聯合國人權機構以及台灣、香港公民社會發出援助之聲。」

新加坡無非就是一個「有錢的北韓」，江宜樺偏偏將台灣與新加坡並列，難道希望台灣向新加坡取經嗎？其內心深處大概無比羨慕新加坡統治者，可以對反抗人士痛下殺手而逍遙法外。

在台灣的脸書上，人們「醜化」馬英九等政府高官的圖片、視頻和

言論多如牛毛，其激烈程度大大超過余澎杉對李光耀的「攻擊」。如果參照新加坡的量刑模式，大概百分之七、八十的台灣民眾都要被關進監獄或精神病院。

自詡為研究西方自由主義思想的學者，江宜樺大肆推崇儒家學說，這是他鎮壓太陽花運動不力而被馬英九當作替罪羊犧牲之後的「新思維」嗎？在儒家森嚴的等級秩序之下，人民不能反抗統治者，統治者卻可以奴役人民。韓愈在《原道》中力倡君權，認為人民只有納稅的義務，而無置疑統治者的權利。也許讀了太多聖賢書，江宜樺心安理得地調動警察向衝擊行政院的學生施暴，即便血流成河，他亦安然入睡。

在今天的台灣，國民黨的其他意識形態早已失去功效，唯有用三民主義包裹的儒家思想，如緊箍咒一般籠罩在人民頭上，讓人艱於呼吸視聽。和諧、秩序、禮貌，成為人與人相處的最高原則；是非、對錯、善惡，放在一邊、忽略不計。從林佳龍倡導讀經，到江宜樺推崇儒家，在過去三十多年的現實政治中敵對的國民黨和民進黨雙方，居然分享同樣的文化與精神傳統，反抗者與壓迫者的界限模糊不清，這是多麼荒誕的一幕！

## 習近平要用儒家拯救中共？

更為詭異的是，把儒家文化當作救命稻草的，不止林佳龍和江宜樺，中共新一代獨裁者習近平亦號稱儒家信徒。習近平在骨子裡師法毛澤東，卻以孔夫子學生的身分對外宣講和平主義。對於毛澤東在文革中發動紅衛兵摧毀孔廟、挖掘孔墓的作為，習近平假裝不知道。他要讓毛、鄧、孔「三合一」。用賣身投靠的幫閒文人甘陽的說法，習要完成

「通三統」—即打通孔夫子、毛澤東和鄧小平的思想，使之支撐共產黨的統治。

據中國官媒報導，習近平執政以後，三次在重要場合傳揚儒家文化。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習到山東曲阜孔府考察，並到孔子研究院與研究人員座談。他饒有興趣地翻看《孔子家語通解》、《論語詮解》，並說「要仔細看看」。在座談時，他表示，研究孔子和儒家思想要堅持歷史唯物主義立場，堅持古為今用，去粗取精，去偽存真，因勢利導。

二〇一四年「五四」青年節時，習專程來到北京大學人文學苑，同哲學家湯一介促膝交談，瞭解《儒藏》編纂情況，讚揚湯一介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繼承、發展、創新做出很大貢獻。而湯一介的父親、學術大師湯用彤在毛時代被迫害、被批鬥的往事，已成過眼煙雲。

第三次是在孔子誕辰二千五百六十五週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上，習以最高領導人身分出席並發表講話：「中華文明源遠流長，蘊育了中華民族的寶貴精神品格，培育了中國人民的崇高價值追求。自強不息、厚德載物的思想，支撐著中華民族生生不息、薪火相傳。」習將自己及中共視為孔子門徒：「中國共產黨人始終是中國優秀傳統文化的忠實繼承者和弘揚者。從孔子到孫中山，我們都注意汲取其中積極的養分。」

習近平號稱擁有清華大學博士學位，但據包括鍾祖康在內的眾多學者調查考證，此學位是假造而來。他只接受過小學教育，此後即失學，基本上是半文盲。以其知識背景和文化程度，讀不懂用文言文書寫的儒家經典。習對儒家的青睞，不是出於個人喜好，乃是認為儒家可為其所用，就像儒家曾為歷代皇帝所用一樣。

既然習尊儒，下面的各級官員便投其所好，儒學又成顯學，高官顯貴抱起四書五經裝點門面。儒家文化也被當作靈丹妙藥，教育「富二

代」和「創二代」。中國官方媒體報導，福建廈門思明區政府針對轄區內知名民營企業家的孩子組織學習班，不少企業家搶著讓孩子入學接受培訓。班主任尤小波說，次次培訓報名都人氣高漲。參與此次培訓的七十多名「富二代」，平均年齡二十七歲，大部分是大學本科畢業，有三分之一是從海外留學歸國。這一次，有超過七十名來自福建民營企業家的下一代，雲集北京翠宮飯店上課，接受當局安排的特殊培訓課，學習儒釋道思想、國家情懷、社會責任和紀律等。

這種儒家文化、國家主義再加上共產黨意識形態的培訓，能鍛造出現代公民人格以及創業者的想像力和創新能力嗎？答案是否定的。正如蘭德公司在一份關於中國現狀的研究報告中所說：中國的教育體系，很大程度上已經成為一種失敗和恥辱。它已經不能夠服務於教育本應所服務的對象：社會。這個教育體系不能提供給社會許多有用的個體。它只是製造出一群投機分子，他們渴望能夠受益於社會所提供的好處，卻毫不關心回報。

## 推倒儒家專制主義，是五四未竟之業

長久以來，中國沉淪於專制主義的泥潭之中，儒家文化難辭其咎。新儒家代表人物張君勱、錢穆、唐君毅等人竭力為中國的專制制度和儒家文化辯護，努力撇清儒家與皇權專制之關係。現代中國飽受蔣介石、毛澤東等獨裁者之蹂躪，這些新儒家學者雖深受其苦，仍對儒家「德治」幻想抱有不切實際的憧憬。他們一廂情願地認為，只要君主手裡握有大權，就可加強其社會責任感，亦可增強他為民父母的道德意識，從而做出對國家對人民有益的事情。可是，中國的暴君和獨裁者殘民以逞

的歷史與現實，卻與此種想像截然相反。

同樣是新儒家圈內人的學者徐復觀，在論述中國專制傳統和儒家文化時更為誠實——他也試圖為儒家辯護，認為儒家只是被專制者利用；但他承認：「中國兩千年的專制，乃中華民族一切災禍的總根源。」同時，他發現了「德治」的缺陷與虛偽——正是「人之初、性本善」式的儒家淺薄樂觀的人性論，才導致源遠流長的德治和人治的文化與政治傳統。

儒家是為統治者服務的意識形態，從不支持人權、自由和民主的價值。徐復觀發現：「因為總是站在統治者的立場上來考慮政治問題，所以千言萬語，總不出於君道、臣道、士大夫出處之道。雖有精純的政治思想，而拘束在這種狹窄的主題下，不曾將其客觀化開來，以成就真正的政治學。因之，此種思想的本身，只算是發芽抽枝，而尚未開花結果。」他接著論述說：「因政治上的主體未立，於是一方面僅靠統治者道德的自覺，反感到天道的難知，而對歷史上的暴君污吏，多束手無策。在另一方面，則縱有道德自覺的聖君賢相，而社會上缺乏迎接呼應承當的力量，聖君賢相也會感到孤單懸隔，負擔太重，因之常常是力不從心。由此可以瞭解歷史上的朝廷，何以君子之道易消，小人之道易長。」最後，他揭示了中國知識分子缺乏獨立性和主體性的根本原因：「因政治的主體未立，於是政治的發動力，完全在朝廷而不在社會。知識分子欲學以致用，除進到朝廷外別無致力之方。」

徐復觀的論述與美國政治哲學家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政治秩序的起源》一書中的觀點不謀而合。福山指出，中國從未建立起法治傳統以及有限的、受監督和問責的政府。中國始終與現代民主政治絕緣。思想史學者蕭公權指出：「儒家哲學思想懷抱聖王理想，因此可視為充滿道德價值觀的專制主義。」對此，福山闡發說：「儒家未設想到

該對帝王權力有何建制性的約束，反倒致力於教育君王，節制君王的強烈愛憎，使君王自覺該對人民負責。」然而，其結果往往是災難性的：許多君王言堯舜之言，行桀紂之行。

對於儒家思想的致命缺陷，德國思想家馬克斯·韋伯（Max Weber）在《儒家與道教》一書中指出，儒家缺乏自然法與形式法的邏輯，所以中國沒有法治精神；儒家欠缺自然科學思維，所以中國人在科學研究上停滯不前；儒家將經濟活動視為「小技」，所以未能像新教倫理那樣激發出資本主義精神；儒家對專家和實務的蔑視，與歐洲的理性、客觀化的管理機制和職業概念形成強烈對比。

在全球民主化浪潮中，儒家早已喪失了生命力，甚至充當攔路石。林佳龍、江宜樺和習近平所選擇的「讀經救國之路」，乃是一條不歸之路。林佳龍、江宜樺和習近平各自代表著不同的政治立場和政治勢力，在台灣島內和海峽兩岸的政治角逐中，彼此互為對手。然而，這三個人對儒家文化的肯定和利用，卻又殊途同歸。

由此看來，五四運動推倒儒家專制主義的目標，至今仍未達成，還需年輕世代奮力承接。

第二卷

高牆欲擋民主潮  
鐵窗難鎖自由心

——論人權災難



變態辣椒 / 繪

## 高瑜戳穿了習近平的新裝

我們生活的時代，或許正是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所說的黑暗時代。自由需要自由人，而我們現在還沒有自由人。

—亞歷塞維奇

習近平時代的開幕，以多名網路大V被捕並在央視上未審先判、掛牌示眾為標誌。如果說網路大V算是「一個人的媒體」，觸角稍稍敏感的人由此可以判斷：即將到來的是媒體的寒冬，而非媒體的春天。

國際記者聯會在《中國新聞自由年報》中指出，越來越多傳媒人和網民受到騷擾、解聘、拘押和逮捕等政治迫害。「在前蘇聯、納粹德國和中國等極權國家，幾乎不受制約的宣傳部門必定是黑幕化的，有宣傳部的地方自然就沒有新聞自由。中國的宣傳部門仍然像過去一樣經常向傳媒發佈指令，根據現實和宣傳需要嚴格控制輿論，人為地製造『真理』和『真相』。宣傳部門的禁令也被當作所謂的機密予以保護。」習近平等中共領導人被認為是言論自由的敵人。

如果說胡錦濤時代逮捕的最著名的知識分子是劉曉波，那麼習近平時代逮捕的最著名的知識分子就是高瑜。上世紀八十年代，高瑜是中新社記者，對體制內改革充滿期望，利用那短暫的、相對寬鬆的輿論環境，發表了許多膾炙人口的報導。六四開槍之後，高瑜因公開反對大屠殺，兩次被捕入獄，此後成為一名獨立記者和自由記者。二〇〇九年聖誕節，劉曉波被判刑十一年，高瑜在自家陽台的柵欄上繫上黃絲帶，以

示紀念和抗議。五年之後，黃絲帶仍然迎風飄舞，繫黃絲帶的人走進了監獄。

二〇一五年五月，在被拘押一年以後，高瑜被以「洩露國家機密罪」重判七年，這是她第三度入獄。這一次，高瑜的罪名是：向海外媒體透露中共黨內傳達的習近平「七不講」講話（不准講普世價值、公民社會、司法獨立、新聞自由、公民權利、共產黨的歷史錯誤、權貴資產階級）。七年刑期，意味著習近平的一句話值一年刑期。如果習說的是「十不講」或「十五不講」，那麼年逾七旬、疾病纏身的高瑜，是否就要被判處十年或十五年重刑？高瑜案之後，「七不講」變成「八不講」——必須外加一條「不准講『七不講』」。

## 你的司法主權，我的鋼鐵镣铐

高瑜案震驚國際社會和中國民間社會。美國國務院代理發言人瑪麗·哈夫表示：「對這名資深記者的判決是對那些以和平方式質疑中國官方政策和做法的公益律師、網路活動家、記者、宗教領袖等人士做出的一系列令人不安的政府行為的一部分。我們呼籲中國當局立刻釋放高瑜，並尊重中國在國際上的人權承諾。」

歐盟發言人表示：「高瑜案突顯了在中國捍衛人權的人士，包括記者、網路博客作者等，在行使言論自由權時，遭受迫害的情況。」

「國際特赦組織」批評說，「高瑜成為當局借此壓制公民言論自由的受害者」。

「美國筆會中心」發表聲明指出，對高瑜的重判顯示像天安門鎮壓這樣的嚴酷措施依然是習近平的統治手段。

國際記者協會、香港記者協會和台灣記者協會也紛紛發表聲明，對中共製造的又一起文字獄表示強烈抗議。

死豬不怕開水燙，中共以更強硬的方式回應外界的批評。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回應稱，「中國所有公民都享有憲法規定的基本權利，高瑜案件是依法處理，其他國家無法干涉，希望其他國家尊重中國的司法主權」。該發言人擺出一副理直氣壯的姿態，因為背後有習近平撐腰。

中共黨媒《人民日報》旗下的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不會閒著。該報以〈高瑜洩國家機密判七年與言論自由無關〉為題發表評論說：「高瑜沒有任何權利可以特殊，她為境外新聞機構供稿，必須以合法途徑做事。……西方一些勢力用『人權』和『言論自由』反覆圍攻中國，證明了中西在這個老問題上很難調和。」這樣的文字，一定出自該報總編輯、習近平的御用打手胡錫進之手筆。

我忍不住痛罵這些厚顏無恥的走卒：去你的「司法主權」！「司法主權」成了中共迫害人權的遮羞布，如果該理由成立，納粹德國可以說，屠殺猶太人是我們的司法主權，不容外國干涉；伊拉克獨裁者薩達姆也可以說，屠殺庫爾德人是我們的司法主權，不容外國干涉。

## 高瑜批評習近平出於公道，習近平報復高瑜出於私怨

我在國內時，多次跟高瑜在同仁的飯局上會面，也曾送書給她，可惜一直沒有機會深談。

反倒是流亡美國之後，我們在紐約的一次紀念胡耀邦和趙紫陽的會議上相遇，一起乘坐一段漫長的紐約地鐵，一路上聽高瑜介紹了不少國內的新動向。那時，我正在寫第一本批判習近平的著作《中國教父習近

平》，我將基本觀告訴高瑜，請她提意見。高瑜表示，她同意我對習的否定性看法，習不是胡耀邦和趙紫陽式的改革派，是心狠手辣的紅二代，是「編外紅衛兵」。

在那次學術會議上，高瑜一邊細緻梳理胡耀邦和趙紫陽時代政治體制改革的脈絡，一邊忠告大家，切勿對習近平抱有不切實際的幻想，如同胡溫剛上台時，有些人一廂情願地炮製「胡溫新政」的說法，最後淪為自我羞辱。

那一次，雖只有短短一個多小時，卻是我跟高瑜最長的一次交談。她的年齡跟我母親相仿，卻毫無長輩架子。其學識之淵博、思維之敏捷、觀點之澄澈，讓做為後輩的我肅然起敬。我再三向她表示，希望她多多小心，習是報復心極強的人，明目張膽地否定習，回國後的危險性會大大增加。高瑜樂觀地回答說，她早已坐過牢、吃過牢飯，什麼都不怕了。

不久，高瑜在紐約激烈批評習近平的一段視頻在網路上廣為流傳。在那段視頻講話中，高瑜警告人們不要對習存有幻想。她認為，習是極左派盟主，上任後的行為，是一輩子夾著尾巴做人的人，一旦得勢之後的翻盤報復。在當時，相當一部分中國民眾、知識分子和西方觀察家，仍對習抱有良好期待，即便他不斷集權，也認為集權之後會推動政治改革。那時，很少有人像高瑜那樣，準確地判斷習是法西斯主義者。

心胸狹窄的習近平果然沒有放過高瑜。在民間知識分子陣營中，高瑜資格老、人品好、聲望高，且得過多個國際大獎，是一位指標性的人物。習近平懷著「射人先射馬」的策略，抓捕高瑜，震懾其他異議人士，並讓媒體和知識界產生寒蟬效應。

高瑜案的整個進程，是在習近平牢牢集權的背景下展開的。周永康及其「餘孽」早已深陷囚籠，不可能跟習「添亂」。江澤民和胡錦濤兩

屆前任，羽翼被折，步步驚心，但求自保，遑論反擊？面對做為「野心皇帝」的習，他們不可能像鄧小平對待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趾高氣揚地垂簾聽政。大權在握的習必須為每一個政策、每一個案例負全部責任。

一向親北京的《亞洲周刊》巧舌如簧地為習近平在高瑜案中的角色開脫。《亞洲周刊》評論說，習在判決前並不知情，也不曉得會判得如此重。《亞洲周刊》將責任推到周強身上：「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周強的強勢動作，被視為扯習近平後腿。」

對此，中國政治評論家牟傳珩指出：「當下仍有人基於不同目的，不停地在為習近平反腐唱讚歌，奢望其成為當今中國的蔣經國，而對其獨攬大權，嚴防和平演變，反對普世價值，不斷抓捕異見人士的一面遮遮掩掩，甚至傳謠江澤民攪局、劉雲山綁架或習近平在做『假動作』，『在下一盤好大的棋』。」實際上，「《人民日報》二〇一四年一月九日刊文，重提政法機關是『刀把子』理論，要『刀把子』必須置於黨的絕對領導之下，已經為今天當局重判高瑜提供了強大的背景支援。」

重判高瑜，是習本人的決策。若沒有習的認可，當局不可能在法院尚未宣判時，就以家人的安全為籌碼逼迫高瑜認罪，並將認罪的畫面在央視播放。這種文革式的「遊街示眾」、羞辱對手人格尊嚴的做法，只有在文革中死去活來、並對文革愛恨交織的習最為擅長。若沒有習的認可，法院不可能在幾度拖延之後，不顧國際的警告和民間的抗議，仍對高瑜判處重刑，在審判過程中霸道專橫，無視律師提供的有力證據，一手炮製這一曠世冤案。

高瑜與前中共總書記胡耀邦之子胡德平、曾任毛澤東秘書的李銳等「黨內開明派」保持著密切關係，也在這個圈子中獲得不少高層權力鬥爭的消息。然而，此次高瑜被重判，顯示出這個由少數退休高官組成的

「黨內開明派」對習毫無影響力。他們本人的開明立場毋庸置疑，但他們並沒有形成一個「派系」，可抗衡或制約獨裁趨勢越來越明顯的習近平。

高瑜案釋放了一個再明顯不過的信號：中國的民間社會除了自行凝聚反對力量之外，再也不能寄希望於黨內出現改革派。

## 重判高瑜，不能嚇退推倒高牆的中國人

在如何煉成獨裁者的道路上，普丁和習近平這兩個人首尾相隨、惺惺相惜。普丁對批評他的記者毫不留情，不惜採取暗殺手段。俄國異見記者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大量報導車臣地區的狀況，詳細描寫車臣人遭受的可怕苦難，嚴厲批評俄軍士兵的暴行。二〇〇四年，波利特科夫斯卡婭在英國出版新書《普丁治下的俄羅斯》，嚴厲批評克格勃出身的普丁，稱普丁將把俄羅斯帶回蘇聯時期。十月七日，她在位於莫斯科的公寓樓內慘遭槍殺，屍體倒伏在公寓樓內的電梯裡。（我與這位勇敢的女記者一樣，都是紐約「公民勇氣獎」得主。）

與普丁相比，聲稱熱愛儒家和佛教的習近平「溫柔敦厚」許多。對待高瑜，只是判刑入獄，還沒有趕盡殺絕。習近平的御用吹鼓手們可以大肆宣揚「皇恩浩蕩」——中國的新皇帝比俄國的新沙皇更加仁慈。

然而，體弱多病的高瑜，在獄中健康狀況急遽惡化，其上訴之後，二審開庭時間幾度延期。其家人表示，擔心高瑜有生命危險。律師尚寶軍前往看守所探視之後表示，高瑜的心臟問題越發嚴重：「胸悶和胸痛發作比較頻繁。」此外，高瑜的左手經常感覺麻痺無力，其家人擔心這可能是中風的前兆。

這位七十一歲的老人，真的要將牢底坐穿嗎？所謂「尊重司法主權」，絕對不是肆意踐踏人權的理由。「人權觀察」亞洲部主任布萊德·亞當斯（Brad Adams）說：「捏造政治罪名把記者打入大牢已經夠糟，還剝奪她必需的醫療照護，實在是殘忍、有辱人格而且危險的做法，中國政府應該立刻將高瑜送往醫院，對她的健康惡化進行徹底診察。」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北京市第三中院二審改判高瑜有期徒刑五年，剝奪政治權利一年，監外執行。對此，莫少平律師指出：「我們的基本辯護意見是仍然認為（案件）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應該依法改判為無罪。」

高瑜的受難，絕非她一個人的受難，鋼鐵镣铐已落到每一個中國記者和言論者身上。習近平關押了高瑜，卻不能摧毀越來越多民眾對真相和真理的渴求。是奮起抗爭，將獨裁者掃入歷史的垃圾堆；還是繼續懷抱幻想、自欺欺人——未來只有這兩種選擇。但願人們珍惜高瑜付出失去自由的代價換來的寶貴信息。

## 中國進入美麗島時代

中國領導層是其自身最大的敵人，往往跟自己過不去。他們壓制言論自由，但言論自由卻是遏制腐敗最有利的武器，而腐敗又是習近平投入大量政治資本要竭力解決的猖獗問題。他們逮捕可以制衡地方官員權力的律師，儘管這些官員濫用權力的行為在損害中央政府的聲譽，並侵蝕其存在的合法性。

—黃亞生

二〇一五年七月十日，是中國的「黑色星期五」—這一天之後短短兩個星期，中國安全部門以前所未有的密集程度，綁架、抓捕、軟禁和恐嚇超過三百名人權律師和人權活動人士。而且，中共封鎖傳統媒體和封閉多種國際社交媒體，妄圖讓此事件不為人所知。但我深信，在歷史的天平上，這數百人比接近一億的股民更重要—他們是中國最優秀的公民，是中國起死回生的希望。

中共建政以來，維持其統治的秘方之一，是消滅最優秀的公民，讓更多人成為愚民和順民。美國國會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資深議員、人權事務小組委員會主席史密斯，針對中共的大逮捕行動發佈聲明說：

「中國政府逮捕的這些維權律師是中國人當中最有智慧、最勇敢的一批人，他們擁有的知識和能量是中國應當大力採用、而不是強行壓制的。」隨即，聯合國人權事務專員、美國白宮發言人、歐盟發言人及歐洲議會，均嚴厲譴責中共當局踐踏法治的惡行，呼籲盡快釋放這批律

師。

## 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一次「大練兵」

此次事件，是自二〇一一年春的茉莉花風潮之後，中共當局對民間社會發起的最大規模的打壓。進入七月以來，一場突如其來的股災讓習近平如坐針氈，互聯網上潮水般發洩不滿的資訊更讓其如芒在背。

如驚弓之鳥般，習近平在出訪俄國的飛機上睜眼到天明。唯一的救命稻草，大概是求俄國總統、前克格勃特務普丁賜予錦囊妙計。普丁是習近平學習的好榜樣，莫斯科是習近平跑得最勤的地方。

可以想像普丁的回答是什麼——「抓人吧，抓更多的人，人民就害怕你了」，普丁陰險地微笑著，對習近平如是說。

於是，習近平親自指揮了這場鋪天蓋地的大逮捕。他要將近年來活躍在第一線的人權律師一網打盡，再用新版的《國家安全法》一一治罪——他們僅僅幾百人，在偌大的中國，讓幾百個人憑空消失，豈不易如反掌？如此，人民才能乖乖聽話，江山才是鐵打的。「永不變色」的江山，「太子黨」可一代代地「坐」下去。

在此後數週時間裡，每一天，「失聯」（在這個神奇的國家，好端端的公民也會像馬航飛機那樣失聯）人數都在攀升。在不同機構和網站發佈的名單上，多名被捕者和失蹤者都是我多年前認識的朋友，或是雖未謀面但彼此惺惺相惜者。這場突如其來的大逮捕，給數百個家庭帶來撕心裂肺的痛苦——我看到妻子們四處尋找失蹤丈夫的畫面，不禁為之揪心。緊接著，必定是秘密警察對當事人實施疲勞審訊和酷刑折磨。缺乏想像力的中共鷹犬們，還有什麼新的維穩手段呢？

法學家范忠信撰文分析說，此次拘捕行動有五大特徵：人數多、規模大、全國警方協同作戰、利用媒體進行人格醜化、大規模銷號刪帖禁言。總之，這不是一次正常的執法行動，而是以律師為鬥爭對象的政治整肅。這場抓捕絕非地方政府所為，而有中央政府一雙看不見的巨手在背後掌控—始作俑者，不單單是公安部、也不單單是政法委，更是習近平親自擔任主席的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管天管地管空氣」的機構，自成立以來有了第一次「大練兵」的機會。如同軍事行動一般，統一部署、統一行動、從南到北、嚴絲合縫。警方採取的手段，從黑頭套綁架、用斧頭破門而入到刻意恐嚇只有六歲的孩子、掘地三尺式的抄家等，無所不用其極。中共政權在別的方面效率極低，唯獨在鎮壓方面效率極高。這是它的光榮，還是它的恥辱？

## 習近平為何仇恨人權律師？

這次被抓捕的人士，主體是人權律師，其人數佔名單三分之二以上。在中國，律師是受人羨慕卻不被人尊敬的職業，律師利用司法體制的漏洞，遊走於法律的邊緣，與公檢法機構狼狽為奸，「吃了原告吃被告」。如果願意同流合污，律師可以點石成金、坐地分贓。作家慕容雪村在小說《原諒我紅塵顛倒》中，就高度寫實地敘述了一個流氓律師的興衰史，宛如律師版的《教父》。

然而，若在「律師」前面冠以「人權」二字，成了「人權律師」，那就是一個完全不同的族類。人權律師必然跟黨國利益發生衝突，成為黨國之「眼中釘、肉中刺」。當局先是通過律師協會控制和招安律師，然後在律師年檢上設置障礙，屢屢將涉足敏感案件的律師停牌。緊接著

修訂相關法律，削弱律師依法辯護的權益。如果人權律師繼續固執己見，不願去掉前面「人權」一詞，最後黑名單和黑頭套就降臨了——甚至你為之辯護的那個人還沒有宣判，你就被扔進了監獄。

這次大逮捕中的第一個受害者，是出生於內蒙古的女性維權律師王宇。近年來，王宇曾代理多起維權案件，如范木根案、曹順利案、尹旭安案、伊力哈木·土赫提案等，並為法輪功學員做無罪辯護，還參與建三江事件的律師團。中共的御用法官和檢察官們，在法庭上不是其對手，流氓只剩下最後一招：讓包括王宇在內的人權律師「集體失蹤」。

先抓人，再抹黑。這一次，官方媒體對人權律師的攻擊聳人聽聞。新華社炮製長篇評論，譴責律師們跟法庭和政府作對，從事顛覆和欺詐活動，甚至將他們描述成貪婪和好色的無恥之徒。「死磕」是極為嚴厲的負面評價——其實，這個詞語生動地描述了律師們鍥而不捨的堅持。

「在一些熱點敏感事件的背後，總是藏有『黑手』在推波助瀾，」一家黨報在評論文章稱，「在這些所謂維權的事件中，少數律師扮演了不光彩的角色，充當起破壞法治、擾亂社會秩序的幫凶。」隨後，一些被抓捕的律師在電視上示眾，被折磨得奄奄一息的他們給出了認罪的口供。習近平似乎大獲全勝。

那麼，習近平為什麼仇恨這些手無寸鐵、人數至多只有數百的人權律師呢？

第一，習執政以後，拋出「依法治國」的口號收買人心。在他心中，法治如同麵團一樣隨意拿捏。偏偏有一群人權律師把這個口號假戲真做，當習政權踐踏民眾的基本人權之際，像王宇這樣的律師站出來斥責說：「住手！」習當然惱羞成怒，撕破「依法治國」的畫皮。

第二，這些人權律師在民間享有越來越高的聲望，未來極有可能形成政治反對派——這是台灣黨外運動的經驗，美麗島事件中的律師團，後

來成了民進黨創黨期間的中堅力量。習近平不願人權律師群中出現耀眼的政治明星，成為中共的掘墓人，便先下手為強，發動全國性大抓捕。

第三，習近平所謂的「法」，是法家之「法」，而不是法律之「法」。習近平重新跳進中國傳統文化的醬缸中尋求統治術，發現法家是好用的法寶。《商君書》中說：「民弱國強，民強國弱，故有道之國，務在弱民。……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富則輕賞。……昔之能制天下者，必先制其民者也。」法家宣揚的國家壟斷經濟和君主專制政治正中習近平下懷，打壓維權律師也就勢在必行。

## 面對未來更黑暗的日子，挺住就意味著一切

此時此刻，我為這些親愛的弟兄姊妹及其家人祈禱，願上帝的慈愛和公義與他們同在。同時，我更有明確的認定：這個「黑色星期五」標誌著中國正式進入自己的「美麗島時代」，在平行的時間軸上，中國的民主化進程比台灣晚了整整三十六年。但它終於來臨了。

一九七九年的台灣，與今天的中國一樣，是一個最恐怖，也最純真的時代。用政論家陳芳明的話來說，美麗島事件標誌著一個歷史的終結，也預告著一個歷史的開端。「美麗島事件不能視同革命，當然也不是政變，更不是官方所宣稱的暴動。然而，它所產生的意義，對新世代而言，已經在心靈裡釀造了一場革命式的風暴。他們徹底與黨國體制劃清界限，或是血脈深處，他們徹底看不起這種猥瑣的統治者。如果要檢討一九八〇年代以後的民主運動，或民進黨組黨的成功，或戒嚴體制的宣佈解除，我們都必須回溯到這場改變歷史流向的美麗島事件。」換言之，美麗島之前的台灣和美麗島之後的台灣，是兩個截然不同的台灣：

前者是無盡的黑暗，後者是即將來臨的光明。

當然，美麗島事件之後，並不意味著獨裁政權自廢武功、束手就擒，民主力量不戰而勝、「輕舟已過萬重山」。被捕的反對派領袖還將在獄中度過一段相當漫長的刑期，監獄之外的反抗力量則接棒前行。此後長達十多年的抗爭充滿血腥味道，相繼發生多起慘案，如林宅血案、陳文成案、江南遇刺案以及鄭南榕自焚事件。然後才是民進黨組黨成功，報禁和黨禁解除，憲法修改，改組國會，直選總統。所以，對於中國的未來，人們不能盲目樂觀，而要沿著人權律師群體奮進的方向，風雨兼程。

習近平是共產黨挑選出來的「自我終結者」，或許他並沒有意識到這是其「第一身分」。面對江、胡二十年統治演化而成的政治和經濟危機，習宣揚制度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其實他最缺的就是自信。今天的習近平比當年的蔣經國更缺乏自信：蔣經國在美麗島事件中對民間反對派採取「未暴先鎮、鎮而後暴」的鎮壓手段，習近平乾脆將一群本來在法律體制內抗爭的法律人推向政治反對派陣營。

英雄從來都是由做為其對立面的獨裁者塑造出來的。當習近平向人權律師群體揮起鐵拳時，他並不知道，更多人民已然覺醒，更多人民開始吶喊和行動。當每個人都伸出手做出電影《饑餓遊戲》中不服從的手勢時，難道你要向每個人開槍射擊嗎？不是你掌控了一支軍隊就搞定了一切。總有一天，反抗者和顛覆者數不勝數、抓不勝抓，即便將中國每一棟公寓都變成監獄，也關不下那麼多人。

習近平缺乏從歷史中汲取經驗教訓的智慧，他像是一個玩火自焚的頑童，他讓人們意識到：共產黨不可改良，共產黨必須推翻，正如民間維權人士李一平在這場大抓捕之後宣稱的那樣：「從今以後，法庭不再是正邪交鋒的場所。只有一個戰場對民間開放，那就是街頭。大規模街

頭運動是謀求正義的必經階段！」

## 向習近平的囚徒們致敬

我非常清楚瞭解，這種抗爭在極短時間內就會轉變成一種完全不同的抗爭，而且只有極少數參加初期衝突的人會繼續投入下一階段的爭戰……這會是一場「至死方休的抵抗」。

—潘霍華（Dietrich Bonhoeffer）

我是二〇一二年一月離開中國的，習近平是二〇一二年十二月正式掌權的。過去十年我所遭受的各種形式的迫害，主要來自胡錦濤、溫家寶政權，執行者是「政法沙皇」周永康，與習近平並無太大關聯。

習近平之於我個人來說，不是私敵，乃是公敵—他上台之後，抓捕數以千計的媒體人、學者、非政府組織人士和人權律師，其中有不少是我相交、相知多年的友人。如果我沒有離開中國，我的命運必然跟他們一樣，在獄中遭受酷刑和凌虐，乃至在家人被當作人質威脅的情形下，被迫錄製「認罪」視頻，在央視新聞節目中示眾和羞辱。

無辜者的血，已沾滿習近平的雙手和衣襟。二〇一五年七月，被中共關押在黑牢中十三年的阿安扎西（丹增德勒活佛）被凌虐致死，當局拒絕其家人按照藏族傳統安葬遺體的要求，強行將其遺體火化，並派武警持槍從其家人手中搶奪骨灰。

十三年前，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周永康一手炮製阿安扎西案，作家和人權活動家王力雄幫助阿安扎西聘請資深人權律師張思之擔任辯護律師，並起草了一份呼籲公正審理阿安扎西案的建議書，我是這份文件的

簽名者之一。十三年後，在權力鬥爭中失勢的周永康被判無期徒刑，但阿安扎西的冤案不僅沒有獲得平反，反而更加惡化。

周永康垮台後，王力雄等人請夏霖律師為阿安扎西案的平反而努力。監獄管理方剝奪阿安扎西家人的探視權，使當事人無法簽署授權律師申訴的法律文件。不久，夏霖因為替聲援香港佔中運動被捕的郭玉閃辯護，在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八日深夜被數十名警察抄家和抓捕。郭玉閃正是當年呼籲公正審理阿安扎西案建議書的簽名者之一，那時他還是北京大學的碩士生，十幾年來已成長為NGO領導者和青年領袖。

如今，王力雄審視十三年前年阿安扎西案呼籲書上的簽名者名單，發現名單上人們的遭遇，幾乎就是中國人權狀況持續惡化的縮影：「首批建議人中的劉曉波被判十一年徒刑，師濤被判十年徒刑，浦志強目前在獄中，張祖樺被軟禁，廖亦武、余杰被迫害後流亡國外，蕭瀚被停止授課，徐曉、冉雲飛也曾分別入獄，王怡擔任牧師的家庭教會成為當局打壓重點；後來的簽署人中，除郭玉閃在獄中，杜導斌數年服刑，趙達功被抓數次，李劍虹曾不讓回國，盧躍剛被停止工作……」然後，就傳來阿安扎西在獄中去世的噩耗，這位活佛成了一名殉道者，中國的監獄比納粹的奧斯維辛集中營「文明」多少呢？

正如美國學者威廉·皮特所說，「律法終，則暴政始」，習近平時代，中國的監獄急遽膨脹。從鄧小平到習近平，獨夫民賊的本質一以貫之；抗爭者或已入獄，或正在進監獄的路上。

## 牢獄中的學者：擇善固執、求仁得仁

習近平對學界和知識分子的迫害，與暴虐的毛澤東亦步亦趨。知識

分子一旦獨立思考，習近平就怒火中燒，恨不得去之而後快：有的學者被服務的大學和研究機構解聘，有的學者被禁止在課堂上授課和出版著述、發表文章，更有甚者被投進監獄、看守所和勞改營。

二〇一二年一月，我離開中國前一週，悄悄邀請幾位老朋友在一家朋友開的餐廳最後相聚，有王力雄和唯色夫婦、徐友漁、王東成夫婦、蕭瀚夫婦。北京天寒地凍，在座諸君心情沉重。飯後，我們握手告別，互道珍重，相逢又不知在何時。

二〇一四年五月，傳來徐友漁因為參加「六四研討會」被傳喚和刑拘的消息，讓我徹夜不眠。徐友漁是中國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領軍人物，也是具有體制內身分的學者中最敢言者，他的存在是社科院最大的光榮。多年來，徐友漁飽受各種形式的打壓，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他在大學的講座時不時被取消，關於文革研究的著作只能在香港出版，還常常被領導約談，但極少被國保警察直接騷擾，更沒有被剝奪過人身自由。習近平掌權之後，悍然撕下最後一道面紗，直接動用秘密警察對像徐友漁這樣理性而溫和的學者下手。

我在一九九八年出版處女作《火與冰》之後，便與徐友漁老師相識，他應邀參加過我的書評會，我們多次在飯局中相見。由於我們都是四川成都人，最喜歡的便是在社科院大樓附近四川省駐京辦的餐廳中餐敘。

我和劉曉波發起各種關於人權議題的簽名信，徐友漁每次都不假思索、義不容辭地簽上名字。很多與他同齡的自由派知識分子，由於在體制內有身分和職位，參與此類公共事務時瞻前顧後，與徐友漁形成鮮明對比。徐友漁為何如此勇敢呢？記者陳遠在微博中說：幾年前，他曾和徐友漁有過長談，徐談到在文革中目睹的武鬥場景對他的價值觀形成的刺激與影響：「我眼看著他們彈無虛發，然後一個人一個人地倒下去。

.....我此後的餘生，就是要說真話，為這個國家真正的進步說真話，哪怕付出代價，哪怕是生命的代價，我也不怕。」

徐友漁經歷了文革、八九等諸多政治運動，沒有變得「成熟」和「老成」，依舊保持赤子之心。對於很多「敏感」問題，他不苟且，不含糊，坦率地表明個人的看法，而被某些人視為「迂腐」。比如，有一次，一位朋友請我、劉曉波和徐友漁到一家高級酒店的藏族餐廳吃飯。席間，有舞蹈演員以藏族歌舞饗客。徐友漁很不喜歡這種形式，直言不諱地表示，旁邊有人歌舞，很難安心吃飯。而且，所謂精緻化的藏餐，是把西藏的文化傳統和生活習俗當作符號販賣。

另一方面，徐友漁又有古道熱腸、樂於助人。有一次，我到歐洲訪問前夕，給他打電話詢問旅行路線，他不厭其煩地詳細解釋，還特別繪製一幅地圖送給我。我們商議救助一些良心犯家屬，他每次都慷慨解囊。二〇〇九年，劉霞遭到軟禁前，徐友漁前去為她錄音，並將錄音帶到歐洲。以防出錯，他事先對著剛學會使用的錄音筆練了二十多遍。

徐友漁被拘押之後，莫少平律師到看守所去探訪他。徐友漁說，是他本人發起六四研討會，開會地點在郝建住處，之後給幾個朋友電郵照片。他不認為這構成「尋釁滋事」，但他願意承擔所有責任，希望當局先釋放其他幾名被抓捕的人。徐友漁表示，他瞭解到近日資深記者高瑜在央視「認罪」的細節，感到相當吃驚。警察也要求他在央視攝影機前這樣做，但被他拒絕。

徐友漁被關押在看守所一個多月才獲釋放。天安門母親丁子霖寫道：「年近七十的他，被戴上手銬和黑頭套，受盡種種不公正、不人道的對待。當我們再次見到重獲『半自由』的徐友漁先生，竟形影枯瘦，判若兩人。」寥寥數言中，即可發現習近平政權何其殘暴、何其野蠻。

次年，徐友漁榮獲瑞典奧洛夫·帕爾梅人權獎，這是歐洲僅次於薩

哈羅夫獎的人權獎項。徐友漁被限制出境，無法到現場領獎，頒獎典禮如同劉曉波的諾貝爾和平獎頒獎典禮一樣，唯有一把空椅子示人。在「半自由」狀態下的徐友漁，突破中共當局的封鎖和隔離，發表聲明宣佈，將七萬五千美元的獎金全部捐獻給天安門母親群體。

天安門母親隨即發表《關於接受徐友漁先生轉贈瑞典人權獎獎金的聲明》，聲明中說：「令我們感到十分意外和感動的是，才從牢裡取保候審出來不久的徐友漁先生竟矢志不渝，毅然決定將瑞典帕爾梅獎的全部獎金悉數捐贈給天安門母親群體，讓我們轉送給全國各地處於困境中的各家難屬。」這是天安門母親群體收到的最大一筆捐款，在日漸艱險的環境下宛如「雪中送炭」。

習近平終將被大部分中國民眾唾棄，徐友漁、劉曉波、天安門母親群體才是中國的脊梁和未來中國道德重建和良心回歸的希望所在。

## 牢獄中的非政府組織人士：風雨如晦，雞鳴不已

習近平害怕顏色革命，顏色革命的主體是非政府組織，所以非政府組織成了其重點打擊對象。在這一背景下，非政府組織活躍人士郭玉閃的被捕，似乎理所當然。習近平認為，將郭玉閃這樣的公民關進監獄，他的政權就可長治久安。習近平的想法錯得一塌糊塗：一個缺乏公共空間和非政府組織的國家，才是最不安定的國家。

郭玉閃小我三歲，算是我的學弟。不過，他是讀研究所時才到北大的，他來的時候，我已經離開，我們在北大唸書時並沒有交集。

郭玉閃在北大讀書期間，恰逢「一塌糊塗 B B S」如日中天，他成為公民生活版塊的活躍網民，參與組織「草坪沙龍」，邀請學者和社會

人士來到靜園草坪，跟同學們座談。這種形式有點像八十年代王丹在北大組織的「民主沙龍」。從那時起，他就被當局列入監控名單。有時，北大保衛部甚至指揮工人故意在附近的草地上澆水，讓講演者和聽講者無處可坐。

郭玉閃也曾邀請我去「草坪沙龍」座談，那是我畢業離開北大之後第一次有人邀請我回母校座談。儘管不是在一間教室（校方對講座的控制和審查日益嚴密，若發現主講人是我，不可能批准提供一間教室），只是在草坪上聊天，已讓我倍感溫馨。那天，靜園的草坪剛剛被澆過水，我們移師到未名湖畔的石舫附近。我沒有專門準備什麼題目，跟十多名同學輕鬆地分享我的寫作和思想之路。頭上是滿天星辰，眼前是未名湖的波光，那真是一個美好的夜晚。

那以後，我跟郭玉閃的聯繫並不多，常常從共同的朋友那裡獲知對方的一些消息。二〇〇七年三月，郭玉閃創立智庫型NGO「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由於中共當局對非政府組織的註冊設置諸多障礙，傳知行只好以公司的名義存在，內設傳知行社會經濟研究所，致力於調查研究社會轉型過程中有關自由與公正的問題與現象，研究主要涉及稅制改革、行業管制改革、公民參與、轉型經驗研究等等。該所自創立以來在民生方面的研究即卓有聲譽，曾在二〇一〇年獲得坦普爾頓自由獎。郭玉閃的好友、立人鄉村圖書館負責人李英強評論說：「玉閃不只是追求了自己的自由，而且他試圖幫助其他人也實現更多的自由，甚至試圖構建一個『兄弟平台』，讓更多人可以在此抱團取暖，共同追求自由，並且推動社會制度的轉型，以實現更大範圍的自由。」

那幾年，傳知行是唯一邀請我去演講的單位，我在傳知行的演講差不多是我在中國僅有的一次面對超過三十人的演講。傳知行有一次冒險請劉曉波演講，草擬了看上去很溫和的題目——「中國當代的悲劇文

學」。然而，那次活動未能成功舉辦，警察直接將劉曉波堵在家中，活動不得不臨時取消。

郭玉閃不僅坐而論道，還起而行道，他幫助受毒奶粉之害的「結石寶寶」的家人維權，也幫助陳光誠逃離戒備森嚴的東師古村、遁入美國使館，他在當局眼中的敏感程度日益提升。二〇一三年七月十八日，傳知行研究所遭北京市民政局以「沒有在民政部門註冊」為由取締。此後，郭玉閃長期被軟禁在家，周遭是令人窒息的空氣。

二〇一四年十月九日，郭玉閃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罪名傳喚和刑拘，並關押在北京第一看守所，之前他曾公開表態支持香港「佔領中環」運動。在中國，支持佔中被當局看作是犯罪行為。

郭玉閃是一顆毫不畏懼地撞向高牆的雞蛋。作家余世存對郭玉閃的描述是「一個熱情似火的學者，做過沙龍、慈善、環保、維權、學術、翻譯」，他具有多方面的才華，是一位「刻苦己身」並「以身作則」的知識分子。他本可過上舒適的中產階級生活，卻義無反顧地走向鐵窗。

郭玉閃的妻子潘海霞在丈夫被捕之後寫了一封《與夫書》，她深情地傾訴說：「夜再長，即使抓不住你的手，我會在同樣的黑暗裡陪著你；雖然不能同路，很多人會看著你，為你擔憂。所以，小寶，無論你會經受什麼，精神或肉體，折磨或煎熬，希望你能時時記著這些溫暖，記著，我們都愛你。」郭玉閃或許收不到這封信，但它在網上發表之後，卻感動無數在黑夜中尋找光明的心靈，以致有人將它與林覺民的《與妻書》相提並論。這樣的類比讓《環球時報》嫉妒得發狂，立即窮凶極惡地發表社論加以「甄別」。

習近平訪美前夕，被羈押接近一年的郭玉閃及傳知行主管何正軍獲釋，但留下「取保候審」的尾巴。代理郭玉閃案的夏霖律師，此前以涉嫌詐騙罪遭到逮捕，目前仍在押。郭何二人獲釋，於他們本人和家人來

說是好事，但並不能解讀成中國人權狀況趨於好轉的信號。這是習近平訪美之前，為獲美方的禮遇，在人權外交方面做出的微弱讓步。此種伎倆，早在江澤民和胡錦濤兩朝就實行過。習以為，以關押中國優秀公民的方式跟美國玩人質外交，他永遠是贏家。這樣的國家及其領導人，永遠不能贏得世人尊敬。

## 牢獄中的人權律師：夸父逐日、精衛填海

相較於媒體人士和非政府組織人士，習近平抓捕人權律師的人數更是驚人。

近年來，中共當局抓人的模式通常是：先是人權捍衛者被抓，接下來人權捍衛者的人權律師被抓，然後聲援人權律師的人權捍衛者被抓，循環往復，沒有盡頭。浦志強是習近平時代首批被抓捕的人權律師，他當年是參與六四廣場絕食活動的大學生。此後二十多年，當年的學生多數隨波逐流，浦志強卻仍然走在天安門學運所追求的民主自由路上。

二〇一三年二月六日，浦志強公開實名舉報周永康，要求中共高層清算周及其在任時的政法委系統十年維穩的問題，並建立法治社會和憲政體制。不久，周永康垮台，揭露周永康的浦志強卻於二〇一四年六月一日被北京市公安局以涉嫌尋釁滋事罪、非法獲取公民個人信息罪為由逮捕。而他真正惹禍的原因，是參加在朋友家中舉行的紀念六四的小型研討會。

浦志強曾為我的一樁名譽權官司擔任律師。那個案件是中共在背後秘密策劃的，儘管有浦志強這位中國數一數二的名譽權案件律師代理，兩審都相繼敗訴。在那期間，我跟浦志強有頗多接觸，我發現多年的律

師生涯沒有讓他老成世故，他仍保有一顆單純坦蕩的心。我告訴他，這個案件前景不妙；他卻安慰我說，有八九成的把握勝訴，總要對法律有信心。我們也彼此交流與國保打交道的經驗，他對於人性的判斷遠比我樂觀。我認為，國保是垃圾中的垃圾，這類鷹犬心中不會有一點的良知和善意；浦志強則說，說不定可以喚起國保的人性中好的一面，他常常買一些書籍和電影光碟送給國保，比如德國拍攝的東德秘密警察監控異議作家的電影《竊聽風暴》。但是，那些國保看了電影之後會羞愧嗎？羞愧對於國保而言，是一種過於奢侈的品質。

緊接著入獄的是唐荊陵等「廣州三君子」。唐荊陵比我年長兩歲，是八九那一年進大學的。他在上海交通大學念應用化學系高分子材料專業，名校和好專業，本來可以讓他過上高級工程師的穩定富裕的生活，他卻轉行當了律師，而且是殺機四伏、吃力不討好的人權律師。唐荊陵曾擔任多起維權案件的辯護律師，包括二〇〇四年東莞勞工騷亂案、二〇〇五年太石村罷免案，後來被當局吊銷律師執業資格，只能做「公民代理」。

唐荊陵長期研究全球範圍內的非暴力不合作運動，做為一名基督徒，他又從基督信仰中汲取力量，希望仿效馬丁·路德·金的道路，推動中國走向民主自由。我們雖然一直無緣見面，卻常常在網路上相遇，彼此激勵、彼此代禱，也常有政治議題和信仰經歷的分享。我寫作基督徒公共知識分子訪談系列，計劃採訪唐荊陵，他亦滿口答應。

我們都是《零八憲章》的首批簽名者，我們的命運都因此改變。劉曉波被捕之後，我長期受警方的嚴密監控，失去行動自由；唐荊陵在二〇一一年二月「中國茉莉花革命」期間，被當局指控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拘押半年之後才獲釋。獲釋後，他又參與李旺陽死亡案調查，發起六四靜思節、林昭紀念日、廢除戶籍隔離、普惠制基本養老

金等行動，直到二〇一四年再次被捕。

二〇一五年六月十九日，唐荊陵案在廣州市中級法院首次開庭，七月二十三日再次開庭。唐荊陵在法庭上做了長達半小時的自我辯護，回顧了過去二十年來自己為推動中國民主化的努力奮鬥。他說：「對我們的關押和判決正是獨裁者自身罪惡的尺規。過去一年裡，我們都已經飽嚐了超乎刑罰的痛苦和屈辱，但這一切正是自由戰士榮耀的冠冕。儘管我們也許無法阻止邪惡肆虐，卻可以堅持對自由和正義的追求。」就連辯護律師也被感動得淚流滿面。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九日，唐荊陵被廣州中院判處五年有期徒刑。他宣佈不上訴，在聲明中強調，專制政體下的法庭不是實現正義與自由的場所，而他，只向上帝和人民上訴。「暴政試圖以它的兇殘嚇倒我們，結果只是暴露了自己的虛弱，更徒然加增我對獨裁專制的憎惡。我將一如既往地推動非暴力自我解放的進程，因為我的願望是要讓我的祖國獲得自由。」最後，他充滿信心地宣稱：「我想起斯巴達王列奧尼達和他的三百勇士，在溫泉關前迎擊波斯王薛西斯的五十萬大軍，戰況如此慘烈，即使戰至最後一人，他們仍然送出了平安的捷報。我們也要在這艱難之地繼續戰鬥，直至自由的佳音傳遍！」這篇擲地有聲的戰鬥檄文，必將收入未來民主中國的公民課本之中。

如今，我與唐荊陵相隔萬里，無從聯繫，不知何時才能實現對他的訪談，把他的故事寫入書中，激勵更多基督徒為公義而戰。

最黑暗的日子還在後頭。二〇一五年七月，中國發生了文革結束之後、恢復律師制度以來最大規模的掃盪人權律師事件。我的好友李和平是受害者之一。

二〇〇五年十二月，我與劉曉波因起草中國人權報告被北京警方傳訊，李和平是第一個趕到我家向我妻子提供法律諮詢的朋友。當時，還

守候在我家的國保惡狠狠地威脅他說：「你最好不要摻和此事，否則連你一起抓！」後來，當我從香港攜帶自己的著作回北京被海關沒收之後，李和平也曾陪我去向北京機場海關投訴。

李和平夫婦與我同一天在同一個北京家庭教會受洗，後來也曾一起在教會中做禮拜。我記得每一次聚會時，他那剛剛三四歲的可愛兒子，安靜地坐在一邊，彷彿能聽懂大人誦讀的聖經經文。我們心目中都有一幅聖經勾勒的願景：「唯願公平如大水滾滾，使公義如江河滔滔。」多年來，我們共同為實現這樣的目標而在各自的領域中奮鬥。

李和平出身河南赤貧的農家，他妻子曾經告訴我，他們剛結婚的時候，回到老家，床上鋪的還是稻草。李和平對底層民眾如上訪者、乞丐、保姆充滿同情與憐憫，常常力所能及地幫助他們。他曾告訴我，每次回老家過年，看到村裡那些衣衫襤褸的孩子，就情不自禁地塞一把錢到他們的口袋中。

做為從河南到京城打拼的「北漂一族」，李和平憑藉拼命三郎般的勤勉，在事業上闖出一片天地。對於一般人來說，可以滿足於當下的中產階級生活了。李和平卻不滿足個人有房有車的生活，他要為社會公義出一番力。他開始為上訪者、受迫害的家庭教會信徒和法輪功修煉者辯護，而將自己置身於險境。

李和平被秘密關押之後，他的妻子王峭玲四處打聽丈夫被關押在何處，從北京公安局到天津公安局，到處都找不到人。她只好在海外媒體發表文章，呼籲大家幫助她尋找丈夫。結果，她被天津警察、北京警察「聯合辦案」，以尋釁滋事罪刑事傳喚。警察撬門入室，將她帶走，在派出所審問五小時才放回家。警察警告說，她的罪行是：連續發表關於李和平的文章。這個做賊心虛的政權，抓了人，還不准家人出聲！

面對一波高過一波的逮捕人權律師的浪潮，人們嘲諷說：「你被捕

的時候，不要向警察要求請律師為你辯護，因為當你被關進監獄的時候，你會發現，律師早就被關進去了，律師成了你的難友。」當習近平將中國最勇敢的律師都關進監獄之際，不會設想自己有一天可能需要律師的幫助。在他失去權力、面臨審判時，誰來為他辯護呢？若無人為之辯護，會不會像利比亞獨裁者格達費那樣被憤怒的民眾直接處死呢？

即便習近平使出毛澤東的雷霆手段，也不可能將中國拖回萬馬齊喑的毛澤東時代。一群維權律師入獄了，又有一群為他們辯護的律師站出來。

與李和平同一批被抓捕的北京鋒銳律師事務所律師王全璋，年僅三十九歲，從照片上看彷彿是剛畢業的稚氣的大學生。「維權網」發佈了一封王全璋在被捕前寫的《致父母書》，相信是此前他交給朋友、以備不測的。當我讀到這封信時，從未謀面的王全璋律師，彷彿是一位心心相印的老朋友。

王全璋在《致父母書》中表示，為給父母帶來的災難深感內疚，但從來沒有把父母帶給他的誠實、善良、正直這些品質放棄。多年以來，他一直按照這些原則生活，「儘管常常深處某種絕望之中，也從未放棄對美好未來的想像」。他回顧說：「從事捍衛人權的工作，走上捍衛人權的道路，不是我的心血來潮，隱秘的天性，內心的召喚，歲月的積累，一直像常青藤慢慢向上攀爬。」

王全璋更在信中展現出高度的決心，「這樣的道路注定荊棘密佈，坎坷崎嶇」、「想起我們曾經走過的艱難道路，這些又似乎稀鬆平常」。他希望父母親會為他感到驕傲，並且無論周圍環境怎樣惡劣，一定要頑強地活下去。

徐友漁、郭玉閃、浦志強、唐荊陵、李和平、王全璋……這些名字應當被我們記住。當這些偉大的公民仍然身陷黑牢之時，為習近平塗脂

抹粉的人就是必須予以唾棄的奴才。法國人權活動家史蒂芬·黑塞爾（Stephane Hessel）挺身對抗納粹政權時說過：「當你們為某件事感到憤怒時，也要像我曾被納粹激怒時一樣，要變成一個強悍的戰士，獻身投入歷史的洪流。而這股巨大的歷史洪流也會因為我們的加入，往正義與自由的方向更為邁進。」這，也是所有習近平的囚徒們永不放棄的信念。

# 習近平與十字架的戰爭

這是一個讓我們感到萬分惶恐卻又不得不面對的抉擇：要納粹黨還是要基督教……

—潘霍華

從二〇一四年二月以來，浙江省掀起拆教堂和拆十字架的風暴。二〇一五年夏天，這一運動趨於高潮。據旅美溫州教會傳道人鄭樂國整理的《浙江、溫州教堂及十架教案涉拆清單》顯示，強拆教堂或十字架的地區包括杭州、寧波、舟山、溫州、台州、義烏、海寧等地。一年多以來，浙江一省有超過兩百家教堂被毀，兩千多家教堂的十字架被拆除。隨即，這股風潮已經從浙江蔓延到江蘇、廣東、四川、貴州、上海等省市，一場全國性的滅教運動雷電交加。

中共當局拆毀教堂或十字架時，像對敵國發動戰爭一樣無所不用其極。比如，七月二十六日，浙江湖州金家兜教會十字架遭到拆除。此前，信徒連續多日守護十字架，中共當局則派和尚、村民在教堂門口誦經、燒香。又如，八月七日，浙江湖州軋村教會十字架被拆。當局以幾種黑幫的行為方式齊頭並進：給外地民工一人兩百元的報酬，讓他們將教堂外會友的小車推翻；傳喚同工，恐嚇家屬；隔離教堂，噴辣椒水；城管、武警帶狼犬衝入教堂。當局毀滅十字架的招數數不勝數、匪夷所思：「割」、「鑽」、「燒」、「拉」、「砍」……其中，「燒」法跟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和庚子年義和團拳匪最像。這不是國家恐怖主義，什

麼才是國家恐怖主義？

拆毀教堂和十字架之後，中共當局乘勝追擊，推行所謂「五進五化」新政。「五進」是：「政策法規進教堂、健康醫療進教堂、科普文化進教堂、扶持幫困進教堂、和諧創建進教堂」。「五化」是：「宗教本地化、管理規範化、神學本土化、財務公開化、教義適應化」。目前，溫州當局已部署委派共產黨員進駐教會，在教會內設立辦公室，在信徒聚會之前佔領講台宣講法規，以此全面改造教會，甚至有教堂被逼迫改名為「文化禮堂」。這些政策比看得見的拆毀教堂和十字架的行為更加邪惡，這是明目張膽地玷污聖殿，將教堂變成共產黨的黨校。

習近平政權還同時迫害報導有關事件的記者和為基督徒提供法律援助的人權律師。基督徒獨立記者咎愛宗長期參與宗教自由的維權活動，他兩次上書習近平，控訴浙江省政府及夏寶龍強拆教堂和十字架屬違法行為。他的上書沒有得到任何回應，反而讓他被杭州公安傳喚並抄家。基督徒律師張凱律師和助手趕往溫州，幫助眾教會維權，卻被溫州警方翻牆進入教會強行帶走，隨即宣佈以「涉嫌洩露國家機密」的罪名對其實施為期六個月的監視居住，至於他究竟被關押在何處、是否遭受酷刑折磨，則又是不為外人所道的「國家機密」。

這次迫害基督教的運動，也席捲了向來被當局視為「自己人」的「三自教會」或者「愛國教會」。二〇一六年一月十八日，被譽為最大的華人教會的杭州「崇一堂」主任牧師顧約瑟被免職，九天之後被秘密拘捕，當局一如既往地冠之以經濟罪名。顧約瑟同時還是浙江省基督教協會會長。香港中文大學崇基神學院院長邢福增教授評論說：「此舉正式標誌著，浙江省自二〇一四年起開展的強拆十字架運動，終於發展至政治清算省內反強拆的基督教最高領袖的局面。」對此，若干一向親北京的香港教會領袖亦無法視而不見，專程赴中聯辦表達意見。而具有諷

刺意義的是，台灣新成立的有基督教背景的政黨「信心希望聯盟」偏偏保持沉默，彷彿彼岸受迫害的牧師和基督徒不是他們親愛的弟兄。

此種喪心病狂之舉，激起教徒抗議、人神共憤。一向親北京的《亞洲周刊》也以封面文章詳細報導並評論說：「二〇一三年年底上任的省委書記夏寶龍，改變過去尊重宗教自由的政策，也和全國的政策相悖，以清除違章建築的名義，強行拆除十字架，若有反抗，就把整座教堂拆掉，引爆百萬基督徒抗爭。」又有評論指出：「如果說中共一九五〇年代強制推行三自愛國運動，是切斷基督教和西方的聯繫，那麼這次習近平的『五進五化』新政，是對基督教的第二次徹底改造，由『三自』變成共（產黨）治、共養、共傳的『三共』教會，就是讓教會完全黨化，成為黨的附庸，最終名存實亡。」那麼，習近平的這一企圖能夠得逞嗎？

## 習近平為何迫害基督教？

習近平上台之初，一些在華人教會中相當活躍的人物如梁燕城、趙曉等，對習近平時代的宗教政策抱有不切實際之幻想，恨不得毛遂自薦充當習的御用宗教政策顧問。誰知，習執政一年多之後，浙江就發生大規模的宗教迫害運動。很多觀察家對此迷惑不解：既然中共各級官僚的邏輯是「維穩為第一要務」，一般「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不出事才能升官發財」，而基督教畢竟不像新疆的伊斯蘭教和西藏的藏傳佛教那樣與分離主義有「剪不斷、理還亂」的關係，當局通常不會主動拿基督教開刀。那麼，做為封疆大吏的夏寶龍，為何大動干戈地拆毀教堂、毆打信徒？這究竟出於怎樣一種執政思維？

熟悉浙江政壇的消息人士認為：浙江大範圍的迫害基督教運動，是夏寶龍迎合習近平的意識形態取向、向其表達政治忠誠並為自己的仕途發展鋪路。二〇一五年五月，中共召開統戰工作會議，習近平親自到會發表講話，論及宗教政策時指出：「積極引導宗教與社會主義社會相適應，必須堅持中國化方向。」夏寶龍敏銳地捕捉到此信號，對浙江基督教的打擊更加峻急，一手硬推對教堂的「三改一拆」。夏寶龍曾與習近平共事過，被習近平視為「習家軍」的當然成員。如果夏寶龍打擊基督教大獲成功，就擁有了一張價值連城的投名狀，極有可能被提拔為下一屆政治局委員，進入「黨和國家領導人」行列。那麼，基督教成為其仕途飛黃騰達之犧牲品或墊腳石，又何足道也？

其次，中共新一輪的宗教迫害選擇從浙江和溫州下手，跟當地基督教快速復興的勢態有關。香港學者安德烈在〈中共迫害教會的新招：浙江省的強拆模式〉一文中指出：首先，浙江省是基督教植根歷史悠久的省分。在柳市堂新堂建成以前，由戴德生於一八六六年建立的杭州崇一堂曾聲稱是「全球最大華人教會」。無論三自教會還是家庭教會，基督教在浙江城鄉有強大影響力，溫州更因為信徒人數接近總人口的百分之二十，被稱為「中國的耶路撒冷」。樹大招風，浙江教會成為習近平迫害基督教的「試點」。

再次，浙江省是習近平曾主政之地，習在浙江安插大量心腹，要動手比較容易。這次浙江省迫害一向恭順的三自教會，清洗民宗局、公安局等部門的地方幹部，有利習派人物清除政敵、統一政令。以溫州市為例，市委書記陳一新是習在浙江主政時的助手。在習最親近的十一個幕僚中，有浙江省委書記夏寶龍、浙江省長李強等六個人是其在浙江時的舊部，可見習與浙江關係之深厚。浙江的地方官員一定要將浙江變得更符合習的「審美趣味」。

然而，從法理上而論，浙江當局的「三改一拆」運動是徹頭徹尾的「違法運動」，跟習標榜的「全面依法治國」背道而馳。該行動的法理依據《浙江省違法建築處置規定》並沒有經浙江省人大審議通過，同時並未按《浙江省地方立法條例》向受影響者（包括三自教會）「徵求意見」。安德烈認為：「這種強硬而枉顧法治的打壓手段，充斥著習近平派系的風格。」

那麼，已經四面樹敵、八方開戰的習近平，為什麼突然掀起宗教迫害運動呢？

第一個原因，習近平缺乏安全感，敵視公民社會，將迅猛發展的基督教看作是潛在的威脅。中國基督徒的人數與共產黨員的人數接近，基督教成為在共產黨控制之外最大的社會組織。一份政府內部文件清晰地顯示，拆除教堂是限制基督教公眾影響戰略的一部分，政府的目標是管理「場所過多」、「過熱」的宗教活動，文件中只明文提及基督教這一種宗教，也只提到十字架這一種標誌物。「重點拆除高速公路、國道、省道線兩側宗教活動場所的十字架」，「分期分批把十字架從屋頂移到建築立面上來」。可見，當局目標明確、計劃周密，絕非一時興起、誤傷無辜。

第二原因，中共的馬列主義意識形態已破產，習到中國的傳統宗教信仰和文化價值中尋求支援，將佛教、儒家、法家等「拿來」為我所用。與此同時，他發現基督教難以成為「馴服工具」。基督教來自西方，而在毛時代形成其精神結構和思維方式的習，對來自西方的一切都心存疑懼，就連股市崩潰都要拉來西方做替罪羊。而基督教確實與極權主義格格不入：基督徒相信人是上帝所造，人具有上帝的形象和榮耀；基督徒也相信「因真理得自由」，一個人不能奴役另一個人，人的權利和尊嚴不可剝奪。既然基督教不能與共產專制制度「和諧並存」，習就

不能容忍基督教與之爭奪民心，辣手打壓遂勢在必行，甚至連官方控制下的三自教會也要一併清除。

第三個原因，習要向毛學習，不僅奴役十三億民眾的身體，更要控制十三億民眾的心靈。中國古代的皇帝從未將「政統」與「道統」統一於一身，皇帝在大部分時候不得不容忍士大夫階層在一定程度上掌握「道統」的闡釋權。而近代以來的中國獨裁者中，唯一成功地集「政統」與「道統」於一身、具備君王與祭司雙重身分的是毛澤東—在一九六六年《紅旗》雜誌第十二期題為〈紅衛兵讚〉的評論員文章中，首次出現「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的說法，這是毛澤東最喜歡的一組「尊號」。這「四頂帽子」也是習最為期待的歷史定位。

習的所作所為就像尼采描述的精神暴君：「精神暴君施行暴力的辦法是使人們相信他擁有真理。但是，這種信念所固有的殘忍、專橫、暴虐和兇惡從來沒有如此有力地表現出來。」這樣就很容易理解習近平為什麼要不擇手段地打壓基督教了：他不僅要當皇帝，還要當上帝。

## 習近平終將是基督徒的手下敗將

消滅十字架、消滅基督教、消滅基督徒，這樣的癡心妄想，古往今來若干獨裁者都曾付諸於行動。古羅馬的暴君尼祿失敗了，日本幕府的將軍失敗了，英國的女王「血腥瑪麗」失敗了，第三帝國的元首希特勒失敗了，蘇聯的獨裁者史達林失敗了，羅馬尼亞的獨裁者西奧塞古也失敗了，習近平當然不可能成功。

上帝讓萬事互相效力。中國基督徒和教會在這場大逼迫中，得到淬

煉、潔淨和復興。他們重新思考此前一直忽略的政教關係的問題，從聖經、大公教會的傳統以及歷代殉道的聖徒那裡尋求真理和經驗。若干原本在官方控制下的三自教會，在受到衝擊之後，發現以真理上的妥協來換取部分宗教信仰自由，是靠不住的，他們勇敢地邁出脫離三自系統的關鍵一步。若干原以為信仰是私人領域的事務、跟公共生活無關的家庭教會，發現即便夾著尾巴做人也不能贏得中共的寬宥，雙方的矛盾不可調和，他們在忍無可忍中發出吶喊，即便教堂的十字架被拆毀，也要手持小小的十字架走上街頭。

在這場突如其來的「教難」中，中國的基督徒和教會開始探究反抗暴政的教義和思想基礎，也開始實踐具體的反抗方式和策略。

就反抗暴政的教義和思想基礎而論，挺身反抗納粹暴政的德國神學家和殉道者潘霍華的思想可以在中國移植開花。潘霍華認為，如果政府過度擴張其權力，甚至剝奪基督教證道與基督教信仰的各種權力，教會就必須反對這種「荒誕的情況」，因為「危害基督教傳播福音的政府，就是在自取滅亡」。他列出教會可以對政府採取的三種立場。第一，教會可以質疑政府的正當性，目的是幫助政府成為符合上帝旨意的政府。第二，教會可以協助被政府行為所傷害的人，對所有階層的受害人都需要擔起無條件的義務，其中，即便不是基督徒的受害者（比如猶太人），教會也應當給予幫助和保護。第三，不只是為被壓在車輪下的受害者裹傷，更要阻止車輛繼續前行，也就是說，直接對抗政府、阻止其繼續作惡。當然，「唯有在教會的存在備受政府威脅，而政府不再符合上帝的旨意時，才可以如此行」。因此，他參與了暗殺希特勒的行動，並為之付出生命代價。今天習近平政權對教會和公民社會的殘害，跟昔日的希特勒德國相差無幾，中國教會和基督徒可以像潘霍華那樣展開反抗。

在具體的對抗方式和策略上，中國教會總結出《守護十字架的具體操作方法》，其中有「蝸牛」守護法和「蜜蜂」守護法。「蝸牛」守護法包括：首先是「一條心」，蝸牛有殼，那殼就是基督徒的主，基督徒的磐石。基督徒同心禱告主賜給信心。其次是「三堅決」，堅決不動手打人，堅決不動口罵人，堅決不袖手走人。像蝸牛一樣，堅決守住教堂，團團圍在十字架下面，禱告、唱歌。就是不走，即使兩個人來拉，也拉不走；三個人來拖，也拖不走；四個人來抬，也讓其費盡體力勉強抬走。想盡一切辦法阻止對方接近十字架，讓其花十天費一百人拆一個十字架。看它能拆幾個？

然後就是「蜜蜂」守護法：以十字架為中心，像蜜蜂一樣將十字架圍起來唱歌禱告。這是第一步，信徒越多越好，可以調動全牧區。如果對方近身，執意要進攻，就啟動「蝸牛」守護方案，堅決守衛在各自原來地方，盡可能不讓移動。

在一次對決中，六十名基督徒對抗六百名政府人員，兩位姊妹身穿白色聖衣在高空徒手擁抱十字架。大家大聲唱歌、禱告，聖靈充滿整個村莊。那六百人全副武裝，卻聞歌喪膽，鳴哨退去，至今沒再來。

中國的基督徒們信心百倍地宣稱：「好好分析就知道，我們是多麼的輕鬆，而對方是多麼的艱難。對方所有幾百人幾乎百分之九十以上心中有愧，內心壓力極大。很多時候，當局選擇在深更半夜動工，就表明他們只敢在黑暗中幹壞事。要知道帶頭的那個，一旦發生事故，肯定要掉帽子做『替死鬼』的。但我們知道為主十字架受逼迫是有福的。」

中國的基督徒們相信，只要真心守衛十字架，啟動「蜜蜂」和「蝸牛」方案，當局拆十字架起碼要動用一千人對付信徒兩百人。當局要用五百人封鎖路口，五百人抬人，起碼要花十個小時以上——喊話做思想工作一個小時，破解「蜜蜂」兩個小時，進攻「蝸牛」要幾次，至少三個

小時，抬一個不合作的人是極其糾結艱難的，這樣就六個小時了。工程車作業更加複雜，要五個小時，一共就是十一個小時。政府調動的都是臨時工，時間一到就要回家，遠道而來沒有吃喝，最多堅持進攻三個小時。想想也知道，哪個傻子拼命去做這樣萬人唾罵的事情呢？這裡面有極大的心理征戰。

在極權主義巔峰的文革時期，毛亦未能將基督教滅絕，今天習政權的動員能力無法做到毛政權那樣一呼百應，更不可能強力消滅教會。香港媒體「端傳媒」描述了溫州一家教會的反抗方式：「在曾山堂，幾乎可以看到所有歷次攻防戰中積累出來的抗爭手法：大門外堆滿巨石，車輛不得靠近；大鐵門用黑布蒙住，謹防偷窺；鐵門後面建了兩個活動板房，青壯年值班人員就睡在裡面；整個教堂的圍牆都用鋸齒鐵絲網加高，以免外人翻牆進來；教堂各個角度都安裝了攝影機，即時發現風吹草動；高音喇叭被安裝起來，緊急時呼叫增援；通往十字架的大門被道道鎖死，危急時刻還有特別組將用肉身擋在十字架前；教堂配備兩百隻強光電筒，強拆人員深夜來襲時就一起照射他們的眼睛；還有數個巡視小分隊，反向監視各個相關政府機關的活躍程度……」傳統的維穩力量無法擊敗教會，除非直接動用軍隊鎮壓。

「越逼迫越復興。」這是抗爭信徒們在談論拆十字架事件時使用得最頻繁的話語，這種信念一方面與基督教的基本精神以及耶穌受難復活的故事高度契合；另一方面，他們自豪地引述的例子往往就是文革—文革期間，溫州基督信徒成倍地增加。

評論人舒辛仁在〈獨裁者的前車之鑑—列寧信徒西奧塞古的不歸路和毛粉習近平的未來之路〉一文中，將習近平與羅馬尼亞獨裁者西奧塞古做了一番對比：「習大大和西奧塞古，分別屬於兩個不同時代，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出身，卻打著幾乎相同的幾張牌，比如信奉國家主義，

標榜社會主義道路自信和許諾深化改革，突出個人權威及個人崇拜，內部政治清洗，敵視西方價值觀和西方政治模式，把民變歸罪於帝國主義敵對勢力的煽動，以及強拆教堂等等。看到了習近平，彷彿看到了西氏的再生；看到了西氏，彷彿今天的習近平就是他昔日的身影。」習並不知道基督信仰的本質及其內在的力量究竟有多大，他自以為是常勝將軍，一意孤行、挑起戰端。他以為，拆毀教堂之後，就可以為自己塑造金像了，卻渾然沒有意識到，災難即將降臨到他頭上。

## 習近平最怕什麼？

《人民日報》副總編盧新寧說：我們在Facebook上的帳號粉絲已達四百六十萬，超過《華爾街日報》，全球二位，僅次於《紐約時報》。記者就此事採訪了盧新寧。

記者：「我只有一個問題。」盧：「請講。」記者：「貴報用的什麼翻牆軟體？」盧愣了一會兒，手指大門。記者：「自由門？」盧：「滾出去！」

—網路段子

副統帥林彪怕風、怕雨、怕陽光，那是戰場後遺症；習近平害怕的東西卻更多：太陽花、歌曲《島嶼天光》、黃雨傘、NGO、臉書、維基百科、人權律師、達賴喇嘛、黃之鋒和陳文敏、顏色革命、新聞自由、劉曉波「我沒有敵人」的宣告以及我寫的《中國教父習近平》……

### 「顏色革命」讓中國黯然無色

二〇一五年七月，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黨的群團工作會議」，這在中共歷史上是第一次。習近平親自出席會議並發表講話，稱「群團工作的核心是最大限度地把人民群眾團結在黨的周圍，打造抵禦敵對勢力和『顏色革命』的銅牆鐵壁」。

群團組織是一個具有中國特色的詞語，即「群體性社團組織」，特指官辦的、偽裝的N G O組織。據新華網全文發佈的《中共中央關於加強和改進黨的群團工作的意見》，「中國的群團組織在編制、工資待遇和黨政機關相同，主要包括共青團、婦聯、工會、工商聯、殘聯、文聯、關工委等，是黨聯繫群眾的橋樑和紐帶」。換言之，群團組織的工作人員雖然沒有黨政軍部門的權力，卻也是吃財政飯的「鐵飯碗」。

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共對非官辦的N G O的打壓空前嚴厲。很多在江、胡時代可以正常活動的N G O，或是網站被關閉，或是身分被註銷，或是負責人被逮捕和判刑。另一方面，中共增加投資扶持親政府的群團組織。鑒於非公有制經濟的蓬勃發展，中共相應提出加強在該領域群團工作的具體措施：工會、共青團、婦聯等群團組織重點向私營企業和合資企業延伸，加強在農民工、自由職業者等群體建立組織體系。

與此同時，《人民日報》以整版篇幅發表多名御用學者否定、醜化「顏色革命」的評論文章。社科院研究員徐崇溫指出：「從政治法律的角度來看，輸出民主、顛覆別國政權的『顏色革命』違反了《聯合國憲章》和現行國際法關於國家主權和不干涉別國內政的一系列明確規定。」人民大學教授金燦榮指出：「『顏色革命』帶來的不是民主，而是民不聊生、生靈塗炭。」北京外國語大學學院教授張志洲指出：「照搬西方的發展道路與政治制度模式，不僅不能達到社會變革的目的和民主的期望，反而會導致國家的亂局，必須在觀念上『去西方化』，破除『西方制度迷信』。」春秋戰略發展研究院研究員寒竹指出：「『顏色革命』這一概念本身充滿內在矛盾和似是而非的說辭，是美國等國家實現其全球戰略的一個工具性概念。」這些論調致力於唱衰他國民主進程，為中共的專制主義張目。

那麼，習近平為何如此害怕「顏色革命」？

所謂「顏色革命」，是民主化「第三波」乃至「第四波」中，一系列發生在中亞、東歐、中東及東亞地區，以顏色命名、以和平和非暴力方式進行的政權變更運動，通常採用一種特別的顏色或者花朵來做為標誌。其中代表性的案例有：喬治亞的「玫瑰革命」、烏克蘭的「橙色革命」（又稱「栗子花革命」，基輔市花為橙色的栗子花）、伊拉克的「紫色革命」（伊拉克民眾選舉時，塗紫色墨水按手印）、黎巴嫩的「雪松革命」（雪松為黎巴嫩國樹）、吉爾吉斯的「黃色革命」（吉爾吉斯首都市花是黃色的迎春花）、緬甸的「番紅花革命」（又稱「袈裟紅革命」）、伊朗的「綠色革命」（自由派的總統候選人穆薩維用綠色做為競選顏色）、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茉莉花為突國國花）等。其中，有的獲得成功，有的遭到失敗，有的雖然暫時成功但民主制度搖晃不定。總體而言，「顏色革命」讓更多人民享受到自由民主的好處，全球範圍內民主國家的數量大大增加。

近年來，「顏色革命」日漸迫近天朝，在帝國邊陲燃起星星之火。台灣爆發太陽花學運、香港爆發黃雨傘革命（佔中運動），世道人心因之改變。受這兩場運動之激盪，中國國內的支持者和人權活動者躍躍欲試，不斷有人上街公開表達政治訴求，讓中共防不勝防、抓不勝抓。

習近平害怕「顏色革命」，因為它會帶來政權易主和制度變革。蘇聯解體後，俄羅斯共產黨無論怎樣折騰，始終是難以翻身的在野黨，其黨魁每天搭公車上下班；台灣民主化之後，國民黨一度失去政權，黨主席不再對政務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看到此情此景，習近平便將「保江山」當作其歷史使命，對顏色革命視為最危險的顛覆力量。（仇寇？）

《島嶼天光》能照亮漆黑的中國嗎？

台語歌曲《島嶼天光》幾乎就是太陽花運動的代名詞，它由台灣搖滾樂團「滅火器」與國立台北藝術大學共同創作。在太陽花運動中，這首歌曲廣為傳唱，激勵了無數曾經失望、冷漠和孤獨的心靈。

二〇一五年六月二十七日，在台北舉行的金曲獎頒獎典禮上，《島嶼天光》獲得最佳年度歌曲獎。滅火器樂團在上台領獎時表示，雖然這首歌曲是他們創作的，但它更屬於太陽花學運中每個努力的學生，他們希望這首歌可以「讓台灣繼續成為更美好的國家」。

一首歌曲成為一個世代的年輕人的心聲，它由此被載入史冊。台灣著名評論人張鐵志評論說：「抗議青年們從街頭佔領了立法院內／外，試圖重塑台灣的民主，音樂青年們也早在島嶼的不同角落唱著他們對於這片土地的思考與情感——無論他們是否佔據了金曲獎的舞台，他們正在改變著台灣流行音樂的想像。」是的，當這首歌曲響徹台灣的夜空之時，也就意味著這是白晝將近的時刻。所有的堅持、奮鬥和抗爭都不會白費。

中國的年輕人，在娛樂方面，除了哈日、哈韓之外，也很追捧台灣的流行和時尚元素。台灣的娛樂節目、流行音樂紛紛在中國走紅。然而，《島嶼天光》是此次獲獎的一首不能在中國媒體播出、也不能在中國的演唱會上演唱的台灣歌曲。中共宣傳部下令，所有媒體不能報導《島嶼天光》獲得台灣最佳年度歌曲的消息，所有網站都要查刪《島嶼天光》獲獎的新聞。

中國最大的入口網站騰訊轉播了台灣金曲獎頒獎典禮的實況。和各大電視台在轉播現場節目時採取延時播出的做法一樣，騰訊網延遲兩分鐘播出——這兩分鐘是特意留給新聞檢查官的。據中國網友披露，當台灣頒獎典禮現場宣佈《島嶼天光》一曲獲得最佳年度歌曲時，騰訊網臨時暫停了有關轉播，等到《島嶼天光》獲獎的環節結束後，才又恢復了現

場的視頻。

一首搖滾歌曲，為何讓號稱自信滿滿的習近平如芒在背？《島嶼天光》在中國遭到封殺的命運，讓我想起一九七〇年代捷克共產黨政權迫害「宇宙塑膠人」樂團的往事。

當捷克作家、人權活動家哈維爾（Václav Havel）認識「宇宙塑膠人」樂團的核心人物伊勞斯之後，立即感到「他們的演唱中放射出某種特殊感受，那音樂深刻而真實地表達出了深受世間苦難折磨的人們對於人生的見解。這是一種嚴肅和真誠的東西，是對現實生活經歷發自內心的自由抒發，這種經歷是每一個尚未變得完全麻木的人都能理解的」。哈維爾興致勃勃地準備去參加他們在布拉格郊外舉行的一場地下音樂會。然而，突然傳來伊勞斯和他的樂隊成員一共十九人被逮捕的噩耗。

哈維爾義憤填膺，他認為捷克當局對這群音樂人的抓捕，是一次極權主義制度對生活本身的侵犯，對人最起碼的自由和誠實良心的侵犯。這些音樂人並沒有政治綱領，他們不過是一群想按自己的方式生活、唱他們所喜歡的歌、創作他們喜歡的音樂，彼此和諧相處、以一種誠實的方式表達思想的年輕人。哈維爾憤怒地批判當局倒行逆施的做法：「官方逮捕他們是令人震驚的：是對精神和思想自由的干涉，並且打著打擊刑事犯罪的幌子去爭取不明真相的大眾支持。這次，權力機構無意中揭示了其根本的動機：讓生命變得單一化，動刀割除任何與眾不同、獨立不羈和難以歸類的事物。」

為了抗議官方的暴行和營救身陷牢籠的「宇宙塑膠人」樂團，《七七憲章》應運而生，極權體制的鐵幕被撕開一道口子。十四年之後，席捲全國的天鵝絨革命摧垮共產黨政權，哈維爾當選捷克共和國首任總統，並與劫後歸來的「宇宙塑膠人」樂團成員們在總統府重逢。

當年的捷克共產黨黨魁如何害怕「宇宙塑膠人」樂團，今天的習近

平也是如何害怕《島嶼天光》。光照在黑暗裡，黑暗卻不願接受光。無論習近平多麼排斥和拒絕，那照耀在島國台灣的自由之光，也必將照耀在中國的大地上。

## 雨傘可追命，革命更驚魂

習近平訪問澳門，本來想效仿乾隆皇帝下江南，展示盛世之氣派。卻未料到，偏偏天公不作美，一場滂沱大雨，落得淒淒慘慘戚戚的景象。最可笑的是，前去迎駕的有關人等，還被嚴令不得打雨傘，每人分配一件透明雨衣。為什麼不能打傘呢？因為自從香港「雨傘革命」之後，打傘變成了一項賦予象徵意義的抗爭行為。

習近平掌管著世界上人數最多的軍隊和警隊，偏偏對小小雨傘心存芥蒂。香港的那場彬彬有禮的雨傘革命，這個號稱在全世界最受歡迎的國家元首雖然不在現場，卻也被嚇得魂飛魄散。於是，習把雨傘當作顛覆國家政權的利器，自己不敢打傘，也不讓別人打傘。

習近平看到的是一個沒有雨傘的澳門。習巡視澳門大學時，校方事先安排學生到校外觀光、看電影和享用大餐，反正從賭博中得到的稅收宛如金山銀山，教育經費鼓鼓囊囊。習接見的學生代表，是二十個精心挑選、根正苗紅的「乖乖仔」。這些大學生不會打傘，更不會扔鞋。他們真的把習近平當作「大大」，把彭麗媛當作「麻麻」。既然君恩深似海，哪能不高呼萬壽無疆？

中國是實行槍支管制的國家，不僅管制槍支，還管制菜刀。在北京閱兵時，超市中的菜刀統統下架，在維穩官員看來，菜刀有可能危及社會穩定。菜刀確實可以殺人，雨傘呢？比起菜刀來，雨傘或許更加危

險。在金庸和古龍的武俠小說中，許多武林高手以雨傘為武器，或是翩翩書生，或是妙齡少女，撐著一把油紙傘，看似弱不禁風，實則雨傘一動，一招致命。

在中國的佛道廟觀中，一般都有一座天王殿。在四大天王中，有一位面目猙獰者，以雨傘為隨身攜帶的武器。當年天兵天將與齊天大聖孫悟空作戰，這位天王打開雨傘，一下子就將孫猴子收納其中，可見雨傘之厲害。既然習近平害怕雨傘，會不會下旨命令天下所有廟觀，全都重新塑造天王塑像，讓天王手中的雨傘消失得無影無蹤？

香港的雨傘革命並不是一場追求政權更迭的真革命，只是一場追求普選權的和平示威。革命一詞，讓以「革命者」自居的共產黨政權心驚膽戰，對號入座地將自己當作「反革命」。當年，共產革命所反對、所打擊的對象，是所謂的資產階級和帝國主義；如今，自習近平家族以下，哪一個共產黨高官顯貴不是腰纏萬貫、酒池肉林？他們早就將大部分財產轉移到歐美帝國主義的心臟地帶，並與跨國資本親如兄弟。一聽到「革命」這個詞語，習及其左右立即兩股戰戰。

此前，習近平視察工地時那張挽起褲管、自己打傘的親民照，被網友拼接成一張站在旺角街頭手執黃雨傘的幽默照，並入選佔中期間的最佳創意獎。習沒有一笑了之的幽默感，恨不得給膽大妄為的香港人安上「侮辱國家元首罪」，打入地牢。

托香港人的福，雨傘成了習近平的眼中釘、肉中刺，恐怕他一輩子都與雨傘無緣。二〇一五年九月習訪美期間，哈佛大學校園的主要地標約翰·哈佛銅像及華埠主要地標「天安門紀念碑」等處驚現習近平「蹤影」—多幅印刷有「我要真普選」及習近平撐黃雨傘貼紙等紀念香港「雨傘革命」一週年的標語，由在波士頓學習和生活的港人張貼，表達了海外港人心繫香港、追求民主的心願。難怪習不敢像當年的江澤民，

冒著被抗議人士嗆聲的危險現身哈佛大學，因為雨傘可追命、革命更驚魂。

## 習近平為何害怕《大憲章》？

習近平的性情，用北京話來說就是「渾不吝」，即我行我素、天不怕地不怕。然而，一份八百年前用拉丁文寫在羊皮紙上的文件，卻嚇到他了。

二〇一五年是英國《大憲章》（Magna Carta）頒佈八百週年，英國政府安排該文件全球巡迴展出。在習近平訪問英國前夕，文件正好到了中國展出。這份在中國展出的《大憲章》是英國赫利福德大教堂的館藏，是一二一五年《大憲章》原件的一二一七年抄本，目前世上僅存四份。

這次展覽原定在人民大學的一所博物館展出。但教育部給人民大學下令取消該展覽，展覽臨時換到英國大使官邸。由於地方狹小且需要預約時間，公眾很難取得參觀機會。

我第一次知道《大憲章》這個名字，是從柏楊所著的《白話資治通鑑》當中讀到的。那時，我剛上初中一年級，迷上了柏楊的作品。柏楊感嘆說：「英國在它的不列顛小島上頒佈《大憲章》，創立國會，為人類立下萬世光芒的楷模，但世界上其他大多數地區，卻一片血腥。」他在書中對比了《大明律》和比它早一百年的《大憲章》：後者保障人權，非經過法庭審訊，對人民不得逮捕監禁；中國卻出現了詔獄和廷杖，出現了一幅慘不忍睹的摧殘人權的圖畫。

然後，我就拼命尋找《大憲章》的中文譯本。那時沒有網路，查找

並不容易。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我才從父親工作的工廠的小圖書館找到一本英國史，其中記載了《大憲章》的幾個段落。那是我對英美古典自由主義發生興趣的開端，也是我日後成了一名不見容於中共當局的異議分子的契機。從這個意義上說，《大憲章》確實具有潛在的顛覆性，因此習近平一定要將它與青年大學生們隔絕開來。

從對待《大憲章》的態度來看，習近平時代中國的言論自由比起胡錦濤時代大大收縮。在胡錦濤時代，央視製作了大型電視紀錄片《大國崛起》系列，探討歷史上大國興衰的秘密。那時，雖然不可能出現八〇年代思想解放浪潮中《河殤》那樣驚世駭俗、挑戰權威的作品，但《大國崛起》至少比較誠實地陳述了英美現代國家的崛起，不僅是經濟和軍事的崛起，更是自由的崛起，而《大憲章》功不可沒。

在《大國崛起》之「英國篇」中，作者指出：「《大憲章》中最為精髓的兩條原則是法律的形式肯定了對臣民財產及人身安全的保障權，以及臣民與君主的契約關係中臣民對君主的反抗權。這兩條原則對後來英國社會的發展產生了極大的影響：保障個人財產，激發個人成為社會發展的動力；人民擁有反抗權，這使革命具有合法性，並最終改變了不合理的制度。」作者進而指出：「更為重要的是：《大憲章》不僅僅是一個契約，它本身就是合法維權行動的標誌。《大憲章》的簽署確立了這樣的一個原則：英國國王的權利並非是至高無上的，他只能在法律的限制之下行使權力，即王在法下，國王的權力不能超越法律。」所以，有《大憲章》的國家和沒有《大憲章》的國家，此後的發展道路大不相同：「沒有國民的自由，就沒有國家的自由，處於不自由的狀態，國家和人民都不可能有什麼發展，也不會有好的命運和前途。中華帝國和日不落帝國的差距在這個時候就已經悄悄拉開了，隨著時間的流逝，這種差距越來越大，直到兩個帝國迎頭相撞。」

那時，《大憲章》還能在中國的國家電視台獲得正面評價；如今，在新浪微博上，「大憲章」這幾個漢字卻成為搜索功能中被審查的關鍵字。難道是因為「大憲章」這個名字容易讓人聯想到導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入獄的《零八憲章》？如同「死諸葛嚇跑活司馬」，《大憲章》讓習近平疑神疑鬼，他哪有一丁點的自信？

中國官員的愚蠢，本身就成為製造新聞事件的動力。如果不是臨時叫停《大憲章》的展覽，不會有那麼多人從外媒的新聞報導中知道《大憲章》正在中國展覽。《紐約時報》評論說，《大憲章》普遍被認為是英國和美國憲政的基石，而這種制度不利於中國領導人，他們認為「憲政」是對共產黨統治的威脅。「因為《大憲章》這樣的古老文獻而感到緊張？他們未免有點敏感、脆弱，是不是呢，中國的領導人們？」澳大利亞悉尼大學中國研究中心主任凱瑞·布朗（Kerry Brown）則稱他們是「可憐的傢伙」。

對於《大憲章》在中國的離奇遭遇，《泰晤士報》發表了一篇署名克拉克（Ross Clark）的評論文章。文章說，《大憲章》為中國的專制豎起了一面鏡子，獨裁者的問題並不是他們蔑視公眾的不滿，而是他們根本就不懂得公眾的不滿。文章追問說：「習近平和他的幕僚們真的認為中國公眾會從《大憲章》的文字中挑出顛覆性的內容嗎？」任何希望樹立國際政治家形象的領導人，不論其是否承諾進行全面人權改革，都會讚許《大憲章》，以表明自己的統治得到了人民的認可。試圖把《大憲章》藏起來的行為只能證實外部世界大多數人的一個想法：儘管那些辯護者口口聲聲地告訴人們民主終將在中國實現，但是當今的中國領導人已經不屑於把自己打扮成一個民主派。

為什麼習近平連遮羞布都不要了，敢於像希特勒和史達林那樣公然蔑視、敵視民主自由的普世價值？習認為，西方國家同中國做生意的自

身利益永遠都會壓倒他們對踐踏人權表達抗議的願望。至少英國現在的外交政策證明，習的判斷是正確的——英國《經濟學人》雜誌以「奧斯本主義」形容英國的對華政策，目前是財政大臣奧斯本（Osborne）主導對華外交政策，是財政部主導，而非外交部主導。奧斯本此前訪問北京時說，英國應該是「中國在西方的最好夥伴」，他甚至稱讚中國對西藏的殘暴統治。達賴喇嘛在接受記者梅兆贊（Jonathan Mirsky）採訪時，將英國現政府對華政策說成：「就是錢，錢，錢。道德哪裡去了？」

習近平訪問英國，受到女王的酒宴款待，睡在白金漢宮的皇家臥榻上，並且在英國國會發表演講。英國政府官員絕不會就習上台之後中國限制言論自由、抓捕人權人士的行動發出絲毫抗議的聲音。唯一有風骨的英國顯貴，大概就是拒絕參與國宴的查爾斯王子了。《泰晤士報》評論說：「我們在人權問題上表現不一，讓人心痛。一些獨裁者因為不能善待自己的民眾而受到教訓、制裁、甚至轟炸，但另一些人卻被請進白金漢宮。……當習近平來白金漢宮坐下來進餐之前，他的菜單應該被換成一份《世界人權宣言》。」

對習近平近乎諂媚的，不僅僅是英國。記者無疆界組織在一份聲明中譴責說，對於劉曉波被關押在監獄中的處境，中國的夥伴國們如變聾了一般地沉默。當習主席訪問美國時，同為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美國總統歐巴馬沒有公開提及劉曉波的處境。法國總統奧朗德和總理曼努埃爾·瓦爾斯也同樣沒有利用中國領導人訪問法國的機會提出這個問題，這仍然是中國共產黨最忌諱的話題之一。習無疑是有史以來在西方民主國家最受禮遇的獨裁者，他似乎也非常享受這種禮遇。記者無疆界組織聲明指出：「我們呼籲國際社會從暮氣中振作起來。二〇一〇年獲獎者的空椅子，象徵著西方民主國家對人權和新聞自由的無所作為。」

不過，英國政府的見利忘義行徑，並不能遮掩《大憲章》本身的光

輝。英國歷史學家詹姆士·C·霍爾特（James Clarke Holt）在《大憲章》一書中論述說，《大憲章》是英國的第一部成文法，不僅是政治原則的宣言，更是自然權利的簡便表達；它不僅存在於英國漫長而多樣的  
政治旅程中，也在美國被激活和傳承。不管習近平如何攔阻，《大憲章》對個人權利和自由的張揚，也必然在中國落地生根、開花結果。

## 習近平為什麼要重點統戰海外留學生？

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日，中共時隔九年之後再次召開「中央統戰工作會議」，名稱由「全國」升級為「中央」。

在中共奪取政權之前，統戰是一個核心部門。若沒有精細而綿密的「統一戰線」，以及共產黨願意與其他黨派一起建立「聯合政府」的騙局，中共不可能戰勝佔據更多資源的國民黨。但是，中共從一開始就不打算跟其他政黨分享權力，毛澤東在給史達林的電報中透露了他的真實心思：「中國革命取得徹底勝利之後，應像蘇聯和南斯拉夫那樣，除中共之外，所有政黨都離開政治舞台，這樣會大大鞏固中國革命。」所以，當中共奪取政權之後，統戰部就成了一個邊緣部門—既然中共一黨獨裁，昔日的統戰對象淪為可有可無的點綴，統戰部也就不再具有重要作用。

長期以來，中共的統戰部長並不居於權力核心位置，地位低於組織部、宣傳部、外聯部等。統戰部長的職位常常是給失勢人物的閒職，比如毛時代長期擔任統戰部長的李維漢，曾是與毛對立的留蘇派要角，當留蘇派靠邊站之後，李維漢趕緊靠攏毛澤東，但也只能得到這個無足輕重的職位。最引人注目的是，習近平整肅胡錦濤的大內總管令計劃，其

策略是先將令計劃由中辦主任「平調」為統戰部長，兩者職位雖然平級，但前者是炙手可熱的天子近侍，後者是清水衙門的「不管部部长」。等令計劃在統戰部長的位置上被涼拌了一年多，習近平才從容出手，再將這隻失去反抗能力的大老虎裝入囚籠。

這一次，習近平親自出席中央統戰工作會議並發表長篇講話，儘管其講話風格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更加僵化和陳腐，幾乎倒退到毛時代的「階級分析法」，但他前所未有地提及統戰工作有「新三類重點對象」，其中被重點提及的一類是「留學人員」，頗讓外界為之側目。

習近平在講話中將海外留學生稱之為「人才隊伍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中國共產黨著重團結的對象」。習近平指出，要堅持「支持留學、鼓勵回國、來去自由、發揮作用」的十六字方針，中央鼓勵留學人員回國工作或者以多種形式為國服務。

近年來，中國成為全世界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留學生中相當一部分來自既得利益家庭。極具象徵意義的是，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和薄熙來的兒子薄瓜瓜也是留學生。習近平深知，送女兒到哈佛大學留學，而不是讓女兒進入中央黨校，才是真正對女兒好。中共一旦崩潰，中央黨校的文憑頓成廢紙一張，而哈佛大學的學歷則可走遍天下都不怕。

可是，對女兒好，未必對共產黨好——女兒在哈佛大學學到的，一定是跟共產黨的理念背道而馳的自由主義價值。那麼，深受美國文化薰陶的女兒，會成為父親的激烈反對者嗎？這是習近平念茲在茲的大問題。

中國留學生（包括在台灣陸生）長期在海外生活，不僅可以自由地接觸網路上的各種資訊，也會在日常生活的諸多細節上體驗民主自由的好處。在海外時間越久，他們越能反省中國一黨獨裁體制的弊端，甚至產生致力於改變現狀的想法。

在六四屠殺二十六週年前夕，一封由一批九〇後留學生發起的譴責

中共政權屠殺學生和市民並遮掩真相的公開信在網路上廣為流傳。這封信由喬治亞大學化學系博士生古懿執筆、哥倫比亞大學陳闖創等數十位留學生連署。這些六四屠殺之後出生的中國留學生，生活在六四話題是禁區的「動物莊園」，長期以來不知道六四的真相；到了西方之後，他們開始搜尋六四的資料，受到巨大震撼，並思索六四對中國社會發展究竟具有什麼意義，以及他們這代人可以為六四做些什麼。他們勇敢地邁出第一步：發表這封關於六四事件的公開信。

這封公開信指出，二十六年前發生的六四事件，至今仍被中國當局精心屏蔽。目前國內有一種聲音說，雖然發生了六四，但中共吸取了教訓，民間不必再追究。這種犬儒主義的觀點非常有害，因為六四不是那一天發生的單一時間，六四深刻地影響了中國社會的發展和中國人的心靈結構。六四讓中共從此更加肆無忌憚地作惡，六四使得中國人成為共產黨永久的人質，正如公開信所說：「鎮壓依然繼續，犧牲者仍被侮辱，倖存者經歷長期監禁。與此同時，屠殺的最高決策者卻做為總設計師被歌頌、指揮開槍的高官和軍人沒有受到審判。中共政權雖自稱掌握了『宇宙真理』，但卻高築網路圍牆，刪除資訊。」遺忘不是救贖之路，從揭露真相走向反抗與批判，才是公民社會的唯一希望。

這封公開信強調，中共政權在六四槍聲中，已失去全部的合法性，中共政權是屠夫政權。習近平豈能用一個虛無縹緲的中國夢繼續催眠民眾？這封公開信戳穿了「中國夢」的肥皂泡：「每個人都能生活在沒有恐懼的世界，這是我們，一群海外學子的中國夢。」

晚近一百多年，從容閎組織第一批留美幼童開始，留學生們就以思想觀念的力量和水滴石穿式的行動，改變著中國這個「老大帝國」。以推翻滿清王朝、締造共和中國為目標的同盟會，以及發動武昌起義的新軍將官，大都是留日學生。辛亥革命是一場留學生的革命，滿清帝國的

統治者做夢也沒有想到，原來想用來「師夷長技以制夷」、並延續帝國命脈的留學生群體，居然成為自己的掘墓人。

今天中國的留學生，也將承擔同樣的歷史使命。習近平正是看到留學生身上蘊含的巨大顛覆性，才慌忙不迭地演出這幕統戰大戲，不惜撥出巨資對留學生收買和招安。然而，想對醒來的人催眠，可謂難於上青天。當我看到古懿在媒體上講述自己由恐懼到無畏的心理轉變時，不禁想起百年前留日學生林覺民的那篇《與妻書》。海峽兩岸的教育部門都將這篇訣別書收入國文課本，然而，信中指陳的清末社會民不聊生的狀況，不正是當下中國的實際情形嗎——「以今日事勢觀之，天災可以死，盜賊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輩處今日之中國，國中無地無時不可以死。」與其坐以待斃，不如奮起反抗；與其生不如死，不如立志成為獨裁者的掘墓人。習近平以恐懼治國，但嚐過自由滋味的留學生們，再也不會成為恐懼的奴隸了。習近平能將每一個學成歸國的留學生都當成維穩對象嗎？

## 習近平是書籍的朋友，還是書籍的敵人？

他那粗大的手指像蛆蟲一樣  
肥胖他的話像秤砣一樣是最終決定  
在他身邊，圍著一群沒有脊梁骨的官吏  
半人半鬼，像弄臣一樣為他效力

—曼德爾斯塔姆

當習近平在若干場合曬書單，顯示其學貫中西、才高八斗時，我想起了一本書《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希特勒愛讀書，即便在維也納當失業青年、飢寒交迫之際，也到處找書看，可謂手不釋卷。歷史學者提摩西·賴貝克（Timothy W. Ryback）所著《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一書，以生動的方式告訴讀者，希特勒比較出名的舉動，當然在於焚書而非藏書，但出乎一般人意料的是，書籍是希特勒終身的固定伴侶，從他一戰期間在前線擔任伍長開始，直到他在柏林自殺前的最後幾天為止，書籍都一路伴隨著他。

賴貝克的這本著作分析了希特勒私人圖書館中的藏書，特別是那些希特勒親自精讀過的書，研究希特勒在書上所做的批註，進而探討希特勒世界觀的形成與他閱讀的對象之間的關係。《書籍評論》指出，希特勒的讀書史就是一部精巧的納粹主義思想史，賴貝克的研究讓讀者意識到，閱讀如何讓人們對閱讀本身的一切期待化為烏有。《出版人週刊》則評論說，這本書提出一個警告，那就是盲目堅持意識形態的危險性，

以及選擇性閱讀所可能帶來的傷害。我希望將來有一天，有一位中國學者能夠寫出一本與《希特勒的私人圖書館》相媲美的《習近平的私人圖書館》。不過，在這本書問世之前，可以先根據習近平已經曬出的書目，透視他與書籍和文明之關係。

## 習近平讀了多少「大毒草」？

習近平不敢像毛澤東那樣在全世界面前宣稱「我是流氓我怕誰」，他「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到了哪個西方國家，便炫耀自己對那個國家的文學藝術如何瞭如指掌。

習近平訪俄，在莫斯科國關學院演講，說年輕時就讀過普希金、萊蒙托夫、屠格涅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托爾斯泰、契訶夫等文學巨匠的作品。

習近平訪德，在科爾伯基金會演講，大談從歌德、席勒、海涅等人的文學巨著和不朽詩篇，從萊布尼茨、康德、黑格爾、費爾巴哈、馬克思、海德格、馬爾庫塞等人的哲學辯論，從巴哈、貝多芬、舒曼、勃拉姆斯等人的優美旋律，獲得愉悅、感受到思想的力量、加深了對世界和人生的認識。

習近平訪法，在愛麗舍宮發表演講：「我青年時代就對法國文化抱有濃厚興趣，法國的歷史、哲學、文學、藝術深深吸引著我。讀法國近現代史特別是法國大革命史的書籍，讓我豐富了對人類社會政治演進規律的思考。讀孟德斯鳩、伏爾泰、盧梭、狄德羅、聖西門、傅立葉、沙特等人的著作，讓我加深了對思想進步對人類社會進步作用的認識。讀蒙田、拉封丹、莫里哀、司湯達、巴爾扎克、雨果、大仲馬、喬治。

桑、福樓拜、小仲馬、莫泊桑、羅曼．羅蘭等人的著作，讓我增加了對人類生活中悲歡離合的感觸。欣賞米勒、馬奈、德加、塞尚、莫內、羅丹等人的藝術作品，以及趙無極中西合璧的畫作，讓我提升了自己的藝術鑒賞能力。讀凡爾納的科幻小說，讓我的頭腦充滿了無盡的想像。」

習近平訪美，在西雅圖演講，聲稱在青年時代就讀過《聯邦黨人文集》、湯瑪斯．潘恩的《常識》等著作；也喜歡瞭解華盛頓、林肯、羅斯福等美國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還讀過梭羅、惠特曼、馬克．吐溫、傑克．倫敦等人的作品；還非常欣賞海明威。

習近平訪問英，在幾次演講中數度引用英國國寶莎士比亞的名言，並列舉少年時代閱讀莎士比亞作品的經歷：「我不到十六歲就從北京來到了中國陝北的一個小村子當農民。那個年代，我想方設法尋找莎士比亞的作品，讀了《仲夏夜之夢》、《威尼斯商人》、《第十二夜》、《羅密歐與茱麗葉》、《哈姆雷特》、《奧賽羅》、《李爾王》、《馬克白》等劇本。」信以為真的英國女王立即贈送精裝本的莎士比亞十四行詩給習近平。但有好事網友披露說，莎士比亞劇作的翻譯出版大都是在民國時期，一九五四年倒是出版了朱生豪翻譯的三十一種劇本，但很快就絕版了，直到二十多年後，一九七八年文革結束才重新出版。這顯然跟習近平說的七十年代初讀莎士比亞的時間對不上，難道習近平又來了一次時空穿越？

積極參與人權活動並經常受國保騷擾的人文學者艾曉明，針對習近平的炫書之舉，寫了一篇〈怎樣告訴別人你讀過書〉。做為習近平的同齡人，艾曉明指出，那個時代要找到莎士比亞的著作可謂難於上青天，必須有一些前提條件，「你的密友中有這類藏書人，家世注定不凡」，這個敢於藏書並攜往鄉間者，當如王小波感嘆莒哈絲之《情人》的第一段「無限滄桑盡在其中」！艾曉明感嘆說：「那個年代又能進入到與中

國的政治廝殺絕然不同的精神世界，需要何等叛逆的膽識，又正可以成為一種契機，即對那個烏托邦世界的審視與決裂。……如果研究七十年代末民間自由主義思潮的興起，那通向民主牆的思考一定可以追溯到叛逆性的閱讀這條暗河。奇怪的是，在這些自由派著名知識分子的朋友圈裡，怎麼沒有當代一位最偉大的同齡人。」難怪有網友調侃說：那個時代，全國最齊全的圖書館在哪兒？答案：陝北梁家河村大隊借閱室。

在北京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中，習近平所列出的書單更是滿坑滿谷，他一點兒也不害怕在作家們面前露怯。然而，這個時代，再也不是只要領袖說什麼，人們就篤信不疑的時代了。網友們對習近平曬書單的行為看得明明白白，紛紛評論說：「要是真讀了這些書，他就不會在專制的道路上越走越遠了！」「要是真的讀了這些書恐怕就不會整天發表莫名其妙的講話了。」「讀了這麼多西方文學著作，還能號召大家抵制西方文化的侵襲，真的是莫名其妙啊。」「看他幾年來的作為，書是白讀了的！」「我看哪，就兩種可能：一，他確實看了，但沒看懂；二，他沒有看過那些書，是國師給他開的書單，沒想到反而把他害了。」確實，偉大的書如果遇到狹隘的心靈，則如同對牛彈琴，不會發生化學反應。事實也是如此，儘管習近平列舉的大都是頂級世界民主，但這些書籍並沒有讓其精神世界變得寬廣、豐富與柔和。

一個更有趣的「段子」如是說：「歐巴馬說：『我青年時代就讀過《毛澤東選集》和《鄧小平文選》，也喜歡瞭解嬴政、劉邦、李世民等中國政治家的生平和思想，我還讀過魯迅、胡適、茅盾、巴金等人的作品，李宗吾的《厚黑學》是我實現美國夢的指路明燈，我還特別喜歡趙樹理的《小二黑結婚》。』回到白宮，蜜雪兒嗔怪道：『你的枕邊書明明是于丹的《論語心得》和余秋雨的《文化苦旅》，最近又迷上了花千芳《我們的征途是星辰大海》和周帶魚的作品，不吹牛逼你會死啊！』

歐巴馬聽罷，羞愧地低下了頭。」這個段子當然不是諷刺歐巴馬，而是以歐巴馬影射習近平。

姑且不論習是否真的讀過這些書、看過這些繪畫和雕塑、聽過這些音樂，我想反問的是：這些作家和藝術家不都是西方人嗎？這些著作和作品中所呈現的價值觀不都是習近平排斥的普世價值的一部分嗎？在習近平的青年時代，這些文學和學術名著都是「大毒草」，是內部發行、憑證購買的「白皮書」。做為延安知青的習近平，要搞到一本外國作家或學者寫的書，不知要費多少心力。如今，習又在國內掀起清除西方思想文化的「小型文革」，他想讓中國的年輕人重蹈他知青時代文化思想極度貧乏的生活嗎？

誰有權決定哪一本是「反動書籍」？

七十年代末，所謂的「改革開放」，首先就是對世界敞開大門，讓西方先進文明進入中國。習近平雖然表示要堅持「改革開放」，不拒絕外國資金，卻要排斥外國文化。

二〇一五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國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宣佈，全國「掃黃打非」工作計劃啟動專項行動「清源二〇一五」，清理和打擊「港台反動有害資訊、境外有害文化」。網信辦副主任任賢良強調，「掃黃打非」事關國家網路安全、意識形態安全和文化安全，是一場「持久戰」，必須堅決、堅定、堅持不懈地打下去。據一份政府文件顯示，「清源」行動是要深化查堵反制港台反動出版活動，採取高壓態勢，重點打擊封堵查繳，「堅決把住入境關，查繳攻擊黨的領導、貶損黨和國家領導人等反動出版物及資訊；堅決查繳炒作群體性事件、製造

對立情緒、破壞社會穩定的出版物及資訊」。所謂「有害」資訊，是對共產黨的統治「有害」；對民眾來說，卻是讓心靈自由的「有益」資訊。

早在二〇一二年十八大前夕，中共就開始實施更嚴格的邊境管控，是為「南山計劃」。所有來自香港的旅行者必須接受更嚴格的行李檢查，更多利用X光機掃描旅客行李，並命令導遊對想在香港購買政治類雜誌和中國領導人傳記的遊客加以提醒。

在習近平眼中，港台是西方民主自由價值進入中國的「二傳手」，加強管控從港台輸入的「反動書籍」就成了維穩的重點。一份傳播範圍廣泛的政府通知指出：「香港已成為政治性有害出版活動的主要策源地。」這些出版物「歪曲中國革命史、黨的歷史、新中國歷史和改革開放，貶損黨和國家領導人」。中國遊客越來越害怕將香港的出版物帶回中國—若在檔案中留下不良記錄，下一次會成為重點審查對象。

「掃黃打非」是一個中共宣傳部門在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使用的具有中國特色的名詞。所謂「掃黃打非」，「掃黃」是虛晃一槍，「打非」才是荷槍實彈。

以「掃黃」而言，最喜歡色情影像和讀物的，向來是中共的特權階層。從毛時代的江青、康生、葉劍英等高官，到如今剛落馬的周永康、徐才厚等「國妖」、「國賊」，哪一個不是利用手中的特權和特殊管道，獲得來自境外的色情影像和讀物？

以「打非」而言，香港和台灣的出版物，明明是合法的、正式的出版物，卻被中共納入「非法出版物」範疇。中共的邏輯很簡單：只要是「反動書籍」，就是「非法出版物」。而判斷是否「反動」的唯一標準，是看對共產黨的統治有利與否。尤其是「貶損黨國領導人的書籍」，包括我寫的「中國獨裁者三部曲」，當然都是「反動書籍」。香

港那些中資連鎖書店奉命拒絕銷售這類書籍，中國海關更是將這類書籍阻擋在國門之外。

「清源」行動的第一個受害者，是在淘寶網上賣自己在台灣出版的《洗腦的歷史》一書的學者傅志彬。這是一部探討極端思想給人類社會造成的禍害的思想史著作，深刻剖析了禍害全世界三千年的極端思想控制術—《洗腦的歷史》不是「反動書籍」，而是習近平應當納入「必讀書單」的好書。然而，習近平企圖讓年輕學生都讀「毛選」、「習選」之類的洗腦書籍，並且像提防洪水猛獸一般攔截那些讓人「因真理，得自由」的好書，更仇視書的作者：傅志彬在旅行途中被南昌市青山湖警方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刑拘、逮捕，其罪由是「在台灣出書《洗腦的歷史》，並以『淘寶』等方式銷售一千多本，行銷額九萬多元人民幣」。邪惡的出版審查制度迫使作者到彼岸出版自己寫的書，不能在書店出售，只好放在淘寶上尋覓有心的讀者，這樣居然犯下「非法經營罪」。這是多麼奇特的法律，這是多麼奇特的國家！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四日，江西省法院以「非法經營罪」判處傅志彬一年十個月徒刑。律師張贊寧說，法院也判處另三名涉及出版的人士六個月至一年半有期徒刑。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共通過海關「嚴防死守」，大大降低了「反動書籍」進入中國境內的數量，香港的獨立出版機構無不感受到經營上的壓力和困難。儘管如此，當局卻無法攔阻國民通過電波和網路尋求資訊和真相的意願。以我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而論，雖然實體書的銷售受到一定影響，但自由亞洲電台播出了朗讀版，在網站上還提供網民免費下載的有聲電子文件，先後有數十萬人下載收藏，並在數百萬人中廣為傳播。用美國系列電影《飢餓遊戲》中的一個象徵物來形容—每一本批判中共統治的禁書，都是一隻「不死鳥」。

## 香港出版人何以成為國家的敵人？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六日，香港銅鑼灣書店東主桂民海（阿海）在泰國神秘地「人間蒸發」，其他三名店員亦在深圳失蹤。據他們的親人及合作夥伴披露，懷疑他們是因為出版和銷售「抹黑黨和國家領導人」的「禁書」，而被北京當局動用秘密警察抓捕。

阿海擁有瑞典國籍，在泰國度假，仍不能倖免於中共之黑手，更不用說其他幾位家眷在深圳的香港人了。泰國警方、瑞典外交部以及香港警方已經展開調查，並與中國執法部門接觸，卻始終不得要領。該案表明，中共為了捍衛其「核心利益」（習近平執政以來，「核心利益」不斷延伸，涵蓋了領導人的「面子」），可以踐踏普世價值，進而漠視國際法。不僅香港是其為所欲為的「新殖民地」，泰國、柬埔寨、越南等周邊國家也成為中國警察隨意進出抓人的「準殖民地」。

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共對香港的「禁書」出版和銷售採取封堵及恐嚇政策，包括以下種種手段：中資的連鎖書店不銷售某些「禁書」、以高租金逼迫「二樓書店」往更高樓層搬遷、在海關加強對陸客購買的港台書籍的檢查、通過第三方找出版者和作者談話甚至許諾以重金收購書稿。涉及六四內幕的《李鵬日記》在上市前夕被封殺，即為一個典型例子。

到了習近平時代，則直接動用警察和司法力量，以莫須有的罪名嚴懲在香港經營「反動」書刊的人士。這些人士從事書刊出版和銷售，符合香港法律，卻被以中國內地的法律治罪。比如，計劃出版我寫的《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的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出版揭露中國政經內幕的雜誌的王健民等人，都因踩到這道肉眼看不見的「紅線」而被判重刑。

桂民海案則預示著習近平對香港「禁書」出版業的打壓進入新的階段。此前，在泰國、柬埔寨、越南等東南亞國家，中共曾動用便衣警察或收買當地警察，綁架民運人士回中國判處重刑，如王炳章、彭明等人。這些人從事反抗中共政權的活動，中共恨不得除之而後快。如今，同樣的手段用在像桂民海這樣的書生和商人身上。

桂民海不是政治活動家，而是學者兼商人。二〇〇五年秋，我赴德國柏林參加國際筆會年會，與桂民海相識。桂民海告訴我，他是北大歷史系畢業的，八十年代末赴歐洲留學，獲哥德堡大學博士學位。我把新作送給他，他也送我剛出版的《雍正十年：那條瑞典船的故事》。我對近代西方的航海歷史以及海洋文明與民主制度的關係頗有興趣，那幾天跟桂民海有很多討論。後來，我們在香港還相聚過。再後來，聽說他長居香港，從事「禁書」出版。

香港成為「禁書」基地，有其特殊的歷史背景。首先，這是中共對言論自由高壓的結果。沒有選舉權的中國民眾長期存在「信息（尤其是高層政治內幕）匱乏症」，陸客到香港旅遊，除了買奢侈品和奶粉，一般都會購買政治議題的「禁書」。其次，香港是一個出版自由的社會，沒有出版審查制度，一個人就可以註冊一家出版社，「禁書」出版成為一個比較容易操作的事業（這也使得「禁書」出版魚龍混雜、整體質量有待提升）。

不到十年時間，桂民海在香港的「禁書」行業做得風生水起，盤下了有二十多年歷史的銅鑼灣書店。這也正符合我對他的印象：他的身上有一種可以跟三教九流的人打交道的江湖氣，投身商海，一定能有所成就。

此次阿海出事，或許與他是獨立中文筆會和「深青社」成員有關，他的多重身分讓國安系統高估了他的「危險性」。獨立中文筆會的標誌

性人物是前會長劉曉波，筆會諸多會員身陷牢獄，其敏感性自不待言。而「深青社」這個知名度沒有那麼高的組織，亦被中共當作眼中釘，中國極左派網站「烏有之鄉」曾刊登一篇名為〈揭秘「深青社」國際秘書桂民海其人〉的長文，認為二〇〇二年末創立於深圳的「深青社」，自稱是「從事編輯、出版、寫作、學術研究的公共知識分子自願締結的非政府、非政黨、非營利、無國界組織」，其實背後卻由美國中央情報局控制，並直接點名「揭露」阿海的「真面目」：「『深青社』國際秘書桂民海就是一個不折不扣的海外民運人士，並且是為歐盟和聯合國某些旨在推動中國民主化進程機構工作的海外民運人士。」這樣赤裸裸的告密和誣告，可能也是阿海遭遇飛來橫禍的原因之一。

桂民海在泰國被綁架，呂波、張志平、林榮基等三人在深圳被拘押，尚未引起香港社會的警醒。直到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十日，另一位書店股東李波在香港被綁架到中國，才引發軒然大波，成為香港社會人人關心和國際媒體爭相報導的新聞事件。（李波事件也使得開放出版社放棄出版本書的香港版）由此，香港出版界出現人人自危的寒蟬效應，香港的出版自由面臨滅頂之災。銅鑼灣書店的厄運，是香港的厄運，以及所有熱愛言論自由的人的厄運。我們不能事不關己、高高掛起。

## 對於獨裁者而言，焚書比讀書更快樂

中共黨媒號召說，中國的下一代必須與西方價值觀隔絕，單單接受官方欽定的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和中國傳統文化。弔詭的是，高官顯貴的孩子們，包括習近平的女兒習明澤，卻跑到哈佛大學接受西方價值觀的污染，這難道不是「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嗎？

謊言要暢通無阻，首先就要消滅真話和說真話的人。毛掌權之後立即整肅大學和知識界，習也仿效毛的做法清洗知識界。在習近平的命令之下，教育部下發多份文件，要求各大學清理有自由主義傾向的教材和教師。在被清理的教材中，一定有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年輕時代參與編輯的作品—李克強曾是讓西方價值觀念教材進課堂的始作俑者：上世紀八十年代，做為北京大學法律系學生的李克強，翻譯過阿爾弗雷德·丹寧（Alfred Denning）的《法律的正當程序》（The Due Process of Law），丹寧是一位以獨特個性著稱且頗有影響力的英國法官。李克強還參與導師、法學家龔祥瑞主編的西方法學教材《比較憲法與行政法》的編輯工作。這些著作會逃脫充作禁書的厄運嗎？

對教師的甄別完全以政治立場劃線。教育部長袁貴仁宣稱，教育部將嚴格考核海歸教員的「精神面貌」與政治正確度。凡是在歐美、澳洲、日本或香港取得學位的海歸學人，專業是政治學、社會學、歷史、法律等人文與社會科學，必須通過極其嚴苛的思想審查才可以站上大學講台。海歸與已經進入「自由化教學黑名單」的教員，必須通過定期思想政治考試，被認為支持普世價值的學者將馬上被解僱！香港政治評論員林和立感嘆說：「神州堅持獨立思考與拒絕獨裁的良心知識分子繼上世紀的十年浩劫後，又面臨可能更慘無人道的清洗！」

而且，當局對大學教師的打壓，不僅涉及課堂上和課堂外的言論，甚至包括網路上的言論。在西安某高校任教的馮紅蓮，常常以網名「無眠」發表針砭時政的言論。解放軍鷹派少將羅援在媒體稱，羅馬尼亞共產黨的領導人，在政權劇變後連骨灰都被清理，一旦「自由民主」在中國得勝，共產黨連骨灰都不能留下。「無眠」在微博上質問羅援：「您幹了什麼喪盡天良的事情，害怕死了骨灰都留不下？」又指「蘇聯、台灣、東德、韓國都獲得了民主自由，是否血流成河，屍橫遍野？」她反

駁羅援涉嫌散佈謠言、製造恐怖氣氛。誰知，在肅殺的習近平主義之下，大學老師以網名在網路上發表溫和言論的自由也不復存在：馮紅蓮所任職的高校的黨委，以她的政治觀點「不適合在高校教師崗位工作」為理由，責令停課。

我雖已經離開中國，但與獨裁者之間的較量並沒有結束。我的文字仍然為許多國內讀者所喜愛並傳播。但是，誰在網上談論我的文章和觀點，誰就成為警察眼中的危險分子。中國國內一位翻牆上臉書的朋友江淳，披露了因為轉發我的文章而兩次被警察約談的故事：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五日七點二十分，南京江寧區高新園派出所片警王大林來電話，問我在哪裡？我問他有何事？他說：你又在網上發了文章，我說最近沒寫文章。片警說，五分鐘到我家。我說還沒起床洗漱，政府不是九點上班嗎？今天還是週六。片警最後說：八點半到我家裡。我現已洗漱完畢，準備吃早飯，靜候片警和國保或網警約談。

此前，十四日下午曾被市局和區局兩級國保四人約談一次，他們主要是要求我『不要參加炒作北京律所周世鋒主任的案子』，並無理要求寫保證書或發佈聲明，匪夷所思。最起碼的言論自由被剝奪，一切自由都無從談起。這一次警察具體要談什麼，或拘留，我不得而知。

片警二人到家後，勸我不要再轉發敏感文章了，這樣會給他們添麻煩。具體就是我前幾日在外網推特和臉書轉發的余杰的文章：〈習近平才是真正的文革餘孽〉。我對片警說：余杰是大陸最優秀的作家之一，他年輕時是北大才子，文章無數次被《中國青年報》和《中國青年》雜誌刊登，以及被無數大陸報刊轉載。後來余杰因說真話、揭真相以及給一些領導人寫傳記被多次迫害流亡美國。從余杰的學生時代開始，我一直關注余杰的隨筆和評論。讓人說說話天不會塌下來，行使憲法第三十五條所保障的公民權利是每個公民的神聖職責。轉個帖子，你們值得在

休息天擾民恐嚇嗎？」

這就是習近平在這個時代焚書的例證，在網路時代，他不一定命令爪牙像納粹那樣將書籍扔進火堆，但他封鎖網路、屏蔽資訊，也是另一種形式的焚書。對習近平來說，焚書比讀書更加得心應手。焚書的結果，就是型塑出人格殘缺、思維遲鈍、知識匱乏、心靈貧瘠的國民。二〇一五年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白俄羅斯女作家亞歷塞維奇認為，前蘇聯國家之所以走到今天的絕境，是因為人格和心靈長年被極權統治扭曲，只剩下見風轉舵的投機心態，既無法判斷是非，也不願承擔責任，「只能靠著把小孩養大來自我安慰，接受權力有黑暗面，與現實妥協，避談政治，不僅大眾，連知識分子也是這樣」。這就是蘇聯知名異議分子季諾維耶夫，在同名書內所提出的概念：「蘇維埃人」。今天的中國連那些前蘇聯國家都不如——中共政權仍然是「現在式」，而非「過去式」；許多民眾滿足於醬缸中蛆蟲的生活，對劉曉波、許志永、高瑜們的犧牲與奮鬥，要麼視而不見，要麼冷嘲熱諷。

正如網上一則段子所說：大米不好出國買，奶粉不好海外帶，霧霾來了戴口罩，汽油漲價連夜加，自來水不安全買瓶裝水，癌症高發就拼命養生，教育不好送孩子出國留學，總之將聰明才智全部用在苟且營生上，然後輕蔑地對為了他們的權利奔走呼號的人說：「這是個和諧國家，你們不要太激進。」

習近平是書籍的敵人，是自由的敵人，他對文明的敵對和扭曲，嚴重地毒化了中國人的精神生活。未來，中國人要成為自由人，不僅需要顛覆共產黨的統治，更需要經過長期的、艱苦的精神世界的重建。那時，中國人需要千萬本書，用書來堆砌成一道通往自由的橋樑。

# 中國為什麼沒有太陽花和黃雨傘？

暴君統治的國家是倒立的圓錐體。

—塞繆爾·約翰遜

二〇一四年，台灣和香港先後發生以太陽花和黃雨傘為象徵物的新公民運動。這兩場運動讓本土意識「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從而具有劃時代的意義——在中華帝國的邊緣，向北京那座「殺人流血的城」發起的抗爭與挑戰，讓邊陲變成中心，從而開啟帝國崩解的多米諾骨牌的第一塊和第二塊。

那麼，中國本土為何沒有發生太陽花和黃雨傘這樣的新公民運動？當我在臉書上發出追問時，有朋友幽了一默：因為中國太乾旱，不下雨，地上長不出太陽花，人們也不需要打雨傘。也有朋友一針見血、一語中的：因為中國有共產黨。台灣雖然有國民黨威權回潮的陰影，卻享有正在成熟和穩固中的民主、自由和法治；香港缺乏更為廣泛的民主，卻有港英時代留下來的法治傳統和部分的自由；而中國儘管具備了一定的自由經濟成分，政治上卻仍是一黨獨裁的極權體制。這是三地社會背景的根本性差異。

不妨繼續追問，中國共產黨如何達成社會控制，將反抗的種子扼殺在萌芽階段？本文以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中國社會格局的變化和中共統治術的更新為重點，提出五個要點：第一，中產階級保守化與階層凝固化；第二，中共對大學如鐵桶般的控制；第三，中共以民族主義為毒素

對全民洗腦；第四，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招安和對網路及傳統媒體的嚴厲管控；第五，中共對民間組織和維權人士強力打壓。

## 中產階級保守化與社會階層凝固化

如果看過關於北京「八九」學運的紀錄片和照片，就會發現那個時代的大學生大都瘦弱單薄、營養不良、甚至有點蓬頭垢面，由此猜測他們大都來自經濟狀況不佳的農民和工人家庭。在被通緝的二十一個學生領袖中，普通工農家庭出身的佔一半以上。

另一方面，基於八十年代思想啟蒙運動的影響，改革、民主、自由理所當然地成為進步價值。即便來自官員和高級知識分子家庭的學生，也具備強烈的批判意識。我聽趙紫陽的秘書鮑彤的兒子、目前在香港從事出版事業的鮑樸講過一個有趣的故事：八十年代後期，美國總統老布希訪華，邀請方勵之到美國使館出席晚宴，中共派遣警察阻攔，使方無法出席。當時還是北大學生的鮑樸得知此事，認為父親與之有關，遂憤而離家出走。

此種情形在今天的大學生中不可能出現。進入二十一世紀，權貴資本主義盛行無阻，貧富懸殊急劇擴大，階級分野逐漸固化，做為既得利益者的中產階級高度保守化。一流大學的學生大都來自非富即貴的家庭，不假思索地認同現行體制和社會結構，很少出現像八十年代的「叛逆者」。他們的政治身分、經濟地位和意識形態認同像齒輪一樣咬合在一起。

反之，「出身越底層，上的學校越差」，底層個體命運的轉型陷入停頓。一份《中國高等教育公平問題研究》的報導表明，重點大學中農

村學生比例自一九九〇年代起不斷滑落，北大農村學生所佔比例從三成落至一成，清華二〇一〇級農村生源僅佔百分之十七。在重點大學，中產家庭、官員、公務員子女是城鄉無業、失業人員子女的十七倍。

清華大學教授晉軍的「社會學概論」課上，每年都會對入學新生進行一次問卷調查，問題包括「你父母的職業」、「你上大學以前到過最遠的地方是哪裡」、「最喜歡的電影」等等。統計發現，相比全國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構成，清華學生社會經濟地位高的家庭佔比更高，社會經濟地位低的家庭佔比更低，呈現「倒金字塔型」。關於學生「入學前活動半徑」的統計資料發現，清華大學社科學院二〇一四級學生，入學之前到過境外的佔百分之四十三點九，沒有出過省的為零。而西部一所重點大學的資料則是，到過境外的只有百分之二點三，沒有出過省的有百分之二十二點七。用晉軍的話來說就是：「你的家庭背景決定了你能接觸到資源的多少，決定了你的學習環境，決定了你上的小學、初中、高中，也決定了你的眼界和見識。」可見，「高等華人」

群體已然定型，其子女必然佔據更多資源。畢業於清華大學、頗具批評精神的才女蔣方舟，在清華校慶時發表了一封給校友的公開信。信中寫道：「我曾經旁觀過學校的幹部們做事，與教育和世俗標準下少年得志的成功者打過交道，他們毫無障礙地接受學校給予的一切價值觀，自詡主流，一百年不動搖、一百年不懷疑；他們青出於藍地運用官場技巧與規則，成者為王，敗者為寇。」這就是北大教授錢理群所說的「精緻的利己主義者」，他們正在成為共產黨官僚系統的後備軍。蘇聯解體前十年，數百萬蘇共黨員退出或脫離共產黨，蘇共無法吸引年輕一代優秀人才；但今天的中國，有一大群優質的年輕人才加入共產黨，共產黨的領袖們感到後繼有人、信心滿滿。

在海外留學生中，「忠黨愛國」的情形同樣普遍。二〇一三至二〇

一四年度，美國大學錄取了八十八萬六千名留學生，百分之六十來自中國。中國留學生的年齡也日趨年輕化。十年前，超過百分之八十的留學生是碩士生或博士生；現在，百分之五十的是本科生。新一代中國留學生比老一代更富有，這些家境優越的中國留學生認為，中國一切都好，在討論六四、台灣、香港、西藏、新疆、法輪功等議題時，自然而然地採納官方立場，與批評者激烈爭論。對此，紐約城市大學政治學教授夏明分析說：「來美國留學的，絕大多數來自於中國的優越階層。他們是中國制度的得益者和捍衛者，因此當你去批評這種制度，同時也就對他們的作為進行某種道德化上的評判的時候，當然他們會很快就進行捍衛。」

習近平訪美時，不少旅美華人和留學生前去歡迎乃至充當「旗手」。BBC報導，一個從事計算機工作，名叫陳明的年輕人，在隊伍中高舉中國國旗，對旁邊抗議人士的「雜音」憤憤不平，也抱怨美國媒體「其實沒有新聞自由」，因為「他們好像不約而同地不把習大大訪問的標題放在主頁，美國媒體故意這樣弄」。奴才並不因為到了自由世界就成了自由人。

另一方面，社會階層的固化，使貧寒子弟改變自身命運的希望越發渺茫。不能進入中國第一流大學、又不能出洋留學的工農子弟，其命運會怎樣呢？他們成為遠赴沿海城市的、數以億計的打工仔中的一員，成為經濟高速發展所必須的廉價勞動力，也成就了中國傲視世界的「低人權優勢」（秦暉語）。他們不滿於現實生活，不認同現有體制，但無法凝聚成一股反抗力量。中國沒有真正的工會，號稱代表工農階級掌權的共產黨，與國際資本狼狽為奸，以打壓勞工為己任。底層打工仔命運的縮影，就是富士康工廠中跳樓自殺的工人——在賈樟柯電影《天注定》中，最後一個故事講的就是一個年輕男孩的夢想、掙扎、苦痛與絕望。

## 中共對大學如鐵桶般的控制

六四之後，中國大學的氛圍一夜之間翻轉。當我在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初進入北大校園時，感受不到王丹在回憶錄中描述的那種思想自由、且瀟灑著理想主義激情的氛圍。不過，校方的管控相對寬鬆。我的處女作《火與冰》出版之後，可以自己寫賣書的海報貼到三角地，並不需要經過什麼機構批准。我接受西方媒體訪問批評中國的新聞出版管制引發教育部震怒，系主任奉命找我談話，但只是例行公事，暗地裡竭力保護我。

當我於二〇〇〇年碩士畢業，再回學校時卻發現，外人進出校園必須出示身分證件。我到過世界各地的大學，從未發現大學被高牆隔離的狀況。在三角地等張貼廣告的地方，所有的廣告必須經過團委或保衛部的批准才能張貼；校園各處包括教室裡安置了無數攝影機，學生宿舍必須要刷卡才能進入。「五四」運動搖籃的北大，變成一座「動物莊園」。

這些還是表象，更可怕的是思想控制向文革時代靠攏。二〇一三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印發名為《關於當前意識形態領域情況的通報》的通知，又名「九號文件」。一年多之後，「三十號文件」以更加隱秘的方式在黨內傳達。據退役少將宋方敏的說法，「三十號文件」要求，竭盡全力將受西方影響的自由主義思想從大專院校和其他一些文化部門中清除出去。

緊接著，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印發《關於進一步加強和改進新形勢下高校宣傳思想工作的意見》。這是「九號文件」和「三十號文件」在教育領域的細化，名為意見，實為命令——黨的命令向來高於憲法和法律。《意見》指出，要強化政治意識、責任意識、陣地意識和底線意識，深入推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進教材、進課堂、進頭

腦，要加強高校網路等陣地建設。要切實加強高校意識形態引導管理，堅決抵禦敵對勢力滲透，牢牢掌握高校意識形態工作領導權、話語權。該文件用詞強硬，充斥軍事用語，充滿文革遺風。

這份文件指出三大措施：首先是嚴把教師政治關，探索教師定期註冊制，定期開展師生思想政治狀況調研。其次是制定實施馬克思主義理論、新聞傳播學、法學、經濟學、政治學、社會學、民族學、哲學、歷史學等相關專業類教學品質國家標準。第三是黨委書記、校長要旗幟鮮明地站在意識形態工作第一線，高校黨委宣傳部長由學校黨委常委兼任。由此，中國的所有大學都落入黨化教育的羅網。中國不復有大學，只剩下共產黨的黨校。

今天的大學擁有大量資源和經費。決定職稱評定、住房和辦公室配置、研究基金流向的標準，不是學者的學術水準，而是學者對政權的忠順程度。當局刻意扶持御用學者，讓人們意識到，只有跟著黨走才能吃香喝辣，若不跟著黨走就只能粗茶淡飯、甚至沒有飯吃。比如，在法學領域，宣稱「黨比法大」、「黨章就是憲法」的強世功飛黃騰達，師出同門、參與人權活動的許志永和滕彪，要麼被捕入獄，要麼流亡海外。在經濟學領域，吹捧「中國的經濟規模已超過美國」的林毅夫被中國拱上世界銀行副行長要職，說真話的茅于軾則遭到打壓和禁言。毛左立場的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型階梯教室裡授課，自由主義立場的法學系教授賀衛方被發配到新疆石河子大學「冷凍」數年。更多傾向自由、民主理念的大學文科教師將被趕下講台：北京外國語大學國際傳播研究中心主任、新聞學教授喬木提倡西方式的新聞報導，長期參與中國公民社會組織，因而成為被打擊的對象。他被降職並發配到校圖書館為英文圖書寫摘要。喬木表示，除了禁止他上課，管理人員將他的工資削減三分之一，把他的名字從該系的網站上刪除，並迫使他的學生找其他老師當論

文導師，這是一種故意的、公開的羞辱。

由此，大學的學術獨立、言論自由蕩然無存，其反叛性和批判性遭到閹割，正如有觀察者所指出的那樣，「中國的大學基本已經喪失代際傳承、價值傳播平台的作用」。而文件涉及到的人文社會科學系科的學術水準，亦將直線下降。面對如此陰晦的前景，很多年輕人在社交媒體上哀號說，如果還想唸這些學科，就只好出國留學了。

## 中共以民族主義為毒素對全民洗腦

一九八九年之後，鄧小平的實用主義和功利主義理論不足以凝聚民心，民族主義、愛國主義成為中共的「救命符」。最近二十多年來，經過官方有意識的宣傳和煽動，中國的民族主義狂潮一浪高過一浪。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來，習近平對民族主義更是情有獨鍾。

二〇一二年中共十八大前夕，中國發生席捲全國的反日狂潮，據說是當時身為王儲的習近平幕後操縱的傑作——習正好在那段時間「神隱」兩個星期。中國人並不享有憲法賦予的遊行示威的權利，唯有政府暗中規劃的反日、反美的遊行示威除外。以本國政府為目標的遊行示威，會受到嚴厲鎮壓；以外國政府為目標的遊行示威，則會得到當局的鼓勵和獎賞。

那一次反日運動，帶給許多普通人噩夢般的記憶。在西安，若干開著國產日本品牌轎車的車主無端遭到毆打，轎車被砸壞。受害者李建利的妻子回憶起當天遇到砸車時的情形：「我們下了車，在兩邊站著，想看看能不能勸他們不要砸。……都是老百姓辛辛苦苦攢錢買的車，別砸行不行，我們買日本車不對，以後不買日本車了，好不好？」然而，一

把U型自行車鎖到了一名憤怒的青年人蔡洋手裡，他把鎖砸在李建利的車上，然後去砸車主本人。一下、兩下、三下、四下……李建利倒在血泊之中，顱骨粉碎，經過急救才撿回一命。

在這場由釣魚台爭端引發的國內反日遊行中施暴的，到底是怎樣的一類人？《南方周末》記者陳鳴在長篇報導〈砸車者蔡洋生存碎片〉中，生動地描述了被判重刑的暴徒蔡洋的心路歷程：二十一歲的蔡洋從老家河南南陽來到西安，吊在高空中刷了兩年外牆和玻璃，剛剛為漲到兩百塊一天的工資感動振奮。他喜歡看抗日劇、上網玩槍戰遊戲、有一個上大學的夢、在QQ空間裡孤獨地訴說對愛情的渴望。反日遊行終於讓他有了一次痛快淋漓地發洩的機會。

受民族主義毒害的，不僅僅是蔡洋這樣沒有受過完整教育、內心充滿仇恨的農家子弟，許多出生於非富即貴家庭的中國留學生也是歇斯底里的民族主義者。哈佛大學在一次模擬聯合國的辯論活動中，主辦方將台灣列位國家，招致一批中國留學生的激烈反應。中國代表團人員的不滿和抗議，要求主辦方發表正式書面聲明，承認錯誤、重新印發手冊將Country（國家）改為Country and Region（國家與地區），並將錯誤手冊收回。哈佛模聯秘書長露絲·卡根（Ruth Kagan）以電子郵件形式回應中方，稱將台灣列為國家並非大會的政治聲明，也不代表哈佛國際關係理事會的看法。這一聲明未能滿足中方要求，衝突升級。中國留學生肆意鬧場，主辦方招來警察，將情緒失控者逐出開會的酒店。

加州大學爾灣分校社會學系的華裔博士研究生梁懷超對中國留學生出國後就更愛國的現象進行了研究。他與十八位來自中國的學生和學者做了深入訪談，把研究結果發表在最新一期的《國際教育研究》期刊上。梁懷超發現，當留學生在中國時，可以很容易地把政府和人民區分開來，但出國後，他們往往把中國政府和中國人看成一體，任何對中國

政府的批評都會讓他們覺得是在批評整體中國人民。留學生們認為，自己能夠通過與所在國的人們交流提升或維護國家的形象，任何對中國的批評都會導致他們憤怒的反擊。

## 中共對知識分子的招安和對媒體的嚴厲管控

中共實行的經濟體制，是舉世無雙的計劃經濟和市場經濟的奇妙結合。某些領域，比那些奉行新自由主義經濟範式的國家還要新自由主義；而在另外一些領域，仍然保持了毛時代的國家壟斷性質，如軍工、鐵路、電信、石油、煤炭等命脈部門。但是，一般人往往沒有意識到，中國計劃經濟成分最高、壟斷程度也最高的領域，是教育和文化領域。中共控制了大學和所有的教育機構，把本來應當是民間組織的文聯、作協變成半官方機構。在文化和教育領域，黨國就是唯一的「下訂單者」，知識分子被納入這一羅網嚴密的體系中，用毛澤東和習近平的話來說，不聽話，就沒有飯吃；只有乖乖聽話，才有飯吃。

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後，以大學人文社會科學方面的教授和作家為代表的中國知識分子集體被招安，同時放棄了八十年代追求過的自由民主人權的價值。我有一個親身經歷的例證：大約在十年前，北師大有一名女學生因為幫助工人維權者起草文件而被捕。我們發起一場簽名抗議活動，我請一位在自由派知識分子圈內頗有聲望的教授簽名支持。他沉思良久，還是婉拒。他解釋說，剛剛得到一筆數百萬的研究經費，成立一個研究所，聘用好幾名年輕學者。「若是我自己，我願意冒著風險簽名，但現在我們是一個團隊，我不能因此連累大家，尤其是那幾位年輕學者。」道理聽上去冠冕堂皇，但用一句俗語來說，就是「屁股決定腦

袋」。

當局先招安知識分子階層，接著再來管制媒體和網路，就水到渠成。宣傳部對傳統媒體——如電視、電影、廣播、報紙、雜誌、出版——的管控，一年比一年嚴格。就連提供打字和複印服務的小店，也被公安要求充當監控者和告密者：一旦發現有不妥的內容，必須馬上報告。九十年代以來在經濟自由化環境中成長起來的南方少數傾向自由化的媒體，近年來遭到多次清洗，滿足於「二奶」之身分，對宣傳部俯首貼耳。

網路更是管控的重中之重。公安部宣佈將在全國重點網站和重點互聯網公司建立「網安警務室」，包括中國移動、阿里巴巴、騰訊等。中國三大國際網路出口局之一的上海電信，擬推出國際流量准入服務機制。此一舉措可以達成三個結果：一是減少國際流量，降低GFW的巨大負擔；二是通過准入機制監控個人上網行為；三是可以隨時切換國家局域網。因此，網路活動人士預測，隨著牆逐步升高，免費或者付費的翻牆軟體被一個個通過技術手段或者威脅恐嚇幹掉，翻牆人數大減恐不可避免。原本低門檻的翻牆，會變成奢侈品。

中國沒有像朝鮮那樣不跟世界「聯網」，但正在變成如同孤島般的「局域網」。國際流行的社交網站如 Twitter、YouTube、Instagram、Facebook，以及谷歌等搜索引擎，Gmail 通訊服務在中國被遮罩，如果沒有專門的「翻牆」軟體越過「長城防火牆」，網民就無法登陸海外網站。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五日，北京二〇二二年冬奧會申辦委副秘書長、新聞發言人王惠表示：「一些人經常會提到 Facebook 和 Twitter，但我周圍的人們根本不喜歡使用這些網站。……我們擁有微博和微信，中國六點五億網民可以自由使用這些工具來交換和接收資訊。」既然中國人民不喜歡西方的網路社交媒體，習近平訪美期間，做為喉舌的新華社為什麼要創建 NEW CHINA 帳號，在 Twitter、Facebook 及 Youtube

上，直播習的一舉一動呢？這三個網站在中國均無法訪問，點擊後只會出現 404 not found 報錯頁面。

無國界記者組織的伊斯邁爾表示，中國政府封鎖外國網站，尤其是社交和新聞網站，是因為他們非常害怕這些網站被用來顛覆中共政權：

「他們一直都懼怕資訊對自己政權可能起到的顛覆作用。他們真誠地相信，新聞自由、言論自由等對自己的權力和對國家會起到顛覆和不穩定作用。尤其是他們幾年前目睹了阿拉伯之春期間社交網站所起到的作用之後，他們對自己無法控制的網站和媒體更懷有一種近乎偏執狂似的恐懼感。」

## 中共對 N G O 和民間維權活動的強力打壓

中共對民間維權運動強力打壓，從《零八憲章》運動到茉莉花風潮再到新公民運動，打壓一步步升級。七千億維穩經費超過六千多億公開的國防預算，習近平心目中最大的敵人，不是「亡我之心不死」的帝國主義，而是日漸覺醒、追尋自由、反抗暴政的本國人民。

維權網記錄了至少九百五十五名維權人士在二〇一四年被拘捕，幾乎是前兩年的總和，這個數字比六四以來任何時候都多，大批活躍人士、律師、記者與自由派知識分子，遭到關押、軟禁、噤聲，少數人被迫流亡海外。報告說，「那些要求行使基本權利，或對越來越嚴厲的壓制發起挑戰的人，正面臨政府的報復，比如使用酷刑、任意拘禁、強迫失蹤、恐嚇，以及其他形式的虐待」。中國民間網站民生觀察工作室發佈的《中國維穩與人權狀況年終報告》也指出，中國已從「維穩」時代進入到管控更加嚴厲的「維安」時代。

在江時代和胡時代，打壓的重點為有明確政治性訴求的民間組織和活動，比如民主黨的組黨活動、天安門母親要求平反六四的呼籲、法輪功的大規模抗議、劉曉波領導的《零八憲章》運動等。當局認為，這些組織和活動直接威脅到中共的統治，不能容忍。而對一般性的環保、女權、教育、學術活動尚能網開一面。

到了習近平時代，習近平企圖像毛澤東那樣，用強勢的國家來摧毀弱勢社會，讓國家如臂使指地控制每個民眾，達到「天下歸心」的狂妄目標。

立人鄉村圖書館被關閉即是其中一個典型案例。立人鄉村圖書館由北大碩士李英強及其朋友於二〇〇七年發起，其宗旨為：以圖書為載體，以教育為內容，立足鄉村，連接城市，推廣國民閱讀，促進鄉村教育革新。其使命為：讓鄉村青少年成長為健康、正常的現代公民。立人圖書館效仿民國晏陽初和梁漱溟的鄉村教育運動，這樣的事業，在民國時代能得到地方官員的認可和支持，在習近平時代則成了「不懷好意」的「顛覆陰謀」。二〇一四年九月，中共當局突然以多種手段關閉大量分館，立人圖書館理事會不得不決定結束營運。

在一份公開聲明中，立人圖書館嚴厲譴責當局的「撲殺」暴行和愚民政策：「第一，立人圖書館所承受的長期而巨大的壓力是不公義的，當局對立人的打壓是違背國法天理良心的，是對轉型社會的巨大傷害。第二，面臨如此強勢與高壓，立人圖書館在鄉村運營的社會基礎已不復存在，立人在機構運營、教育探索、籌款等方面已沒有發揮空間，與其平庸苟活，不如就此告別。第三，『立人』是中國轉型的核心命題之一，立人圖書館在今日死去，或將在未來某一個時間，由另一群人將其復活。立人所積累的經驗如果對社會重建是有用的，一個立人圖書館死去，千百個立人圖書館將出現。」這份文件終將成為審判習近平的一項

罪證。

習近平時代，不允許在共產黨控制之外的民間組織存在。即便是溫和的女權活動也招致滅頂之災。二〇一五年三八婦女節前夕，北京、廣州等地的近十位女權主義者因籌備反對公車上性騷擾的宣傳活動遭拘捕，其中李婷婷、韋婷婷、鄭楚然、武嶸嶸和王曼等五人，三月十二日被北京警方以涉嫌「尋釁滋事」刑拘，外界稱為「女權五傑」。

女權人士被抓引發國際社會的關注，並發起全球連署，要求中國當局立即釋放她們。美國和歐盟提出批評，中共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則聲稱不容外國干涉中國的「司法主權」。這種說法如同納粹稱屠殺猶太人是其「司法主權」、敘利亞阿薩德政權稱屠殺婦孺是其「司法主權」。後來，「女權五傑」獲釋，但仍受警察之監控和騷擾，無法過上正常生活。

## 留學生將是習近平的掘墓人

中共當局認為，通過以上五個方面的控制與打壓，就能避免在中國出現太陽花和黃雨傘，以及再發生一次「八九六四」。然而，今天的世界已經步入地球村，再高的防火牆也不能阻隔民眾對資訊和真相的尋求。

據香港《蘋果日報》報導，教育機構 Roundtable 教育及全球發展部，在佔領運動爆發五個月後，在香港各大專院校校園，訪問了近五百名來港讀大學的陸生，百分之九十一受訪者均表示，若有投票權，會投票；百分之四十三的人更認同甚至非常認同佔領運動爭取民主的目標。調查亦發現，佔領運動爆發後，八成受訪陸生都自認，曾嘗試瞭解佔領

運動的始末及訴求，七成稱有跟支持佔領運動的朋友交流想法。

二〇一五年，六四紀念日前夕，一群中國留學生在網路上發表公開信，譴責六四屠殺，宣稱中共自六四之後已全然喪失了統治合法性。習近平命令官方媒體做出反擊，這類髒活通常由《人民日報》旗下的黃色小報《環球時報》承擔。《環球時報》以〈境外勢力試圖煽動八零後九零後〉為題發表社評，認為公開信「以十分兇悍的語言攻擊中國現政權」，指責留學生在國外被洗了腦，對「八九政治風波發表充滿民運味的極端觀點」。社論指出：「境外敵對勢力近年把突破的重點放在了八零後、九零後等沒有見證歷史現場的年輕人身上，並把香港、台灣當作特殊陣地。」這是習近平式的粗鄙蠻橫的語言風格。

《環球時報》不敢面對留學生們關注的六四議題展開討論，而是給留學生們扣一頂「被煽動」的帽子。《環球時報》是中共的御用喉舌，面對批評中共政權的聲音，想當然地認為對方背後有「敵對勢力」唆使。它是奴才，便以為別人也是奴才。它不能相信，這個世界上有人會為了真理、公義、民主而發聲乃至獻身。《環球時報》的筆桿子胡錫進常常裝扮出雷鋒、劉胡蘭的大公無私、大義凜然的模樣，卻被人揭露出挪用公款到歐洲豪華遊、遭到《人民日報》警告處分的醜聞。

《環球時報》充滿文革遺風的頭條社論，意想不到地起到傳播六四訊息的實際效果：這大概是中共官媒上唯一提到六四的文章。人們讀到社論之後，立即通過翻牆軟件尋找留學生們的公開信。難怪有人猜測說，這篇社論的作者或許「身在曹營心在漢」，故意用這種曲折的方式喚起國人的六四記憶。那麼，胡錫進難道是公民社會安插在習近平身邊的間諜？

果然，《環球時報》這篇步步殺機的社評，當天上午就從環球網上刪除了，其他由國內網站轉載的原文也無法打開。海外媒體如此評論當

局「欲說還休」的做法：「這顯示中國當局在六四屠殺二十六週年來臨的敏感時刻，試圖再次將涉及『六四』的輿論關注降到最低程度。」這不僅是《環球時報》的尷尬，更是習近平的尷尬：要批判敵人，卻又不敢讓民眾看到敵人的面目；要終結六四的話題，反倒強化了國人對六四的記憶；派遣留學生出國學習西方的科技，卻無法阻攔留學生也學到民主自由的價值；留學生為中國經濟發展立下汗馬功勞，卻也帶回了普世價值的火種。

公開信起草人之一的古懿露面接受美國之音等媒體的訪問，講述戰勝恐懼、無所畏懼的心路歷程。古懿介紹說：「這封信本來是寫給國內同學的，我們預期會通過QQ、人人、微博在國內流傳，但是沒有想到我們這些連署者會被官方媒體做為國家公敵批判。我們將來必定面臨極大的風險，我們都是普通人，也會害怕。但如果讓這種恐懼完全控制自己，那麼我們子子孫孫都將生活在沒有真相、沒有自由的恐怖中。」

古懿這樣的「傑出青年」，絕非孤獨和孤立的個體。習近平那貧乏乾枯、霉味十足的統戰講話，能吸引像古懿這樣「醒過來」的留學生嗎？古懿的聰明、勇敢和對正義的熱愛，與習近平的愚蠢、怯懦和對獨裁的堅持，形成鮮明對比。中國的未來，屬於前者，不屬於後者。以習近平這個假博士的智商、情商和能力而言，不是像古懿這樣的真博士的對手。

在台灣留學的陸生中，我也結識了不少像古懿那樣熱愛自由和真理的年輕人。只要在台灣學習和生活半年以上，很多陸生就會被台灣的民主自由價值所吸引，甚至嘗試瞭解台灣的民主運動歷史並觀察台灣當下的公民運動，這些經歷必將成為他們返回中國後推動中國進步的重要資源。

覺醒的中國人不會放棄對自由的渴望，最黑暗的夜半也正是黎明的

前夕。一場規模更大的太陽花和黃雨傘運動，在不久的將來必將在中國的土地上閃亮登場。

## 中共遇到臉書「非死不可」？

任何一種民主政體，若無暢通資訊，或獲取資訊之途徑，只會淪為鬧劇或悲劇的序幕。知識將永遠統治愚昧：人民若想當家做主，必須用知識的力量武裝自己。

—麥迪遜（James Madison）

二〇一四年二月二十七日，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落幕，宣佈成立「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習近平親任組長—這是習眾多頭銜中舉足輕重的一個。

在此背景下，中共與臉書、推特等網路社交媒體的關係尤其耐人尋味。二〇一四夏季，在天津舉行的達沃斯論壇上，對於臉書即將進入中國的傳言，被外界視為備受習近平看重的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辦公室主任魯煒，明確地說「不可以」！同時兼任中央宣傳部副部長及國家互聯網信息辦公室主任的魯煒指出，中國互聯網的管理有「底線思維」，具體化來講有兩條：首先，維護中國的國家利益；其次，維護中國消費者的利益。新華社引述魯煒的話說，中國互聯網開門迎客的同時，絕不允許背後捅刀子的行為。

二〇一四年十月三十日，中國「世界互聯網大會」舉辦前夕的記者會上，日本記者提問說：「西方一些網站比如說 Facebook 在中國無法訪問，請問中國為什麼要關閉這些網站？」魯煒回答說：「中國歷來都是好客熱情的，但是誰到我家作客，我是有選擇的。我可以講兩句話，

我沒有辦法改變你，但是我有權利選擇朋友，我希望到中國來的都是朋友，是真朋友。」

兩個月後，魯煒訪美，特別到訪臉書在加州的總部。臉書創辦人馬克·祖克柏陪同魯煒參觀公司園區。中國官媒報導，在祖克柏的辦公桌上，魯煒發現一本英文版的《習近平談治國理政》。祖克柏解釋說：

「這本書我也給同事買了，我要讓他們瞭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中國雖寸步不讓，臉書卻見縫插針。

二〇一五年九月下旬，習近平訪美，在西雅圖的高科技峰會上，與臉書創辦人祖克柏等美國科技巨頭會晤。祖克柏罕見地打上領帶，並用中文向習近平問好，兩人交談了一分多鐘。在華府的國宴上，祖克柏夫婦又被安排在與習近平同桌的貴賓席上，祖克柏指著懷孕的華裔妻子，請求習近平為即將誕生的孩子取一個中文名字，習近平以「責任太重了」為由婉拒。真是熱臉貼在冷屁股上。

中國官方為習近平訪美造勢，除了在CNN、《紐約時報》這樣的正牌「西方媒體」上耗費鉅資刊登廣告外，也在臉書上創建了一個叫做XI's US VISIT（習近平訪美）的主頁，內容包括來自中國國際廣播電台、新華社等央媒的照片、視頻及文字。祖克柏特意在個人主頁上發佈了與習近平握手的照片，並寫到「你可以關注 XI's US VISIT 這個主頁，瞭解習主席訪美的動態」。習近平訪美的專頁擁有百萬點擊，究竟有多少人是翻牆出來「按讚」的，恐怕只有臉書的技術部門才能做出精確統計。

祖克柏多番向習近平示好，習近平卻不可能對臉書「網開一面」。臉書要想進入中國與騰訊開發的微信平台競爭，仍然是遙不可及的夢想。而且，臉書發展至今，已經成為一個公共媒體平台，而不單單是其創始人及股東的私人產業。即便公司管理者為了進入中國市場賺更多的

錢，而願意做出過濾信息乃至出賣使用者個人信息的妥協，但臉書遍及全球的用戶們會欣然同意嗎？雅虎幫助中國公安部蒐集異見人士資料導致師濤等入獄，而被斥責為技術的巨人、道德的侏儒，並被迫道歉、賠款，雅虎的前車之鑑，臉書難道置若罔聞？

## 萬人按讚、萬人到場：臉書對全球民主化的功勞

臉書等社交媒體是全球新一波民主化浪潮的推手。美國政治學家杭廷頓曾歸納二十世紀全球的三波民主化運動，進入二十一世紀，民主化第四波又在最不可能發生的區域—阿拉伯世界—風起雲湧、摧枯拉朽。阿拉伯之春席捲中東、北非的十多個阿拉伯國家。BBC製作了一部名為《臉書如何改變世界：阿拉伯之春》的電視新聞專題紀錄片，介紹這些革命的始末緣由，革命者的共同工具就是以臉書為代表的社交媒體。阿拉伯之春讓世人看到，推翻極權的武器，不是槍砲彈藥，而是網路和手機。被統治者忽略的社交媒體意想不到地成了革命的催化劑。

第一把火從突尼西亞點燃。一名青年攤販為抗議警察暴力而自焚身亡，隔天，數千人聚集在現場，高喊反貪污的口號。官方電視台完全沒有報導。民眾決定自己當記者，拍下抗爭畫面發送到臉書上。突尼西亞有高達兩百萬人使用臉書，相當於全國五分之一的人口。有拍片民眾說：「警方在抓是誰拍下這些影片，我們有人站在最前線從屋頂攝影，他們雖然不是專業，但知道怎麼做。」靠社群網站動員民眾上街抗議，也把官方血腥鎮壓的過程傳到全世界。在位二十四年的總統班·阿里，倉皇逃亡海外。很快，經過民主協商誕生了新政權，創建該協商機制的代表人物榮獲二〇一五年度諾貝爾和平獎。

在中國，死於城管和警察暴力的攤販和底層民眾數不勝數，卻未能成為一場新的民主運動的誘因。極權統治下，中國的網路被管制得嚴嚴實實。而在突尼西亞，班·阿里的專制程度遠遜於中共，如果他仿效習近平，成立一個權力超越憲法的網路安全小組，說不定還能「獨裁到底」。

突尼西亞民主勝利的喜悅，透過網路感動和激勵了埃及人。當青年異議者賽義德被警察殘酷殺害之後，埃及民運人士在臉書上創建「我們都是賽義德」的專頁，號召民眾抗議暴政。示威活動當天，四萬多人湧入開羅市中心的解放廣場。為了防堵民怨，埃及政府切斷網路和手機通訊，卻出現反效果。民運人士說：「人們不知道發生了什麼事，他們說，我不能上網、不能打手機，看不到新聞，我乾脆上街，看到底發生什麼事，百萬人都走上街頭。」

埃及總統穆巴拉克命令軍隊和警察開槍鎮壓。開羅市中心血腥的鎮壓場面，透過外電和網路全球放送，引起國際撻伐，軍隊紛紛倒戈。號稱「埃及最後的法老」的穆巴拉克，垂頭喪氣地放棄權力，被關進囚籠、送上法庭。

與阿拉伯之春同步展開的，還有俄羅斯、委內瑞拉、土耳其、緬甸、馬來西亞、伊朗等國的民主運動。美國學者威廉·道布森在《獨裁者的進化》一書中寫道，在許多專制國家裡，勇於挑戰最難撼動、最強大政權與獨裁者的，往往屬於青年運動。而青年運動積極分子，大都是臉書之類的社交媒體的使用者。

台灣太陽花學運：臉書凝聚公民社會的力量？

台灣的太陽花學運，是一場大衛面對歌利亞的、實力懸殊的鬥爭。馬英九執政以來，國民黨威權回潮、以黨領政。民進黨萎靡不振、進退失據。各大財團垂涎於北京拋出的胡蘿蔔，傳統媒體或受國民黨的操縱。國民黨一班達官貴人，背靠「大國崛起」的中共，宣稱與之「聯手遏制台獨」，強行通過服貿、貨貿和自經區協議。

民間社會和學生面對不利的國際和國內環境，既沒有強大的組織架構，更缺乏資金和資源，處於弱勢。但奇蹟出現了，年輕人由草莓族變成太陽花，巧妙運用臉書等社交媒體，讓陷於茫然、無力、彷徨中的台灣社會空前整合。最終，「島嶼見天光」：不僅達成阻止服貿協定在立法院過關的近期目標，更收穫遠期成果—本土意識和獨立價值「去妖魔化」。

觀念可以改變世界，但觀念需要傳播管道。根據分析臉書熱門議題的網站「林克傳說」抽樣調查，全台灣的臉書用戶約一千五百萬人，在學生佔領立院第二天中午前，塗鴉牆上都出現過一則以上的反服貿相關連結，觸及率百分之百。

第一時間跟著學生進入議場的網友張龍僑，在各電視台還未取得議場內畫面時，只靠一台iPad，連上可即時轉播、錄影資料還能自動儲存在雲端的網站「Ustream」，轉播議場實況，一個晚上累計近百萬人次點擊。網友笑稱，他靠一台 iPad 和免費的網站，就「打趴」電視台造價上千萬的SNG車。

反服貿團體首度利用網路直播，二十四小時播送議場情況。實況轉播最大的優點，是提供不經修飾剪接的影像，讓大眾自主判斷。此外，抗議群眾也進行文字轉播，一千多位網友在臉書組成社團，將資訊翻譯成十三國語言。學運領導人透過臉書向外宣示主張，減少被大眾媒體的仲介解讀，鞏固運動中的發言權。

主流媒體刻意醜化學運，將實踐抗命權的公民誣衊為「暴民」。這是台灣美麗島事件和中國八九學運中，獨裁政權曾經使用過的手法。這次，當權者慣用的伎倆失效了，人們不以「暴民」為恥，反以「暴民」為榮。

學運之後，國民黨檢討青年政策，承認當局失去青年人的支持，以傳統媒體影響、控制青年的策略已過時。有一個忠於國民黨的大學生到馬英九面前哭訴說，在大學裡表明自己是國民黨員，會受同學的「歧視」。馬英九等國民黨高層指示文宣系統重視臉書等社交媒體。但是，縱然國民黨投入億萬資金，僱傭成千上萬「網軍」在臉書上「洗版」，也不可能翻轉臉書上「反國民黨」的整體氛圍。

沒有臉書，就沒有太陽花運動的成功；沒有臉書，就沒有台灣公民意識的覺醒。我對台灣民情民意的瞭解，臉書是最重要的管道。我支持太陽花學運，而大多數中國「公知」和旅居海外的流亡人士卻支持國民黨。這種截然不同的判斷，是因為我的資訊從臉書上獲得，而他們的資訊從《聯合報》和《中國時報》上獲得。我在臉書的朋友，涵蓋了老中青三代社運活躍人士，這些友人在臉書上的言論，給我啟發和刺激，讓我對台灣的認識不斷刷新和提升。

## 中國的「新常態」是「西朝鮮」

中國是全球最後四個全面封鎖臉書的國家之一（其他三個國家為：北韓、伊朗、古巴）。中共不敢像北朝鮮那樣一了百了式地「斷網鎖國」，卻用高高的防火牆打造出一個「局域網」，讓中國成為升級版的「西朝鮮」。

在中共歷任黨魁當中，習近平最為重視「網路安全」—毛澤東和鄧小平時代沒有網路，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網路還未如此深切地影響人類的生活。習近平執政之時，不得不正視網路的挑戰—從他家族的財富數字，到他的女兒在哈佛的生活情況，以及陪同他出訪各國的歌手妻子彭麗媛拿著蘋果手機拍攝的圖片，都成為中國網民的熱門話題；而網路與所謂「國家安全」的關係，亦空前緊密。

在互聯網未出現的時代，中共控制傳統媒體，就天下太平；在互聯網時代，資訊流通之迅捷和廣泛，讓中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江澤民和胡錦濤世代，採取消極防禦政策，每年耗資數百億打造防火牆，防止國人翻牆看外面的資訊，就心滿意足；到了習近平時代，則採取「進攻就是防守」的新政策，習近平親自過問網路管控事務，將網路安全納入「黨國核心利益」，企圖將網路「傳統媒體化」。

在習近平一手炮製的《國家安全法》中，特別突出保護所謂的「文化安全」，以及「維護國家網路空間主權」的內容。該法還包括「加強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教育和宣傳」、「防範和抵禦不良文化的滲透」之規定，聲稱要以舉國之力「建設國家網路與資訊安全保障體系，提升網路與資訊安全保護能力」。

在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領導小組成立後的第一次會議上，習近平強調說，網路安全和信息化是「事關國家安全和國家發展、事關廣大人民群眾工作生活的重大戰略問題」，要「從國際國內大勢出發，總體佈局，統籌各方，創新發展，努力把我國建設成為網路強國」。他把網路安全和信息化比作「一體之兩翼、驅動之雙輪」，必須「統一謀劃、統一部署、統一推進、統一實施」，「要創新改進網上宣傳，運用網路傳播規律，弘揚主旋律，激發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把握好網上輿論引導的時、度、效」。習近平認為，網路安全是一

場事關共產黨生死存亡的「戰爭」，他的內心深處充滿對網路自由的疑懼。

近年來，中國的微博和微信相繼興起，雖處於中共監控之下，卻也逐漸形成不同於官方媒體的新的輿論場域。習近平感受到來自微博和微信的威脅，下令抓捕一批大V，逼迫他們在央視鏡頭前認罪悔過和自我羞辱。這一伎倆，比當年毛澤東利用紅衛兵將習仲勳遊街示眾更加高明。習近平更看到港台年輕一代用社交媒體掀起波瀾壯闊的社會運動，為防患於未然，快馬加鞭地擴大「五毛黨」的數量及影響力。

二〇一五年二月，共青團中央下發文件，要求各地團組織在六月底前招募一千零五十萬名「青年網路文明志願者」。該文件要求，「青年網路文明志願者」的職責是在網路上主動弘揚正能量、抵制負能量，積極參加團中央推出的「陽光跟帖」行動。這份文件還透露，在各省一千零五十萬「青年網路文明志願者」名額中，來自高校的志願者將佔四百萬。以廣東為例，省內各高校都要上報志願者人數，比如廣州中山大學需提供九千名志願者，香港中文大學在深圳開辦的分校以及香港浸會大學在珠海與合辦的學院也被要求分別提供八百名和一百名志願者。

如果這一計劃得逞，「五毛黨」將成為共產黨和共青團之外的「中國第三大黨團組織」。但是，他們人數雖多，戰力卻弱。「五毛黨」剛剛在網路上露面，即成人人喊打的「喪家之犬」，被網友冷嘲熱諷得抬不起頭來，更無法達成習近平賦予的「扭轉網路輿論風向」的「戰略目標」。

中共遇到臉書，會發生怎樣的化學反應？

據香港《南華早報》報導，與中國僅有一河之隔的香港擁有四百三十多萬臉書的活躍用戶，香港和台灣是華人世界乃至全球範圍內臉書普及率和滲透率最高的地方。可是，中國民眾想不翻牆就使用臉書，仍遙遙無期。

中國的網路上有一則關於習接見臉書創始人祖克柏的段子：習說：「年輕人，公司上市啦，了不起啊。網站都打不開還能上市，佩服佩服啊！」小馬回答說：「哪裡哪裡，聽說貴黨沒註冊都發展成世界第一大黨，你們官員財產不公開都敢說反腐，學習學習啊……」

有網友根據臉書英文讀音的諧音，搞笑地將臉書翻譯成「非死不可」。對於使用臉書的普通人來說，在臉書上自由表達，找到新老朋友，獲得生活樂趣，是「不亦悅乎」；對於中共來說，臉書則是致命毒藥和顛覆工具，共產黨以暴力和謊言維繫政權，社交媒體將其倚重的暴力和謊言曝光於全世界面前，使其恐嚇功能逐步失效，共產黨當然「非死不可」了。

目前，臉書市值突破兩千億美元，成為全球排名第二十二位的公司。二〇一四年七月，臉書被允許在北京財富金融中心租下一處八百多平方米的辦公地點。九月八日，一個名為「臉書公司」的帳號在新浪微博（微博被稱為「中國版本的臉書」、受到中共當局的嚴密監控和管制）受到熱捧。該帳號自稱是「臉書官方微博」，此事後來被證實是烏龍事件。

更有趣的是，在臉書上先後出現幾個以習近平夫人彭麗媛（解放軍將軍兼五個大學的教授）的名字命名的帳號，還貼出不少彭麗媛的正面報導。港台普通民眾不會自告奮勇為彭麗媛做義務宣傳，這只能是中共文宣部門獲得最高層首肯後的做法—彭麗媛本人不會親自管理該帳號，也不會親自發佈個人消息。有臉書使用者調侃說，如果習近平下令解除

對臉書的封鎖，基於中國六億網民的巨大基數，彭麗媛一定可以迅速竄升為全球臉書「第一紅人」。

但是，習近平通過其親信魯煒之口斬釘截鐵地宣佈，中國政府不准臉書進入中國。對於習近平來說，確保權力的鞏固，比讓彭麗媛在臉書上大出風頭更重要。自己垮台了，彭麗媛擁有再多粉絲又有何用？彭麗媛總不能代夫出征、參選總統吧？

中國官方對臉書、推特、谷歌、雅虎、蘋果等國際互聯網巨頭髮號施令：若要進入中國市場，就得自我審查並接受中共審查。兩者只能選擇其一：堅持促進信息自由和不配合專制政權作惡的原則，而失去中國市場；或者服從中共管制、幫助中共作惡，由此進入中國。谷歌斷然選擇離去，臉書又豈能「欲練神功、揮刀自宮」？

習近平知道中共這個腐敗不堪的「老大哥黨」見不得光，若與臉書相遇，確實「非死不可」。他多次就網路控制發表講話，氣勢洶洶地宣佈「封網抓人」。香港佔中運動爆發後，習心急如焚，命令偵騎四出，抓捕數十名在網路上發佈香港佔中照片以及支持佔中言論的人士。中國公民動一動鍵盤和滑鼠，在網路上發表一點不同意見，立即就身陷「尋釁滋事」這一新罪名之中。

習近平以為，把牆修得足夠高，其統治就固若金湯；他不能明白，世上從沒有不透風的牆，也沒有推不倒的牆。習真該重溫柏林牆倒下後的歷史場景：東德領導人的斑斑劣跡很快被揭露，多年來，他們就像《綠野仙蹤》裡的巫師利用可憐的小技巧維持龐大卻搖搖欲墜的統治。昔日神氣活現的人物被送上法庭，超過八十歲的東德共產黨總書記昂納克和秘密警察頭子米爾克，常常在法庭上而不是在政治局會議上相遇。他們彼此淒涼地一笑，有時互相說幾句鼓勵的話。他們的白髮蒼蒼和步履蹣跚，並不能喚起被他們欺壓、凌虐數十年的民眾的同情心。

昂納克曾驕傲地宣稱「一百年也不會倒」的柏林牆，二十八年之後轟然倒塌；習近平在互聯網上修築的這道比長城還要長的「防火牆」，又能屹立多久呢？

第三卷

群魔亂舞西遊記  
國妖猖獗水滸傳

——論中共內鬥



變態辣椒 / 繪

## 習近平鬥周永康，如朱由檢鬥魏忠賢

朕非亡國之君，事事乃亡國之象。

—崇禎皇帝朱由檢

若將時間上溯到三百多年前的明朝末年，有一個人的垮台跟周永康一樣，其軌跡是垂直跌落，如《紅樓夢》中所云：「金滿箱，銀滿箱，展眼乞丐人皆謗。正歎他人命不長，哪知自己歸來喪！」也如聖經所言：「出來如花，又被摘下。」

那個人就是魏忠賢。

魏忠賢的故事，對明史略有瞭解的人，大都耳熟能詳。在天啟一朝，魏忠賢提督東廠，號稱「廠臣」。其黨羽遍及天下，號稱有「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兒」、「四十孫」，人數之多、影響之大、為害之烈，早已超過此前各朝喧囂一時的那些大璫，如王振、劉瑾、馮保等所形成的權力集團。

在魏忠賢權力臻於頂峰之際，閣臣所擬的票、旨中，「朕與廠臣」竟成為習語。老百姓但知有廠臣，不知有皇上。魏忠賢利用東廠凌駕於法律之上的鎮壓力量，殘殺東林黨人，掠奪各地財富，普天之下的士農工商個個都道路以目。各級官員們阿諛奉承，爭先恐後為其建立生祠。魏忠賢被朝廷封為尚公，人稱為九千歲，離人稱為萬歲的皇帝僅一步之遙。魏忠賢六十大壽，「天下督撫、總鎮競投密獻、異寶、諛詞。廷臣自三公、九卿……稱觴者，衣紫拖金，填街塞戶。金卮玉罍，鑄姓雕

名，錦屏繡障，稱功頌德」。

小人得志便猖狂。歷史學者溫功義在《明代宦官》一書中指出，魏忠賢的野心比其前輩都大。掌控特務系統尚嫌不夠，還試圖把兵權納入手中。他竭力拉攏分駐各地的總兵，為此興起一個與各地方兵馬接近的辦法：讓各地駐軍輪流到大內會操，人多時，進入大內的官兵竟多達萬人。

幸虧明朝的開國君主朱元璋有先見之明，其奠定的明朝軍隊的體制非常複雜，魏忠賢始終難以將兵權統合起來。於是，他乾脆在宮中選拔三千名身強力壯的太監，讓他們每日操練習武，以備緩急之用。不過，在天啟一朝，皇帝任由魏忠賢胡作非為，魏忠賢可以狐假虎威，篡位並非迫在眉睫；當天啟帝（朱由校）一死，崇禎帝繼位，魏忠賢失去靠山，篡位之心，立即變得緊迫起來。

魏忠賢還未來得及展開篡位行動，崇禎帝朱由檢就先下手為強。朱由檢鼓勵御史們上疏參魏忠賢的「並帝」、「蔑后」、「弄兵」等十大罪狀，在朝廷營造出「牆倒眾人推」的輿論氛圍，再隔離其黨羽、削弱其權柄，一旦時機成熟，立即下詔將魏忠賢發配到鳳陽看守皇家祖陵。朱由檢害怕魏忠賢及其黨羽狗急跳牆，沒有趕盡殺絕，只是將其驅離權力中樞。看似固若金湯的魏黨，一下子就樹倒猢猻散。朱由檢馬上下旨，命令將魏忠賢從半路追回，準備對其重新從嚴治罪。

接到消息後，久經宦海的魏忠賢知道此去凶多吉少，與其回京城受盡羞辱而死，不如就此劃上生命的句號。幸虧魏忠賢是一個「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太監，沒有嫡系子孫，即便死有餘辜，也不會連累家人。他「一死百了」，即便崇禎下令斬首戮屍也無所謂了。

那麼，只花了短短幾個月就摧毀盤根錯節的魏忠賢集團，朱由檢是一名英明神武的中興之主嗎？

朱由檢原以為，魏忠賢黨羽遍佈朝野，需要花好幾年時間、好多個回合，才能將其鬥倒。卻未料到，魏忠賢一打就倒、一觸即潰。其實，決定這場權力鬥爭勝負的關鍵原因，並非朱由檢如何運籌帷幄之中、決勝千里之外，而是魏忠賢多行不義必自斃。崇禎鬥倒魏忠賢，並不意味著他有本事拯救病入膏肓的大明王朝。崇禎執政之後，幹過的唯一一件漂亮事，就是登基之初一舉拿下魏忠賢集團，以「欽定逆案」清洗兩百六十二名大小官員。崇禎其餘的作為，乏善可陳。

朱由檢之勤政，在明朝的皇帝中首屈一指。他繼位之後，盱食宵衣，每天夜以繼日地批閱奏章。他節儉自律，不近女色，不迷信長生不老藥，天天生活在操勞、恐懼、痛苦、煩躁與焦慮之中。但是，做為領導者和決策者，最重要的不是勤勉，而是要判定大方向。若是目標錯了一味蠻幹，則猶如揚湯止沸、火上澆油，不僅於事無補，反倒敗事有餘。

朱由檢以為，這個世界上只有自己偉大、光榮、正確，朝政紊亂、內外交困，都是大臣的敷衍塞責、欺上瞞下造成的。由於不信任文武大臣，他很快又走上明朝諸帝重用宦官的老路。崇禎四年，朱由檢匆匆恢復派遣內監到軍中做監軍的辦法。當有大臣拿魏忠賢擅權的例子勸諫他時，他反駁說：「若諸臣能實心任事，朕何事乎內臣。」於是，張彝憲、曹化淳、高起潛、李輔國等太監頭子陸續掌權，他們的名字雖然不叫魏忠賢，卻與魏忠賢毫無二致。朱由檢實施的是「沒有魏忠賢的魏忠賢模式」，魏忠賢雖死無葬身之地，其幽靈卻與大明王朝的覆滅過程如影隨形。

朱由檢性情猜忌刻薄、果於殺戮。他急於事功，又自視甚高，且極為多疑。對於被派遣到外面與後金及流寇作戰的將帥，總是要遙控指揮，他迫使多名主帥在準備不足的情況下輕率出擊敵軍，導致全軍潰

敗。朱由檢在位十七年，先後屠戮了袁崇煥、熊文燦等七名總督，以及多達十一名巡撫，殺大臣之多，直逼大殺功臣的洪武皇帝。但殺人並不能延緩大明王朝的崩潰。李自成的軍隊逼近北京，朱由檢信任的太監頭子率先打開城門。走投無路的朱由檢，不能成為李自成的俘虜，遂逃到景山自盡而死。這位崇禎皇帝臨死前，寫下「君非亡國之君，臣皆誤國之臣」的絕筆為自己辯護。

可是，史家儘管同情崇禎的悲劇，卻無法全盤接受其誘過他人的思路。對於崇禎丟掉江山的過失，清朝所修的《明史》有一針見血之評論：「莊烈之繼統也，臣僚之黨局已成，草野之物力已耗，國家之法令已壞，邊疆之搶攘已甚。莊烈雖銳意更始，治核名實，而人才之賢否，議論之是非，政事之得失，軍機之成敗，未能灼見於中，不搖於外也。且性多疑而任察，好剛而尚氣。任察則苛刻寡恩，尚氣則急遽而失措。」《明史》撰寫者將風雨飄搖的大明王朝比作重病之人，將崇禎比作臨時上場的庸醫。崇禎沒有治病救人的經驗，輕率地開出致命的藥方：「譬一人之身，元氣羸然，疽毒併發，厥症固已甚危，而醫則良否錯進，劑則寒熱互投，病入膏肓，而無可救，不亡何待哉。是故明之亡，亡於流寇；而致亡之本，不在於流寇也。」

三百多年之後，紅朝的「政法沙皇」周永康短短十多年間「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歷程，與大明朝的魏忠賢如出一轍。

在江澤民的庇護和重用之下，周永康獲得火箭式的提拔，數年之間，由地方進入中樞，成為繼華國鋒之後以政治局委員兼任公安部長的第二人，進而瘋狂迫害異議人士，這才引起中外人士之側目。在中共十七大上，周永康晉升政治局常委，雖在九人中叨陪末座，但主管權勢薰天的政法口，公、檢、法等強力部門落入其囊中，還有上百萬裝備精良的武警部隊受其轄制。其任職多年的石油系和四川省，在其離開之後，

仍被圈為禁臠，旁人不得措手。

周永康長相兇惡、心機深沉，在政治局常委會中，雖是一名只有一屆任期的過渡性人物，其掌握的實權卻讓胡溫忌憚三分。他讓政法委這個在中共十三大後一度被趙紫陽下令裁撤的機構，如氣球般膨脹、如野馬般圈地。周掌控超過公佈的國防預算數字的高達七千億的「維穩」費用，宛如獨立王國的國王，氣焰之囂張，便是康生、羅瑞卿、謝富治、華國鋒等本黨負責安全工作的前輩，便是希姆萊、貝利亞、普丁等外國同行亦甘拜下風。「政法沙皇」之冠冕遂不脛而走。

以為羽翼已豐，周永康從不把謹小慎微的胡錦濤、溫家寶放在眼中，更不願讓看上去木訥遲鈍的習近平順利接班。他糾結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組成「新四人幫」，奪權計劃，成竹在胸。

人算不如天算，殊不料，王捕頭立軍夜奔美領館，牽一髮而動全身。王捕頭的主子平西王薄熙來轉眼事敗，從雲端跌入天牢。緊接著，大局翻轉、強弱易位，順藤摸瓜、水落石出。周永康扶持薄熙來上位、自己充當太上皇的美夢成了泡影。金山銀山，如冰雪般消散；劍拔弩張，卻是束手就擒。周永康在退休前被剝奪政法大權，一個死結套上脖子；習近平接班後、步步為營，「溫水泡康師傅，鐵籠關周老虎」，勝利在望，好不得意。

周永康之濫權、之貪腐、之橫暴，比起魏忠賢有過之而無不及。中共政治鬥爭之慘烈不亞於大明朝，周永康的下場也比魏忠賢更悲慘：魏忠賢一人做事一人當；周永康有一個龐大的家族，一人垮台，全家老小都被一網打盡，習近平怎麼會不知道斬草除根的道理？

習近平處理周永康案，所花費的時間和精力，超過朱由檢處理魏忠賢案。一年多之後，才用秘密審判，劃上並不圓滿的句號。

周老虎剛剛入籠之際，習近平通過打虎立威，然而，對周老虎的這

場虎頭蛇尾的審判，卻讓打虎運動淪為一幕鬧劇。鄧小平連毛澤東的遺孀江青都敢於公開審判，習卻只能偷偷摸摸地完結周案，顯示其缺乏鄧的自信。

更為嚴重的是，周永康雖身敗名裂，其作惡的基礎——以黨代法的政法委並未被取消，警察治國和特務治國的模式仍大行其道。習近平在政法委大會上講話指出，政法委「是黨委領導政法工作的組織形式，必須長期堅持」。換言之，習近平要將周永康打造的「警察國家」的模式升級換代。

習近平的個性和從政風格，跟朱由檢如出一轍：一上台，就拋出「三個自信」（理論自信、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之「學說」，做為「習近平理論」的基礎。自信對於政治人物來說固然是一種優異的品質，但最高統治者若是自信到自負和自戀的地步，毫無自我反省和自我質疑的能力，其自取滅亡就指日可待。

就在習近平標榜「自信」時，竭澤而漁的「中國模式」已走到窮途末路。今日中國的局勢，比之禮崩樂壞的明朝末年，又能好到哪裡去呢？

以內政而言，中國的人口紅利走到拐點盡頭，環境污染變本加厲，能源危機迫在眉睫，股市和人民幣匯率一路下滑，外資紛紛撤走，「世界工廠」的稱號難以為繼；貧富懸殊超越危險紅線，社會矛盾一觸即發，群體性事件層出不窮，剛性維穩激發出更多不穩定因素；種族矛盾越演越烈，藏人自焚抗議，維族武裝反抗，邊疆宛如俄國的車臣，恐怖襲擊瀰漫到天安門廣場。習宣稱構築「銅牆鐵壁」、撒下「天羅地網」，但一個視國民如仇讎的政權，豈能有長治久安？

以外交而言，習近平四面出擊、橫挑強敵，不僅欺凌鄰國，而且挑戰美日。然而，環顧全球、數算敵友，習比之文革時期的毛澤東還不如

—毛在其最孤立時，還有阿爾巴尼亞的獨裁者霍查前來朝拜；習連一個崇拜他的朋友也沒有。

朱由檢剛一登基，立即將天啟賦予太監、閣臣的權力收回，他認為只要將權力集中在一人手上，就能挽救大廈之將傾。誰知，他才能有限，處置乖方，一錯再錯，遂一發而不可收拾。朱由檢通過整頓吏治、清除魏忠賢集團等政績收攏人心，但為了籌措鎮壓農民起義和女真入寇的龐大軍費，不惜橫征暴斂、竭澤而漁，又使得農民飢寒交迫，農民起義如野火燎原。

習近平上台後的做法與崇禎亦步亦趨：他顛覆江和胡時代的「集體總統制」，統攬大權、事必躬親。清除前朝大佬，迫使退休元老和政治局常委會中的同僚統統閉嘴。又大力提拔一批年輕氣盛的「習家軍」，利用心狠手辣的「現代廠衛」中紀委和政法委，打壓生機勃勃的公民社會，以維持「穩定壓倒一切」之局面。

三百多年之前，大明王朝從萬曆後期開始，已是「朽木不可雕也」，但仍沿著既有慣性苟延殘喘數十年，末代之君崇禎勉強在位十七年才「以身殉國」；在全球民主化大潮驚濤拍岸、包括互聯網在內的各種現代通訊手段加快民智開化的今天，將一黨獨裁的邪路走到底的中共政權，還妄想如大明王朝那樣「百足之蟲，死而不僵」，就是一場黃粱美夢。習近平拒絕還政於民、憲政共和、多黨競爭、議會政治這唯一一條「人間正道」，試圖回歸毛時代的全能政府和原教旨主義意識形態，他越是「有所作為」，就越加速中共之覆滅。

三百多年前，朱由檢在自盡前，與太子及幾個兒子訣別，叮囑兒子：「爾等今日是太子，王城破，即小民也，各自逃生去吧！」最後他痛苦不堪地嘆息道：「爾三人何不幸而生我家也！」那麼，今天不可一世的習近平，數年之後也會走到這一步嗎？習近平唯一可以傲視朱由檢

的地方，是他的女兒早已擁有美國綠卡，即便中共政權如雪山般崩解，習明澤也可逃亡到美國，用早已轉移到海外的萬貫家財過完衣食無憂的下半輩子。我不會用推背圖給習近平算命，但我從全球民主化的大潮以及中國人日漸覺醒的趨勢就可以判斷，習近平難以在其任期內締造太平盛世，也不可能在歷史上留下豐功偉業。

同樣一齣歷史劇又上演了，周永康飾演魏忠賢、習近平飾演朱由檢，那麼，在這一盤天地玄黃的大棋局中，誰又飾演李自成、誰又飾演皇太極、誰又飾演吳三桂、誰又飾演陳圓圓、誰又飾演錢謙益、誰又飾演柳如是？

棋局已殘，或許可以逐一說出那些對號入座的名字了。

## 鬼王趕鬼，百姓莫喜

我們做出選擇的基礎不是民主制度的優越性，而只是獨裁專制的罪惡—民主制度的優越可能會令人懷疑，但獨裁專制的罪惡卻是肯定的。

—卡爾·波普爾（Karl Popper）

聖經中說：「有權勢的人如火絨，他的工作如火星，都要一同焚毀，無人撲滅。」明代戲劇家孔尚任在《桃花扇》中寫道：「眼看他起朱樓，眼看他宴賓客，眼看他樓塌了。」古今中外，手上沾滿鮮血的特務頭子從來沒有好下場：執掌錦衣衛的魏忠賢被賜死在流放途中，黨衛軍頭目希姆萊被捕後咬破毒藥膠囊自盡，克格勃頭子貝利亞被同僚逮捕並槍決，軍統頭子戴笠死於神秘的空難屍骨零散……當他們掌握權力時，心狠手辣；但當他們死去時，淒淒惶惶。如今，習近平將周永康送入囚籠，周永康終於嚐到失去自由的滋味了。

## 包子與速食麵之爭

二〇一四年九月十五日，習近平訪問馬爾地夫，與中國使館人員談話。在談到旅遊問題時，習希望中國遊客注意形象，「少吃速食麵，多吃當地海鮮」。這是一個無法惹人發笑的冷幽默：能到馬爾地夫這種奢

華之地旅遊的中國人，不會是省吃儉用的赤貧階層，不會捨不得去餐廳吃飯而以速食麵充饑。那麼，難道習另有所指？

在周永康案公佈之前，網民發明了一個既能躲避網警檢查、又能準確指稱周永康的代號：康師傅速食麵。誰知，一包速食麵泡了一年半才泡開。當中國官方通訊社新華社發佈短短七十七字對周永康立案審查的訊息之後，億萬「屁民」齊聲歡呼「大快人心」。

在習集中權力之際，英國《經濟學人》雜誌發表了題為〈習近平的日益崛起〉的封面文章，稱習為近年來最有權力和最受歡迎的中國領導人：「習近平是中國第一位僱用了龐大團隊幫他打造公共形象的領導人。他本人對此也饒有興趣，這得益於他的魁梧身材，強硬立場，平易近人。在迷戀身高的中國，習近平的身高超過毛澤東以外的所有前任領導人。他能與民眾坐在一起吃餃子，外出不乘坐總統豪華轎車，而是普通中巴。」作者或許對中餐不甚了了，錯誤地將包子寫成餃子—習近平屈尊「與民同樂」的那一餐飯，吃的不是「大娘餃子」，而是「慶豐包子」。雖然包子和餃子都屬於帶餡的麵食，兩者卻大不相同。

於是，包子與速食麵之爭上演了。在文字獄高壓之下，中國人慣於使用隱喻的方式曲折地表達其心思意念，以及對人物的臧否。兩千多年前，詩人屈原開啟了「香草美人」的諷喻傳統。如今，康師傅速食麵和慶豐包子之間的競技，似乎暗示著黨內兩派勢力之間的對峙。

中國官媒報導說：天津科技大學發佈營養專家研究成果，稱「速食麵營養優於包子」。專家們經過科學的分析比對，認為速食麵的三大營養素的能量均衡度上居於其他食品前列，比起含油量過高的包子等主食營養更為均衡。

《新京報》隨即發表文章，駁斥上述觀點：「速食麵營養優於包子」的說法有失偏頗，這種「正名」是否有利益代言之嫌「著實可

疑」。在科學領域出「新見」無可厚非，可若因利益瓜葛而去誤導民眾，那就是褻瀆「學術」二字。

包子和速食麵哪種食品更好吃、更營養的爭論，無法改變這一鐵的事實：慶豐帝拿下了康師傅。慶豐包子鋪因為習的光顧而顧客盈門，幾乎要躍升中國餐飲業第一品牌。反之，既然周永康「落魄的鳳凰不如雞」，康師傅的厄運亦降臨了：擁有康師傅速食麵品牌的台灣頂新集團，再度爆出使用黑心豬油的醜聞，康師傅速食麵在海峽兩岸都被打入冷宮。

面對包子與速食麵之爭，我偏偏要發出疑問：中國人的食譜，難道只能在「康師傅速食麵」與「慶豐包子」之間選擇嗎？可以既不喜歡包子，也不喜歡速食麵嗎？我們不是監獄中的囚犯，不願吃規定的垃圾食品。我們不僅有權根據口味選擇食物，更期待通過投票選擇領導人——既不是周永康，也不是習近平。我們不願在兩個爛蘋果之間選擇。

「康師傅下架，包子帝登基」，是共產黨的家事，跟外人沒有太大關係。民眾不必額手稱慶，中共統治者從來是沒有最壞，只有更壞。

## 覆巢之下，豈有完卵？

周老虎入籠，中共黨內在文革後形成的「刑不上常委、禍不及三代」的「潛規則」頓成過眼雲煙。周永康不是一個人倒台，而是全家覆滅。雖然沒有到帝制時代誅連九族、滿門抄斬的地步，但在牽連家人這一點上，比起江和胡時代政治鬥爭的失敗者陳希同和陳良宇，周的下場更悲慘。此前落馬的「二陳」，「一人做事一人當」，家人大致無恙；周則是「一榮俱榮，一損俱損」，親朋好友無一倖免。中共內鬥的殘酷

程度，已趨於你死我活、招招見血。

《人民日報》發表評論員文章稱，黨內決不能搞封妻蔭子、封建依附那一套，搞那種東西總有一天要出事。「而事實也證明，曾經獲得周永康關照的家人和追隨者都紛紛被拿走特權。」然而，周家覆滅，美國智庫蘭德公司對中國國情的描述並未改觀：「普通中國人通常只關心他們的家庭和親屬，中國的文化是建立在家族血緣關係上而不是建立在一個理性的社會基礎之上。中國人只在乎他們直系親屬的福祉，對與自己毫不相關的人所遭受的苦難則視而不見。毫無疑問，這種以血緣關係為基礎的道德觀勢必導致自私、冷酷，這種自私和冷酷已經成為阻礙中國社會向前發展的最關鍵因素。」

周永康的家人從侯門跌入糞坑，此中滋味，大概習近平在父親被毛清洗時就深有體味。據英國《每日電訊報》報導，周永康五歲的孫女被其所在的幼兒園開除，理由是她的所有家人都已被捕，她需要一個新的環境。周永康孫女就讀的幼兒園，當然是那種「談笑皆王公，往來無匹夫」的頂級幼兒園。她的同學和夥伴，無不來自高官顯貴之家庭，只有中南海裡的貴族子弟，才能從小一起長大。當她的爺爺不再是黨內「同志」、而成為「國妖」和「叛徒」之後，她就沒資格與小朋友們一起享受「特供」服務，只能宛如「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不，連尋常百姓家的天倫之樂都求之不得。

此刻，這個孤苦伶仃的小女孩，身邊沒有一個近親。唯一還有自由之身的外婆，是因為回美國看牙醫才逃過一劫的漏網之魚，想到中國接外孫女亦不得，只能孤零零地困居遠在大洋彼岸，望眼欲穿。這個從小長在蜜罐中的小女孩，恐怕很難理解突然降臨的厄運：為何一夜之間，所有親人都消失得無影無蹤？大概要到她長大以後，才會明白這個國家的鐵律是「成王敗寇」，誰讓你爺爺當初沒有做出正確選擇呢？

周永康倒台之後唯一的一次露面，是央視公佈的秘密審判的畫面。過去，身為政治局常委的周永康出現在新聞聯播中，是意氣風發的黨和國家領導人。控制央視的是其馬仔李東生，當然要派遣最好的記者和攝影師對其行程做最詳盡的報導。這一次，出現在法庭上的周永康，滿頭白髮，神色萎頓。昔日宛如在世閻王，窮兇極惡；如今如鄰家老者，漠然等死。

死老虎不會博得人們的同情，周永康幹過的壞事罄竹難書。不過，同情周家小女孩的人還真不少，也許人們聽多了趙氏孤兒的故事，對這個命運逆轉的孩子頗有惻隱之心。對此，我更想追問一句：被周永康戕害致死的李旺陽、曹順利以及成千上萬的正義之士，不也是父母的子女，或者也為人之父母？若有同情心，先給他們的親人吧。

## 周永康為何逃脫死刑？

周永康案公佈一年多之後，以「雷聲大、雨點小」的方式落幕。文革結束時，審判包括毛澤東遺孀江青在內的「四人幫」，都敢對全國全程直播；如今，審判周永康，反倒退化成偷偷摸摸的秘密審判。此前許多觀察人士評估的死刑或死緩，也變成了無期徒刑。這是習近平所標榜的「依法治國」嗎？

法庭上公佈的周永康的罪行和周永康在法庭上承認的罪行，與周永康被捕之後坊間流傳的滔天大罪比起來，大大縮水：此前，海內外流傳周永康家族貪腐數額高達九百多億人民幣，在判決書中列出的只有一億多人民幣；此前，最高人民法院指稱周永康涉嫌「從事非法組織活動」（拉幫結派、企圖推翻習近平），在判決書中卻消失得無影無蹤；民間

津津樂道的周永康親自策劃車禍害死結髮妻子的驚悚情節，也沒有出現在判決書中；原本人們認為最嚴重的洩密罪，洩密對象也從薄熙來變成一個跑江湖的氣功大師和算命先生曹永正（外媒報導，周永康把關於經濟政策變化以及人事安排的機密文件告訴曹，後者通過這些信息去發財、去蠱惑其他官員）。

高官究竟貪腐多大數額才會被處以極刑，中國法律中並無明確的量刑規定。判決或重或輕，不由公檢法系統說了算，全看製造「御案」的「今上」心思意念如何。江時代，全國人大副委員長成克杰，因貪腐四千一百萬元人民幣被判死刑。二〇〇〇年九月十四日上午，成克杰被帶到行刑室，執行注射死刑，成為第一個因經濟問題被處死刑的「副國級」領導人。

如果以成克杰的量刑標準而論，周永康公佈的貪腐數額接近成克杰三倍，既然成克杰被處死，那麼周永康足夠被處死三次，但周永康居然逃脫了死刑。此時此刻，在地獄中的成克杰眼巴巴地看到周永康被「刀下留人」，一定會死不瞑目、大聲喊冤。

那麼，周永康為何能逃脫死刑呢？習搞掉周，是周瑜打黃蓋，一個願打，一個願挨嗎？

原因有三。首先，周永康是中共政治局常委和政法委書記，是正國級領導人，地位遠高於任全國人大副委員長這一閒職的成克杰。習以反腐為號召，清洗掉周永康集團，突破了毛時代之後「刑不上政治局常委」的潛規則。即便如此，習不敢對曾坐在一張圓桌上開會的同僚大開殺戒—今日剃他人之頭，他日自己之頭也可能被他人所剃；反之，今日若放政敵一線生機，他日即便自己不幸敗北，至少也能保全首級。習為了給自己留一條退路，賜周永康以「不殺之恩」。

其次，周永康案牽連甚廣，若正本清源，必然涉及提拔其上位的、

周的後台老闆江澤民和曾慶紅。以今日習之實力，未必能同時將江之上海幫和胡之團派一網打盡；退一萬步說，即便習近平有力量拿下江和胡這兩名前任，也不敢輕舉妄動——若江、胡一起落馬，中共黨章中對江、胡的溢美之詞如何自圓其說？習自身的法統又從何而來？如此，中共自身的統治權威必將蕩然無存。這是習近平不願看到的後果。他只能點到為止，以周永康為涉案的最高層級官員，並與周達成以不牽連其他退休的黨國元老、換取免死金牌的契約。

第三，如果說這場世紀大審判的幕後導演是習近平，那麼周永康就是老當益壯的男一號。導演要讓男主角唯命是從，必須給男主角糖吃，將其哄得開開心心。習除了許諾輕判周永康家人之外，還要保全周本人一條性命。即便如此，習仍然害怕周不按照事先寫好的劇本演戲，萬一周像薄熙來那樣臨時翻供，豈不洩露更多黨國骯髒的機密？習寧願被世人詬病為「法治倒退」，此案也要閉門審理——於是，周不再有薄那樣有最後一場表演的機會，央視從容使用刪減和修補技術，將觀眾騙得如醉如痴。

二〇〇〇年，我在香港《開放》雜誌揭露時任四川省委書記的周永康在四川的種種惡行，算是第一個批判周的中國知識分子。此後，周成為權勢薰天的「政法沙皇」，他統領的秘密警察對我實施了監控、恐嚇、軟禁和酷刑。或許，在他眼中，他是大象，我是微不足道的螞蟻——他宣稱可以在一夜之間將包括我和劉曉波在內的數百名異議人士全部挖坑活埋。

如今，我在海外自由地寫作和生活，周永康卻成為終身囚徒。我在電視上看到周永康白髮蒼蒼、灰心喪氣的模樣，並不感到高興和欣慰——周永康的落馬並不意味著中國離法治國近了一步。一個周永康倒下，還有一打一打的周永康爭先恐後地替補而上。習近平清除了做為江澤民和

胡錦濤的打手的周永康，卻又挑選了做為自己的打手的王岐山和劉源。  
中國法治的崩壞並未停止。

## 習近平為何不放過令計劃？

令人們不快樂的原因不僅僅是邪惡和陰謀詭計，還有困惑和誤解；其中首要的原因就是，你沒有成功認識到其他人和你一樣。

—伊恩·麥克尤恩

二〇一四年冬至之夜，胡錦濤時代權傾天下的令計劃失去自由。至此，薄熙來、徐才厚、周永康、令計劃等「新四人幫」被一網打盡。想當年，令計劃陪同胡錦濤到福建視察，做為福建省長的習近平鞍前馬後、誠惶誠恐，新聞照片猶在，兩人的處境卻宛如隔世。

《人民日報》海外版發表評論文章，以「計劃總是趕不上變化」形容令計劃的落馬是意料中事，並以「關鍵字」指稱令計劃：「即便沒有傳說中的高衙內橫死攪局，還有背後那張利益交織紛繁複雜的家族圈子關係網，端的是剪不斷、理還亂。即便是曾經如日中天的關鍵字，又豈敢說在光天化日之下可以隻手遮日？」然而，令計劃的落馬並不意味著腐敗官僚的嚴冬降臨，正如日本《產經新聞》所質疑的那樣：「反腐運動為什麼都是江澤民率領的上海幫和共青團派的人下台，沒一個太子黨成員。被形容為『露骨地排除政敵』的強硬手段會引起黨內反彈，令計劃下台能鞏固習近平政權的看法為時尚早。」

令計劃的垮台，標誌著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第一階段取得完勝，也標誌著團派和秘書幫這兩大勢力土崩瓦解，在相當長的一段時期內不可能重新集結成挑戰習近平的力量。而令計劃在新四人幫中落馬最晚，此前

被「涼拌」整整兩年多，說明拿下令計劃比拿下其他三人更加棘手——儘管管令計劃在黨內的地位低於其他三人，卻比他們更接近權力核心。

政治評論家楊光對令計劃的比喻唯妙唯肖：被調離中辦主任和中央書記處書記的要職之後，令計劃不再是張牙舞爪的老虎，而是苟延殘喘的病貓。對於這隻已經無害的病貓，習近平為何一定要趕盡殺絕呢？分析習令兩人水火不容的矛盾，既可成為透視兩人性情與手腕的標本，更可深入晚近十多年來中共內部權力的運作與分割的隱秘世界。

## 令計劃破壞了什麼「政治規矩」？

令計劃被調查半年之後，中共中央在北戴河會議前夕宣佈將其開除黨籍、開除公職、逮捕法辦，其罪名比周永康還多。多年操縱北戴河會議的令計劃，再也不能到北戴河「擊楫中流」了。新華社發表評論文章指出，令計劃是「黨的健康肌體中的毒瘤」，令計劃的所作所為，完全背離了黨的性質和宗旨。「『道私者亂，道法者治』。令計劃案再次警示我們，黨紀紅線不可逾越，政治底線不可觸碰。」在令計劃的罪狀中，有一個醒目的新詞：破壞黨的「政治規矩」。

「政治規矩」這個詞語首次在官方文告中使用，帶有鮮明的習近平風格。英國作家喬治·歐威爾指出，所有的獨裁者都喜歡炮製一套術語，其表面意思與實質內涵相反。

以中共歷屆黨魁而論，毛的語錄和「老三篇」在文革中膾炙人口，毛善於使用「人民群眾喜聞樂見」的語彙，比起蔣介石及其文膽陳布雷、陶希聖那半文半白的文字來，更容易在宣傳戰中佔上風；至於鄧小平，則有「不管白貓黑貓，抓到老鼠就是好貓」及「摸著石頭過河」等

形象地表達其實用主義理念的名句；再後來，江澤民的「三個代表」和胡錦濤的「科學發展觀」是各自的座右銘，江的「修正主義」思路和胡的「工程師治國」風格呼之欲出。習近平掌權之後，「中國夢」、「三個自信」、「四個面向」、「七不講」、「砸鍋論」層出不窮，如今又拋出「政治規矩」，不僅要將令計劃置於死地，還要將這道緊箍咒戴在全黨全民頭上。

學者章立凡指出，「政治規矩」這個概念無非是指搞團團夥夥、搞非組織的政治活動、拉幫結派等，聽起來和「江湖規矩」有得一拼，是中共黨章和紀律規定中未明文列出，屬於「潛規則」和「不成文規則」，卻又客觀存在的東西。從這個用詞可以看出，中共執政已半個多世紀，骨子裡仍是「家規大於憲法」的「匪幫」。

中辦主任一職，在古代中國是大內總管，在美國類似白宮幕僚長，在台灣則堪比總統府秘書長。令計劃是胡錦濤的總書記辦公室主任和中辦主任，當然對胡一人忠心耿耿，不可能同時效忠當初還是王儲的習近平。習令之矛盾在當年就已埋下。

此次公佈的令計劃貪腐、包養情人等罪名，其實都不是罪名，或者說，幾乎所有中共高級官員都存在這些問題。令計劃真正的罪名，是破壞「政治規矩」，即不願接受習做為接班人的事實，試圖以某種「黨內民主」的方式重新洗牌，甚至自己搶先上位。

中辦主任權傾天下，最後往往能更上層樓、修成正果。中共建政以來一共有十一名中辦主任，成為正國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國家主席楊尚昆、政治局常委和中共中央副主席汪東興、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第一副總理姚依林、政治局常委胡啟立、政治局常委和人大委員長喬石、政治局常委和國務院總理溫家寶、政治局常委和國家副主席曾慶紅；而成為副國級「黨和國家領導人」的有：當過政治局委員並以政協

副主席身分退休的王兆國和王剛，以及現任中辦主任、政治局委員栗戰書。

其中，汪東興和胡啟立的情況稍稍特殊一些：汪東興在抓捕四人幫事件中立了大功，卻因支持華國鋒而遭鄧小平罷免，最後的職務是部長級的中顧委委員；胡啟立在趙紫陽時代貴為最年輕的政治局常委，被視為總書記的接班人，卻因為與趙紫陽一起反對六四屠殺而被老人幫罷免，九十年代初復出，由電子工業部副部長做到政協副主席退休。

中辦主任，又是「伴君如伴虎」的「高危職業」，即便將主子服侍得舒舒服服，也未必見容於下一屆主人。這就是和珅雖然能討得乾隆皇帝的歡心，在嘉慶皇帝繼位之後卻只能等死的根本原因。在中共的歷屆中辦主任中，楊尚昆為毛服務二十年，仍遭毛之整肅；汪東興、胡啟立、王兆國都曾淪為黨內鬥爭的失敗者，受過不同程度的批判、羞辱和貶斥，但最後總算平穩著陸。與之相比，下場最慘的是令計劃，不僅「因嫌烏紗小，致使鎖枷扛」，而且「覆巢之下，豈有完卵」——一家老小，死的死，抓的抓。與胡錦濤朝夕相處十年，卻換來如此下場，真個是「高處不勝寒」。

## 彼岸馬秘書熬成總統，此岸令秘書淪為囚徒

當年我就讀的北大中文系，出的秘書比作家和學者加起來還多。很多同學畢業後先去給省長、部長當秘書，再外放到基層擔任縣市首長，一路走來，「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可見，當秘書是「筆桿子」進入政壇的重要渠道，中共體制內一直有一個善於玩弄權謀的「秘書幫」。

一般而言，「秘書幫」比太子黨和團派更低調和隱蔽。這跟秘書這個工作所陶冶出來的性情和習慣有關。秘書通常躲藏在首長背後，即便有「以言論定乾坤」的才幹，也很少直接走上前台頤指氣使、發號施令。秘書一般擅長文字、精通權謀、人情練達、世事洞明，但該職位在既有的權力結構中「名不正、言不順」，他們通常只能狐假虎威，「挾天子以令諸侯」。如毛時代的陳伯達、江時代的曾慶紅，儘管權勢薰天，卻無法再進一步而黃袍加身。

不過，在台灣，卻有一個由秘書熬成總統的人物，即馬英九。馬英九每年率文武大員去慈湖祭拜兩蔣之靈位，並以擔任過蔣經國的英文秘書洋洋自得。當年，馬秘書在獨裁者面前畢恭畢敬、如履薄冰，奠定了在國民黨內脫穎而出的第一步。蔣經國統治晚期，蔣經國向來訪的美國《華盛頓郵報》發行人宣佈要在台灣解除解嚴之時，馬英九坐在兩人之間擔任英文翻譯，是這一歷史時刻的見證人。

馬英九親身經歷了晚近三十年來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在民選總統的職位上，對鞏固和深化民主意興闌珊，反倒對恢復威權模式和密室政治野心勃勃。有多少重大決策，是他與國安會秘書長「金小刀」在密室中謀劃的？總統府的各職能部門和行政院、立法院、監察院等，在此種操作之下，遂形同虛設。這種決策模式，深受馬的秘書生涯之影響。馬是以做秘書的心態當總統，金是以做總統的心態當秘書。難怪馬兩屆任期，島內怨聲載道。此為「秘書治國」之禍害。

而彼岸的令秘書，結局與馬秘書截然不同。在極權中國，權力交接是黑箱政治的產物，在中共黨內從未實行過黨魁的競爭性選舉。秘書們在權力交接時，便大有作為。在胡時代，令計劃做為大內總管，將胡服侍得舒舒服服，同時也在臥榻之旁，看到主人是中看不中用的繡花枕頭。既然像胡這樣的草包都能「奉天承運、皇帝詔曰」，令計劃自然產

生了覬覦大位的念頭。

那時的習近平，已被中央內定為接班人，但他那一副土老冒的模樣並不足以服眾。令計劃組建了官商結合的「山西會」，還支持成立「秘書協會」，既然羽翼豐滿，不妨問鼎大位。他瞞過黨內元老，在黨內搞了一次「民意測試」，得票高過習。有此「民意基礎」，總書記為什麼非得給習近平做呢？

百密一疏，兒子的一場突發車禍引發官場連環地震。習近平發出雷霆一擊，令秘書的皇帝夢折戟沉沙。不僅皇帝當不成，連秘書的位子也保不住，甚至像百歲老父當年告老還鄉的自由也沒有了。隨著令計劃的垮台，連帶他的心腹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局長霍克和中辦副主任王仲田等人也被查處，秘書幫灰飛煙滅。

同為秘書，命運不同。彼岸國民黨的馬秘書在民主體制下參加競選並當選總統，雖然治國乏術，卻也讓選民「吃一塹、長一智」，再也不投票給國民黨了。在中共極權體制下，黨內前輩曾慶紅由秘書熬成國家副主席，溫家寶由秘書熬成總理，無限風光；令計劃卻因鋒芒太露、野心太大，不明白「木秀於林，風必摧之」之道理，終於自毀前程，連老東家也救不了他。

令計劃這個精打細算的山西掌櫃，「一子之差、滿盤皆輸」。而流落海外的令完成，至多苟活，不可能實現「令計劃的計劃由令完成來完成」的使命。二〇一五年秋，習近平訪美，引渡令完成被列入與美方談判的重要內容。美方當然不會輕易放棄這塊從天上掉下的餡餅，但至少會給習近平一點面子，讓令完成在美國暫時隱身和消音。

奴才束手就擒，主人無動於衷？

令計劃垮台的原因，並非中共當局宣佈的「嚴重違紀」，乃是他試圖取習近平而代之，這是不可赦免的「僭越之罪」。

二〇一六年一月，中央文獻出版社正式出版了一本名為《習近平關於嚴明黨的紀律和規矩論述摘編》的小冊子，其中收入習近平一年前在中紀委全會上的講話，習嚴厲地指出：「從近年來查處的高級幹部嚴重違紀違法案件特別是周永康、薄熙來、徐才厚、令計劃、蘇榮等案件看，破壞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問題非常嚴重，務必引起重視。」習近平還說：「這些人權力越大、位置越重要，越不拿黨的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當回事兒，甚至到了肆無忌憚、膽大包天的地步！有的政治野心膨脹，為了一己私利或者小團體的利益，背著黨組織搞政治陰謀活動，搞破壞分裂黨的政治勾當！」對此，北京航空航天大學公共管理學院教授任建明評論說：「他們沒有公開使用『政變』這個詞，但從事『陰謀活動』、『破壞分裂黨』，其實就是政變活動，因為共產黨是執政黨。」可見，中共之內鬥已經到了你死我活、有你無我的地步。

「成王敗寇」是中共權力運作之「潛規則」，「老四人幫」之「粉碎」如一夜曇花，「新四人幫」的垮台也如煙消雲散。不為總書記，便為階下囚，令計劃畢竟曾經放手一搏，也算死而無憾。

令計劃垮台，中國老百姓拍手稱快。對於「人為刀俎，我為魚肉」的可憐百姓來說，所有權貴都是吸血鬼，沒有一個是好人。看群鬼內訌，是中國人在庸常生活中唯一的樂趣。美國人有白宮槍戰、總統出醜的美劇可看，中國人只需要看央視的「新聞聯播」和《人民日報》，就比美劇更加盪氣迴腸。

但是，奴才的垮台不足以撼動整個邪惡的體制。令計劃垮台後，很少有人追問，是誰提拔令計劃的呢？不正是胡錦濤嗎？周永康、徐才厚和郭伯雄垮台後，也很少有人追問，是誰提拔這幾個「國妖」的呢？不

正是江澤民嗎？那麼，江和胡該承擔什麼責任？

有什麼樣的主人，就有什麼樣的奴才。主人的品質、性情和興趣，決定了奴才的品質、性情和興趣。有嘉靖皇帝的縱容，才有嚴嵩的權傾一時；有乾隆皇帝的寵愛，才有和珅的富可敵國。希特勒身邊，永遠有戈林、戈培爾和希姆萊這「三劍客」；毛澤東身邊，始終有周恩來、康生和江青等左膀右臂。不是奴才特別壞，乃是主人本來就不是什麼好東西。

奴才是主子的鏡子。江澤民對曾慶紅、賈廷安等人言聽計從，胡錦濤則將令計劃視為心腹，如今習近平又讓栗戰書飛黃騰達。曾慶紅亮相天安門閱兵式，表明曾仍是太子黨的老大哥和不倒翁，他當年盡心盡力輔助的江澤民仍具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力；令計劃身敗名裂，則說明小吏後代根基淺薄、隨風而倒，更重要的是他輔助的胡錦濤早已失去話事權。那麼，如今追隨習近平鞍前馬後的栗戰書，未來的命運又將如何？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率領中南海衛隊前去周永康的住地，宣佈對其實施隔離審查，將「政法沙皇」驚嚇得癱倒在床上的，正是栗戰書。栗戰書的職位，與令計劃一樣，都是「參知政事」的「中辦主任」。狗還是同一類的狗，只是各為其主。

令秘書之後，江時代的大秘賈廷安亦成為呼之欲出的大老虎。從來打狗都是給主人看的，嘉慶非得要等老爸乾隆駕崩之後，才敢對和珅下手，遂有「和珅跌倒，嘉慶吃飽」之說；如今，習不是江和胡的親兒子，不等江和胡去見馬克思，就對他們的寵臣大打出手。

面對新一輪的血雨腥風，令計劃拿不出自救的計劃，賈廷安無法讓朝廷保有安寧，而心中最痛的，自然是江澤民和胡錦濤。

此時此刻，栗戰書意氣風發，恐怕不會有物傷其類的同情心；習近平胸有成竹，恐怕不會有水月鏡花的虛無感。

然而，聖經中說，已有的事，後必再有，已行之事，後必再行，日光之下，並無新事。我們且聽下回分解。

## 埋葬你之人的腳，已到門口

幾乎任何擁有無限權力的人都會變成暴君，縱使最溫文爾雅的人也有可能成為尼祿式的暴君。

—奧爾德里奇

二〇一三年以來，習近平掀起的反腐運動，堪稱六四學運被鎮壓、以趙紫陽為代表的改革派失勢之後中共體制內最大規模的政治清洗，江澤民鬥垮北京的陳希同、胡溫鬥垮上海的陳良宇根本無法與之相比。中共官媒對習式反腐讚不絕口，竭力營造「天下歸心、萬眾擁戴」的輿論氛圍。當局還動用大小外宣機器，在海外大肆吹捧習是「一代明君、世界救星」，除了一群拿錢說話的「洋五毛」之外，還有不少行走於中國內外、兩岸三地的「疑似五毛」為之搖旗吶喊。

以「民主小販」自詡的網路政治評論家楊恆均，自習近平一登基，即撰文擁戴，等到習式反腐逐漸暴露出權力鬥爭本質之時，又不失時機地在海外媒體發表〈習、王反腐到底動了誰的乳酪？〉之類的文字，為習近平塗脂抹粉：「我支持反腐，是因為這屆政府利用反腐開始著手限制官員手中的權力時，各項旨在推行更健全市場化的改革措施接二連三出台；我支持反腐，是發現在中國現有條件下，強力反腐也是啟動深水區改革與社會轉型必不可少的。」難道楊恆均真不知道習近平上台後抓捕了上千名要求民主自由的公民，以阻止制度性反腐的實現？楊氏不是智商太低，而是心機太深—既然負有特別的使命，當然就要不顧事實和

真相，從頭到腳地吹捧習。楊恆均聲稱：「反腐是民心所向，反對反腐的只是少數貪腐分子而已，這恐怕是多年來大家的共識吧？可一旦這屆政府要玩真的，要『刮骨療毒』，卻有越來越多人從當初的激動不已到不適應，最終開始生出些許的不安與反感。」楊氏並未經全民授權，自以為是地代表「民心所向」和社會共識。他使用一種偷梁換柱計的混帳邏輯阻止人們對習式反腐的置疑：如果你置疑這場偉大的反腐運動，你就是腐敗分子的同路人和獲利者。

面對中共一浪高過一浪的宣傳攻勢，面對楊恆均之類「小罵大幫忙」的形象設計師的精心化妝，如何才能識破習式反腐的真相？

## 「選擇性反腐」中的「好人」與「壞人」

二〇一五年一月的中紀委全會，習近平親自出席並發表講話。習指出，反腐鬥爭要繼續保持高壓態勢，不定指標，上不封頂，除惡必盡。習近平聲色俱厲，簡直要掀翻牌桌，讓官員們沒有好日子過了。

但是，隨著一個個貪官落馬，民眾對反腐大戲逐漸產生審美疲勞。越來越多的人開始質疑：為什麼倒楣的官員中沒有一個是太子黨成員（薄熙來是在胡錦濤執政末期垮台的，因為王立軍遁入美國駐成都領事館，洩露薄熙來的若干秘密，成為國際重大新聞，中共紙包不住火，才將薄熙來拿下。而薄與習存在競爭關係，習也樂於看到薄落馬，在政局常委會是否拿下薄的表決中投下贊成票）？為什麼習不敢公佈自己及其家族的財產狀況？

作家慕容雪村在一篇題為〈習近平有選擇性的懲罰〉的文章中指出，習近平的反腐更多是一種史達林式的黨內清洗，而不是對陽光政治

的追求。他的反腐依照的主要是共產黨的章程，而非法律。執行反腐任務的也大多是克格勃式的黨官，而非執法者。幾乎所有反腐案件都禁止記者介入，媒體只能在案件公開後發表幾乎完全雷同的統一文稿。最重要的是，到目前為止，習近平的反腐基本只針對特定的黨內派別，而對那些支持他、效忠他的派別，則少有觸及。

習近平如何選擇反腐運動中的打擊對象？習認為，「非我族類，其心必異」，那些對他懷有二心的人物就是「壞人」，甚至是「非人」。在反腐運動中，習用「老虎」和「蒼蠅」兩種動物形容因腐敗落馬的高級官員和中層、基層官員。既然是「非人」，是「老虎」和「蒼蠅」，無論用什麼方式對待都不為過。美國學者大衛·史密斯在《非人：為什麼我們會貶低、奴役、傷害他人》一書中指出，對「壞人」進行「非人化」的處理，構成了現代社會各種有組織反人類暴力行為的正當化機制。這也是習近平反腐運動中加以利用的一種思維模式。

反之，習近平大力提拔「好人」，即對其個人忠心的官員。習近平跟高級官員之間仍然是一種人身依附關係。習近平最重要的支持者是「紅二代」（包括「紅三代」），即共產黨創始人的後代，習近平本人是其中之一。「紅二代」（或「紅三代」）有一個大致的定義，就是他們的父輩（或祖輩）在中共建政之初至少是黨的中央委員、政府部長、央企領導人和軍隊少將以上級別。誰是「紅二代」、誰不是「紅二代」，圈內圈外一目了然：比如，令計劃的老爸當年是投奔延安的一名醫生，也算是「老革命」，但夠不上這個級別，所以令計劃被「紅二代」排斥和蔑視，命中注定被清洗。在中國，「紅二代」或「太子黨」這個特殊群體享有難以想像的權力和資源，很少被反腐風暴所波及。

「壞人」與「好人」的二分法，在毫無法治的毛時代是中共權力鬥爭不二法門。昨天你還是萬民稱頌的「好人」，但今天毛說你是「壞

人」，你立刻就成如同「牛鬼蛇神」般的「壞人」——國防部長彭德懷、國家主席劉少奇、黨的總書記鄧小平、副統帥兼接班人林彪……這些顯赫一時的人物，都遭致由「好人」變成「壞人」的下場，不是他們本人變了，而是毛對他們的看法改變了。習企圖承襲毛的權威，掌握「好人」與「壞人」的命名權。美國前負責東亞事務助理國務卿、曾任駐華大使的洛德（Winston Lord）認為，習「正在恢復毛時代的一些最壞的做法」。習本人可歸入「太子黨」，習打掉屬於其他派系的官員，對團派、上海幫下手，「在對誰下手的問題上他是有選擇的，因為幾乎人人都貪」。習的反貪沿用的仍是毛時代「恐嚇、擺樣子的審判」，以及在電視上強迫坦白等手段，這場反腐運動是「恢復通往毛時代的那條最壞的途徑」。

習近平的選擇性反腐，跟薄熙來的「唱紅打黑」如出一轍。如果薄在權力鬥爭中戰勝習，也會使用類似手段在中央層面掀起反腐運動。習和薄在骨子裡是一樣的，正如洛德所說，習「儘管打掉了一些可能是貪腐的官員，但卻是使用不公正、不透明的方式進行的，這再次顯示了在中國沒有真正的法治」。此前，為薄熙來垮台而歡呼雀躍的某些自由派知識分子和民眾，轉眼就發現自己高興得太早了。習近平對民主自由價值的仇恨，並不亞於薄熙來。

如此，就可以回答「習式反腐的本質是什麼」這個問題了。習式反腐是「選擇性反腐」而不是「制度性反腐」，它並非中國走向民主、法治社會的起點，而是中國回頭向毛時代看齊的轉折點。被習鏟除的官員當然都是「壞人」，但並不意味著習近平及其同僚就是「好人」，以及習所用的手段符合民主和法治的原則。

## 福建省長落馬仍是黑幫內鬥的延續

北京時間二〇一五年十月七日晚上十一點三十分，中紀委網站發佈了福建省委副書記、省長蘇樹林因涉嫌嚴重違紀接受調查的消息。中紀委選擇在深夜公佈這個消息，顯然有其特殊的用意。隨即，福建省委連夜召開常委緊急會議，通報中央的決定，除了不在場的蘇樹林之外的所有常委無一例外地對此決定表示「堅決擁護」——他們或許忘了二〇一一年蘇樹林走馬上任時，他們也同樣「堅決擁護」。而當時中組部領導在宣佈蘇樹林上任決定時表示：「蘇樹林長期在大型企業工作，也有地方領導經歷，他熟悉現代企業管理和經營工作。其政治堅定、大局觀念強，思想解放、思路清晰、視野開闊，開拓創新精神強，有比較強的組織領導能力。」如今重新找出這段評語來閱讀，堪稱對中共的人才選拔機制的最大諷刺。

蘇樹林落馬，似乎打破了習近平曾任職的福建、浙江和上海三地沒有正省級「老虎」被打的說法。此前，海外媒體和中國國內民間輿論都認為，與那些垮台官員被「選擇性反腐」相對應，這三地的官員都受到習的「選擇性保護」。做為沿海經濟發達地區的福建、浙江和上海，吏治不可能比其他省分更清廉，而近年來被反腐運動拉下馬的高官卻極少。比如，浙江現任省委書記夏寶龍，以暴力拆毀教堂和迫害基督徒，在國際上聲名狼藉，其家族的腐敗情況在海外媒體上屢有披露。習偏要重用此「猛人」，夏氏不僅不會被查處，反倒可能更上層樓。又比如，上海浦東的新年集會發生數十人被踐踏致死的重大安全事故，上海高層卻無人被問責並查處——與其說習給江面子，不如說習不願揭開他任職上海時就緊緊捂住的蓋子。

蘇樹林倒台，並不能說明習近平敢於「揮淚斬馬謖」，習的反腐

「毫無私心」。蘇樹林雖然擔任習近平曾擔任過的福建省長之職，但他不是習的嫡系，而屬於周永康曾控制的石油幫。蘇樹林長期在石油系統工作，曾任中石油副總經理、中石化總經理及黨組書記等職，是二〇一三年以來繼蔣潔敏、周永康、廖永遠、王天普後第五位落馬的「兩桶油」原總經理。

蘇樹林在石油系統與蔣潔敏爭權失利，於二〇一一年外調福建，另謀發展。這一職務變動，出自周永康的安排，而並非習近平之欽點。儘管當時習已是儲君，但正處於韜光養晦階段，刻意不對地方大員的人事安排發表意見，以免激起敵對派系反彈，導致接班出現危機。即便他長期任職的福建落入敵對派系囊中，也隱忍不發，直到如今才發出致命一擊。

據「財新網」報導，周永康被調查後，有關部門曾找蘇樹林談話。在蘇樹林任內，中石化在安哥拉投資一百億美元開採油田，後來發現報批程式違規、投資出現巨大虧損。蘇還幫助其親屬的公司獲得中石化位於海南洋浦的一個油庫工程項目。蘇樹林的妻子在香港旅遊和購物的費用，由中石化（香港）公司公款支付。如果這些問題出現在習近平的嫡系人馬身上，當然都不是問題；但是，既然蘇樹林「來路不正」，習近平就要「小題大作」。蘇樹林早在二〇〇二年時，年僅四十歲就躋身候補中央委員的行列，是石油幫精心扶持的明日之星。九年之後外放福建，是石油幫佈置的一個關鍵棋子，讓其由地方諸侯進軍中樞，捍衛石油幫的利益。習不能容忍此人成為「漏網之魚」並「修成正果」，甚至以後為石油幫「平反昭雪」。

另外，蘇樹林出身普通農民家庭，父親在其十四歲時病故，由母親帶著兄妹七人艱難度日。蘇樹林曾在一次演講中自述自己從小學四年級開始，就每天早起拾糞的經歷。上大學時，他常常吃玉米麵發糕就鹹

菜、開水。其早年困苦的經歷，與周永康、徐才厚、郭伯雄等人如出一轍，他們從金字塔的最底層攀爬到上層，付出了比太子黨多若干倍的艱辛、血汗以及陰謀詭計。耐人尋味的是，在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中落馬的高官，幾乎全都是平民子弟，而沒有一個是太子黨。日本媒體《外交學者》評論說：「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使得數千貪官污吏倒台，他卻沒有打算建立一個體制，以防止將來的腐敗，也沒有打算將他和他的親信的權力置於公共監督之下。」可見，習的反腐運動的目的是強化共產黨的獨裁統治，而不是將權力無邊的共產黨收納到民主和法治的框架之下。

## 集權式反腐的本質是政治清洗

回溯中共最高領導人的統治模式，毛澤東曾親筆起草《工作方法六十條》，提出中共的領導原則：「大權獨攬，小權分散。黨委決定，各方去辦。」毛死後，無人能像毛那樣大權獨攬，鄧小平時代是「八老治國」，鄧在重大事件上至少需要徵求陳雲的意見。江澤民和胡錦濤的權威更加有限，勉強算是在董事會中佔據較大股份的董事長。誰也沒有料到，此前不顯山、不露水的習近平，上台僅兩年多就完成權力高度集中。在這一屆政治局常委會上，其他常委不再享有平等的發言權，只能畢恭畢敬地向習「匯報工作」。

習近平的反腐，目標指向集權，而不是分權。旅法政治評論家張倫指出：「對於一個缺乏政治合法性資源，靠各種我們迄今也不全然清楚的選拔機制上位的新領導人，反腐不僅是社會穩定和清明政治、獲取社會認可之所需，更是一個樹立權威打擊政敵幾乎是必然要借用的利器。」習以反腐為突破口，「項莊舞劍，意在沛公」，一方面震懾退休

的元老——你們不要再干涉時政了，否則即便是「鐵帽子親王」，我也會動手收拾你。江和胡的干政空間大大收縮，眼睜睜地看著昔日的親信成為反腐對象。另一方面恐嚇政治局常委會的同僚——你們必須乖乖臣服，以保全各自家族聚斂的財富，否則我隨時讓你們吐出來。在「習王體制」治下，包括總理李克強在內的其他五名常委，迅速「花瓶化」。

習近平在講話中炫耀「打鐵還需自身硬」，但他從未直接回應美國彭博新聞社、《紐約時報》披露其家族富可敵國的事實。習近平召集家庭會議，命令家人退出商界的報導，僅僅流傳在一些被「餵料」的海外中文媒體上，從未被中共官方媒體證實。

為安撫反腐運動中「官不聊生」的公務員階層，習一手大棒，一手胡蘿蔔，出台了公務員加薪方案。加薪範圍從國家最高領導人到最基層的一線公務員，有的加薪幅度超過百分之百，習本人的基本工資從人民幣七千多元增加到一萬一千多元，增幅達六成——但這個工資水準仍不足以支付他女兒在哈佛的學費，昂貴的學費從何而來？這在中國是一個天問。沒有法治之保障，習不可能做到新加坡式的「高薪養廉」。在中國經濟下行、大學生失業率居高不下、普通民眾生活困頓之時，公務員這一特權階層單獨加薪，必定引起社會各界強烈反彈。連《環球時報》也承認：

「以往確有不少公務員灰色收入豐厚，而且公務員在住房、醫療以至子女入學等方面往往有更優惠的解決條件。這一切讓公眾普遍相信公務員的福利有相當一部分是『隱性的』。」

詩人史蒂文生（Stevenson）說過，「忠言逆耳，無人願聞」，但是，人們必須聽取慕容雪村的分析：「當習近平全面打壓中國的言論自由，當他的宣傳機器不遺餘力地吹捧他的英明神武，當他把那些正直的異議之士一一送入監牢，可以斷定，習近平無心開創中國的民主之路，

他只是一個新時代的大獨裁者。」習近平不是在帶領中國走向民主與法治的正道，而是拉著中國走回頭路。今日興高采烈地看他人的屍體被抬走，卻不知道埋葬自己之人的腳已站到門口。

## 中央不能「妄議」，「今上」不可冒犯

容許空氣中充滿不和諧的聲音，不是軟弱的表現，而是力量的象徵。

—約翰·哈倫

習近平在中央全會上點名批判周永康與令計劃等「國妖」，數算黨內「任人唯親」、「尾大不掉」、「妄議中央」等現象，誓言整頓和清除之。二〇一五年十月，中共中央頒佈「史上最嚴厲的黨紀」—《廉潔準則》和《處分條例》，將習強調的「政治規矩」明確列入，包括「不可妄議中央大政方針」和「破壞黨的集中統一」，適用範圍亦由「領導幹部」擴大至全黨約八千八百萬黨員。「妄議」中央者，輕則黨紀處分，重則開除黨籍。

誰是第一個因「妄議中央」而被懲罰的祭旗者？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一日，新疆紀委、監察廳發佈消息稱，《新疆日報》原黨委書記、總編輯、副社長趙新尉「嚴重違紀」，開除其黨籍、公職，收繳其違紀所得財物，並移送至司法機關處理。在通告中，首次使用「妄議中央」的表述。

胡錦濤時代，每當政治局常委會就某項政策出現意見分歧之時，胡議而不決、長期擱置，寧可無所作為，也不讓分歧激化，破壞刻意營造的「九人（或七人）集體」一派和氣的假象。習近平則當機立斷、獨斷專行，不容旁人七嘴八舌、說三道四。所謂不能「妄議」中央，其實就

是不能「妄議」代表中央的習本人。習是黨唯一的代表，反對習近平就是反黨—這是毛時代的一條黨內「潛規則」，如今又死灰復燃。

## 中共黨史上「妄議中央」的悲劇性人物

回顧中共血跡斑斑的歷史，中央從來都不能「妄議」嗎？

中共的歷史儼然就是一部成王敗寇的爛污史。毛澤東曾直白地宣稱，奪權和掌權全靠槍桿子和筆桿子，而筆桿子是槍桿子的附庸—如果拿槍的人用槍指著你的頭，拿筆的人還敢不乖乖聽話，戰戰兢兢地充當槍桿子的留聲機？

中共奪取天下遵循此一原則，中共內部鬥爭也遵循此一原則。誰掌握軍警大權，誰就以中央自居，擁有懲惡揚善之權柄。當年，毛澤東一旦獲得幾個手握重兵的軍頭的支持，就能掀翻由共產國際在背後撐腰的黨中央，將秦邦憲、張聞天等幾個名正言順的總書記驅逐下台，並給他們扣上「錯誤路線」的高帽子。從遵義會議到延安整風，毛澤東一步步奠定了在黨內說一不二的獨裁地位，進而化身為中央的代言人。誰批評毛本人，就是反對中央。

不過，中共建政之後，黨內至少出現過三個「妄議中央」的人物。

第一個是習近平的老爸習仲勳。習仲勳不屬於毛的嫡系，毛還沒有到延安，習仲勳與劉志丹就已佔山為王。習仲勳促成小說《劉志丹》的出版，觸犯毛之大忌—毛佔據延安，玩弄的是《水滸傳》中林冲火拼王倫的那套把戲。中共建政後，毛最不願聽到的就是劉志丹這個名字。做為副總理且在文宣方面有一定權力的習仲勳，偏偏要為劉志丹樹碑立傳，這不是哪壺不開提哪壺嗎？毛怒火中燒，定下「利用小說反黨，也

是一大發明」的罪名，將習仲勳打入天牢，囚禁十七年。由此，才有習近平少年時代的飛來橫禍、淪落街頭。

第二個是「橫刀立馬」的「彭大將軍」彭德懷。五〇年代末，毛掀起大躍進，造成大飢荒。彭德懷下鄉調研，發現「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之慘象，給毛上萬言書，勸誡其改變政策、善待百姓。老毛早已南面稱孤，豈能容忍「妄議中央」？即便彭在朝鮮戰場出生入死，也不能「逆龍鱗」。

在廬山會議上，毛對彭破口大罵，並威脅說，如果軍隊跟彭走，他就要重新上井岡山打游擊。與會高官大驚失色，立即對毛表達忠心，對彭則污言穢語、鋪天蓋地。隨後，彭德懷等人被打成「反黨集團」，剝奪自由、嚴加看管。直至文革潮起，「死老虎」彭德懷又被紅衛兵綁架批鬥、凌虐致死。

第三個是八十年代的悲劇改革家趙紫陽。趙紫陽因反對鄧小平等「老人幫」悍然動用軍隊鎮壓學生運動，被鄧小平在家召集的元老會議非法罷免總書記之職，乃至軟禁至死。死後十多年，骨灰仍不能入土為安。六四屠殺之後，鄧小平主導的中央全會給趙紫陽強加「分裂中央」之罪名。此罪名真是滑天下之大稽：既然趙紫陽是黨的總書記，是黨的最高領袖，他為什麼還要「分裂中央」呢？那時，鄧小平只是一名普通黨員，連中央委員都不是，按照黨章無權參與黨國重大決策。鄧小平才是「分裂中央」的罪魁禍首。但鄧小平手上牢牢掌握著軍權，既然軍隊聽他的，中央就成了他的手中玩物。

從中共黨史中看出，「妄議」中央、冒犯「當家的」之下場，就是名聲掃地、家破人亡。習近平從老爸的慘劇中汲取教訓，不是設立制度保護像老爸那樣的耿直之士，而是將「不可妄議中央」寫入黨員守則。

## 不能「妄議」的中央，一定就是賊窩

鄧小平駕崩之後，黨內缺乏魅力型領袖、黨魁只是「維持會會長」。江澤民和胡錦濤兩朝，有少數高層智囊奉命考察和研究社會民主黨執政的北歐國家的政治模式，試圖促成共產黨由革命黨變成執政黨，甚至改名為社會民主黨，該思路卻未能被黨內當權派採納。到了習近平時代，這種想法更顯大逆不道—習不能接受社會民主主義理論，他要讓共產黨回歸百分之百的列寧式政黨：全黨服從中央，中央服從領袖，此為「民主集中制原則」。

不可「妄議」中央之警告，顯示習近平不僅要大大收緊社會輿論，還要在黨內進一步集權。對那些喜歡發表異見的黨外人士，以「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擾亂社會治安」等罪名恐嚇之，甚至將他們關進監獄；對那些心懷不軌的黨內同僚，則以「妄議中央」為名讓其閉嘴，徹底取消原本就十分有限的「黨內民主」。習心目中的中國，是一個中央集權、領袖最大的國度，是一個上行下效、令行禁止、中央對每個鄉村都能指揮若定的國度，宛如納粹紐倫堡大會上整齊劃一的方陣，宛如北韓「阿里郎」大型演出時百川歸海的場景。

那麼，如何才能讓「一盤散沙」的中國「聚沙成塔」呢？第一步當然就是削弱地方的權力，將權力收歸中央。經過此前三十年的改革開放和有限的經濟自由化政策，毛時代剛性的中央集權體制逐漸融化，很多權力靜悄悄地向地方下沉。在胡錦濤時代，北京的寡頭們常常有「政令不出中南海」的感嘆，比如上海市委書記陳良宇就公然反對溫家寶的經濟政策，雖然陳良宇後來被拿下，但地方的桀驁不馴始終未被壓服。這就跟清代末年的情形一樣：經過太平天國運動的衝擊，鎮壓了太平天國的地方諸侯順勢而起、不聽命令，義和團運動時南方督撫甚至自行實施

「東南互保」。而習近平的「削藩」之舉，跟清朝的王公貴族們試圖重建中央權威、連立憲改革也被扭曲為推出「皇族內閣」一般，看似絕頂聰明，實則為自尋死路。

中國的民主轉型，在國家結構上，必須解體中央集權的大一統模式，完成聯邦或邦聯的變革。在中央與地方的關係上，是彼此分權和制衡，而非中央獨大且永遠光榮、偉大、正確。在實行聯邦制的美國，地方政府可以置疑、批評甚至拒絕執行聯邦政府的某些政策。比如，很多州拒絕實行歐巴馬的醫療保險方案，也有多個州聯合向法院狀告歐巴馬宣佈的移民改革方案違憲。這些州的長官和民眾不擔心受到歐巴馬及聯邦政府打擊和報復。正如雷根總統所說，權力是由公民授予地方政府，然後由地方政府授予聯邦政府，而非相反。是人民締造了聯邦政府，而不是聯邦政府天生擁有宰制人民的權力。以習近平有限的政治知識，只能在中央集權的怪圈內「鬼打牆」，死守中央不能「妄議」之準則。

只有當人人都有權且積極地「妄議」中央，政府才不會走向獨裁。美國最高法院布蘭代爾大法官在「惠特尼訴加利福尼亞州案」的判詞中寫道：「國家的終極目的，是協助人們自由、全面地發展；在政府內部，民主協商的力量，應超過獨裁專斷的權力。……自由思考，暢所欲言，是探索和傳播政治真理不可或缺的途徑。如果沒有言論自由和集會自由，所謂理性協商就是一句空話。」習近平肯定沒有讀過這段判詞。

## 不能「妄議」的領袖，必定就是暴君

中共宛如專制王朝，黨魁近乎皇帝。習近平喜歡向傳統文化尋求治國智慧，常引用古代典籍，既顯示學識淵博，也教導手下百官。但他讀

的偏偏是傳統文化中的糟粕，如《韓非子》、如《弟子規》之類的無法完成「現代轉化」的垃圾。當習宣稱黨內各級官員不可「妄議中央」時，他卻忘記了《國語》中的那句話——「為川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

習近平執意以歷代暴君為師，將文字獄進行到底。中國最值得自豪的「世界之最」就是文字獄，習可以仿效的先輩數也數不清：司馬遷因替李陵辯護，被漢武帝下令處以宮刑；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因《報孫會宗書》令「宣帝見而惡之」，以大逆不道的罪名判處腰斬；嵇康因寫作《與山巨源絕交書》令司馬師「聞而惡之」，被斬於東市；文豪蘇軾作詩被指「包藏禍心，謗訕時政」，入獄五個月，貶官千里；金國翰林學士張鈞因一場天災為金熙宗起草「深自貶損」的詔書，遭誣陷而被劈開嘴巴、剝成肉醬。

明清兩代的文字獄更層出不窮。明初洪武年間，有老百姓因私下議論政治話題被滿門抄斬。東廠、西廠等特務機構，不僅監視四方百姓，也監控朝廷百官。特務政治營造出恐怖氣氛，敗壞了社會風氣，加速了明王朝的覆滅。到了清朝，因為是異族入主中原，統治者疑神疑鬼、咬文嚼字，正如李祖陶所說：「今之文人，一涉筆唯恐觸礙於天下國家，……人情望風覘景，畏避太甚。見鱗而以為蛇，遇鼠而以為虎，消剛正之氣，長柔媚之風，此於世道人心，實有關係。」直到清末，慈禧太后還掀起「蘇報案」，甚至殺害揭露簽署《中俄密約》內幕的記者沈蓋。然而，無論文字獄如何酷烈，亦無法挽救清王朝之窮途末路。

習近平剛上台時，滿口民主、法治，欺騙了不少民眾和知識分子。誰知，第一屆任期尚未過去，習的猙獰面目便原形畢露。一個害怕民眾議論和批評、竭力打壓言論自由、視言論自由為天敵的統治者，怎麼可能是民主和法治的信仰者和支持者？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八日，湖南公民彭佩玉撰寫〈討習檄文〉提供給海外的博訊網發表。文章以古文寫成，對習近平提出嚴厲批評，鞭辟入裡、窮形盡相。文章寫道：「今以嘴歪眼窄之輩，德缺智障之徒，猶睥睨自顧，竊國以盜。語無倫次，先有紅色江山，後曰破鞋合腳，繼以吃飯砸鍋，又申政治規矩。……前拘劉公，後羈許君，外假屁股之崛起，內分權力之贓市，護院家丁，傷人於無法，鷹犬打手，招搖而過市，假神聖之愛，掩埋民怨，煽動民粹，賦衙門之威。緹騎廠衛，絕滅人性，衙役僕作，強姦人權，監視人間，禍害自由，不法之能事，偽法博士者流所奉爾。」文章最後預言了習近平終將眾叛親離、走投無路：「民之不可以愚，猶父母之不可以欺也。習某欺世弄權，末世作法，又豈知自由不可以欺耶！吾輩草民子息，謹奉以歪脖子樹，以待他年論其醜態百出之世也！」結果，三天之後，彭佩玉就在其工作的無錫新仁科技公司內被警方帶走，關押了將近一個月才被「取保候審」。

不能被「妄議」的領袖，就是暴君；沒有「妄議權」的民眾，就是奴隸。「妄議」是言論自由的一部分，言論自由包括公民對政府和權力部門的監督與批評。在民主和法治國家，無論官員還是民眾，都可以「妄議領袖」，且享有憲法和法律所保障的「免於恐懼的自由」。

關了彭佩玉，還有後來人。今天的中國不再是北韓那樣的孤島，民智漸開，人心思變。國際人權組織「自由之家」發表報告指出，習近平對異議人士的鎮壓越來越嚴厲，但人民對政權的恐懼卻在減少，公民的維權行動不斷加強，他們通過社交網站等新媒體組織維權活動。報告認為，中共政權現在貌似強大，但背後危機四伏。我也深信，未來中國的主人是彭佩玉這樣心靈自由、勇氣非凡的公民，而不是習近平這樣「視民若無，弄臣有術」的暴君。

## 如果妄議中國，「就只能車毀人亡」

習近平不僅要讓全黨下跪，更要讓洋人閉嘴。他以為腰包鼓鼓，便要強迫全世界接受他的「政治規矩」。習近平訪問英國前夕，中國駐英大使劉曉明說，如果有人有在習近平訪問期間強提中國人權問題，習近平將會覺得「不受尊重」。

網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一個網友評論說：「殺氣騰騰，是不是找錯了地方？」還有網友評論說：「大度一點，人權有問題，人家問一問，也是一種尊重。」

黨員不可「妄議」中央，洋人不可「妄議」中國。習近平早就做過這樣的宣示：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十二日，習近平和來訪的美國總統歐巴馬聯合召開記者會。當被問及是否會放寬外國記者的簽證條件時，習近平一開始顯得相當不耐煩，之後才回答說：「一輛車如果拋錨，我們都要下車檢查哪兒出了毛病。中國人有句老話說，解鈴還須繫鈴人。」

這句話一點也不幽默，幽默不是搜腸刮肚地製造出來的。但它傳遞的訊息非常清楚：你們的麻煩是自找的，你們正在因為造成不利影響或引發爭議的報導遭受懲罰，但你們可以通過改變報導的方式和內容來解決拿不到簽證的問題。

仔細一推敲，這個比喻在邏輯上是錯亂的。習近平這個貨不真、價不實的假博士，缺乏基本的邏輯訓練。導致汽車拋錨的原因很多，未必是汽車本身的問題。若是行駛在一條坑坑窪窪的爛路上，無論品質多麼優良的汽車，都有可能遭遇拋錨的厄運。當年，末代皇帝溥儀想在紫禁城裡騎腳踏車，卻因為到處都是高高的門檻，只好放棄。

其實，有些爛路上的坑坑窪窪，是人故意挖的，有人偏偏就要劃地為牢，不讓汽車飛奔而過。前輩作家王鼎鈞在回憶錄《關山奪路》中寫

到國共內戰的場景，做為親歷者，他發現共產黨是打游擊的天才。當時，共產黨徵集農家耕種用的「耙」擺在公路上，「耙」的形狀像梯子，釘滿了鋼打的長釘，它本來的功用是劃破土塊以便耕種。幾百把「耙」反過來，針尖向上，公路就變成刀山，軍用卡車不能前進，幾十輛卡車編成的車隊，一時又怎麼後退？只有任憑共產黨游擊隊把糧彈搬運一空。這個「釘板陣」，莫言在小說中將它放在山東對日抗戰的歷史情境中，並對共產黨的聰明智慧歌功頌德。但王鼎鈞糾正說，抗戰時期共產黨從未用過這個奇特的戰術，恐怕這是中共的秘密武器，專門留到內戰時使用。中國軍隊，向來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屠殺同胞最拿手。

習近平的父親習仲勳，是西北共產黨游擊戰專家，不會不知道「釘板陣」這一戰術。子承父業，習活學活用：中國豈能由洋人說三道四，等我放上密密麻麻、寒光閃閃的「耙」，讓你們人仰馬翻。那時，我再嘲諷說，是你們的汽車品質不佳或駕駛技術不行。倘若不入鄉隨俗，就活該倒楣。習的歪理邪說很清楚：替中國政府說好話、唱讚歌的外國記者，鼓掌歡迎、多多益善，絕對不會遇到簽證問題；揭露中國政府的陰暗面、或者支持中國異議人士的外國記者，敬謝不敏、一個也不放進來。

對於習近平在記者會上的這番風涼話，《紐約時報》正面回應說：「要求記者為迎合政府改變報導內容，只是保護了權貴和那些有不可告人之處的人。一個自信的、認為自己是世界領袖的政權，應該具備應對真實的審視和批判的能力。」然而，在習心目中，中國就是一條爛路，不僅不願正視自己的爛，反倒要指責汽車為何拋錨。

習近平可以用恐怖的力量暫時壓制海內外人士對他和他的政權的「妄議」，但他無法躲開人們在他還沒有死去的時候就給他的謚號：他

只配獲得「習煬帝」之諡號，因為「好內遠禮曰煬，去禮遠眾曰煬，逆天虐民曰煬，好大殆政曰煬，薄情寡義曰煬，離德荒國曰煬」。

## 《南方周末》向習近平繳納投名狀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出版的《南方周末》，發表了一篇一萬三千餘字的長篇特寫報導〈習近平改革這三年〉，首次披露習近平剛上台時赴南方考察的諸多細節。

這篇報導在海外未引起足夠的注意，但它釋放出一個標誌性的信號：做為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發展壯大的所謂「體制內的市場化、自由派媒體」的領頭羊，《南方周末》自己敲響了自己的喪鐘。在習近平新極權主義露出猙獰面目之際，《南方周末》以這篇長文做為給習近平的投名狀，義無反顧地投入「黨麻麻」溫暖的懷抱，日後將迅速「人民日報化」或「環球時報化」。

這篇報導當然也塞入少許《南方周末》的「私貨」：藉著渲染當初被中央級媒體低調報導的習近平的南方之行，在如今個人崇拜油煎鼎沸之時，要把一盤剩飯做成電影《食神》中色香味俱全的蛋炒飯。

於是，習近平的「南巡」似乎成了鄧小平一九九二年「南巡」的翻版—這篇報導特別披露了一個耐人尋味的細節：習近平專門召集一九九二年陪同鄧小平「南巡」的四名退休官員會面，並一起向鄧小平塑像獻花圈。其中，包括當時的廣東省委副秘書長陳開枝、深圳市委書記李灝、珠海市委書記梁廣大和佛山市委書記歐廣源。由此暗示，習近平仍然要堅持鄧小平的改革開放之路，大家應當擁戴他。

只有皇帝才會「出巡」，這篇報導雖不忌諱習近平的皇帝身分，卻

又挖掘出一些習近平的親民細節，給民眾「撓癢癢」：廣東省政協副主席梁偉發當時是省公安廳長，負責警衛。據他回憶，當天公園不封園、不封路、不安檢，當習近平與民眾握手時，「我感到壓力非常大，襯衣全都濕透了」。

在互聯網時代，習近平的這類親民秀還有多大的欺騙性呢？英國首相卡麥隆一個人坐地鐵、德國總理梅克爾一個人逛超市，在他們的國家是家常便飯，從來沒有媒體大肆宣揚，倒是中國網友看到相關照片後大呼小叫、拍案驚奇。我感到納悶的是：既然人人都愛習大大，梁偉發為什麼還會焦慮呢？對於習近平與民眾的親密接觸，又何必揮汗如雨、心驚膽戰？

中國古代的皇帝也曾微服私訪，但絕大多數時候他們出宮都是儀仗如雲。習近平也一樣，輕車簡從的親民秀，既然是「秀」，當然就不是常態。習近平出行的「常態」是大動干戈、如臨大敵。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至十九日，互聯網大會在浙江嘉興的烏鎮召開，安保措施覆蓋到八十多公里外的杭州。當地居民披露說，杭州的公安機關發出《抄告通知單》，要求在互聯網大會召開期間，杭州的賓館、酒店和旅館客房中面朝馬路一側的客房實行「零入住」。杭州的多條高速公路被封閉，市民事先一無所知，成千上萬的人被塞在路上長達三小時之久。杭州居民只好自我安慰說：「大家要冷靜下。如果在古代的話，你們是應該沿街下跪的。現在能讓你呆在車裡就挺好了。」而烏鎮一地，居民不足一萬人，當局調來的軍隊和警察卻多達四萬人，主要路口塞滿了通常只有在戰場上才能見到的裝甲運兵車。好端端的詩情畫意的江南水鄉，頓時變成殺氣騰騰的大監獄。這些更加有趣的細節，《南方周末》為何沒有隻言片語的報導以及發出「妄議」呢？

習近平明明已經偏向毛式極權主義，《南方周末》卻要將其塑造成

鄧式後極權主義。既然鄧小平比毛澤東「好」，那麼將習近平從毛澤東那邊拉到鄧小平這邊，就是一個莫大的成就。然而，這篇報導竭力將習近平塑造成改革先鋒，卻忘記了習近平把共產黨統治的前三十年和後三十年「打通」的雄心壯志。換言之，在維繫共產黨一黨獨裁的意義上，毛鄧並無本質的差異，只是手段有所不同罷了。毛利用文革群眾運動的方式殺人，跟鄧直接派解放軍進北京城殺人，究竟有什麼差異呢？

就在這篇捧習報導發表之前一週，廣州市天河區法院週五宣判，參與二〇一三年《南方周末》事件街頭運動的維權人士郭飛雄被判監禁六年、孫德勝被判兩年六個月、劉遠東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當時，《南方周末》發生新年獻詞事件，中共廣東省委宣傳部新聞處未經該刊正常出版流程，大幅刪改其新年獻詞〈中國夢，憲政夢〉，引發採編人員罷工抗議。數十以至數百名網民自發前往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大樓前集合、獻花或高舉標語。郭、孫、劉三人即因此被捕。而後，南方報業傳媒集團做出對他們不利的證詞，稱他們的行為「滿足聚眾擾亂公共場所秩序罪的後果要件」。此事一經披露，引發輿論一片憤慨，紛紛指責南方報業「背信棄義」。

而這一次《南方周末》發表萬字捧習長文，無視習近平執政以後中國人權狀況急遽惡化的事實，為習近平塗脂抹粉，更是明確了《南方周末》未來的走向：不向蒼生說人話，偏向暴君拋媚眼。上個世紀九十年代末，我大學畢業時，一度想去當時生機勃勃的《南方周末》工作，幸虧沒有去，否則要麼被其開除，要麼與之一起沉淪。

說到沉淪，這篇報導中唯一的亮點是習近平一句此前未公開的談話：「我們一個大國，決不能在根本問題上出現顛覆性錯誤。鐵達尼號真要沉了，它就是沉了，小帆船可以在水裡打轉，繞幾個彎又起來了。」將專制獨裁之路走到底的習近平，正在操縱如同鐵達尼號一樣的

中國撞向冰山，而《南方周末》的記者和編輯們，是不是正在船上若無其事地吹吹打打的吹鼓手呢？

## 習近平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

一個等級森嚴的體系恰恰無法培養出自信的、有創造力的領導人，最多只有虛榮的追隨者和投機分子罷了。

—漢斯—約阿希姆·馬茨（Hans-Joachim Maaz）

漢斯—約阿希姆·馬茨是生長在東德的心理學家，心理動力學療法和深度心理學協會的創始人。他長期致力於研究壓力性體制對民眾造成的心理後果，以及轉折期民主德國民眾的心理問題。他在《情感阻塞》一書中指出，轉型期的人們需要的不僅是制度的變革、物質的富足、環境的寬鬆，更重要的是「心理革命」，並提倡一種鼓勵健康生活的「治療文化」。

馬茨在研究了數千個病例之後發現，東德的民眾心理上並未「成年」，用中國學者余世存的話來說就是「類人孩」。他指出，民主德國生活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天真幼稚：整個民族永遠被定格在「童年」時期，正如人們用「恐怖教育」折磨孩子，使他們變得永遠矮小，愚昧無知。政府像一位父親，偉大、無所不知、永遠正確，具有決定一切的權威。對付孩子的手段，是教訓、羞辱、孤立和疏遠。對付成人的手段，則是勸阻、恐嚇和懲罰。在這個社會的任何一個地方，都無法保證每一個人最基本的生存權利，即真實的生存，自由表達意見，接納和承認獨特的個性和性格。所以，如果想要獲得結社、高等教育、被提升、被認可的權利，必須在國家劃定的準則內循規蹈矩，恭順服從。如果想獲得

住房、旅行、嘉獎和事業發展等特權，必須會溜鬚拍馬和絕對順從——這不正是今天中國的社會現實和中國人的精神境況嗎？有中國讀者感嘆說：「用『吾國』替換『東德』二字，毫無違和感。」

習近平也是這樣一個斯德哥爾摩綜合症患者，馬茨應當是他最好的心理醫生。習是文革的受害者，又是文革的迷戀著，他心中有揮之不去的「文革夢」。多年前，我曾批評曾經是「四人幫」寫作班子成員的散文作家余秋雨是「文革餘孽」，在中國文壇引發一場歷史反思風暴。如今，我更意識到，小蝦米余秋雨算不上「文革餘孽」，真正的「文革餘孽」是習近平。如果說習近平是「文革遺少」（文革期間他還是一名少年人），那麼鄧力群、汪東興、戚本禹便是「文革遺老」，這一少三老之間的關係，恰恰是「文革餘孽，惺惺相惜」。

## 習近平為何出席鄧力群的葬禮？

據中國官媒報導，二〇一五年二月十七日上午九時許，習近平等人在哀樂聲中緩步來到鄧力群的遺體前肅立默哀，向鄧力群的遺體三鞠躬，並與親屬一一握手，表示慰問。

這是習上台之後，罕見的一次率領全體政治局常委出席一名級別不夠的前高官的遺體告別式。按照中共嚴密的等級秩序，全體政治局常委必然出席的已故元老的遺體告別儀式，一般是正國級領導。鄧力群的最高官職是中央書記處書記，離常委這個核心圈子尚有一定距離。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中期，胡耀邦下台後，鄧力群企圖在保守派元老的支持下謀求總書記之職，卻在十三大上第一次差額選舉中落選中央委員和中顧委常委，不光彩地退出政治舞台。

習近平等七常委本來不必出席其遺體告別儀式。不必出席而又出席，就釋放出強有力的信號。在中共的政治文化中，退休官員的喪葬儀式也是意識形態的一部分。習近平藉著對鄧力群的「破格垂青」，顯示他對鄧力群一生堅持的左派原教旨主義的認同。

美國學者傅高義（Ezra F. Vogel）將鄧力群視為鄧小平時代的十五個關鍵人物之一，「他並非中共的最高一級官員，但他的影響力卻大大超過他的職位」。鄧力群長期主管中央書記處供最高領導人閱讀的、一天兩期的情況簡報，還幫助起草過鄧小平的講話。他無懼於表明自己的觀點，精通理論，只要他認準的事，就會堅持到底，連鄧小平都說他是一頭倔強的「湖南騾子」。

傅高義指出，由於有強大的保守派的支持，鄧力群不但敢於攻擊知識分子，甚至敢於批評總書記胡耀邦。他大力提倡維護黨紀的重要性，在攻擊對黨有批判意見的知識分子和幹部時從不手軟。倡導自由的知識分子認為，鄧力群在鼓動老幹部毫無必要地壓制自由時，發揮了很不好的作用。在陰險的康生死後，知識分子和自由派官員最痛恨的人便是鄧力群。

六四屠殺之後，鄧力群對趙紫陽的下台歡欣鼓舞，他以先知自詡：「這些年來，馬克思主義的階級鬥爭觀點、階級分析方法受到冷落，甚至遭到歪曲、侮辱和攻擊，我們卸下了自己的思想武器。」然而，鄧小平殘酷鎮壓了學生運動，卻不能容忍中國經濟大幅倒退，以及全盤否定改革開放路線，對於鄧力群的左派思想不感興趣。一九九二年，鄧小平發表「南巡講話」，號召在經濟領域繼續「走資本主義道路」，鄧力群東山再起的希望隨之破滅。

二〇一五年，鄧力群死掉之後，一些自由派知識分子貌似公允地發表一些似是而非的評論，對其頗多肯定。比如，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

說：「他起碼有一套自己的理念，而且對這種理念是堅信的。」孫立平似乎忘了鄧力群在八十年代如何迫害知識分子的。鄧力群未必堅信左派理念，他只是將「左」當作政治資本。鄧力群人品極壞，早在延安整風期間，李銳被關押，鄧趁機與李銳的妻子范元甄通姦，而被鄧妻撞見，李銳被釋後夫妻離婚。

最具諷刺意義的是，鄧力群在退休後撰寫回憶錄《十二個春秋》。他在中宣部部長任上封殺了許多「政治不正確」的書籍，沒想到自己的書因為透露黨內鬥爭的若干內幕而不被當局允許出版。他曾攻擊香港是敵對勢力顛覆中國社會主義制度的「反動基地」，卻將書稿送到香港出版，並因此遭中宣部高官「約談」。他何曾忠於自己的毛派信仰？對於此書的內容，記者高瑜評論說，鄧力群空前絕後美化自己、醜化胡耀邦和趙紫陽，缺乏基本的實事求是的精神。

鄧力群的兒子鄧英淘有句名言「捲旗不繳槍」，被認為是對改革開放的經典概括。這個立場比起鄧力群死硬的毛主義來退縮了一大步。政治評論家胡平認為，捲旗不繳槍，就是耍流氓。共產黨知道共產搞錯了，把共產那一套收起來，但還是堅持共產黨專政，這不是耍流氓是什麼？

鄧力群在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備受冷落卻未料到死後享受習近平的推崇。習近平向鄧力群的遺體致意，也暗示身邊的智囊文膽：你們要向鄧力群學習。習身邊需要不止一個像鄧力群這樣既體察上意、又妙筆生花的筆桿子。習的政策是：既不捲旗，也不繳槍。要想當習文膽的才子們，可要摸清主人的心思意念啊。

汪東興與令計劃：兩個公公的不同命運

二〇一五年八月二十一日，曾任中共中央副主席的汪東興以九十九歲高齡去世，中國官媒基本給予正面評價，絕口不提他被鄧小平鬥垮下台的往事。如今的年輕一代，大都不知道淡出權力中心三十五年的汪東興為何許人也。而據海外媒體報導，習近平不顧「黨內規矩」（汪東興被鄧小平逐出官場時，只保留了部長級待遇，黨魁一般不出席部長級老人的喪事），微服出席汪東興的遺體告別式，此一舉動釋放出的信息，耐人尋味。

汪東興從一九四七年擔任毛澤東的警衛，並長期掌管「御林軍」八三四一部隊。從一九六八年起，他擔任中辦主任兼中央警衛局黨委第一書記，並兼總參謀部警衛局局長，對毛的起居、出行等負責，是毛晚年最信任的人之一。有好幾次，毛想換掉汪，但還是沒有換，毛說，「此人用慣了」。汪出任中辦主任，江青投了關鍵一票，後來卻為之付出慘痛代價。毛剛一去世，汪立即反叛，與華國鋒、葉劍英結盟，是抓捕四人幫的「懷仁堂事變」的決策人和指揮者之一。文革紅人戚本禹在一篇回憶文章中寫道，毛主席紀念堂管理局局長田疇曾跟他提起汪東興，就一句話，「那是條連主人都咬的狗」。戚則回答說：「那是條裝成狗的狼。」

汪東興立下大功，在一九七七年八月的中共十一大上，被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然而，高處不勝寒，這個位置他這個太監頭子哪裡坐得穩？汪東興支持毛欽定的接班人華國鋒，堅持「兩個凡是」（即「凡是毛主席做出的決策，我們都堅決維護；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們都始終不渝地遵循」），竭力阻攔鄧小平重返權力中樞。汪對身邊的人說：「鄧小平的那兩下子，不是（在一九七五年第二次復出時）試過了嗎？就是不行嘛！」因此，他很快與鄧系人馬發生激烈衝突。

華國鋒不是鄧小平的對手，汪東興自然跟著倒楣。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在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汪東興受到多名元老點名批評，被免去中辦主任和黨委書記、中央警衛局局長、八三四一部隊政委、毛澤東著作編委會辦公室主任和黨委書記、中央黨校第一副校長、中央項目組組長等職，等於被削去實權。一年多以後，汪又被迫辭去政治局常委、中共中央副主席兩個關鍵職務。因為是敗軍之將、且知道太多黨內最高機密，汪比一般退休高官的自由要少，此後三十多年，過著深居簡出、寂寥落寞的生活。

不過，汪東興在去世之後畢竟享有一定的哀榮，不僅被視為「同志」，據說習近平還低調前往八寶山送其最後一程。雖然此舉不符合中共黨內制定的喪葬規矩，卻表明習近平身上具有濃得化不開的文革情結——汪是毛時代最後一名老臣，習送汪上路，實際上是向毛時代致敬。由此，汪大概死而無憾吧？

而與汪東興一樣長期擔任大內總管的令計劃，就遠沒有這位前輩那麼幸運了。令落馬後受盡羞辱，被官媒描述成十惡不赦的大壞蛋。令家除了令完成在美國過著驚弓之鳥的逃亡生活外，其他人都被一網打盡。就連其妻子谷麗萍也被描述成武則天式的「女淫賊」，以央視主播芮成鋼為面首。估計，令計劃要在牢房裡度過其晚年，死後不可能葬在八寶山。

北美的博訊網上流傳一則令完成在美國發聲、否認令計劃有「非分之舉」的消息。其中，令完成最經典的一句話是：「宦官能接班嗎？這不符合中共的權力運行規則。」用宦官形容令計劃的職務和身分，倒是畫龍點睛之筆。不過，令完成不必過於謙虛，在中共的歷史上，宦官即便不能熬成「男一號」，成為「男二號」者亦不少，如汪東興、曾慶紅、溫家寶等「前中辦主任」。令計劃即便不想當「男一號」，至少有

當「男二號」的野心吧？只可惜他服侍的主人胡錦濤，是一個比他還要缺乏陽剛之氣的「面癱帝」；而貌似忠厚老實的習，則比當年的鄧更蠻橫霸道，三下五除二就瓦解了十年來「胡家天下令家黨」的權力格局。

鄧小平鑒於文革期間汪東興曾對他手下留情，以及在推翻四人幫時有功勞，故而放汪一馬，讓其衣食無憂，甚至還可以走馬鬥雞、撰寫回憶錄。習的心胸比不上鄧，令計劃於他並無恩情，他不容許黨內出現「不守政治規矩」的人物，對於令計劃及其同黨，一定要趕盡殺絕。

## 戚本禹為何讚揚習近平？

習近平在意識形態上急遽左轉，薄熙來倒台後一度受挫的左派尤其是毛左再度喜出望外，就連一些閉關修煉的毛朝舊人也蠢蠢欲動。前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接受香港《明報》採訪時，高調表揚習近平反貪反腐，呼籲習近平「好好學習毛主席，重走毛主席的無產階級革命道路」。

八十三歲的戚本禹，本已隱身在歷史幽深的隧道中，年輕一代沒有幾個人知道他那拗口的名字。當年，他曾是炙手可熱、呼風喚雨的大人物。一九六六年文革潮起，受毛澤東和江青賞識，戚本禹先後出任中央文革小組成員、中央辦公廳秘書局副局長、《紅旗》雜誌副總編輯、中共中央辦公廳代主任等要職，就連周恩來、陳伯達、康生、葉群等人都要跟他套近乎。做為文革導火線的《五一六通知》，戚本禹是起草人之一。一九六七年四月十四日，他宣佈遇羅克所寫的《出身論》是大毒草，並致遇羅克於一九七〇年三月五日被宣判死刑。

爬得越高，跌得越快。中共高層鬥爭瞬息萬變，當文革極左派挑戰

軍方受挫後，毛澤東為討好軍方，將戚本禹拋出做替罪羊，親筆批示戚本禹是「壞人」和「小爬蟲」。一九六八年一月十四日，戚本禹被中央宣佈「請假檢討」，直接送進秦城監獄。在未經過法律程序而被關押十二年後，被北京市公安局宣佈「依法逮捕」。三年後，北京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反革命宣傳煽動罪、誣告陷害罪、聚眾打砸搶罪，判處其有期徒刑十八年，剝奪政治權利四年。

對毛澤東而言，戚本禹這個筆桿子，是一張用完就丟掉的廁紙，毛對其無情無義；而對於戚本禹而言，毛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皇帝，他永遠對毛山呼萬歲。僅僅用斯德哥爾摩綜合症來解釋戚與毛的關係是不夠的。戚對毛感恩，基於利益交換：若沒有毛的賞識和提拔，就沒有戚一度權傾天下的地位，即便掌權的時刻宛如曇花一現，但足以讓他像陳年老酒一樣回味一生。戚是一塊文革時代的活化石：對於十八年的大牢生涯，他無怨無悔；對於害死遇羅克的惡行，他更無愧疚之心。

出獄之後，戚本禹長期沉默是金，夾著尾巴做人。如今他再次開口議政，讓人感嘆「廉頗老矣，尚能飯否」？他不僅向記者炫耀當年曾向副總理習仲勳彙報工作，更是稱讚習近平是毛的好學生。戚本禹說，習近平學毛澤東著作是下了工夫的，「他隨口就能背誦毛澤東的名言，如果不好好學，是不可能這麼背的」，「習近平如果真能把中國從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扭轉到社會主義道路上，那他就是了不起的歷史人物，他就會成為毛澤東苦心營求的無產階級革命的接班人，他是毛澤東第二。」他彷彿忘記了正是毛澤東將習仲勳定罪為「利用小說反黨」，習仲勳的「狗崽子」，怎麼又成了毛主席的接班人？

左派們搶奪話語權，習近平虛位以待，他們沒有當成薄熙來的國師，當習近平的國師也一樣。以民間左派領袖自居的張宏良透露，早在

習上台之前，戚本禹就在一個左派聚集的場合，「指著在場的幾個同志說，你們的任務就是支援張宏良，張宏良的任務就是支援習近平順利上位」。戚氏果然是久經宦海的老人，該支持誰、該反對誰，門兒清。張氏企圖藉戚氏抬高身價，身價一高，被習重用的可能性就越大。毛左們將習奉為取代薄的新主人，被監禁終身的薄熙來則被棄之如敝屣，毛派之冷酷無情可見一斑。

對於習的本質，左派看得比右派清楚。直至今日，仍有不少民間自由派「公知」，包括近年來受到迫害的人士，對習抱有無限期待，認為其集權的目的是改革—沒有權力，如何改革？但經歷中共殘酷的黨內鬥爭的戚本禹，早已煉成一雙火眼金睛，看出習的夢想是做毛澤東第二。

## 國安會和國安法是習近平的護身符嗎？

有多少恐懼的情緒就可以算出我們到底喪失了多少自由與尊嚴，而權力正是利用恐懼來支配我們。對於濫殺無辜的行為，任何鼓勵不懲罰的作為或無所作為，都隱含著這個意思：「全世界皆屈服於恐懼的統治。」

—索因卡（Wole Soyinka）

稍稍研究中共黨史便會發現這樣一個慣例：每次三中全會都會出台某些重大決策。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最重要的決策，是宣佈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空前強大的機構「千呼萬喚始出來」，代表著習近平的權力趨於穩固。

三中全會公告在談及經濟改革等多方面問題後，轉到國內安全和維穩方面——其實，習近平最關心的是「政權安全」。為應對目前中共政權面臨的種種挑戰，公告順水推舟地提出建立「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新的機構。據稱，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組建是「創新化解社會矛盾體制」的實踐。

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把公安、武警、司法、國家安全部、解放軍總參二部及三部（軍事和技術情報）、總政的聯絡部、外交部、外宣辦、國信辦等部門聚合在一起，成為繼中共中央、國務院、全國人大、全國政協之後第五大國家機構。這個龐大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成為總管軍隊、公安、外交、情報領域的強力機構，習近平不放心任何人執掌此機

構，遂親自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 習近平為何親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

對中共新設「國家安全委員會」這一權責架構，海內外各方有諸多評論。

有評論家認為，一般而言，國安會設立的目的是為了討論和研究重大國家戰略，實際運作起來可能有兩種模式。一種是美國、英國、日本、台灣模式，名為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準確翻譯應該是國家安全會議，或國家安全理事會，基本是幕僚、諮詢、協調類機構，在國防、外交上為總統提供意見。另一種是俄羅斯模式，由於有集權傳統，國安會可能成為超級強力機器。

中國版的國家安全委員會，新華社稱 National Security Committee，聽起來不光是簡單的資源整合、簡單的議事出主意，而更像或更偏向是一個掌握實際權力的行政部門。另外，在共產黨國家的傳統中，「國家安全委員會」這個名稱讓人毛骨悚然—眾所周知，蘇聯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無惡不作的克格勃。習近平設立的國家安全委員會，就是中國版的克格勃，他就是克格勃頭子。

按中共的政治邏輯，黨即國家，國即是黨，所謂「國家安全」就是「紅色政權的安全」，就是共產黨執政的安全。習近平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目的，首先是集中權力，成為名副其實的「元首」。江、胡兩朝沒有完成集權，習通過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等機構來實現。

習近平對「裸退讓位」的胡錦濤彬彬有禮，對其執政記錄緘口不語。習拿胡的大秘令計劃開刀，明顯是不給胡「面子」。習不僅要讓人

民和黨內同僚害怕他，也要讓退休的元老們徹底放棄垂簾聽政的野心。習成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是效法前蘇共總書記安德羅波夫的「警察革命」，從腐敗官僚手中奪回權力，交到擅長陰謀詭計的秘密警察手中。可以預見，習將集黨、政、軍、警、特等大權於一身，此前二十多年中共「集體領導」這一寡頭體制迅速向個人專斷的「元首制」演變。今後論者論及中國政治，假如有人再稱「習李體制」，說明他對中國議題相當無知。

其次，從三中全會公報的上下文推斷，國家安全委員會將整合多個部門的相關權責，打通國際、國內的國家安全問題的畛域，但還是側重於內部安全治理，即「維穩」。可見，在習心目中，對中共政權的最大威脅，並非來自「帝國主義國家」（如中共一直不遺餘力地妖魔化的美國、日本），而是國內人民綿延不絕的反抗——每年數十萬起超過千人以上的「群體性事件」，被習視為心腹之患。在漫長的中國歷史上，造成王朝崩潰和更迭的力量，內亂遠遠多於外患，而且外患多半是由內亂誘發的。於是，國家安全委員會成為打壓公民社會的利器。

對於新成立的國安會的功能，外交部發言人秦剛說得很清楚：「毫無疑問，中國設立國家安全委員會，恐怖分子緊張了，分裂分子緊張了，極端分子緊張了。總之，那些企圖威脅和破壞中國國家安全的勢力緊張了。」這裡，秦剛拋出三類國安會重點對付的「敵人」：所謂「恐怖分子」，特指新疆維吾爾族的暴力反抗者；所謂「分裂分子」，特指西藏藏族的非暴力反抗者以及港獨、台獨人士；所謂「極端分子」，則包括不認同中共統治、批評高官、譏評時政者。可見，國家安全委員會打擊的對象十分寬泛。

習親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表明他不並需要人民愛戴他，只需要人民畏懼他。在國安會的監控之下，中國人又回到文革時代動輒得咎、

如履薄冰的生活環境之中。與此同時，中共出台互聯網管理的「七條底線」，其中包括社會主義制度底線、國家利益底線、社會公共秩序底線和信息真實性底線等。這幾條底線涵蓋範圍極寬，加上解釋權掌握在當局手中，大大提高了中國人言說的政治風險。

## 習近平為何高調通過國安法？

有了國家安全委員會，整肅了公安、國安和武警系統，習近平還需要有一張遮羞布。既然宣稱「依法治國」，就要有一部新的《國家安全法》為其所用—舊的國安法，如同一件尺碼太小的衣服，無法套到習近平過於肥胖的軀體上。

二〇一五年七月一日，中共建黨九十四年紀念日，習近平送給黨的「生日禮物」，是一部包羅萬象的《國家安全法》。全國人大常委會只有一張棄權票，沒有一張反對票—比胡錦濤時代通過《反分裂法》時更乾淨俐落（當時還有兩票棄權，三人未按表決器）。這從一個側面說明，被共產黨像「二奶」一樣包養的人大常委們，被習近平的威勢所震懾，更加順服、更加忠誠。習近平需要的是只能投贊成票的投票機器，而不是有獨立思考能力的政治參與者。

此次，習近平讓人大高調通過《國安法》，是要給除他之外的所有中國人—包括黨內同僚—都套上緊箍咒。在中國，無論是昨天政治局常委會上坐在習近平鄰座的周永康，還是挑戰共產黨的記者高瑜或律師浦志強，任何人都有可能是「習近平的囚徒」。在新的《國安法》中，國家安全定義極度寬泛，涵蓋環境、國防、財政、信息技術、文化、思想意識體系、教育和宗教等方面，甚至將各種外來文化和思想視為對國家

安全的威脅。漢唐時代中國的強盛，原因在於以開放的心態汲取外來文化，相容並包，有容乃大；習近平卻將外來的思想文化都視為對政權具有顛覆性的危險因素，一律加以拒斥和遮罩，那麼中國如何實現「大國崛起」？

《國安法》進一步將黑手伸向香港和台灣。親北京的香港政客梁愛詩說，《國安法》也要在香港的土地上實施。《國安法》剛剛通過，就有香港牧師鄔小鶴被深圳警方約談，這位牧師在香港向陸生和中國旅行者傳福音、培訓中國家庭教會的神職人員，對方對這一切全都瞭如指掌。深圳警察公然威脅說，以後你不要這樣做了，雖然你人在香港，我們照樣可以搞你。在《國安法》的魔爪下，一國兩制漸成泡影，香港進入比《二十三條》立法更風聲鶴唳的時期。而生活在民主自由體制下的台灣人民，本土意識和台獨意識高漲之際，卻被習近平強迫賦予「維護祖國統一」的義務。國台辦發言人甚至宣稱，台灣的領導人要經由中國十三億人民的同意（雖然習近平的國家主席從未經過全民直選）才能當選。若有不從，《國安法》有關條文亦可加諸於台灣民眾頭上。必要時，嚴刑峻法、刀光劍影全都施展出來。

《國安法》是中國的國內法，卻撼動了中國與世界的關係。二〇一五年七月七日，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扎伊德·拉阿德·侯賽因（Zeid Ra'ad Al Hussein）對中國通過新《國家安全法》表示擔憂。他說：「這部法律用異常寬泛的範圍及模糊的辭彙和定義，引起了很多擔憂。它給中國政府留了更大的餘地，以便更加嚴苛地控制中國公民的權利和自由，甚至加強對民間社會的已經很緊的控制。」中國外交部則粗暴地辱罵侯賽因的關切和憂慮，全然不顧中國做為聯合國安理會常任理事國的身分。既然如此，習近平乾脆宣佈中國退出聯合國，從此更可為所欲為，而不受外界的制約。

## 公安部是國務院之「第一部」

習近平對安全問題顧慮重重，掌權後首先對公安和國安系統大洗牌。周永康垮台、政法委降級、公安部副部長李東生和國安部副部長馬建、邱進以及北京市安全局局長梁克、擔任過政法委秘書長的河北省委書記周本順等相繼被查，武警政委和司令雙雙易人，若干前朝執掌部門的人物，一個個淪為階下囚。

習對公安和國安部門的整肅，與對軍隊的整肅同步展開。對於獨裁者來說，掌控公安、國安、武警與掌控軍隊同等重要。在中共歷史上，只有掌控專政工具，黨魁才真正成其為黨魁。比如，毛在延安建立割據政權期間，通過延安整風打擊異己、集中權力，讓康生、李克農替他掌控安全部門。這樣，延安黨政軍大員的日常生活，都在毛的監控之下，每個人的生殺予奪，都由毛一人說了算，毛這才煉成小朝廷的「土皇帝」。

若不能如臂使指地指揮安全部門，就不能酣睡在臥榻之上，公安部長是中共權力體系中的「第一部長」。熟悉中共黨史的評論人金海山，梳理中共政權內部對公安部長這個職位的激烈爭奪，其精彩程度不下於一部《後宮甄嬛傳》。

一九四九年十月，中共建政當月即召開第一次全國公安會議，毛、朱、周三大巨頭接見與會者。周恩來的講話，定下公安工作至今六十多年的基調：「國家安危繫於一半，國家安危你們擔負了一半的責任，軍隊是備而不用的，你們是天天要用的。」周說得很直白，軍隊這個槍桿子，平時一般用不上；公安這個槍桿子，「是天天要用的」。在中共殘酷的黨內鬥爭中，一般很少動用軍隊一決雌雄，即便是號稱「戰神」的林彪與毛澤東決裂，也無法拉一支軍隊出來。最高權力者通常用公安的

力量就能讓對方屈服，文革期間，好幾個戎馬一生的元帥都乖乖淪為案板上待宰的羔羊，毛調動公安就讓他們束手就擒。可見，非戰爭年代，公安比軍隊還要吃重。

公安部在建制上歸國務院管轄，但公安部長卻由黨魁操控。毛非常在乎公安部長的人選，每個公安部長都由他欽定。從組建公安部，到一九五九年彭德懷下台，接任總參謀長，羅瑞卿當了十年公安部長。很多人回憶說，「羅長子」這十年就是「毛主席的大警衛員」。毛常常下水游泳，不會游泳的羅瑞卿，即便年過半百，亦要學會游泳，才能在主席游泳時隨侍身旁。羅以此自傲，自謂對毛忠心耿耿。可是，文革即將開幕，毛卻先把羅搞掉。不僅毛放心、而且林彪和江青都放心的極左派謝富治。文革後期，謝暴死之後，圍繞公安部長這一職位發生了你死我活的殺戮，在槍林彈雨的文革期間也是步步驚魂：軍方出身的李震接任公安部長之後不久，有一天晚上接到電話趕去辦公室，次日即神秘死於公安部地下室。周恩來和毛澤東下令迅速破案，專案組曠日持久、勞而無功。

毛風燭殘年之時，選中華國鋒接班，首先給華什麼官職呢？毛調華進京，先讓華當公安部長兼政治局委員。讓接班人在公安部長的職位上接受嚴格訓練，毛之用意相當深遠。只有掌握鎮壓機器和情治系統，未來的黨魁才能指揮全黨上下。然而，毛已病入膏肓，沒有更多時間手把手指點華如何玩弄權術，華也沒有更多機會在公安系統安插忠於自己的人馬。毛去世後短短兩三年，根基未穩的華就被以鄧小平為首的元老們聯手罷黜。

等到鄧小平大權在握時，他用指揮一二九師作戰時的秘書劉復之出任公安部長，如此才可伸伸懶腰、洗洗睡了。就連周恩來生前信任的主管常務的副部長于桑也要趕走，于桑和鄧小平的政敵汪東興關係不錯，

若其留在公安部，始終是個隱患。

八十年代中期，名義上的一把手、擔任黨的總書記的胡耀邦，提拔團派幹將阮崇武當公安部長，引起老傢伙們強烈不滿——如果有一天胡突然動用公安力量，將老傢伙們一舉軟禁在家，那還了得？當胡黯然下台之後，阮崇武也被趕出公安部。接任胡的趙紫陽，在中央的根基更薄弱，對公安部的人事佈局說不上話，這就是為什麼在八九學運中，趙不敢奮起反抗鄧及整個保守派集團，因為從中辦主任溫家寶到公安部長王芳再到家中的警衛員，都是「人家的人」，你沒有半點行動自由，豈能像俄國的葉利欽那樣登上坦克發表演講從而一舉擊敗軍事政變？

到了江澤民時代，由政法委統管公檢法和武警系統，政法委權力越發吃重。江統治前期，受在世的鄧小平等元老節制，勉強算是「江李（鵬）體制」，江對公安和國安的控制有限；江統治中後期，元老一一凋零，江逐步實現對公安、國安和武警的操控。那時，表面強勢的朱鎔基出任國務院總理，在媒體上高言大志、風頭出盡，但從未形成「江朱體制」，而只有「江曾體制」——朱雖執掌經濟大權，但在其他領域一句話也說不上；而曾慶紅以「造王者」自居，手伸向每個領域。周永康就是江澤民和曾慶紅都信任的人，周的權柄與胡執政的十年重疊。是故，胡不得不讓周三分，更不敢跟江攤牌。這就是習整肅公安、國安和武警的大背景。習要擺脫元老干政，要打垮敵對的政治派系，要讓民間社會服服貼貼，就必須把公安、國安和武警牢牢抓在手中。

## 政法委是中共之「第一黨部」

如果說公安部是國務院之「第一部」，那麼政法委就是中共之「第

一黨部」。國安會成立之後，政法委則成為國安會的執行機構，也就是習近平心目中的「刀把子」。習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發表關於「刀把子」的講話之後，《人民日報》政治文化部微信公眾號「人民日報政文」立即發表題為〈習大大說啦：確保刀把子牢牢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的評論。

毛澤東認為，槍桿子、筆桿子、印把子、刀把子是共產黨的四大法寶。刀把子之說始於一九二六年，毛在廣州主持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時向學員指出，搞革命就是刀對刀、槍對槍，要推翻地主武裝團防局，必須建立農民自己的武裝，刀把子不掌握在自己人手裡，就會出亂子。習近平在文革時代度過其青春歲月，他是身為受害者的「黑五類」子女，卻對毛由衷地熱愛和崇拜，若是毛命令他手刃「利用小說反黨」的父親習仲勳，他不會猶豫和手軟。革命踐踏親情，利益超越倫理，這就是太子黨的價值觀。

官媒預感到民眾會對「刀把子」之類的文革語言不解和不滿，便跳出來為習辯解。文章指出，刀者，鋒利也；把者，方向也。所謂「刀把子」，就是鋒利的武器應該由誰掌握、向誰發力。「一個有理智的人拿著刀並不可怕，可怕的是一個瘋子手裡有把刀。」文章認為，政法機關是國家強力部門，擁有限制人身自由、收繳個人財產的強制力（政法委不是法院，為何僭越法院的權力？），一旦脫離了黨和人民的掌握，落入別有用心的人手中，就會成為傷害黨的事業和人民合法利益的犀利武器。

這篇文章接著說，近年來，鼓吹三權分立、司法獨立的言論不絕於耳，有些人把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檢察權等同於司法獨立，「取消政法委」的說法一度甚囂塵上。在這種背景下，習近平重申要確保「刀把子」始終掌握在黨和人民手中，絕不是一句閒談，而是政法機關要打什

麼旗、走什麼路的重大問題，是政法機關為誰服務、為誰張目的原則問題。

習近平將政法委當作「刀把子」，既用它打擊黨內其他派系和潛在的挑戰者，更用它迫害公民社會中。習近平頻頻宣講「依法治國」，但他並沒有法治精神，他的「法治」是「以法治人」。

真正推動中國走向法治化的，是八十年代的改革派總書記趙紫陽。趙紫陽提出《政治體制改革總體設想》，其中有這樣的內容：「黨中央和省的政法委可考慮逐步由政法工作的領導機構轉變為調研機構，地、市、縣委的政法委逐步撤銷。」在中共十三大之後的第二次書記處會議上，正式提出撤銷中央政法委，成立中央政法協調小組，此後中央下發取消政法委的文件，堪稱八十年代中後期政治體制改革的一大突破。可惜，六四屠殺之後，趙紫陽被非法罷免，政法委又捲土重來。

從習近平在中央政法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以及《人民日報》的評論文章中可看出，習反對三權分立、反對司法獨立。習一手以肅貪為名清洗政敵，一手殘酷打壓民眾的民主訴求，這些做法全都離不開政法委和中紀委的「保駕護航」。中紀委承擔黨內鬥爭的前半段工作，先是以「雙規」之類的黨內調查，處理落馬高官。政法委既負責後半段工作——讓落馬官員俯首認罪，並經過精心演練的審判程序，以示「司法公正」；更肩負著打壓民間社會的「維穩」使命，並瓜分天文數字一般的維穩費用。

習近平迷戀暴力，抓經濟也讓強力部門出馬。當習看到靠反腐好不容易樹立的一點好名聲，正在被經濟下行、股市崩盤消耗殆盡時，遂直接動用公安進駐證監會，讓公安替代證監會管理股市，算是人類社會自從有了股市之後最傳奇之舉。任教於耶魯大學的華裔經濟學家黃亞生評論說，中國統治者選擇一個善變且又難以預測的系統——股票市場，做為

展示自身實現經濟增長的技能和本事的舞台。然而，干預的失敗讓人民認識到習近平並非救世主，「其中損失最大的，是一個政府的信譽，這個政府執意要讓外界認為它有著無所不能的力量，儘管它已經失去了這種能力」。

國安會和國安法是讓習近平江山永固的護身符嗎？有了公安部和政法委這兩個守門的哼哈二將，習近平就能垂拱而治嗎？古語說得好，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既然蓋世太保並未保住希特勒的江山，那麼，國安會和國安法不是習近平的護身符，反倒是他的催命符。

第四卷

滿朝文武藏綠卡  
半壁江山養紅顏

——論腐敗蔓延



變態辣椒 / 繪

## 習近平和普丁的盜賊統治

路邊攤買水果，聽到攤主跟幾個人高談闊論：「你們年輕人整天就知道玩，不看新聞報紙，懂得什麼？說實話以前中國怕美國，自從習主席上台，跟俄羅斯搞好了關係，兩個強國聯手，這才叫強強聯合！現在我們誰也不怕了……」我大聲喊了一嗓子：「城管來了！」他急忙收了攤子，登著三輪車一溜煙跑了。

—網路段子

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普丁先後會面多達二十餘次，超過他與美國、英國、德國、法國等四個西方大國的國家元首或政府首腦會見次數的總和。習近平外交政策的軸心是：與俄國結盟，共同對抗西方。以民族主義者自居的習近平，偏偏對俄國有一種出乎本能的親近感。他不願汲取近代以來中國屢屢受俄國霸凌的歷史教訓—俄國對中國傷害之大，遠超過其他國家（包括日本），中國被俄國侵佔的領土就超過一百萬平方公里。中國人念念不忘日本侵華戰爭，卻對蘇俄百年來的巧取豪奪如此健忘。

習近平在與普丁第一次見面時，說的第一句話是：「我覺得我跟您很相像。」這兩個梟雄見面，宛如當年曹操與劉備「青梅煮酒論英雄」，曹操以手指劉備，然後再指向自己說：「天下英雄，唯使君與操耳。」這裡，習近平所說的「相像」，或許指的是做為最高統治者的強勢作風。

相比之下，普丁對習的態度克制而冷淡。習赴莫斯科參加俄國的大閱兵，普丁也赴北京參加中國的大閱兵，算是等價交換，兩國還沒有達到抱團取暖的地步。普丁心中看不起習近平和中國，卻不拒絕習的人民幣外交，願意將石油和天然氣高價賣給中國。但普丁轉身就公開表示，中國不是俄國的盟友，俄國更願意將日本當作盟友；對於習近平打通新絲綢之路、將中國的影響力深入中亞的戰略，普丁更是疑懼交加、嚴陣以待。

即便如此，習近平仍頻頻向普丁獻媚。兩個竊國大盜的對話，大半言不由衷，唯有這句話是真實的：在各自的國家裡，習近平和普丁施行的是相似的盜賊式統治，他們都是兇狠而強暴的盜賊頭子。

普丁：一個秘密警察，如何進化成新沙皇？

普丁領導的俄羅斯，是一個什麼樣的國家呢？記者班·裘達（Ben Judah）在《普丁強權下的俄羅斯真相》一書中指出，今天的俄羅斯，國家更富裕了，卻更分裂、更封建了。俄羅斯全球化了，實質收入飆升百分之一百四十，但許多機關卻淪為詐欺和勒索的工具。莫斯科的億萬富翁超越紐約，但俄國像巴布亞紐幾內亞一樣腐敗，其競爭力只能跟斯里蘭卡匹敵。俄羅斯遠未成為受人尊敬的大國。

普丁比習近平引以為豪的是，他是經選舉上台執政的政治領袖，更具統治正當性。他在總統和總理兩個職位之間遊刃有餘，掌握俄國最高權力長達四分之一個世紀，可以跟史達林相媲美。相比之下，習近平即便利用選擇性的反腐集聚了遠超過前任的人氣支持，仍不敢開放選舉。習近平如何突破任期限制，目前仍然有待觀察。像普丁那樣做，在現時

的中國還存在一定的困難。

普丁的支持率一度飆高到八成以上，這更讓習近平羨慕不已——在俄國軍隊進軍克里米亞、擊潰烏克蘭軍隊之時，許多俄國人興奮地以為，俄國在歐洲攻無不克、戰無不勝的輝煌歷史又重演了，這樣的光榮應歸功於普丁強硬的對外政策。民族主義是獨裁者慣用的一張王牌——習熱衷於在南海大興土木、擴充島嶼，並不是那些島嶼有多大價值，而是以此顯示他將中國打造成一個可以跟西方分庭抗禮的強權。這也是普丁給習近平的啟發。

班·裘達解釋了普丁的朝廷從一開始就腐敗失能，但當他無法建立一個人民深切渴望、功能健全的現代化國家時，人民仍支持他——俄羅斯有超過五百年的專制主義傳統，民眾內心深處存在「鐵血沙皇」的憧憬，心甘情願地將命運交託給強悍的沙皇，普丁恰好扮演了這個角色，填補了自軟弱的戈巴契夫和葉利欽以來「沙皇缺位」的狀態。

普丁找到一個複雜微妙的方法，實行「中央計劃型民主」並監控媒體，但它無法掩飾普丁政權內在的脆弱性。這是「一個已經搞砸的國家體制」，解體的種子在普丁極高的支持度中發芽萌生。俄羅斯歷史學家祖博夫指出：「普丁和他周圍的親信密友都是前蘇聯秘密警察的軍官。這些人有自己的價值觀，他們對世界有自己的看法，他們也生活在他們所想像的蘇聯的世界裡。這種狀況肯定不可能長期維持下去。」在蘇聯時代就是異議人士的資深作家沃伊諾維奇認為，普丁是個狡猾的克格勃特工，玩弄政治陰謀時很聰明，但他不是擁有大智大慧的領袖。普丁的統治將徹底失敗，俄羅斯必須再來一次改革和重建。

另一本研究普丁政權的重要著作，是美國學者凱倫·達維沙（Karen Dawisha）的《普丁的盜賊統治》。普丁聲稱他建立了一個強大而高效的國家，讓每一個辛勤工作的俄國人都能安居樂業。達維沙戳穿

了普丁的謊言：普丁體系的最基本特點正是大規模的腐敗，竊國令普丁暴富，還有他在共產主義東德期間擔任克格勃官員、上世紀九十年代在聖彼得堡擔任第一副市長和聯邦安全委員會主席期間結識的密友小圈子也跟著發了財。

為了解釋這一系統如何運作，達維沙列舉了貪贓枉法的政權的種種標準詭計：向謀求商業許可的國內外公司收取賄賂；從國有項目誇大的非投標合約中收取回扣；非法操縱私有化合約，令普丁的好友致富，而這些朋友日後亦為克里姆林宮提供大量現金；非法出口以政府津貼價格購買的原材料，並以低價出售；接受來自渴望繼續從政府獲利的寡頭政治家的「捐贈」；房地產騙局令少數人暴富，建起宮殿般的房屋；洗錢；操縱選舉；撲朔迷離的離岸帳戶；與黑幫有利可圖的合作夥伴關係；恫嚇甚至消滅可能出現的舉報者。

由此，普丁和他的親信很快擁有天文數字般的財富。據達維沙估算，普丁的私人財富約四百億美元。至於弗拉迪米爾的朋友們，達維沙寫道：「索科冬奧會花費的五百億美元中，約有一半來自普丁密友們的口袋。」僅僅普丁的兒時密友羅登伯格兄弟就為奧運會掏了二十五億美元。俄羅斯的億萬富翁名單相對保持著穩定，他們的共同之處是，都與普丁維持長期的密切關係，其中有不少人是克格勃前特工。

為創作此書，達維沙研究了各種書籍、新聞報導、官方文件、回憶錄、維基解密資料，以及俄羅斯國內外記者收集的證詞，勾勒出一幅關於竊國大盜的素描。《普丁的盜賊統治》堪稱關於當前俄羅斯腐敗狀況最有說服力的描述，它的控訴不是在法庭上進行，但擊到了普丁的痛處。這本書不可能在俄國公開出版，達維沙近期內也不可能得到俄羅斯簽證——普丁的威嚇甚至讓這本書換了出版社。

當普丁在國際舞台上秀肌肉時，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克魯格曼

（Paul Krugman）在《紐約時報》撰文指出，普丁所展現出來的力量只是泡沫，而且這個泡沫已經破了。普丁統治下的俄羅斯是一個極端的「裙帶資本主義國家」，效忠大老闆的人可將大筆金錢拿走。在油價持續偏高時，整個體系還能維持。現在泡沫破了，普丁政權賴以維繫的貪腐體制就帶著俄羅斯走向懸崖，如班·裘達描述的那樣：「他就像一個嫉妒又變態的愛人，他不斷地緊緊握住俄羅斯，告訴她說，如果沒有他，她就活不下去了。」

## 習近平：反腐運動的主帥，也是腐敗分子的元首

今天中國的腐敗程度，若與俄羅斯相比，誰能勝出？

當今的國際政治學者描述中國政權的本質時，往往會使用一個希臘詞，這個詞就是「盜賊」。澳大利亞學者約翰·賀普京（John Hempton）在其博客發表了〈中國盜賊政體的微觀經濟學〉一文，他在開篇即點出「中國實行的是人類歷史上從未見過的盜賊政體」。

習近平和王岐山多次宣佈，他們有能力戰勝貪腐，破除共產黨不能遏制腐敗的「偏見」。習近平宣稱，「要在減少腐敗存量的同時，堅決遏制腐敗增量」，反腐不會輕易鳴鑼收兵，「拉弓就沒有回頭箭」。但無論習近平怎樣賣力地反腐，從民間和國際社會獲得的掌聲卻越來越少。中國民眾逐漸抱著一種「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的心態，像欣賞通俗小說和狗血電視連續劇一樣，打聽和傳播一樁樁驚天大案。大家都把腐敗看成是共產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乃至共產黨的本質。所以，習近平不可能消滅腐敗。

習近平不可能戰勝腐敗，原因有以下五個。

首先，貪腐是普遍性的。從中央到地方，從北京到帝國邊緣的新疆、西藏，「無官不貪」。從黨和國家領導人到省部級一直再到縣鄉級和村級，整個官僚系統是慾壑難填的竊賊團夥。只要進入官僚體系，沒有人可以「置身貪外」，很多地區和行業的腐敗案件都是「坍塌方式」的情形。不願貪腐的官員，很快被同儕排擠出局，他的不貪腐構成了對貪腐群體的威脅。

其次，貪腐與發展經濟是共生關係。官員把地方經濟搞上去的根本動力，一方面是經濟發展尤其是那些看得見的公共建設項目，是衡量其政績的主要標準，而政績決定著他們的政治前途。另一方面，只有把地方經濟的蛋糕做大，他們才有更多的資源用於賄賂上級和營建圈子。大型國有企業幾乎被「紅二代」掌控，國有資產被蠶食鯨吞。

第三，貪腐是制度性的。中國官場有一個「賣身做家奴」的說法，即低級幹部要往上爬，只有給其直接上級做家奴。從反腐機制來看，當局只是靠中紀委這種自查制度，卻連官員登記財產的「陽光法」都不能出台。不制定「陽光法」就是為了保護一大批現在不法擁有財富的官員。所以，中共的獨裁制度就是貪腐的溫床。

第四，貪腐是社會性的。貪腐無處不在，中國社會已經形成一個以各種職務優勢而產生的貪腐文化。凡有權力的都要用盡、用光、用到極致。醫生、幼稚園和大中小學老師本是較有尊嚴的職業，如今淪落為腐敗重災區。而沒有權力或職務優勢的，則設法去買、去騙、去偷、去搶。人們不是厭惡官員的腐敗，而是羨慕官員有權腐敗。

第五，中國的貪腐有軍隊的保駕護航，有公安、法院、檢察院、武警、國安和國保等所有強力部門的參與和支持，還有電視台、報紙、網站等文宣機構為其唱假和掩蓋。腐敗分子形成一個漫長的「利益攸關者」鏈條。在一黨壟斷權力的一元體制下，不可能設立像香港的廉政公

署，對腐敗展開獨立自主的調查。

今日中國的盜賊政體與傳統的皇權制度也有很大的差別。皇權體制下，皇帝是天子，朕即國家，沒有必要親自斂財。暴君的貪婪大都只是侷限在大興土木修建宮廷和陵墓方面。君王多少還受到士大夫以及天道觀念的約束。而今天的中國是寡頭集團輪換制，他們必須在有限的任期內獲取最大的經濟利益，所謂「有權不用，過期作廢」。他們甚至直接利用國家機器掠奪國民財產。古代的皇帝自認為是「家天下」，不會將財富轉移到海外隱藏起來；而中共高官顯貴個個沒有安全感，早就安排好退路，讓家人移民海外，並將不義之財轉移到海外。

在全球腐敗國家排行榜上，中國與俄國不相上下、你追我趕。那麼，習近平家族掠奪的國家財富，有沒有普丁家族多呢？彭博社和《紐約時報》披露的習家數億美元的財富，只是冰山一角。習近平家族的財富狀況，比普丁更加隱蔽、更加神秘。即便精明能幹的普丁研究者達維沙轉而研究習近平家族的財富狀況，恐怕也很難得出一個類似普丁擁有的四百億美金的具體數字來。

無論是普丁還是習近平，都不能阻擋席捲全球的民主浪潮。俄國歷史學家祖博夫指出，俄羅斯目前正處在巨大變革的前夜：「俄羅斯目前的處境是嚴重危機。俄羅斯舊有的思維觀念和蘇聯遺產導致對外侵略、戰爭和沉重的經濟負擔。因此，如果不改變自己，不變革，俄羅斯就無法走出這個困境。我們目前恰好就處在一場巨變的前夕。在未來的幾年，甚至更短的時間內，伴隨著政權更替，俄羅斯的政治和社會生活都將發生巨大變化。」這一段話，說的也是今天的中國。

二〇一六年一月二十七日，烏克蘭裔的美國學者、羅格斯大學政治系教授亞歷山大·莫托爾（Alexander J. Motyl）在美國《外交政策》雜誌發表了一篇名為〈普丁政權的黃昏〉的文章，認為普丁政權已經來日

無多，如中國古詩所說「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這篇文章指出：「普丁及俄羅斯的問題在於，俄羅斯的政治經濟體制抗拒變革。只有當控制這一經濟體的是一群自私自利、並將自身利益置於國家之上的官僚世襲集團時，這樣一個功能失調的經濟體才得以維持。相應地，一個高度腐敗的威權體制本質上需要有一位獨裁者來協調和平衡精英階層的利益和胃口。普丁的創新在於，他將自己塑造成了一位偶像式的人物，其合法性依賴於其貌似無窮無盡的年輕和魄力。但這樣的領袖最終都成了他們自己個人崇拜的犧牲品，而且，如同史達林、希特勒、毛澤東和墨索里尼一般，他們不會主動下台。這樣一來，俄羅斯就陷於系統性潰敗和系統性停滯當中不能自拔。在這樣的情形下，為尋求合法性，普丁將越來越多地利用俄羅斯的沙文主義、帝國主義和民族優越感。」這一段話的主人公，若是換成習近平，其他的評價，一個字也不用改動。

## 習近平與劉曉波，誰是腐敗剋星？

包子夢皇打了一隻老虎。

太監說，陛下神功蓋世。夢皇說，賞。

官員說，皇上英明無比。夢皇說，升。

主流媒體說，皇上為民做主。夢皇說，加薪。

專家說，反映了皇上堅決反對腐敗的決心。夢皇說，獎。

有一個學者說，皇上是不是檢查一下產生老虎的原因。

包子夢皇突醒，大叫：如此煽顛尋釁，馬上抓起來。

—網路段子

詩人布羅茨基（Joseph Brodsky）如此描述布里茲涅夫統治的龐大帝國：「暴君的形象，是布里茲涅夫，個性上的平庸，純粹通過官僚體制向上爬的過程，這是一個不太聰明、已不再年輕、也不健康的人。領袖在麥克風前朗誦事先為他寫好的講稿，聽眾則千人一面地表示贊同——用鼓掌的方式，或是表決時的舉手。手臂伸得像針葉林，面對一個渺小但兇猛的魔鬼。」這段話同樣可以用來概括習近平及其治下的中國。

## 反腐大戲，老百姓原來「只能看看」

反腐運動為習近平聚集了相當的人氣。在習近平的眾多冠冕之中，

有「腐敗剋星」和「人民福星」兩頂高帽子。中國官媒報導：「二〇一四年十二月十三日，習近平在江蘇鎮江世業鎮考察，很多村民自發圍上來。擁有五十三年黨齡的七十四歲老黨員崔榮海握著習近平的手，激動地說：『總書記，您好！您是腐敗分子的剋星，全國人民的福星！』」習近平面帶笑容地說：『不辜負全國人民的期望。』」

對於這一幕「魚水相融」的美好場景，在傳統官媒之外擔任「編外形象設計師」的澎湃新聞，專門製作了一系列「深入報導」。澎湃新聞的記者採訪在場的人士，世業鎮黨委書記楊益斌如此描述當時的情形：「總書記回了一句，他（崔榮海）眼淚一下就下來了。這是老百姓有感而發啊。沒有任何人去導演。」

澎湃新聞接著對崔榮海做了專訪，並問他：「以後還會關注反腐敗嗎？」崔一語道破天機：「我們老百姓只能看看。」

中國只有老百姓，只有臣民和順民，沒有公民。公民有權利和義務的觀念，公民有監督和批評政府的意願；而老百姓則是聽天由命、逆來順受，對於國家大事，只能站在一邊「看看」，他們最大的盼望就在於，中央能夠出現明君和賢相，肅清地方的貪官污吏，解救他們於水火之中，千百年來都是如此—獨裁者的愚民教育就要達到這樣的效果，正如梁啟超所言：「君主一人耳，既用愚民之術，自尊曰聖曰神，則人民每不敢妄生異想，馴至視其專制為天賦之權利。」在這種奴隸文化的薰陶之下，即便影帝溫家寶及其家族貪污二十七億美金，仍然深得民心；而演技更上一層樓的習大大，則被許多像崔榮海這樣「只能看看」的老百姓視為可以讓共產黨起死回生、讓大家豐衣足食的「大救星」。

習近平能欺騙的，是像崔榮海這樣的「奴在心者」。那些接受過「西潮」衝擊的人士，不會對皇帝「單相思」。在中國工作三十年之久的美國觀察家和投資人楊思安指出，她不信任中國，不是不信任中國人

民，而是不信任這個體制。她在中國看到財富與機會分配不均，以及共產黨精英的殘酷，還有一大堆來自企業與政府機關的欺騙作假，讓她對中國變魔術般的成長持懷疑態度。對於習近平的打貪行動，她認為這只是重演毛時代紅衛兵的那套手腕，配額逮捕、即決審判，導致很多人神秘失蹤、自殺等諸多不堪的結果。所以，楊思安的結論是：「習近平的意圖並非要肅貪，而比較像藉機消滅政敵。」

## 習近平還能「引蛇出洞」嗎？

明明已經是遍地文字獄，習近平卻還要營造百花齊放、百鳥爭鳴的假象。習近平在黨外人士的新春團拜會上說：「因為我們是執政黨，應該更加自覺地做到虛懷若谷、集思廣益。我們將一如既往營造寬鬆民主的協商環境，鼓勵不同意見交流和討論，真正形成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的氛圍。」

八大「民主黨派」的頭頭腦腦們點頭稱是，一副聆聽聖旨的奴才樣。他們多半是共產黨的地下黨員，只是對外秘而不宣。

「民主黨派」的花瓶地位，從廣州市政協原副主席潘勝燊被調查一事就可看得清清楚楚。潘勝燊是八大「民主黨派」之一的民主建國會成員，現任民建廣州市委主委，他是十八大之後首個公開被查的民主黨派高官。

中紀委監察部網站轉載該消息時，增加了一句「經廣東省委批准」，並註明消息來自「廣東省紀委」。從措辭上判斷，是由中共紀委將潘「雙規」（在規定時間和規定地點交代問題）。這是一個具有諷刺意義的細節：中紀委這個專門處理違法亂紀的中共黨員的紀律監察機

構，卻可以抓捕其他「民主黨派」的黨員。雖然民建中央設有監督委員會，該機構卻不能對「自己人」潘勝燊展開調查。

對此，國家行政學院教授李拓表示，十八大後加強反腐，中共紀委處理涉嫌違紀違法的民主黨派人士或者會成為「新常態」。中共紀委處理民主黨派的公務人員，法理基礎來自「長期共存、互相監督、肝膽相照、榮辱與共」的中共與民主黨派合作的「十六字方針」。

這個法盲學者是「睜著眼睛說瞎話」。首先，中紀委「雙規」包括中共黨員在內的公民，本身就是踐踏憲法保障的公民的人身自由權，中紀委儼然是凌駕於法院之上的超級裁判所；其次，中共自欺欺人的「十六字方針」，居然成為中紀委干涉其他黨派「內政」的「法理基礎」，再次驗證了「黨比法大」的「硬道理」，以及其他「民主黨派」的傀儡和花瓶的本質。

美國法學家伯爾曼說過，法律若不被信仰，則如同廢紙一張。美國政治學者福山指出，中國從來沒有受法律制約的政府，當國家侵害民眾的基本權益時，民眾無法保護自己。而中共御用學者、北大教授強世功則宣稱，黨章就是法律，倘若伯爾曼和福山遇到強世功，一定會瞠目結舌、無言以對——他究竟是法學家，還是黨衛軍？

習近平並不需要裝出一副禮賢下士的模樣，徵求黨外人士的意見。現成的優秀藥方早就擺在他的面前：對中國政治改革的最佳建言就是《零八憲章》，可惜其起草者劉曉波被關進監獄；真正有效的反腐手段是通過《陽光法案》、公佈官員財產，可惜其倡導者許志永也被關進監獄。

習近平鼓勵黨外人士「知無不言，言無不盡」，這是毛澤東早就用過的「引蛇出洞」的計謀。一九五七年，數百萬知識分子因為相信毛的「陽謀」而被打成右派，掃入勞改營，劫後歸來者只有十之一二。同樣

的騙術，還能蠱惑幾個人呢？

## 回到劉曉波的《反腐敗建議書》才能根除腐敗

腐敗剋星，不是習近平，而是被共產黨政權關在監獄中的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

早在一九九五年，中國的腐敗狀況遠不及今日嚴重之時，劉曉波就與一群關心國事的民主人士起草並發表了一封致全國人大的《反腐敗建議書》。該建議書中指出：「執政黨所發動的逐步升級的反腐運動和越來越多、越來越嚴厲的舉措並未奏效。腐敗似乎是個專愛逆流而上的怪物，越反膽越大氣越壯。腐敗的金額越來越大，級別越來越高，行業越來越廣，乃至滲透了全社會。」那麼，如何才能根治腐敗呢？

劉曉波等提出五個根治腐敗的舉措：一、開放黨禁，實行多黨競爭執政地位公開的、全民的、平等的、直接的選舉制度。二、實行權力分離，相互制約的憲政民主制。把人大和政協改造為獨立於執政黨的立法機構，使立法、司法、行政三權真正分離。三、創立獨立的憲法法院，對執政黨、人大、政府、檢察院、法院的違法行為進行監督和懲治。四、開放報禁，允許民辦電台、電視台、報刊、出版社的合法存在。五、在憲法上明確私有財產的合法性，使現有的國有、集體、私有財產獲得同等的法律地位。如果當時中共政權接納並實踐這五個建議，中國的腐敗還會發展到今天這種不可收拾的地步嗎？

該建議書發表之後，中共拒絕聽取簽名者的建言，將劉曉波等人關進監獄。就好像諱疾忌醫的病人，不願聽取醫生的診斷結果，還警告醫生不得說出真相。二十多年過去了，中共仍然在制度性腐敗的泥沼中

「鬼打牆」，劉曉波則因起草《零八憲章》而第四次入獄—《零八憲章》正是當年的《反腐敗建議書》的深化與發展。

如今，判斷中共當局是否真心反腐，只要看它有沒有啟動以上五個方面的改革。迄今為止，習近平的所作所為，全都與以上五個建議南轅北轍。習近平強化黨對社會的控制，將權力集中在手上，箝制輿論，踐踏法治，迫害知識分子，如此就能建立一個新加坡式的威權、高效而廉潔的政府來嗎？

是故，根治腐敗的希望，在劉曉波身上，而不在習近平身上。習近平利用做為「現代錦衣衛」的中紀委實施其反腐大計，是以反腐掩蓋權力鬥爭之真相。他在短時期內可以迷惑不少崔榮海之類的「草民」和「賤民」，但是，如果沒有制度變革，沒有民主轉型，中國式腐敗必然如同迅速擴散的癌細胞一樣，最終吞噬習近平和共產黨。

## 蔡英文和呂秀蓮且慢肯定習近平的魄力

習近平善於經營其海外形象，他對台灣窮兇極惡，台灣人卻普遍對他抱有好感。台灣主流媒體正面報導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似乎習近平是中國百年一遇的偉大領袖。即便民進黨方面，也頻頻向其拋出橄欖枝。繼蔡英文訪美期間稱讚習近平領導反腐運動，是一個有能力、有魄力的領導人之後，呂秀蓮在訪美期間接受美國之音專訪時稱讚說：「習近平先生得天獨厚，他是官二代，但吃過苦，由上到下，再由下到上。我想，他的人生歷練、政治手腕應該非常豐富和高明，聽說他在掌權之前遭遇嚴厲的挑戰，在風險中能夠屹立出來。所以我們給予高度的尊敬。」

當今世界，沒有人敢公開讚美希特勒多有能力、多有魄力，但是，人們對習近平的讚美，理由無非是他有能力帶領中國「大國崛起」，他們在評論習時的思維方式和論據，完全可以用在希特勒身上。

即便從「戰勝挑戰」和「超越風險」這個層面而論，希特勒也比習近平更值得稱讚。希特勒是平民子弟，靠實打實的選舉而上台；習是紅二代，其上位是中共高層黑箱作業的產物，他並沒有獲得十三億中國人民的選票。

希特勒將一戰戰敗之後滿目瘡痍的德國迅速打造成歐洲第一強國，建立起完善的社會福利制度和紀律嚴明的軍隊。與之相比，習的經濟政策只是蕭規曹隨：上個世紀七十年代末，中國從毛時代僵化的計劃經濟中掙脫出來，此後如長江般噴湧出三峽。所謂「改革開放」，並非共產黨之豐功偉業，只是黨少幹一些壞事並允許人民展開自救罷了。最近十多年來，全世界被中國的經濟增長驚呆了，而習執政以來的其他真相：數千名維權人士被監禁，環境遭到毀滅性的破壞，法西斯主義隱然成形……卻沒有多少人注意到。

單就經濟成長的成績單而論，希特勒也比習近平亮麗許多：從希特勒執政到戰爭全面爆發之前的十年間，德國的經濟增長率至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可以與之媲美——當時德國的經濟增長平均每年高達百分之二十七，習時代百分之七的「新常態」只能算是它的一個零頭。短短五年間，德國的國民生產總值增長了百分之一百零二，國民收入增加一倍。一九三七年，在整個資本主義世界工業總產值中，德國工業產值佔百分之十三點四，居資本主義世界第二位和歐洲第一位，僅次於美國而把英法拋在後面。

希特勒政府大量修建高速公路，一九三三年至一九三八年的五年間修建了長達三千公里的高速公路，工人們熱情洋溢地參與「元首的公

路」的修建。希特勒將大眾品牌的汽車市場化，將價格降低到九百九十德國馬克，這個價格實現了「在沒有階級、專業、財富差異的每個德國人的承受範圍之內」。希特勒在工人階級中推行「通過快樂獲得力量」的計劃，向普通工人提供便宜的國內和國外假日旅遊、有補貼的戲劇表演、展覽會、運動會和遠足旅行。一九三八年，有一千萬德國工人參加了各種形式的活動，他們的快樂指數超過其他國家的工人。該計劃的負責人羅伯特·萊伊博士指出：「我們將德國工人從自卑的感覺中解放出來，促進國家共同體的情感。」

納粹德國治下，沒有犯罪、沒有吸毒、沒有娼妓、沒有同性戀、沒有失業、沒有靡靡之音、沒有悲觀失望，人人純潔無瑕、人人理想遠大、人人幸福無比。這不是黃金時代，什麼才是黃金時代？

如果用這樣的標準來判斷，希特勒的能力和魄力遠勝於習近平，希特勒比習近平更有資格雄踞歷史的神壇之上——如果他沒有因為發動侵略戰爭而身敗名裂，那麼他在那些「唯發展主義」的人士心目中，必定是經濟天才和人民救星的正面形象。

對一個政治人物的評價，經濟發展絕對不是唯一的「硬道理」。判斷一個政治人物的好與壞、優與劣，比起經濟發展更加重要的，乃是人權、法治、自由、民主這些指標。美國政治家道格拉斯說過：「一個領袖要是把鏈子掛在自己同胞的腳踝上，那他到最後肯定會發現鏈子的另一頭繫在自己的脖子上。」希特勒如此，習近平也是如此。因此，做為民進黨的重要政治人物，也是民主自由人權這些進步價值的追求者和守护者，蔡英文和呂秀蓮不應當輕率地讚美中國的獨裁者習近平——更何況，習近平還心懷染指台灣的狂熱慾望。

## 暴君與酷吏合演的反腐大戲

中共官場的腐敗就像一棵大樹，懲治貪官只是揪掉了樹上的一些葉子，這棵大樹的根並沒有動。歷史已經證明如果不剷除產生腐敗的根系，那腐敗就不可能消除。

—納亞克拉（Nanayakkara）

習近平掀起了中共建政以來規模最大的反腐運動，被反腐風暴打倒的高官名單越來越長：一名前政治局常委、兩名前軍委副主席、一名前中辦主任、超過一百名省部級高官、六十多名將軍以及若干央企負責人……刺刀確已見血，是否傷筋動骨，只有習近平自己知道。

然而，總部在德國柏林的國際反貪組織「透明國際」發佈報告顯示，中國的腐敗排名從原來的第八十名急速滑落到第一百名。中共官方不服氣地否認該報告的真實性，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回應說，該指數「與中國反腐敗取得的舉世矚目成就的現實情況完全相悖、嚴重不符」。而「透明國際」組織亞太分部經理納亞克拉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中國名次落後的原因在於，北京肅貪的手法是從上到下、重懲罰而非從體制上著手。沒有公民社會參與的多面向行動，司法亦未獨立，這樣的肅貪，效果是有限的。

誰是真正的大老虎？周永康還算不上。美國彭博新聞社發表了一篇題為〈毛澤東的戰友們的後代成為資本主義新貴〉的文章，追蹤報導鄧小平、陳雲、彭真、王震、李先念、楊尚昆等元老的直系子孫和配偶、

共一百零三人的財富狀況，這群人掌握的財富大致相當於一個歐洲中等國家的國民生產總值。文章指出，在中國已形成被稱為「太子黨」的新的精英階層，「公眾對不公平的財富積累，機會不均等和特權剝削感到憤怒，而太子黨現象無疑火上加油——所有這些都與共產主義革命的初衷背道而馳」。該報導剛一發表，彭博社的網站立即被封鎖。然而，封鎖人家的網站並不意味著人家指出的問題不存在：「太子黨」這個群體若不被反腐運動觸及，習近平就無法消除海內外關於「選擇性反腐」的置疑，也無法遏制腐敗的蔓延和擴大。

## 習近平比朱元璋更狠毒嗎？

習近平的反腐運動，效仿的對象除了毛澤東以外，還有明太祖朱元璋。毛澤東生前最欣賞跟他一樣從農民和草莽變成皇帝的朱元璋。

一九四八年，明史學者吳晗來到河北西柏坡拜見毛澤東，呈送《朱元璋傳》手稿。吳的著作以批判朱元璋的獨裁暴政影射毛的對頭蔣介石，以為能以此取悅毛。誰知毛澤東最欣賞的帝王就是朱元璋，對吳的觀點不以為然，並命令其用「歷史唯物主義」的思想觀點加以修改。一九五五年，毛審閱該書的修改稿時，再次對吳說：「朱元璋是農民起義領袖，是應該肯定的，應該寫得好點，不要寫得那麼壞。」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三日，毛同陳毅等人談話時說：「朱洪武是個放牛娃出身，人倒也不蠢，他有個謀士叫朱升，很有見識，朱元璋聽了朱升的話『廣積糧，高築牆，緩稱王』，最後取得民心，得了天下。」一九六四年五月，毛在一次談話中又說：「《明史》我看了最生氣。明朝除了明太祖、明成祖不識字的兩個皇帝搞得比較好，明武宗、明英宗

還稍好些以外，其餘的都不好，盡做壞事。」朱元璋以一個落魄的和尚，十五載而成帝業，讓毛聯想到自己的豐功偉業而深有感觸，並得出不要小看「大老粗」、「老粗出人物」的結論，毛甚至說：「自古能軍無出李世民之右者，其次則朱元璋耳。」

朱元璋迷信的特務統治、洗腦教育和苛法酷刑，更是被毛發揚光大。朱元璋奠定了有明一朝皇帝用特務控制百官和百姓的統治方式，後來由錦衣衛又發展出東廠和西廠；毛的警察國家則更為隱匿而精緻，甚至讓家人之間亦彼此監視和告發（從林彪一家到普通百姓家均如此）。朱元璋認為對貪官使用酷刑可以根除腐敗，在各級官府公座兩側各懸掛一個塞滿草的人皮袋，也是首個對貪官使用凌遲的處決方式的帝王；毛則處決了劉青山和張子善兩名涉嫌貪污的高級官員，但這並不妨礙他本人聲色犬馬、荒淫無度。

在加拿大學者卜正民、布魯和法國學者鞏濤合著的《殺千刀：中西視野下的凌遲處死》一書中，有專門的章節分析朱元璋及明朝皇帝對凌遲這一酷刑的迷戀。凌遲在遼代進入中國的刑罰實踐，在北宋被用來處罰最嚴重的犯罪，在元代進入成文法典，但直到明朝初期才變得相當常見。朱元璋認為，皇帝必須讓人恐懼，懷有邪惡企圖的人終會敗露，會受到皇帝所能設計的最嚴酷懲罰。他突破《大明律》，以彙集眾多案件的《御製大誥》頒佈天下、警示官僚。《大誥》中的若干凌遲判決，傳遞了洪武遭到背叛的個人體會，對擾亂司法程序的沮喪和對經濟犯罪的憎惡。

在凌遲處決大小貪官的判決中，朱元璋承認，在他治下的不幸的墮落的時代，酷刑不可避免，凌遲是實現天下太平的一種工具。然而，他始終無法解決長期困擾司法制度的問題：腐敗並未被酷刑嚇阻，他只能逐步加重刑罰。《大誥》三編的序言結尾暗示了日益嚴峻的形勢：「嗚

呼！良民君子之心，言不在多，其心善矣。兇頑之徒，雖千萬言，終不警省，是其自取也。」

習近平向朱元璋學習，只能取其糟粕，不能得其精髓。習不是親自打天下的帝王，其創設和破壞制度的能力及空間都不如朱。習不敢對貪官大量使用死刑，即便是他痛恨的周永康都能免於一死，周永康的爪牙們更是獲得輕判：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前主任蔣潔敏被判有期徒刑十六年、四川前省委副書記李春城被判有期徒刑十三年、中石油副總經理王永春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周永康的秘書及四川前副省長郭永祥被判有期徒刑二十年……民眾普遍感到是「雷聲大雨點小」，這些貪官坐牢三五年就能保外就醫，這樣的懲罰對其他貪官毫無震懾作用。如果連朱元璋的凌遲、剝皮等酷刑都不能根除大明朝的腐敗，習近平的輿論醜化、司法審判又怎麼能讓今天的腐敗官員洗心革面呢？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中共當局密集公佈劉志軍、薄谷開來等人減刑的消息，擺出黨內和解、不追窮寇的寬容姿態。另一方面，以七條微博給浦志強律師定罪，而且在法院門口戒備森嚴，一口氣抓了二十多位圍觀群眾。在路邊乞討的一位老大爺亦感嘆說：「連我都看明白了，忙著把好人關進去，急著把畜生放出來！」

## 習近平能靠酷吏洗淨官場嗎？

習近平重用王岐山，中紀委遂坐大。中紀委向各黨政機關和央企派出欽差大臣，所到之處，高官們無不如芒在背、夜不能寐。澎湃新聞發表了一篇以〈劉志軍是我親手送進去的〉為題的、中遠集團新任紀檢組長徐愛生的內部講話。若干精彩細節，絕非那些描摹官場故事的小說家

所能想像。該文問世數小時之後，立即從各大網站消失得無影無蹤，牆內的網友要想再看，就只能翻牆到已經轉載該文的一些海外網站上查閱。

王岐山是錦衣衛的總頭目，其麾下有不少徐愛生式的得力幹將。徐愛生對中遠集團高官發表講話，宛如口含天憲的欽差大臣。他一開頭就自我介紹說：「劉志軍，就是我親手把他送進去的，中石油的廖永遠、大唐跳樓的蔡哲夫、國網副總帥軍慶的問題都是我查的，最近五年，我總共查了一百八十多起案件。」他總結自己有三大特點：一是死豬不怕開水燙，二是自斷後路，三是全得罪總比不得罪好。他還繪聲繪色地講述了與已落馬的安全部副部長馬建的一場鬥法：他在查案中得罪了馬建，馬氣勢洶洶地衝著手機說：「警告你不能再查，你查的人是安全部在下面的線人，受我們保護。」徐則反問：「請教馬部長，你是老國安嗎？中國哪一條法律規定，你安全部的人員，包括線人，違法不受法律追究？」當時，連中紀委的上級官員都提醒徐，得罪馬後果嚴重，馬可以對任何人實施全天候監控，一旦被抓到蛛絲馬跡，則死無葬身之地。徐不以為然。半年之後，馬建進了監獄。徐的意思是說，他比馬更狠。給出這個下馬威之後，他對中遠內部問題的揭露可謂血肉模糊，對中遠負責人更是嬉笑怒罵、極盡羞辱。

若單單聽這些內容，人們真以為徐愛生是當代海瑞或包公，既是貪官剋星，又是百姓救星。人們會想，王岐山手下有這樣一群能吏、幹員，腐敗的官場必定能被他們翻轉過來。但是，接著聽下去，則會發現徐愛生並非香港廉政公署「依法辦事」的調查員，而是大明朝「奉旨抓人」的錦衣衛。對於廉政公署的調查員來說，遵循的最高原則是法治；但對於大明朝的錦衣衛來說，則只聽從來自「今上」（習）和「廠公」（王）的最高指示，他們的指示高於憲法和法律。

中遠集團的高官使用公款打高爾夫球已成慣例，僅此一項每年浪費數百萬元。徐愛生威脅說：「中遠的風氣，中遠公款打高爾夫，其惡劣程度，已經讓總書記都知道了。」習並非閉目塞聽，手上有龐大的情報系統，此類信息會出現在「內參」之類的報告之中。但是，習雖然明察秋毫，卻並不認為國企腐敗的根源是一黨獨裁的體制。在聽取二十六家央企巡視結果報告的講話中，習的結論是：「中央企業黨的領導弱化」導致了「權力尋租盛行，侵吞國有資產管理監督缺位，違規決策頻繁等突出問題」。習開出的藥方是「全面從嚴治黨」。

徐愛生既然是習近平和王岐山如臂使指的錦衣衛大璫，當然不能有自己的獨立思考，而以總書記及紀委書記之是非為是非。他說：「央企之所以出現如此嚴重的腐敗問題，根本原因是各級黨委、黨組管黨、治黨失之於寬、失之於鬆、失之於軟。」而主要體現之一就是「黨組織機構被弱化，邊緣化」。徐舉出的一個例子是：他到中遠集團履新，一到辦公室，看到有國旗、中遠旗，卻沒有黨旗。他就跟秘書講，要一個黨旗，卻要了一個星期也沒要來。徐去問總經辦，總經辦說黨旗不好買、買不著。徐勃然大怒說：「共產黨的天下，買不到共產黨的旗子，胡扯。」他馬上給司機四百塊錢，司機花了不到半小時就買到了。從這個細節可以看出，徐愛生的所作所為，全都是為了捍衛「共產黨的天下」和「共產黨的旗幟」，他的心中只有黨的利益而沒有法治的尊嚴。他在講話中談及西方國家的政府和企業廉潔高效的例子，難道他不知道那些國家沒有黨委和紀委嗎？徐愛生雖然有國際貿易的學歷，也有擔任駐外使節的履歷，還曾經給溫家寶出訪時做過翻譯，但骨子裡仍是皇帝和公公麾下的奴才，還未進入八百年前英國的「大憲章時代」。

可悲的是，兩千年來，中國人從未脫離依附於明君崇拜之上的酷吏崇拜。習近平和王岐山重用徐愛生這樣的酷吏對付貪官，人們讀到徐愛

生鏗鏘有力的講話，遂鼓掌歡呼、涕淚縱橫。人們偏偏忘記了，司馬遷在《史記》中記述了漢武帝時代的鄧都、寧成等十數名酷吏的事跡，不是讚賞他們，乃是批判他們，司馬遷藉批判秦朝的苛政來諷喻漢武帝對酷吏的縱容：「昔天下之網嘗密矣，然奸偽萌起，其極也，上下相遁，至於不振。」今天的中國仍然深陷人治的泥潭，徐愛生這樣的人物，在中共朝的歷史中，無非就是一名以毒攻毒的酷吏罷了。

## 國信老總何以留下「勿擾妻兒」的遺書？

在習近平的反腐運動中，大小官員和商人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層出不窮，漸漸變得司空見慣。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三日，中國國信證券有限公司總裁陳鴻橋被發現在家中「自殺身亡」，自殺之前匆匆僅留下「請勿擾妻兒」的五字遺書。另有微博爆料，陳鴻橋在陽明山莊家中陽台用電線自縊身亡，陳鴻橋事發前欲出境，發現自己被實施邊控而遭勸返。

據公開資料顯示，陳鴻橋現年才四十九歲，畢業於北京大學國際經濟系。歷任深圳證券結算有限公司副總經理、深交所資金交收部總監，深交所副總經理。二〇一四年五月由深圳市委推薦，出任國信證券總裁、國信證券總經理，級別為正局級，屬深圳市委組織部直管幹部。

單單從級別來說，在近年來被反腐風暴波及，被雙規、被判刑乃至自殺身亡的官員中，陳鴻橋這個局級幹部只能算是老虎與蒼蠅之間的碩鼠而已，隨便都能數出一打來。中紀委官員說，幾個官員畏罪自殺，天不會塌下來。但從陳鴻橋的實際工作來看，卻相當吃重：他當過深交所副總經理，執掌的國信證券是中國最大的國有證券公司之一，在金融領

域算得上翻雲覆雨的大鱷。

自中共十八大以來，中國證券業至少有二十名證券監管高官被抓，上百名證券公司經理被限制出境，等待接受調查。陳鴻橋於深交所任職時，頂頭上司正是不久前落馬的證監會主席助理張育軍。《北京青年報》引述內部人士稱，兩人在深交所共事數年，關係密切，在圈內，兩人均為證券業界內公認的「學者型官員」。

陳鴻橋的死訊傳出後，國信證券在官網發佈〈沉痛悼念公司總裁陳鴻橋〉一文。文章稱，陳鴻橋任職期間，「始終以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為指引，積極落實監管機構的監管要求，全力做好資本市場的穩定、建設工作；公司各項業務保持了良好的發展勢頭，並成功首發上市，整體經營實力穩步提升」。文章並強調說，公司目前各項經營管理活動一切正常，顯然是要穩定廣大股民的心。但是，文章對陳的評價，能否成為陳最終的蓋棺定論，尚且不得而知。

更讓人毛骨悚然的是，陳臨死前留下「請勿擾妻兒」的一紙遺書。這幾個字散發出濃濃的血腥味道，是什麼樣的恐懼，讓他臨死之際戰戰兢兢地寫下這五個字？參加共產黨就如同參加黑幫。香港電影《無間道》中的那個黑幫大佬有一句名言，「出來混，都要還的」，即便命喪仇家之手，他也早有預料。這句話同樣適用於陳鴻橋這位曾在證券金融界風光一時的「少帥」。他也有過「春風得意馬蹄疾，一日看盡長安花」的歲月，誰知冰山消融、大廈傾倒來得如此之快！

自古以來，「文官不貪財，武官不怕死」是中國的皇帝和老百姓的夢想，但在現實生活中一直都是「文武百官全是貪官」，是「寧死也要貪」的貪官。既然官場是一個大染缸，對於陳鴻橋這位學長的人格，我不會抱太大期望，他能爬到那麼高的位置，不可能沒有幹過一件傷天害理、貪贓枉法的事情。他生前操縱數十億證券股票如同孩童扮家家酒，

離開這個世界時最後的願望，卻是「請勿擾妻兒」，不能不讓人唏噓感嘆。

中共內部以反貪為名展開的權力鬥爭，已經到了使用株連制的階段——中共當局迫害人權律師時，大肆使用株連之法，在海關攔阻多名人權律師的未成年子女出國留學，甚至跨境抓捕之；而中共自己人之間的搏鬥，殘酷程度有過之而無不及——陳鴻橋深知，錦衣衛心狠手辣，唯有自己一死了之、將秘密帶入另一個世界，或許才能為妻兒開出一條生路。

此時此刻，孤懸海外的薄瓜瓜應當感到欣慰，他之所以能倖免於難，不是因為他的父親是薄熙來，乃是因為他的爺爺是薄一波。薄一波的黨國元老，薄一波的孫子就享有周永康的兒子不能享有的、被黨國「網開一面」的特權。而陳鴻橋清楚地知道，平民子弟一旦落馬，則妻兒亦很難過關。儘管「千古艱難唯一死」，但為了救妻兒，他才鼓起自我了結的勇氣。陳鴻橋不是第一個這樣做的官員，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 耿飆的女兒為何認為習近平是「好貓」？

定義中國的共產主義的特徵之一就是黨的領導人對維持權力壟斷、消滅任何競爭對手的強悍決心。北京的老闆們已經基本上放棄了共產主義做為其經濟理論，並採用了資本主義，但是，當涉及到對權力的掌控時，他們卻寸步不讓。

—《華盛頓郵報》

在中國國內可以登錄的具有民間色彩的著名網站當中，烏有之鄉代表極端毛左立場，共識網則代表體制內溫和自由派和民主派立場。兩者都被當局關閉過，卻又重新開張，在左右兩端各自具有標誌性意義。

當習近平一步步完成權力集中之後，左右兩邊都爭先恐後地向其靠攏和歸心，並懷有一點小小的私心——將他往左或右的方向吸引。烏有之鄉昔日奉薄熙來為黨國救星，今天又將習近平視為毛澤東的嫡系傳人，如此華麗轉身，臉不變色心不跳。共識網在二〇一五年三月二十四日的頭條推出對已故國防部長耿飆之女耿瑩的長篇訪談，題目赫然是〈近平弟弟人品正，眼裡揉不得沙子〉。僅幾個小時內，該訪談就被若干主流官網轉載於顯赫位置。

北京有過一次上千名「紅二代」的聚會，與會者大聲支持習近平的反腐運動。習近平剛剛聲色俱厲地講過黨內不允許搞「團團夥夥」，這些「紅二代」卻敢於「頂風作案」，實在非比尋常。聚會上特別安排已故國防部長耿飆的孫子等大批「紅三代」以及更年輕的後代們發言、朗

誦詩歌、高唱紅歌，表達「紅色江山代代傳」的願望。而習近平步入仕途的第一站是擔任耿飆的秘書，「紅二代」聚會的組織者讓耿飆後人現身的細節不同尋常。耿瑩的這篇訪談與紅二代聚會是兩個可以互相印證的重要信號。

## 「紅二代」如何去污名化？

中共宣傳機構對習近平的「偶像化」過程，跟古代儒生神話皇帝一樣——在文人學士筆下，皇帝們往往一出生就具備超凡脫俗的異象、異稟，或龍飛鳳舞、彗星落地，或雙耳垂肩、雙手及膝。近期出籠的一批吹捧習近平的文章，大都描述習近平擔任基層官員之時才能出眾、胸懷大志的事跡。提供各種「寶貴細節」的，是那些當年與之接觸過的同事、上下級和記者，以此呈現還原歷史現場的「真實感」。這些文章的潛台詞無一例外都是：這位領袖早年即已展露崢嶸，一貫偉大、一貫光榮、一貫正確，是獨一無二的真龍天子。

耿瑩的訪談也是如此。這篇萬字訪談的題目本該是〈我的父親耿飆的一生〉，只有最後一個部分涉及到對習近平的評論。但是，既然時勢迥異、主客易位，編輯就斗膽換了一個具有「烘雲托月」功用的題目，不顧傳統的長幼尊卑秩序，讓習近平取代耿飆成為主人公，藉耿飆女兒之口，讓習近平曾為之當過秘書的耿飆從棺材裡爬起來，替習近平歌功頌德。耿飆是戰場上九死一生的猛將，卻被後人拉來反襯根本沒有經歷過戰爭的習近平如何英明神武，真是拉大旗作虎皮。由此，也透露出共識網及其背後一大群體制內溫和自由派、民主派，急於向習政權「輸誠」的微妙心態。

從這篇訪談中看出，耿飆在文革中受到造反派的衝擊和批判，做為耿家大女兒的耿瑩未能接受完整的教育，其知識結構和思想能力相當有限。她對共產黨的暴政缺乏基本反省，談及文革被批鬥之慘也只是感性地認為「大家都瘋了」——其實，「大家」都是遵循毛澤東的最高指示燒殺搶掠，「大家」並沒有瘋。耿瑩也為自己及同儕的「紅二代」身分辯誣：「『紅二代』這個詞，包括以前的什麼『高幹子弟』、『太子黨』，這些詞對我們來說不公平。每個人都有生的權利，我們也有，而且每個人的父母都是自己沒法選擇的，就像我也不知道為什麼我姓『耿』。外界應該是平等對待我們，不管是『幾代』。」耿瑩試圖為「紅二代」去污名化，但「紅二代」真像她說的那麼純潔無瑕、天真無辜嗎？

耿瑩的說法堪稱「此地無銀三百兩」：父母和姓氏固然不能選擇，但國人對「紅二代」、「太子黨」的深惡痛絕，不是因為他們的出身和姓氏，而是因為他們利用父輩的權勢，走馬鬥雞、肉林酒池，將國庫變為私家保險箱。在民主國家，那些總統、總理的子女同樣無法選擇本人的出身和姓氏，但他們不會有「大樹底下好乘涼」的想法，更沒有縱容這種想法的社會環境，他們大都過著尋常百姓自食其力的生活，一般也不會有媒體和公眾對他們過於關注和吹毛求疵。美國雷根總統的兒子失業後像普通人一樣領取失業救濟金，英國柴契爾夫人的兒子長期擔任一家公司的普通文員，在民眾眼中本該如此，沒有人認為「老子英雄兒好漢」是天理。但是，在中國的「黨天下」體制之下，「紅二代」和「太子黨」們靠「純正血統」，就能乾坤挪移、日進斗金，進而盤踞黨政軍各要津以及掌控國民經濟的命脈部門，這當然違背公平正義的原則。

從耿瑩的訪談中看出，她和兄弟姊妹很早就下海經商，如今究竟擁有多少身家，普通人不得而知。但若非「紅二代」和「太子黨」的背

景，焉能一夜暴富？並非大眾對「紅二代」實施污名化，「紅二代」就是一群吃人不吐骨頭的吸血鬼。「紅二代」若要去污名化，首先就應當退出官場和商場，將已經轉移和尚未轉移的非法所得上繳國庫。但是，有誰能做得到呢？

羅瑞卿的兒子羅宇是其中極少數「赤條條來去無牽掛」的叛逆者，失去了官位，卻得到了自由。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三日，比習近平年長好幾歲的羅宇在香港《蘋果日報》發表〈與習近平老弟商榷〉一文，從兩家父母的情誼談起：「本是同根生，兄弟情誼，可以說悄悄話。但專制體制下，沒渠道，只好越洋喊話了。」羅宇指出，中國社會危機的根源就是一黨專政。在現有體制下，習近平反貪根本不可能成功，「全黨都腐，無官不貪，你反貪，就是反黨」。羅宇又指出，中國唯一的生路就是有序的、逐步的民主化，包括解除報禁和黨禁、司法獨立、選舉和軍隊國家化。然而，習近平寧願傾聽耿瑩肉麻的恭維，不願聽羅宇良藥苦口之言。

## 習近平早就對軍隊腐敗洞若觀火？

耿瑩談及習近平的段落，是這篇訪談中最「有料」的部分。無論耿瑩將父親吹捧得如何天花亂墜，一般讀者對早已過世的耿飆其人並無太大興趣，卻對耿飆與習近平的關係、習近平通過擔任耿飆的秘書而熟悉軍隊事務的那段歷史有相當的興趣。由此，也可揣摩軍隊反腐的下一個步驟。

耿瑩訪談中的這段話，大概就是習近平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掌控軍權的秘訣之一：「他跟著我父親三年多，從一九七九年到一九八二年，

這段時間他也學習了很多東西。他很好學，有種向上的衝勁兒，並且很願意學。所以有這樣的機遇給他，在他這一生當中應該是一段不可磨滅的經歷，是很寶貴的。那段時間，不管我父親是到國外也好，在國內也好、港澳也好，他都跟著一塊去。他從那會開始，就已經養成一顆紅心，而現在把這顆紅心再交付給人民，我想這是他的一個使命。」倘若郭伯雄、徐才厚等軍中大老虎早點讀到這段話，知道在習近平眼中，軍隊並非鐵板一塊、獨立王國，而是太子黨的近衛軍，習近平不是對軍隊一無所知的「局外人」，從而趕緊向習近平表忠心、遞投名狀，恐怕就不至於落得「樹倒猢猻散」的淒慘下場。

江、胡在掌權之前，與軍方並無太深淵源，執政之後對軍隊放任自流，只要軍隊不要干政，對其內部的腐敗睜一隻眼、閉一隻眼。鄧小平挑選江做為接班人的時候，語重心長地傳授機宜：要把超過一半以上的時間用到軍隊工作上，軍權穩固，才能確保政權穩固。胡雖然在西藏任書記時，親自穿上軍裝、登上裝甲車，指揮軍隊鎮壓藏人的反抗，但那只是擺姿勢拍照片。胡對軍隊的控制比江還要弱，兩名軍委副主席都是江系人馬，胡對軍隊事務放手不管。但當徐才厚、郭伯雄被習拉下馬之時，不僅江被打臉，胡更是備受羞辱。軍事科學院退休少將楊春長向「鳳凰衛視」證實，「徐才厚他們壟斷了軍隊權力並架空當時的中央軍委最高領導人」——雖然沒有點名，但當時的軍委最高領導人是誰，人人心知肚明。軍委主席處於「被架空」狀態，實在太過窩囊。

習近平在為國防部長耿飆當秘書期間，對中國軍隊的運作有了通盤的瞭解。儘管國防部不是決策機構，而只是執行機構，但中國的國防部長從來都不是文職部長，而由將軍出任。所以，耿飆大概常常跟習近平談及軍中事務，習近平牢記在心中——三十年後，這些知識終於派上用場。香港《南華早報》在專題報導中更引述軍隊消息來源說，二〇一〇

年，習成為中央軍委副主席，見證了另外兩名副主席徐才厚和郭伯雄如何在胡錦濤的鼻子底下奪過軍隊人事權。審查谷俊山的決定雖然得到胡和習的支持，但居然延宕多時、無從下手。那時，習必定深深體驗到一種無力感。習不願像胡那樣「垂拱而治」，一坐上軍委主席的位置，便仗著青年時代對軍隊事務的瞭解，對軍方揮出重拳，啟動新一輪的大洗牌。

二〇一六年二月一日，北京舉行了中國人民解放軍戰區成立大會，將中國軍隊原有的七大軍區改為五大戰區。習近平向各戰區的司令員和政委授予軍旗。（原有的七大軍區是：北京軍區、瀋陽軍區、濟南軍區、南京軍區、廣州軍區、蘭州軍區和成都軍區；新建立的五大戰區是：東部戰區、南部戰區、西部戰區、北部戰區和中部戰區。）此前，習近平又把軍隊四總部改為十五個職能部門。習近平推動的這場解放軍大規模改革，將會逐步拋棄蘇聯式的指揮體系，向美國模式轉型。但是，共產黨的黨軍絕對不會變成國防軍，習近平不斷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權，說明他對軍權的看重——在獨裁體制下，軍權是其他所有權力的根基。

習近平的軍隊改革，其目的是打造一支屬於他自己的軍隊，以及一支可以滿足其對外擴張野心的軍隊。對於期待「軍隊國家化」的進步人士而言，這場軍隊改革對中國未來的走向並無正面價值。

### 習近平有「棉裡藏針」和「嫉惡如仇」的品質嗎？

耿家與習家是在血與火中淬煉出來的交情深厚的世交，否則習仲勳不會讓兒子給耿飆當秘書。習仲勳刻意培養兒子，他卻也沒有想到這段

履歷會成為習近平仕途發展中的一個關鍵性的環節。習近平這個秘書，與長官之間不是簡單的上下級關係，他與耿飆的家人也有相當的接觸。耿瑩在採訪中說，她將習當作親弟弟來看待：「我對這個小弟弟的感情，應該說，跟對我親生弟弟的感情是一樣的。」耿瑩還回憶耿飆去世時，已經是福建省副省長的習前來參與了葬禮的全過程，包括參與整理骨灰，宛若耿家後輩一般，以此顯示習是一個念舊情的人。

緊接著，耿瑩使用最美好的言辭讚美習：「首先，他人品正，絕對沒有邪的歪的念頭。另外，他睿智、聰明。我比他大，是大姐姐。主席說鄧小平是棉裡藏針，我覺得我這個小弟弟絕對也是棉裡藏針，他眼裡揉不得沙子，容不下那些歪的邪的念頭，而且他嫉惡如仇，性格非常堅韌。」

耿瑩用「棉裡藏針」和「嫉惡如仇」八個字為習畫像。然而，習當不起這八個字。

以「棉裡藏針」而論，習近平掌權前後確實判若兩人：掌權前笑容可掬、謹言慎行，給人以憨厚老實、泥塑菩薩的印象；掌權後惡向膽邊生，一副方今天下、捨我其誰的傲慢姿態，黨內鬥爭毫不手軟，對外擴張野心勃勃。但這絕不能說明習近平善於「藏拙」，或者「大智若愚」，而只能驗證阿克頓勳爵的那句名言——「權力使人腐敗，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腐敗。」若更準確一些，只需將「腐敗」換成「專橫」即可——「權力使人專橫，絕對的權力使人絕對專橫。」換言之，是專制制度將棉花變成針，而不是習近平兼有「棉」與「針」兩種品質，可以「剛柔相濟」、收發自如。

以「嫉惡如仇」而論，習近平打擊腐敗看似暴風驟雨，但打掉的全是其他派系的人馬，難道他的圈內人和親信當中，沒有腐敗分子嗎？更深一步追問，腐敗固然是惡，竭盡全力地維持共產黨一黨獨裁的統治則

是更大的惡——這恰恰是習近平和耿瑩們追求的最高目標。耿瑩反覆強調黨要恢復與群眾的魚水關係，甚至引用耿飆晚年的一個「天問」——耿飆晚年赴蘭州貧困地區視察，對地方幹部說：「我問你們，如果你們現在犯了錯誤，還有沒有老鄉給你們求情？你們誰告訴我，有還是沒有？」答案是否定的，老百姓對貪官污吏的痛恨，到了恨不得食其肉寢其皮的地步。三十多年後的今天更是如此。老百姓為習的反貪鼓掌，並不能說明習多麼得民心，如果習有一天垮台，並被冠以貪腐的罪名，人們的掌聲肯定更加熱烈。

緬甸軍政權首腦丹瑞大將的女兒曾經攻擊翁山蘇姬，提出與之「單挑」。翁山蘇姬輕蔑地回答說，如果我們兩人隻身走上街頭，走過貧民窟，看老百姓會把誰打死，看誰能全身而退？這個問題也可以讓習近平和耿瑩們來回答：若是到了中共崩潰的那一天，你們敢走入憤怒的人群之中嗎？那時，還有沒有同情你們的老鄉呢？

## 即便是好貓，也救不了這末世殘局

耿瑩的談吐雖然庸俗淺薄，卻也通過對鄧小平一句名言的「創造性轉化」來描繪習近平，頗為傳神。習尚未掌權時，在地方上任職多年毫無出色的政績，在相當長一段時期內被眾人所輕看。若不是輕看習，周永康、徐才厚、令計劃等人又豈會一敗塗地？

且看耿瑩是怎樣說的：「鄧老爺子有一句話說，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我就不太同意。我覺得鄧老爺子說這句話有點偏，偏在哪裡呢？因為按照上世紀八、九十年代的狀況來說，抓住耗子的絕不是好貓，不抓耗子的才是好貓。為什麼？因為不抓耗子的貓，會觀察抓耗子

的貓是先咬脖子還是先咬肚子，牠抓得對不對、好不好，然後再做判斷。而上來就抓耗子的不見得是好貓。」然而她話鋒一轉，對習執政以來的反腐讚不絕口：「現在近平雷厲風行了一年多一點，在這個一年多中他做的那些事，那才是好貓該做的事。」

耿瑩居然敢改動鄧小平的話，這個細節背後隱藏著一段鄧小平與耿飆的矛盾衝突。八十年代中英談判香港問題時，時任國防部長的耿飆曾公開宣稱，香港回歸後，解放軍可以不在香港駐軍。鄧小平聽到之後破口大罵，斥責耿飆未經授權而私自讓步，出賣國家利益。耿飆從此被打入冷宮，不久黯然隱退。

耿瑩這一次似乎要為父親報一箭之仇，公開對鄧小平的「貓論」表示不滿。十多年前，自由派雜誌《方法》因為刊登學者余世存的文章，文章對鄧之「貓論」和「摸論」有所調侃，立即被中宣部勒令停刊。如今，習崇毛甚於崇鄧，耿瑩這才敢於對鄧老爺子有所不敬，這樣的言論也才施施然地出爐，並得到新聞檢查官的「開綠燈」放行。

總而言之，耿瑩的意思是說，習是一隻後發制人的「好貓」。與之相比，先發制人、鋒芒畢露的薄熙來，固然也有「唱紅打黑」的累累碩果，卻落得個「出師未捷身先死」的結局，當然算不得「好貓」。習不聲不響地收攏權力，然後風捲殘雲、直搗黃龍，老鼠聞風喪膽，老虎垂頭喪氣，還有誰敢與之爭鋒？但是，「好貓」就能拯救這末世殘局嗎？

清華大學教授孫立平在《財經》雜誌的年會上，發表演講指出，中國各級政府不擇手段、授權作惡，中國已經淪為與法治格格不入的國家，一場靜悄悄的革命已經發生，中共的統治模式已經進入尾聲，「十年到不了，五年差不多」。換言之，習近平統治的倒計時如沙漏一樣展開，他已來日無多。

# 你的飯，你的鍋，你的國

這六十多年來，中國像一台巨大的榨汁機，最先掉進去的是農民，後來是工人，後來是城市平民。如今，城市中產階級已經被放置在這個榨汁機之中。這種榨取與傷害，過去僅僅是被理解為百分之三十七的宏觀稅負或者是住房、教育、醫療的高代價，現在看來，還與人身安全、生命財產相關聯。比如北京的霧霾，成為許多人移民的最大理由。這也意味著，中國中產階級在過去十多年的鴛鴦政策宣告破產。

—戴若瑜

習近平的「歪理邪說」，數量之多、程度之低，超越了鄧、江、胡三朝，直追說話喜歡帶髒字的毛太祖。習發明的「新語」，讓歐威爾的「新語詞典」亦黯然失色。習是神龍教教主，或是《天龍八部》中最喜歡門人阿諛奉承的「星宿老怪」丁春秋。在「習式新語」中，最邪門的就是「砸鍋論」。

## 習近平是「砸鍋論」的始作俑者

二〇一四年十月二十二日，新華社發表網評〈杜汶澤們，休想吃我們的飯，還砸我們的鍋〉，嚴厲批判香港藝人杜汶澤等人支持佔中運

動。這篇社論警告香港藝人不能支持民主運動，否則就不能到中國市場撈錢。作者刻意強調「你們」和「我們」之差別，即追求民主的人與熱愛共產黨的人之差別。這個觀點背後是共產黨的「養豬哲學」：只要「你們」聽「我們」的話，「我們」就給「你們」飯吃，否則「你們」只能腹中空空、一無所有。

「砸鍋」之說，不是御用文人的突發奇想，而大有來頭。三天之後，中國社會科學院屬下的「國家文化安全與意識形態建設研究中心」官方微博「@思想火炬」披露「砸鍋論」的來源：「習近平對意識形態工作再發重要指示：要在重大問題上與黨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絕不允許與黨中央唱反調，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該消息來源準確無誤：做為首席智囊機構的社科院，萬萬不敢編造領袖語錄，那可是假傳聖旨的欺君之罪。

這段話迅速出現在中國各大學及文化機構的官網上。據說，這段話跟一份秘而不宣的「三十號文件」有直接關係。那份神秘文件指出，要警惕受西方影響的新聞獨立觀念、「普世價值」及對毛澤東的批評，這些言論威脅到黨的「生死存亡」。把異見的存在當作是對黨的生存的威脅，這個黨實在太孱弱了。

在薄熙來垮台之後一度偃旗息鼓的毛派，重新集結在習近平周圍。他們為習的毛式語言、毛式思維和毛式政策大聲叫好。知名新毛派、中央民族大學教授張宏良公然表示：「現在中國對左派來說是黃金時代，習上台以來，跟過去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可以說是石破天驚的大變化。」既然習是「加強版的薄熙來」，「薄迷」當然迅速改旗易幟成為「習迷」，他們萬變不離其宗的身分乃是「毛迷」。

緊接著，中國紅色文化研究會、中國政治學學會科學發展與政治和諧專業委員會等半官方半民間的機構，在京舉辦「掌握意識形態鬥爭主

動權理論研討會」。有關人士對「砸鍋論」做出全面解讀：「必須明確告誡人們：跟誰走才有好處、有前途，跟誰走沒有好處、沒有前途。要讓正派人，堅持馬克思主義的人，和黨一條心的人吃香，讓和境外敵對勢力眉來眼去、勾勾搭搭的人風光不再。在中國這塊土地上，無論什麼人，只要發議論，就不能違犯《憲法》，不能背離黨的基本路線，不能向以習近平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叫板。尤其是體制內的人，絕不允許吃共產黨的飯，砸共產黨的鍋，而不管你資歷多深、名聲多大。」這個說法刻意營造出一種山雨欲來風滿樓的肅殺氛圍。學術界、文化界和教育界開始清查與西方的聯繫，並戮力清除「自由主義的思想毒素」。

「砸鍋論」不僅對黨外適用，還是黨內整風的利器。外人不能「砸鍋」，黨內上上下下，更要齊心守護這口鍋。中組部原部長張全景在《紅旗文稿》雜誌上發表文章，嚴厲批評「個別黨員吃黨的飯砸黨的鍋」。這是黨內清洗的信號，黨內不允許獨立思考，黨內也不能有言論自由。這篇文章中有一句話可以詮釋「砸黨的鍋」之真義：「有些人用錯誤觀點、錯誤理論，甚至用一些胡編亂造的事實污衊黨、污衊黨的領袖。」至此，這篇文章道出了習近平匆匆拋出「砸鍋論」的真實原因：近年來，當局雖然對主流媒體嚴密控制，但黨員和民眾在日常生活中，仍然毫不檢點地發表對從毛到習的歷屆黨魁的「不敬」的言論。

媒體上沒有真相和真話，人們便創作「段子」自娛自樂。由此形成具有中國特色的「段子文化」，連官員們也喜歡講「段子」和傳「段子」。中共黨員、央視著名主持人畢福劍，在飯局上對毛太祖嬉笑怒罵，視頻在網路上廣為傳播。結果，畢福劍的節目被停播，央視紀委宣佈要對其嚴懲。在江和胡時代，當局對民間批判毛的言論，以及黨員和群眾私下裡譏諷時政的言論，基本不予理會；習卻要將這一點自由收回：即便在飯局上，也不能有隨意議論政局，更不得用社交媒體傳播各

種「動搖國本」（也就是砸鍋）的言論。

## 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習近平自打耳光

習一手在傳統媒體和網路上圍堵和封殺「污衊黨和黨的領袖的言論」，另一手則積極炮製新的理論和話語體系，為掀起新一輪的個人崇拜開路。

習宣稱，鍋和飯都是共產黨提供的。但共產黨從一誕生起就是不事生產的革命黨，哪來的飯？哪來的鍋？當然是劫掠而來。中共官方史家以「竊國大盜」形容袁世凱，共產黨自己才是「竊國大盜」。在其「打江山」的時代，共產黨的財源，或是從蘇聯老大哥那裡乞討而來，或是綁架地主和資本家及其家人、敲詐贖金而來，或是在延安廣植罌粟、販賣鴉片而來，全都上不得檯面。而在其「坐江山」的時代，共產黨如吸血鬼一樣，以民脂民膏為養料，其高官顯貴個個長得像毛澤東、習近平一樣肥頭大耳。在風調雨順的和平年代，共產黨製造了活活餓死數千萬平民百姓的大饑荒。這樣一個綁匪集團，還有什麼資格談鍋和飯的事情呢？

習近平及其幫閒文人團隊製作的「砸鍋論」，遭到經濟學家茅于軾嚴詞反駁。茅于軾在《金融時報》中文網發表一篇題為〈是誰養活了誰〉的文章指出：「事實上有少數政府官員並不是為納稅人服務的，而是專門來干涉百姓的自由，甚至侵犯百姓的憲法權利的。……對於這批專門干涉公民權利的官員，就不是誰養活誰的問題。他們變成了傷害社會肌體的寄生蟲，必須儘快清除出去。」換言之，飯和鍋都是人民通過辛勤的勞動得來的，不是共產黨施捨的。習和他的黨，未經選舉，未獲

授權，不是給大家飯吃的「掌杓人」，而是一群貪得無厭的碩鼠。共產黨以救世主自居，常常威脅國民說，沒有共產黨，就會天下大亂。其實，如果沒有共產黨，中國人一定早就過上富裕、幸福、自由的生活。

不必茅于軾專文駁斥，習近平此前就打了自己一記響亮的耳光。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二十六日，習近平在山東菏澤調研，面對部分市、縣委書記，現場送一副對聯：「得一官不榮，失一官不辱，勿道一官無用，地方全靠一官；穿百姓之衣，吃百姓之飯，莫以百姓可欺，自己也是百姓。」這是清代康熙年間的進士高以永在擔任內鄉縣知縣時撰寫的楹聯。青年時代在延安農村當過知青的習近平，似乎比滿清的縣官更深知「土裡刨食」之艱辛。

習以此訓導地方官員，表明他認同這副對聯背後的事實：各級官僚乃至皇宮內院的飯和衣，全都來自老百姓「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勞作。官僚切勿「四體不勤，五穀不分」，騎在人民頭上作威作福，「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那麼，為什麼僅僅一年多以後，習就忘記了這副他曾經朗朗上口的對聯，居然炮製強詞奪理的「砸鍋論」？

如今，鍋還在，鍋裡的肉早被太子黨明搶暗偷、搬運一空。即便共產黨的統治可以用一口鍋形容，它也到了分崩離析之關節點。「砸鍋」的，不是支持佔中的香港藝人，更不是國內外的異議人士和維權律師，而是共產黨內部遍佈要津的貪官污吏——包括習自己。

## 從「強國」到「你國」

共產黨自認為最大的功勞，是把鍋做大，把國做強。習登基之後，

「強國夢」一夜之間從異想天開變得觸手可及：中國的經濟總量直逼美國，即將成為世界第一，毛主席「超英趕美」的狂想不再是畫餅充饑。俄國總統普丁直接派兵吞併克里米亞，用導彈摧毀民航客機，並粗暴干涉烏克蘭內政，國際社會反應遲鈍—習近平會不會效仿他心中的偶像，在香港動用解放軍鎮壓民眾的抗爭，甚至以賭徒的心態對台灣動武呢？

天朝心態，虛驕氣氛，瀰漫朝野，從習近平到孔慶東，個個如趙括般「紙上談兵」。日本戰略學者岡崎久彥認為，中國是一個崛起的威脅，如同一戰前夕的德國：一個世紀前國際社會對德國的戒懼，在一九〇七年面臨重要轉折，人們的心情從「焦慮」轉變成「夢魘」。他以相同的詞句描述中國的發展趨勢，尤其專注於中國高漲的民族主義和擴張軍備方面。

不過，許多國家的民眾並未注意到流行於學界的「中國威脅論」，倒是對蜂擁而至的中國遊客滿懷希望—這些出手闊綽的中國人，或許能振興全球旅遊業。然而，短暫的蜜月剛過，他們就對這些暴發戶心存疑懼：中國遊客在羅浮宮門口的噴泉裡洗腳，在東京搶購馬桶蓋子，在加州的華人月子中心生下美籍寶寶，在台灣의公共場合隨地大小便，在香港搶購奶粉和日用品……雖然不至於被當作「黃禍」，卻也離「蝗蟲」不遠。

美國第二任總統約翰·亞當斯說過：「政府只有一個要素，那就是人民。一切政府均源於這一要素。」中國的獨裁者們也不時發表類似言論。毛親筆題詞「為人民服務」，鄧矯情地自稱「中國人民的兒子」，習宣稱「始終與人民心連心，同呼吸，共命運」。被迫成為鄧小平和習近平「爸爸」的「中國人民」，一覺醒卻發現，自己落入專門「坑爹」的「孽子」之手—「強國人」含辛茹苦地存錢買房子，房子卻被政府和開發商炒成天價，房地產儼然是政府的印鈔機。即便你買了房子、成了

房奴，卻只有七十年的土地使用權，而沒有土地所有權。「強國人」好不容易積攢一點保命錢，懷著僥倖心理投資到股市，殊不知股市是太子黨圈錢之地，小戶、散戶血本無歸。二〇一五年七月，中國股市崩盤，不知多少普通百姓欲哭無淚，在微信上發誓說：「我們不再炒股，不再愛國，我們要當美國和日本的『帶路黨』。」

「強國人」的身分並沒有讓多少中國人揚眉吐氣，在富翁和專業人士當中，一大半都已經移民或正在移民。央視主持人字正腔圓地宣稱「我國」如何、「我國」如何，網民卻讓「你國」這個新詞口耳相傳——在中國，除了幾百個太子黨家族之外，沒有幾個「強國人」有幸福感和安全感。習要打造強國，可惜國民不是國家的主人，大家都袖手旁觀習的獨角戲。

當年，毛澤東對在蘇聯留學的青年人說，世界是你們的，也是我們的，但歸根結底是你們的。然而，直到今天，共產黨仍壟斷一切，飯是共產黨的，鍋是共產黨的，國是共產黨的，還有什麼不是共產黨的呢？既然飯和鍋都被黨國握在手中，誰又敢不就範呢？人民只好消極抵抗，偏以「我國」為「你國」。台灣太陽花世代喊出「國民黨不倒，台灣不會好」的口號；同樣，在中國，人民共同的信念是「共產黨不亡，『你國』不會變成『我國』」。

## 解放軍能否一戰？

百姓看到的解放軍並非是威武之師、文明之師，而是驕橫之師、腐敗之師。

—《東方日報》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正在軍國主義化嗎？抑或只是在擴大軍力？兩者的區別顯然不只是語義上的。說一個國家正在軍國主義化，意思是這個國家打算要使用自己的軍隊了，打算向外擴張了，其衡量標準也不僅僅是艦船、飛機和坦克的增長，還包括行為方式的變異。

從以下四個事實可以判斷習近平的擴軍備戰已然到了何等瘋狂地步。其一，二〇一三年十一月，中國國防部宣佈劃設東海「防空識別區」，要求所有飛經該區域的飛機配合中方識別身分，該識別區包括東中國海，以及一些日本、台灣宣稱擁有主權的島嶼上空。據一名中國前官員說，此舉甚至把中國外交部打了個措手不及。「通常這樣的事情要經過多輪磋商後才能完成。」一名西方外交官說：「他們（中國國防部）差不多是直接拋了出來。」在中國，國防部相對於掌握實質性軍權的中央軍委來說，只是一個禮儀性的機構。做出單方面劃分防空識別區決策的，不是國防部的官員，毫無疑問是新任軍委主席習近平。

其二，央視播出一張衛星圖片，顯示三艘潛艇停靠在中國海南島的一個絕密基地。報導稱，這些潛艇是中國海軍最先進的核動力攻擊潛艇。專家們表示，它們將展開中國核動力潛艇的首次遠程巡邏。如同作

家王力雄在預言小說《黃禍》中所描述的，中國鷹派將領將核動力潛艇做為中國弱勢海軍的殺手，一旦戰爭爆發，即便海軍的艦艇全被對方摧毀，這些隱藏在茫茫大海深處的潛艇仍然可以對敵國發動可怕的核打擊，一舉扭轉敗局。

其三，習近平訪美期間，與美國總統歐巴馬完全沒有交集的議題是南海的危險爭端。美國太平洋艦隊司令、海軍上將哈里斯指出，中國方面通過大規模挖沙行動，在偏遠的礁石上填海造陸，建立港口、兵營、甚至飛機跑道，宛如建造一道「沙長城」。中國單方面實施填海造島，使該區域成為一觸即發的火藥桶。日本、台灣、菲律賓、越南等周邊國家不願坐以待斃，邀請美方提升在該區域的兵力，以維持這一區域的戰略平衡。儘管歐巴馬苦口婆心地勸阻中方玩火自焚的行徑，習近平卻無動於衷地加以反駁。

其四，中國改造完成從烏克蘭購買的舊航母之後，立即宣佈建造第二艘航母。二〇一五年，中國的國防開支增長百分之十點一，這是中國國防開支連續第二十七年保持或接近兩位數的增長——而中國並不面臨外敵入侵的危險，處於十九世紀以來最漫長的一段和平時期。即便居安思危，亦毋須窮兵黷武。日本抱怨說，中國的軍費開支是日本的三倍，佔全亞洲軍費開支的三分之一。根據瑞典斯德哥爾摩國際和平研究所的一項最新研究，過去五年，中國武器出口增長百分之一百四十三，成為全球第三大武器貿易國。

對於習近平來說，中國實現軍國主義化，首先就要將解放軍打造成一支可以一戰的「鐵軍」。那麼，中國的解放軍究竟能否一戰呢？

政治體制不改，軍隊改革只是修修補補

二〇一五年解放軍「八一」建軍節前夕，習近平特別視察駐紮在東北長春的第十六集團——那是被整肅的前軍委副主席徐才厚的老巢。習在講話中表示，徐「對部隊建設的損害是全面的、深層次的」，「要從思想上、政治上、組織上、作風上徹底肅清徐案件的影響」。

徐才厚案是觀察中國軍隊戰鬥力的一個重要窗口。調查人員在徐才厚家查獲一噸多現金和寶石，其豪華別墅中滿坑滿谷的奢侈品裝滿了十二輛卡車，整整花了一個星期才登記完畢。徐才厚落馬牽扯出排名在他前面的另一名前軍委副主席、一度是中國地位最高的職業軍官郭伯雄。圍繞在徐才厚和郭伯雄周邊多達六十多名將軍也相繼被抓。郭伯雄和徐才厚的貪污腐敗，並非「孤例」，他們形成一張巨大的網路，幾乎所有將領的升遷都要通過賄賂手段。腐敗已深入解放軍肌體和血液之中。

習近平一邊讓反腐風暴席捲此前宛如獨立王國一般的軍隊，一邊宣佈對軍隊體制動大手術。他的權力超過江澤民和胡錦濤，制定出雄心勃勃的軍隊改革計劃。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研究員陳剛評論說：

「習近平一方面依賴軍中『紅二代』將領的支持，另一方面依靠中紀委、軍紀委對軍中過去二十年形成的既得利益集團展開最後的攻勢。習近平希望通過軍中的『大換血』和『大重組』，培養一大批注重『作戰能力』而非『撈錢能力』的解放軍少壯派，把每年大幅增長的軍費預算真正用在作戰部隊和作戰裝備上，為未來中國更為強硬的外交和國防政策做好準備。」中共內部權力鬥爭的焦點，一直在「黨指揮槍」和「槍指揮黨」兩者之間移動，習近平所要實現的是前者，所要避免的是後者。

具有諷刺意義的是，儘管習近平骨子裡極端反美，軍隊改革的目標卻參照美軍模式。海外媒體報導的軍隊改革方案包括：軍委總部和指揮機關重組，總參謀部升格，仿照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重建為由各兵種

將領組成、為軍委主席提供決策參考的軍事智囊式機構。總後勤部和總裝備部合併，更名為後勤保障部。現有七大軍區撤銷，改為五大戰區。所有軍官在任職期內要向部隊和基層流動。而被徹底撤銷的軍區正好是徐才厚、郭伯雄的發跡地。此次改革還涉及重新調整指揮結構，將給予空軍和海軍獨立指揮權。此舉反映了戰略重點的轉變——以前的重點在於對蘇的陸地戰爭，現在則轉向對西太平洋地區投射海軍力量。

然而，如果中國政治體制不改，軍隊改革就只是零敲碎打，無法脫胎換骨。軍隊不可能脫離社會大背景而獨立存在，什麼樣的社會制度和結構，就會衍生出什麼樣的軍隊。《金融時報》專欄作家查理斯·克洛弗指出，習近平軍隊改革的目的是改變胡錦濤時代黨魁無法直接控制軍隊的情形，讓解放軍絕對服從習個人的領導。但是，解放軍最根本的問題，不在於軍隊的不服從，而在於管理不當。幾十年來，軍隊一直像私人領地，賄賂與庇護現象嚴重。《紐約時報》評論說：「習近平重組和重振軍隊的計劃，與經濟改革一樣，都是二〇一三年宣佈的一項雄心勃勃的全面計劃的組成部分。自那之後，政府制定了一些措施，但很多觀察人士認為，這些舉措往往不夠堅決，也缺乏透明度，並未兌現習近平的大膽承諾。」

若不把黨衛軍變成國防軍，若不把獨裁制變成民主制，中國軍隊就不可能贏得人民的支持和尊重，更不可能成為一支真正有戰鬥力的、「保家衛國」的軍隊。但是，習近平拿出的藥方卻是變本加厲地強調「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他真的是「不到黃河心不死」。

要求軍人體重達標，習近平會帶頭減肥嗎？

中共軍委四總部聯合頒發《軍事體育訓練改革發展綱要（二〇一五至二〇二〇）》。引人注目的是，綱要中有一個所謂的「軍人體重強行達標」的新措施：「實行軍人體重強制達標、推行軍事體育訓練與人事管理掛鉤、建立軍事體育訓練榮譽體系等配套政策。」雖然關於軍人體重標準的具體數據並未同步發表，但看起來似乎要動真格的了。

此前，《解放軍報》曾報導說，由總裝防化研究院某研究所承擔中國陸軍人體參數測量資料庫的項目。最後得出的資料顯示，與二十年前相比，解放軍官兵平均身高增加二厘米，腰圍增加五厘米。面對這個數據，訓誡軍隊要「能打仗、打勝仗」的習近平，不知是喜是憂？喜的是，跟面黃肌瘦、越境奪食的北韓軍人相比，中國軍人吃香喝辣，終於「胖起來」了；憂的是，過於肥胖的中國軍人養尊處優，演習如演戲，究竟有多少作戰能力呢？一位曾赴美與美軍交流的解放軍軍官感嘆說：「所有的美軍人員，無論是軍官和士兵，絕少能看到肥胖者。軍官的軍姿挺拔，渾身透著精幹。在中國的城市裡，隨處可見肥頭大肚的軍人，整個人呈現下墜的感覺。」美國胖子很多，但美軍中找不到一個胖子。

解放軍鷹派將軍羅援針對軍中普遍的肥胖症現象大聲疾呼：「未來戰爭軍人比拼的是肌肉而不是肥肉。」然而，上樑不正下樑歪，做為中央軍委主席、三軍總司令的習近平，就是肥頭大耳者，他本人會參照這個新頒佈的軍人體重標準，嚴格實施減肥計劃嗎？

做為三軍總司令的美國總統從來沒有一個胖子（一名研究美國總統的學者指出，歷屆總統中，從來沒有一個人的體重超過當時的平均值），習近平引以為知己的俄國總統普丁也是身手矯健的肌肉男。美軍中專門有一項軍官體形標準規定，一旦軍官體重超過規定標準，就會受到警告，並被要求限期整改，整改後達不到標準的，不能在軍隊服役。原海軍作戰部副部長、四星上將亞瑟，曾被提名擔任美軍太平洋總部司

令，但由於體重超過規定，未能通過參議院的審查，被勒令提前退休。

與之相比，中國的高級將領並沒有為全軍做出良好表率。「博訊新聞網」記者西諾撰寫了一篇題為〈軍委大肚漢排名〉的報導，將現任中央軍委委員的體型指數分為從一到五的不同等級，根據媒體公開發表的照片逐一對比和分析：總後勤部部長趙克石和軍委副主席許其亮的體型指數均超過三，屬於肥胖等級，必須經過長期、刻苦的訓練才能達標；軍委主席習近平和總裝備部部長張又俠的體型指數均超過四，屬於比較肥胖，這兩位很難通過訓練達標，最好的辦法就是下崗；至於解放軍最年輕的少將、「毛太孫」毛新宇，體型指數已超過五，屬於超級肥胖等級，只有去北韓掛職鍛煉幾年才能解決問題。

彼岸的台灣總統馬英九，在接受媒體專訪時炫耀說，除了國事以外，對自己的身體狀況管理甚嚴。每天要量三次體重，早起一次、運動完一次，雖然六十五歲仍維持標準體格，身體質量指數屬於正常範圍。馬英九表示，維持身材的方法，有少吃、運動兩大原則。他維持每天晨跑的習慣，從一九七五開始，迄今已長達四十年。民進黨立委蔡其昌諷刺說，馬比較適合去當道德重整委員會委員長。也有網友質疑說，有需要每天量三次體重嗎？馬到底是在當總統，還是在當模特兒？

不過，馬英九對自身體重和體型的高度重視，倒是習近平效仿的對象。馬英九可以貢獻給習近平的寶貴禮物，或許就是他保持身材的秘方。

## 中日新甲午海戰，結局將怎樣？

中國擴軍備戰，首要的敵人當然是日本。習近平是中國歷屆黨魁中

最反日的人，就連親歷日本侵華戰爭的毛澤東後來都對日本人極其友好，而明明是在中共建政之後出生的習近平偏偏要強調他對日本侵華造成的苦難多麼記憶深刻。習近平反日，不單單因為兩國的歷史糾葛，更因為他要做亞洲霸主，必須先擊敗日本，並讓日本的盟友美國知難而退。

那麼，中日之間若真發生戰爭（當然主要是海戰，因為民主日本不太可能動用陸軍入侵中國），結果會跟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戰爭截然相反嗎？

中日之間在東海擦槍走火的機率不斷上升，甲午海戰的劇本有可能再度上演。中國歷史學者姜鳴在《龍旗飄揚的艦隊：中國近代海軍興衰史》一書中探討了北洋艦隊在甲午海戰中一敗塗地的原因。從一八七四年討論南北洋海防，到一八九五年北洋海軍覆滅，前後歷時二十一年。曾幾何時，這支艦隊無比顯赫，號稱世界第六大艦隊，是洋務運動中的一顆璀璨明珠，也是中國軍事近代化事業的象徵。它曾經開赴墨西哥阻止當地的排華政策，讓當地華僑倍感天威赫赫。然而，好景不長，很快中國海軍便從巔峰狀態跌落下來，直至全軍覆滅。

做為當事人的清末重臣李鴻章嘆息說：「十年以來，文娛武嬉，釀成此變。平日講求武備，輒以鋪張靡費為疑，至以購械購船為厲緊。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敵而淆於群哄，輕於一擲，遂至一發不可復收。」可見，戰爭不單單是武器質量和官兵素質的對決，更是經濟水準、政治制度、管理水準、人員素質和精神狀態的競爭。

當時，日本如何評價中國海軍的實力？中國在中法戰爭之後創設海軍衙門，宏辭偉議，綱目條舉，引起日本的恐懼。日本政治家和漢學家副島種臣評論說：「謂中國海軍之可慮，則實不足以知中國也。蓋中國之積習，往往有可行之法，而絕無行法之人；有絕妙之言，而絕無踐言

之事。先是以法人之變，水軍一旦灰燼，故自視懷慚，以為中國特海戰未如人耳……於是張惶其詞，奏設海軍衙門，脫胎西法，訂立海軍官名及一切章程，條分縷析，無微不至，無善不備。如是，而中國海軍之事亦即畢矣。彼止貪虛有其名，豈必實證其效哉？又何曾有欲與我日本海軍爭衡於東海之志哉？」旁觀者清，他對中國體制和人心的病入膏肓看得清清楚楚，中國海軍外強中乾、不能一戰。

今天中國當局的「文娛武嬉」、「虛有其名」更甚於清末。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習近平不可能一夜之間鏟除軍中腐敗，讓解放軍煥然一新。閱兵式上正步踢得好的軍隊，未必是有實戰能力的軍隊。習堅持個人獨裁，軍隊更是其愚民教育的大本營，這樣的軍隊如何應對現代戰爭？

今天的日本軍官和學者，對解放軍的專業水準有著精準的評估。被稱為日本瞭解中國海軍「第一人」的海上自衛隊前軍官山內敏秀，在接受BBC訪問時一反日本人的謙遜個性，嚴肅地指出：「我很自信地說，我們在上海訓練的時間至少比中國海軍長，我們在 seamanship 上比中國海軍優秀。」英文 seamanship 指的不僅是操船技術，更多側重航海的技術和經驗。山內認為，在這方面日本更具優勢，「海軍不是僅僅是操作艦船，而是無論在什麼情況下，船要與海成為好朋友，完成作戰的任務」。山內接著提到另一個英語詞「man-machine system」，即「人與機器一體化」。他認為，只有「人與機器融為一體，才能發揮最大效力」，日本在這方面也有優勢。

那麼，中國海軍有何優勢？山內敏秀指出，中國海軍追求量，有數量龐大的艦隻，「儘管中國海軍有數量上的優勢，但是很多船艦得進博物館了」。中國海軍「旅滬級」驅逐艦還不錯，但處於試用階段，要投入實戰還需磨合若干年。目前，能跟日本先進海軍作戰的中國艦艇，還

只是做為字面上的型號而存在。

日本自衛隊前統合幕僚會議議長（相當於總參謀長）夏川和也認為，雖然中國軍力近年來發展迅速，但官兵質素和武器質量遠不如日本自衛隊，一旦開戰，以《日美安保條約》為基礎的日本防衛體系可勝。夏川在《日中會爆發海戰嗎：中國進入海洋步伐加大和日本的對應之策》一書中指出，解放軍與日本自衛隊差距仍然很大，「儘管中國海軍有了核潛艇和航母，但一旦發生軍事衝突，所有的一切都將成為日本海上自衛隊和美國絕好的攻擊目標」。夏川又說：「自衛隊的素質是中國的至少一點五倍，最看得出士兵訓練程度的是發射導彈及操作艦船的能力，自衛隊一直是和美國海軍共同演習，相信熟練度是世界第一流的。」日本陸上自衛隊退役將領福山隆更是聲稱：「如果不考慮彈道導彈，我們一週就能殲滅全部中國艦隊。」

這些被封鎖在國門之外的、中國的憤青們看不到情報，一定會擺在習近平的辦公桌上。習雖然傲慢自大，卻也深知自己和對方的虛實：即便美軍不介入，中國海軍亦不是日本海上自衛隊的對手。對日作戰是自尋死路，只會加速共產黨政權的滅亡，就像沙俄參與一戰而國破家亡一樣。所以，習近平只敢利用民間的憤青掀起反日遊行示威，自己躲在背後看熱鬧。

## 俄美兩國都不看好解放軍

二〇一五年，根據瑞士瑞信銀行（Credit Suisse）和世界軍力排名網「全球火力」（Global Firepower）先後發佈兩份排名，按照軍隊紙上的實力，中國軍隊僅次於美國、俄國而名列世界第三。習近平看到這個排

名，大概會欣喜若狂。但俄國和美國對解放軍都沒有太多正面評價，在他們眼中，解放軍不是一支可以一戰的強敵。

中國軍隊自從那場很丟臉的、損兵折將的中越戰爭之後，已經有將近三十年時間沒有實戰經驗了。換言之，即便參與過中越戰爭的官兵，大都到了退役年齡，如今掌權的將領中再無有實戰經驗者。而俄國和美國的軍隊近年來常常應對各種形態的戰鬥，可謂百煉成鋼。習近平妄圖依靠解放軍這支養尊處優、貪腐無度的軍隊為其打天下，恐怕是南柯一夢。

二〇一五年秋，中俄進行了號稱空前規模的遠東海上聯合軍演。中方參加演習的包括驅逐艦、護衛艦、登陸艦、綜合補給艦等七艘，以及空軍預警機、殲擊機五架；俄方也派出水面艦艇、潛艇、固定翼飛機、艦載直升機、海軍陸戰隊等兵力。實彈演習階段共投入五百多名海軍陸戰隊、二十多艘軍艦、潛艇和保障船，二十多架飛機及數十輛裝甲車輛。

據俄羅斯《觀點報》網站報導，通過這場俄中有史以來規模最大的海上聯合演習，俄軍高級將領深切感覺到中國海軍實力不足，現代化程度不夠，並在很大程度上依賴俄羅斯販賣的二流軍火。俄國人斷言，日本艦艇技術比中國強得多，解放軍連印度的遠洋海軍戰略也沒有。總之，中國海軍還談不上全球戰略的水準。

俄羅斯媒體指出，中國在建設遠洋海軍的漫長道路上，唯一「並不牢固的盟友」是俄羅斯。莫斯科不斷賣軍艦、潛艇給北京，還提供人員培訓，更出動「瓦良格」號導彈巡洋艦和中國最精銳部隊聯合軍演。但在所謂「傳幫帶」的過程中，俄軍發現中國官兵對很多武器至今還存在使用問題。俄國人失望地表示，無論怎麼幫助中國，都像上世紀七十年代前蘇聯幫助埃及和敘利亞一樣，這些落後國家耗費幾百億美元引進前

蘇聯先進戰機、導彈，仍然一次次慘敗給以色列。

習近平甘當普丁的小弟，普丁卻並不願意提攜這個小弟。表面上看，中俄關係進入當年中蘇翻臉之後難得的一段蜜月期，但兩國的實質性問題並無改觀，即俄羅斯在遠東和中亞的利益與中國存在嚴重衝突。俄國對中國勢力進入西伯利亞和中亞心存疑懼，俄國對在其境內的中國商販的歧視和限制堪稱世界之最。俄國不願將先進武器和軍事技術賣給中國，中俄軍貿一直舉步維艱。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普丁向印度慷慨提供「戈爾什科夫元帥」號航空母艦，以及「獵豹」號核潛艇，這些艦隻都構成中國遠洋艦隊通過印度洋的天塹。

美國方面，除了部分鷹派過於誇大解放軍的實力之外，政界、軍方、學者和智庫對解放軍的戰力都有清醒的認識。美國智庫蘭德公司曾發表一份題為《中國未完成的軍事變革：對解放軍弱點的評估》的研究報告，美國前駐華武官卜思高（Dennis J. Blasko）也曾撰文〈中國打不了現代戰爭的十個理由〉。報告和文章一致指出，解放軍存在機制性弱點和缺陷，包括缺少擁有充分實戰經驗的職業軍官、猖獗的腐敗、管理體系落後及士兵素質不高。蘭德公司的報告致力於梳理和描繪中國軍力的「致命弱點」，包括在體制機制、指揮結構、人員素質、職業水準、戰略空運能力、艦隊防空與反潛戰等方面存在嚴重不足，以及新裝備數量有限，新老裝備整合困難等。蘭德公司得出結論：解放軍將難以「與強敵打一場現代戰爭」。

蘭德公司還發表了一份題為《一九九六年到二〇二七年美國與中國軍事實力發展趨勢》研究報告。該報告的主要執筆者、資深研究員黑根·巴薩姆（Eric Heginbotham）指出，報告以台灣海峽和斯普拉特利群島（中國稱南沙群島）發生衝突這兩種情況來比較美中在空中與導彈、海上、太空、網路與核武器五個領域的軍事實力。台灣衝突的假設

條件是中國攻打台灣，斯普拉特利群島衝突是假設美國到這一地區協助菲律賓等國家。報告發現，從一九九六年到二〇一七年，美國對中國的軍事優勢大幅度縮小。但是，在這兩種情況下，中國都不會獲勝，「從綜合軍事力量來看，中國不是美國對等的競爭對手」。

習近平沒有希特勒手上那支戰鬥力超強的軍隊，他無法仰賴腐敗而落伍的解放軍達成「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其實是他個人稱王稱霸）的幻想。倘若習近平敢於對外發動戰爭，那麼，戰爭開始之日，就是習近平及其黨國滅亡之日。

第五卷

天下歸心何足道  
萬國來朝猶可誇

——論外交困境



變態辣椒 / 繪

## 法西斯中國踏入「修昔底德陷阱」

他們的「天朝主義思想」，與一九三〇年代要「超克西方現代性」的「大東亞共榮圈」思維，存在諸多平行的軌跡；他們在「人民專政」下的軍國主義和好戰姿態，與日本當時的天皇制法西斯主義，存在著眾多類似的地方。

—曾昭明

二〇一五年九月，習近平在訪美途中的演講中表示，「世界上本無『修昔底德陷阱』」，加深相互瞭解可以幫助防止美國或中國的戰略誤判。

「修昔底德陷阱」（Thucydides Trap）是哈佛大學政治學者格雷厄姆·艾利森（Graham Allison）提出的，講的是雅典歷史學家修昔底德觀察到的一種現象——修昔底德在《伯羅奔尼撒戰爭史》中指出，「使戰爭不可避免的真正原因是雅典勢力的增長和因而引起斯巴達的恐懼」。推而廣之，一個新崛起的大國必然要挑戰現存大國，現存大國也必然回應這種威脅，這樣戰爭變得不可避免。這個概念形象地傳達出一戰前夕逐漸凝聚成火藥桶的巴爾幹半島以及整個歐洲的局勢：沒有人想要戰爭，但更沒有人能避免戰爭的腳步聲臨近。

世界上當然有「修昔底德陷阱」，不能因為習近平閉目塞聽它就不存在。習近平沒有做好打一場戰爭的準備，並不意味著他是一名和平主義者。

## 習近平的履歷與性格，宛如希特勒的翻版

美國學者沃爾特·拉克爾（Walter Laqueur）在《法西斯主義：過去、現代、未來》一書中指出，法西斯主義與以前的專制的差別在於，存在著一個群眾政黨，這個政黨通過它的保安機構和軍隊來壟斷權力，清除所有其他政黨，並在這一過程中使用相當大的暴力。這種新式政黨是由一個領袖領導的，這個領袖實際上具有無限的權力，受到他的追隨者的奉承，並且是宗教式崇拜的核心。在這個意義上，習近平與希特勒是同質的法西斯領袖：人民和元首是一個共同體，而元首的獨裁「隨時獲得絕大多數人的贊同」。

英國政治家和精神科醫生大衛·歐文（David Owen）在《權力與疾病》一書中，針對身居高位的掌權者提出了「狂妄症候群」這一概念。他列出十四個評判「狂妄症候群」的指標：

- 一、自戀的傾向，把世界當作在其中施展權力與尋求榮耀的場域。
- 二、天性喜歡採取行動，以提升他們的形象。
- 三、對於自己的形象與外表有超乎比例的關心。
- 四、習慣以救世主的口吻談到自己的所作所為。
- 五、把自己跟國家等同起來，認為這兩者的形貌與利益是完全一致的。
- 六、傾向用第三人稱來稱呼自己，或者使用舊日國王的口氣說話。
- 七、對自己的判斷有過度的信心，對他人的建議或批評有過度的蔑視。
- 八、對自己所能達成的事情具有誇張的自信心，接近一種無所不能的感覺。
- 九、相信自己真正要面對的不是人民，而是歷史或上帝。

十、相信在歷史上他們將會得到勝利。

十一、不知休息、輕率魯莽以及容易衝動。

十二、失去與現實的聯繫，常常伴隨著日漸惡化的孤立狀態。

十三、傾向於因為他們的「宏觀視野」，堅信他們行動的道德正確性。

十四、毫無能力執行政策，可以稱之為狂妄的無能。

大衛·歐文指出，若符合以上症狀中的三項，就建議當事人「請及早下台」。以這十四條標準來衡量，希特勒和習近平符合的症狀，至少超過十條。習近平和希特勒都是狂妄症候重度患者。病源來自於他們的家庭教育、少年及青年時代的經歷和思考世界的方式。

德國歷史學者克勞斯·費舍爾（Klaus P. Fischer）在《納粹德國》一書中指出，從希特勒最初在維也納遭遇艱苦的生活開始，就形成了殘酷和冷漠地對待他人的思想，後來將這種思想理性化為偽達爾文主義的術語。希特勒主張生活是無休無止地為生存戰鬥，只有最強者才能獲得勝利。希特勒曾向身邊的人說：「殘酷令人激動。人們需要神聖的恐怖。恐怖是政治最有效的方法。」

早年一度淪為流離失所的社會邊緣人，使希特勒具有強烈的反社會傾向，他一生都仇視確定的、規範的體制。漢斯·弗蘭克指出，希特勒是一個麻木的心理變態者，受到原始的、任意的自我中心主義的驅使。這種反社會的人格，還可以從其孩提時代和家庭生活的經歷中尋找到，他身上必然帶有在家庭中遭受背叛的印記。費舍爾的結論是：「希特勒前三十年的大多數時間是在反社會的環境中度過的。在歷史上，強烈的邪惡多次獲得了勝利。無論怎樣有缺陷，希特勒和他的隨從都是些極端的狂熱分子，具有令人驚訝的心理動力。」希特勒成功地瓦解了威瑪共和國，並自我加冕成為歐洲歷史上空前絕後的「元首」。他的權力超過

了羅馬帝國的皇帝以及天主教的教宗。

習近平跟希特勒、毛澤東的早年經歷和思想模式非常相似。少年和青年時代的習近平，是一個被拋入社會底層的邊緣人：父親被毛清洗、家庭支離破碎，尚未成年的習一度成為無家可歸的流浪兒。做為最年幼的「知青」中的一員，他被送到陝西的窮鄉僻壤接受勞動改造。因忍受不了缺衣少食的生活，跑到父親老家富平向親友尋求幫助，卻被眾人拒之門外。中共的鐵血統治已深入鄉村，傳統的古道熱腸不復存在。而後，習潛回北京，被當作「盲流」送入少年勞教所關押。在家族長輩勸誡之下，他不得已返回延安的小山村。

習是毛的孩子，毛主席了他的命運，《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狄雨霏在〈從文革浩劫中走出來的習近平〉一文中描述說：「毛澤東在文革期間發動的清洗運動、狂熱和群眾衝突，在他之後繼任的每一位中國領導人身上都留下了永久的印記。但習近平有些與眾不同，他是第一位從紅衛兵—毛澤東的奇襲隊—那一代成長起來的黨的領導人，而且在踏上通往權力的長路之前，他曾經跌得那麼重，從一名中共高幹子弟，淪為失勢政治人物無依無靠的子女。」苦難可能造就英雄，也可能造就心智失衡的獨裁者。

當習仲勳的傳記出版時，一篇採訪習近平的文章記述了一個動人的細節：一九七二年，在周恩來的安排下，成年的習近平終於見到被關押多年的父親。在多年的隔絕和虐待之下，習仲勳受到重創，有些糊塗。

「看著兩個長大了的兒子，竟然完全不認識了。」父親流下了淚，習近平遞了一支煙。「他就問我，你怎麼也抽煙了？」習近平談到。「我說，『思想上苦悶，這些年，我們也是從艱難困苦中走過來的。』」然後，「他沉默了一會兒說，『你抽煙我批准了。』」這個細節說明，習仲勳雖然喪失了對兒子的實際控制力，並對因自己的緣故給兒子帶來的

磨難深感愧疚，但在兒子面前仍然要維持父親的權威，必須經過一個「批准」兒子抽煙的程序。這就是共產黨高級幹部家庭中家人相處的方式。在沒有愛的環境中長大的習近平，心中自然充滿「敵人意識」。

那一段生活的陰影，籠罩在習近平心頭，改變了他的性格和思維方式。習並不仇恨其家族的仇人—險些害死他父親並導致他淪為「賤民」的毛澤東；相反，他對毛澤東的「山大王氣」心儀不已，毛時代的話語方式和政治氛圍成了習近平揮之不去的「潛意識」。習「朕即天下」的自戀和自信，來自於「太子黨」和「紅二代」的身分，以及紅衛兵時代「不怕血」、「不怕死」的青春記憶。長期研究文革的歷史學者宋永毅評論說：「在毛澤東統治下，習近平受了很多苦，但這一點實際上強化了他的一種信念，即『紅色子弟』，也就是中共精英的後代，贏得了繼承毛澤東在黨內的核心地位的權利。」習夢想著有一天掌握權力，要像毛澤東那樣迅猛地攪動社會，乃至創造「新天新地」。

上個世紀八、九十年代，在漫長而單調的地方官員生涯中，習近平刻意壓制內心的反社會傾向，裝扮成循規蹈矩、謹小慎微的技術官僚。等到登上大位，才露出真面目：他是獅子，是潑猴，是皇帝，是救世主。他要像毛太祖那樣，給中共政權打上強烈的個人烙印，而一切攔路的障礙，無論是黨內反對派還是民間異見者，都要冷酷無情地掃除掉。

## 法西斯從日本轉世到中國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七十週年之際，中國民眾在觀看大閱兵，日本民眾在遊行示威反對新安保法的通過。七十年之後，法西斯從日本轉世到了中國。

為反對安倍政府強力通過新安保法，日本「不要戰爭，守護九條行動執行委員會」於八月三十日發起「國會十萬人、全國一百萬人大行動」，在國會議事堂附近舉行大規模集會。日本四十七個都道府縣包括千葉、神奈川、埼玉、北海道、青森及南邊的沖繩，共計三百多處響應該活動。這是近年來日本民間最大規模的一次有組織和計劃的街頭抗議，由此可見，日本國內長期形成了強勁的中立、鎖國思潮，儘管這種思潮已然不符合當今東亞的政治形勢。

中共官媒大肆報導日本民眾抗議政府的消息，以此顯示安倍政府如何不得民心，甚至直接將安倍描述成「戰爭販子」。然而，細心的中國民眾從有關報導中引發無盡的思索：為什麼在被中國形容為「軍國主義復活」的日本，民眾可以自由地在國會大樓前面組織數萬人的抗議活動，而警察只是在一邊維持秩序？當年，日本令人聞風喪膽的「特高」到哪裡去了？中國媒體轉發了許多日本抗議者以真名實姓發表的反政府言論，反倒讓中國民眾逆向思考：日本民眾擁有公開反對政府的權利，日本在戰後七十年發展為成熟的民主國家，日本的警察和軍隊不會肆意屠殺本國民眾。

反之，如果在中國的首都發生類似抗議，後果會怎樣呢？一九八九年，就在習近平洋洋得意地閱兵的天安門廣場，同一支「人民解放軍」，對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大開殺戒。北京街頭血流成河、屍橫遍野。中國政府天天敦促日本政府為當年的侵略戰爭道歉，自己卻從來不向六四被屠殺的同胞的家屬道歉——不僅不道歉，還要辱罵、監視、軟禁難屬群體。

英國學者馬克·尼古拉斯（Mark Neocleous）在《法西斯主義》一書中指出，法西斯主義的特徵包括為民族主義與反革命目的而做的動員、軍事化的行動主義、朝向精英主義的運動、權威主義與壓迫性的國

家機器。他尤其聚焦於法西斯主義的三個概念：戰爭、自然與民族。法西斯主義從一切政治與社會問題當中抹去歷史，填充真空的就只剩下對自然的神聖化，而其實現目標的手段就是發動民族主義的戰爭。以此觀之，當今世界，沒有一個國家比中國更像當年挑起戰爭的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也沒有一個國家的領導人比習近平更像戰爭販子希特勒和東條英機—習近平以反法西斯為名發起的大閱兵，儼然是當年納粹德國希特勒閱兵式的翻版。為了保障習的安全，當局發佈通告說：「閱兵期間，狙擊手會警戒閱兵路線附近的高層建築，為了您的人身安全，請勿在窗子附近逗留觀看。」對此，一網友說：「當年德國納粹的希特勒同志閱兵，沿街的窗口陽台甚至樓頂，柏林群眾都是可以觀看的。」另一網友回覆道：「幸好這次不允許群眾觀看，否則就和法西斯一樣了。」

## 南海成為亞洲的火藥桶

習近平掌權後，刻意挑動擱置多年的南海爭端，使南海成為比當年歐洲的巴爾幹半島還要危險的、一觸即發的「東亞火藥桶」。台灣學者曾昭明分析說，習近平的莽撞行徑反映了中國的天朝主義者最深的憂慮：這個只有陸權帝國傳統的國家，根本不瞭解現代海洋法的遊戲規則。這個古老而新興的帝國，不知道它對大海，究竟該說什麼。儒教的天下帝國論，只有「大地法」，而沒有「海洋法」。

東亞不安，則世界動盪，因為東亞格局牽一髮而動全身，美國和歐洲不可能置身事外。北京曾經承諾，就南海爭端與周邊國家協商談判，不會做出任何挑釁舉動。話音剛落，習近平就下令在南海諸島施工作業、圍海造地，毫不理會美、日以及越南、馬來西亞、菲律賓、汶萊、

印尼、台灣的反對與抗議。

二〇一五年六月，菲律賓總統阿基諾訪問日本，在東京發表兩場演講，嚴厲批評中國的玩火行徑。阿基諾說：「日本與菲律賓訴求自由航行和法律統治來針對中國非法主權的主張。」阿基諾在回答現場提問時說：「如果南海成為真空狀態，例如超級大國美國如果說『我國不關心』的話，就不能阻止其他國家的野心。我雖然只是學過歷史的外行，但這個問題令我想起德國納粹摸索著投入戰爭和當時歐美各國對此的反應。」阿基諾舉例說明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前，德國納粹吞併捷克斯洛伐克的蘇台德地區，當時「誰也沒叫停」。中國外交部對於阿基諾將中國與納粹德國相提並論發表強烈抗議，阿基諾的觀點卻深得東亞各國政治領袖和民眾之心，沒有人敬重且熱愛中國這個磨刀霍霍的北方鄰居。

二〇一五年八月，東盟外長會議邀請美國、日本、澳大利亞、韓國等國與會，儘管中國試圖阻撓大會討論南海問題，但中國挑起的南海問題已經成為地區安全的潰瘍，各國紛紛發言譴責中國，中國成為眾矢之的。中國外長王毅嚐到了「得道多助，失道寡助」乃至「四面楚歌」的滋味。自由亞洲電台特約評論員胡少江指出：「中國在此次東盟外長會議上遭遇滑鐵盧表面上是因為南海主權爭端，本質上是由於中國的外交失去方向。世界大國、地區大國和中國周邊國家聯合起來對中國進行指責，既是世界對一個崛起的中國的焦慮，也是中國領導人缺乏外交能力的一個表現。」

更大的羞辱還在後面。二〇一五年十月二十七日，就在中共召開十八屆五中全會的第一天，美國就送上一份「厚禮」—美軍部署在日本橫須賀基地的宙斯盾驅逐艦「拉森」號（USS Lassen），駛入中國南海島礁周邊十二海浬範圍以內。「拉森號」隸屬阿利·伯克級（Arleigh Burke class）導彈驅逐艦。美國形容這個級別的導彈驅逐艦是「史上最

大、最強」的驅逐艦之一。美國國務院發言人約翰·柯比（John Kirby）在新聞發佈會上說：「在國際水域行使自由航行權時，不需要和任何國家商量。」他強調說，這正是「設立海軍的原因之一，讓你能夠發揮影響力，捍衛國際水域的航行自由」。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戴維斯（Jeff Davis）在當天強調指出，「這是與過度主張海洋權益的國家對抗」。美國前副國務卿、前世界銀行行長佐立克（Robert Zoellick）在華盛頓傳統基金會的研討會上表示：「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好的例子，說明美國需要對中國直截了當（straightforward），但是直接（direct）卻不好戰（belligerent）。」佐立克提到中國把南中國海視作「南中國湖」的想法是不可接受的。美國軍艦的行動得到了日本、澳大利亞、菲律賓等國的公開支持。此後，美國還會派遣航母巡迴該區域，並使之成為「新常態」。

美國主流社會對習近平的霸權姿態越來越厭惡。既然懷柔政策對習近平不管用，那就只能來硬的了。美國之音報導說，前康涅迪格州參議員、民主黨副總統參選人利伯曼（Joseph Lieberman）認為，針對最近幾年中國日益咄咄逼人的做法，尤其是在南中國海和東中國海問題上，美國政府有必要對此作出強有力的回應，這樣才能確保中國不會成為亞太地區的一個危害和平的霸權。而《世界事務》雙月刊的出版人、編輯登頓（James Danton）認為，美中兩國是否會因為南中國海問題而爆發武裝衝突的真正關鍵在於，美國是否展現它的領導地位。「只要我們顯示（不接受中國的領土宣稱）的決心和意願，我們將會在該地區建立一個由日、韓、澳大利亞甚至台灣這些傳統盟友以及像越南這樣潛在盟友組成的聯盟，這將使得中國不可能進行初步試探之外的試探行動，從而導致武裝衝突。」在他看來，一旦發生武裝衝突，中國遭受的損失要遠遠超過美國。

剛剛訪美歸來的習近平陷入困境，除了命令外交部召見美國駐華大使，口頭表達抗議之外，別無他法。不過，中國鷹派喉舌《環球時報》仍然要過一把嘴巴癮，刊登了一名不具名的軍事專家的錦囊妙計：中國可派出多艘艦隻監視美國軍艦，「極端情況下更可撞擊美方船艦」。這名所謂的軍事專家，大概只看過電影《甲午風雲》。這種戰術，北洋艦隊的管帶鄧世昌試圖用來對付日本軍艦，卻「出師未捷身先死」。如今，它能成為對付美國先進軍艦的殺手嗎？—派一隻破舊軍艦去撞毀美國這艘價值六億美金的戰艦，確實很划算。但「拉森號」的官兵會傻到等你去撞擊嗎？

戰爭暫時不會爆發，但危機日夜在醞釀。習近平這個醉酒的司機，將中國這艘長長的火車駛入一段漆黑的隧道。火車上的十四億乘客，能夠平安地度過這段黑暗之旅，再次看到黎明的陽光嗎？

## 習近平是中美新冷戰的罪魁禍首

關於「問鼎」，中共領導人之前數十年都遵從著祖先一個有關「自我節制」的古老教誨—直到最近，習近平甚至整個中國領導階層似乎已耐不住、也藏不住「問鼎」的饑渴。

—顧爾德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美關係持續惡化，甚至比六四屠殺之後那幾年還要冷淡。美國的中國問題專家夏偉（Orville Schell）指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北京轉而追求一種新毛派議程，對內大權獨攬，對外強勢好鬥。」中國自認為可以扮演亞洲霸主角色，要將美國從亞洲踢出去，嘗試幾次之後，卻發現心有餘而力不足。

儘管中國媒體不斷唱衰美國，美國的實力卻是中國在一兩代人內無法超越的。美國《明星論壇報》在一篇社論中寫道：「中國無法改變美國既是全球大國，又對亞洲有重要影響力的現實。」習近平的一系列挑釁言行，用中共的術語來形容，是一種「左傾盲動主義」。如果說中美之間已然展開一場新冷戰，習近平就是始作俑者。

除了中美兩國，太平洋就沒有別的國家嗎？

二〇一五年五月，習近平在北京會見到訪的美國國務卿柯瑞時，再

度重申中美共同治理世界的理論——「寬廣的太平洋有足夠的空間容納中美兩個大國」。這句話早在前一年習近平受邀訪問美國，在加州莊園與歐巴馬進行「不打領帶的會談」時就說過了。當時，愚鈍的歐巴馬對於習近平的挑戰不置可否。此次習近平舊話重提，與美國平起平坐、分庭抗禮的傲慢姿態躍然紙上。

果然，此次中美雙方的會談「話不投機半句多」。柯瑞與中國高層和軍方會晤時，提及美國嚴重關切中國在南海的填海造島行動，此舉將導致鄰國擔憂和升高地區緊張；但中國官員對美方的施壓毫不讓步，並回絕美國緩和南海緊張局勢的建議。兩國媒體發佈的柯瑞與習近平會談的照片，柯瑞的臉色前所未有的嚴峻。

此前，就中國人權律師浦志強被拘押一年多之後遭正式起訴一事，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多次表示嚴重關切，並呼籲中國早日釋放浦志強。中方以「中國的司法主權不容干涉」為名嗆聲華府，甚至擺出巴爾摩黑人騷亂事件反戈一擊——你們連家中的事情都管不好，有什麼資格干涉我們的內政？在美方的呼籲聲中，浦志強案的立案和審判工作大大加快，中方有意給美方大大的難堪——我們就是要迫害自己的優秀公民，打擊你們氾濫的同情心和公義心。當浦志強案開庭審判時，美國駐華大使館一等秘書白丹利（Daniel Biers）試圖在法院外向記者宣讀聲明，但隨即被警察暴力驅趕。習近平政權撕下了最後一層面紗，連基本的禮節都不講了，對歐美外交官毫不客氣，完全是一副「我是野蠻人我怕誰」的流氓派頭。

土豪不可能一夜之間修成貴族。習近平以為中國經濟一枝獨秀，東風壓倒西風，便如同頑童一般弄槍舞刀。習在東北亞及南海自說自話的領土主張，讓中美關係降到兩國軍機在南海相撞事件之後的又一個最低點。習自以為「中美共治太平洋」之說可以稍稍安慰美國，這句話偏偏

暴露出他濃得化不開的「帝國夢」。這句話背後的意思是說：太平洋可以從中間分成兩半，美國管理那邊，中國管理這邊。在習眼中，這邊一望無垠的亞洲部分，除了中國之外的所有國家都算不上獨立自主的現代國家，而是必須看北京臉色行事的「藩屬」。

習近平喜歡看《漢武大帝》、《康熙大帝》之類的電視連續劇，看著看著，就真把自己當成漢武大帝和康熙大帝的轉世靈童。然而，時代和國際形勢都與當年大不相同，習近平的單邊主義外交，激起亞洲各國的公憤。

為了應對中國的霸權，美日聯盟加快升級，東亞各國無一例外地向美日聯盟靠攏，沒有一個國家願意回到近代以前受中華帝國支配的處境中。就連長期以來事事仰賴中國的緬甸，在開啟民主化道路之後，也向美國拋出橄欖枝，並凍結中資在緬甸的一系列破壞環境的建設項目。

太平洋確實很大，但太平洋屬於那些兼收並蓄、堅韌不拔的海洋國家；太平洋從來不屬於閉關鎖國的、做為大陸國家的中國。習近平這個從延安的窯洞中走出來的原始人，要仿效英美乘風破浪、海天一色的強國之路，只能是異想天開。

## 拜登原來不是習近平的老朋友

在中美南海爭端持續升溫之際，美國副總統拜登向美國海軍軍校畢業生表示，中國在南海的行動正在令亞太區的和平面臨考驗，美國將在五年內將百分之六十的海軍駐紮在亞太區。拜登說，太平洋的和平與繁榮，很大程度取決於美國在那裡的海軍力量。

美聯社如此引述拜登的話：「在南中國海的爭議海域，……我們將

不退避地維護和平公正解決爭端的原則，以及航行的自由，而今天這些原則因為中國在南海的行動而受到考驗。」拜登告訴在場畢業生：「在那裡，氣氛很緊張，就在我說話的時候它正在變得緊張，但你們將會出現在那裡保衛和平。」

在此前後，在美軍海神反潛偵察機飛近中國的永暑礁和美濟礁上空偵查，美國國防部發言人沃倫上校放話說，美艦將進入中國填海島礁十二海浬範圍。一般來說，西方人知道東方人的面子觀念極其重要，不會直接打臉，但這一次美國看到中俄聯盟已然成型，敵對關係不可改變，就拿出真傢伙來針鋒相對。

習近平的痞子氣質直接影響了中國媒體的語言風格。代表中國官方立場的《人民日報》在頭版刊登署名為「鐵鈞」的軍事問題專家的評論文章，對美國大加討伐：「一旦美國這種軍機抵近偵察的不負責任且十分危險之舉再次上演，南海之和平與穩定將被一點點破壞。在南海問題上，美國真是有些霸道無賴。」該文呼籲，美國的好戰分子，馬上停止在南海地區採取軍事冒險行動。不要錯判形勢，不要把中國的克制當軟弱。其實，中國空軍和海軍的實力不足以與美國抗衡，只能眼睜睜地看著美國的飛機飛來飛去、艦船游來游去。中方自稱「克制」的表態，盡顯其色厲內荏、外強中乾的本相。

習近平執政以來，中國對外政策最明顯的變化是：不再以披著羊皮的狼的形象示人，扔掉羊皮，顯示狼心和狼面。歷史學家余英時教授評論說：「習近平是鐵了心要與西方來一場新冷戰，習近平將美國當作最大的敵人看待。」美國政府一直對中國實行綏靖政策，如今被習近平的挑釁驚醒，不再對其「回頭是岸」抱有幻想。

以拜登個人而論，習近平以副元首和諸君身分訪美時，由他出面接待；他以副總統身分訪華時，習也放下身段與之套近乎，親自陪同他到

四川等地參觀。兩人有較多時間和機會近距離接觸。那時，拜登對習大加讚賞，認為習是可以打交道的開明人士。如今，這個夢幻破滅了。這一次，拜登的講話如同一道分水嶺般宣示：我不是習近平的朋友，習近平是美國最大的威脅，比普丁還危險。

以美國對華外交的歷史而論，早在二戰硝煙瀰漫之際，美國政府對中共地方割據勢力就抱有美好的想像——中共不是蘇聯式的共產主義原教旨主義，毛澤東不是史達林式的強硬人物。美國願意與之保持聯繫，甚至給予支援。這種幻想一直到中共建政之初還未破滅，到了中國參與韓戰才破碎。

自七十年代末文革結束、鄧小平實施改革開放政策，美國又陷入新一輪亢奮狀態，認為中國要走資本主義道路。上個世紀八十年代，是中美關係的一段黃金時期。直到一九八九年發生天安門屠殺，美國才發現中共是「鄧皮毛骨」、是殺人不眨眼的暴政。

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中國進入權貴資本主義新時代，美國成為中國最大的貿易伙伴，認為經濟可以改變政治，只要中國的經濟發展了，政治就能走向民主化。然而，魔鬼就是魔鬼，美方的放任和輕信，一手扶植出一個接替蘇聯老大哥的、更為強悍和狡詐的對手。半個世紀以來，美國的對華政策一錯再錯。

等到歐巴馬當總統時，本該對中國奮起反擊，堅守民主自由價值，在原則問題上寸步不讓。但是，由於缺乏處理國際事務的經驗，歐巴馬被習近平玩弄於股掌之上。直到整個西方世界對中國的風向發生轉變——不能繼續縱容「中國模式」腐蝕乃至顛覆普世價值，不能再一廂情願地將敵人當作朋友——美國政府和學界這才睡獅猛醒，大幅度調整對華政策。

今後，等待習近平的，不會是鮮花與笑臉，而是石頭與石頭的碰

撞。

## 希拉蕊為何對中國說重話？

二〇一五年七月四日，美國獨立日。美國風頭最健的總統候選人，既當過第一夫人，又當過參議員和國務卿的希拉蕊，趕赴在美國總統選舉中具有指標性意義的新罕布夏州參加競選活動。

希拉蕊在這場競選演講中，公開點名批評三個嚴重威脅美國國家安全和全球秩序的國家：中國、俄國和伊朗。雖然她沒有使用小布希喜歡使用的「流氓國家」這個形容詞，但措辭之嚴厲毫不遜色。她指出：

「我們必須保持充分警覺，中國軍力正非常迅速地增長，他們建立的一些軍事設施威脅到與我們有條約的國家。」她還說：「中國也正試圖駭進美國國內一切不能動的東西，竊取商業秘密、國防承包商藍圖，並盜取大量政府資訊，尋求獲取優勢。」後一句話既俏皮又尖銳——將中國政府控制的、無孔不入的駭客對美國的入侵形容得窮形盡相。

美國有線電視新聞網如此評論希拉蕊的講話：「希拉蕊對中國攻擊美國電腦發出了迄今為止最為強硬的言論。」希拉蕊在演講中告誡美國人不要犯錯、不要輕敵、不要對中國採取綏靖政策：「中國知道他們在競爭——為了獲勝，他們會做一切他們能夠做到的事情。」這句話可以理解為對歐巴馬敷衍塞責、失去方向感的中國政策的含蓄批評。白宮拒絕評論希拉蕊的有關言論。

希拉蕊為什麼對中國說重話？顯然不僅僅是總統候選人在競選期間的「敵人修辭」。希拉蕊對中國的反感，源於她個人對中國本質的深刻認知和美國對華政策劇變的大背景。

首先，與擔任總統之前毫無外交經驗——甚至有可能連中國在世界地圖上的位置都找不到——的歐巴馬相比，希拉蕊是美國總統候選人中少有的「知華派」。在一九九八年身為第一夫人與丈夫柯林頓總統一起訪華前夕，她強烈建議丈夫不要輕率接受中方安排，前往天安門廣場舉行閱兵式。她直截了當地指出：「那裡是一場大屠殺的現場，鮮血永遠也不能洗去。」

希拉蕊對中國的言論控制和新聞審查也有切身體驗。希拉蕊自傳的中文版出版之後，我蒐集了英文版、港台出版的繁體中文版以及中國出版的簡體中文版，將三個版本仔細對照，撰文揭露簡體中文版中大量內容被刪節——比如，希拉蕊對達賴喇嘛的讚美消失得無影無蹤。我的考證文章發表後，《紐約時報》很快跟蹤報導。希拉蕊讀到報導，勃然大怒，指示出版社收回簡體中文版版權，中國的書店必須將被刪得慘不忍睹的書籍下架。這一事件讓她認識到，中國是一個多麼缺乏言論自由的國度。

當希拉蕊成為歐巴馬政府的國務卿，她更是與中國直接交鋒。有趣的是，在主導美國外交政策的幾股力量中，通常是國務院比白宮和國會更親華；但希拉蕊主導的國務院，卻主張對中國採取比較強硬的立場，與軟弱無力的白宮形成鮮明對照。

其次，也是更重要的原因，希拉蕊投入下屆美國總統競選之際，正是美國對華政策發生重大調整之時。美國朝野在強硬對付習近平的蠻橫擴張上取得共識，做為政壇老手的希拉蕊嗅到風向轉變，當然要顯示「鐵娘子」作風，以獲得美國選民信任。

對美國政府來說，不僅要遏制中國在亞洲的「新帝國主義」行徑，還必須面對中國對美國本土的攻擊——不是「九一一」事件那樣明目張膽的攻擊，而是對美國密集的網路攻擊和情報戰。美方將中國當作冷戰之

後最危險的竊賊。美國人事管理局遭到來自境外的網路攻擊，大約一千八百萬萬現任、前任和潛在的聯邦僱員個人資料失竊。二〇一五年六月，美國國家情報總監克拉珀在情報會議上宣佈，中國是美國人事管理局遭大規模網路攻擊的「頭號嫌犯」。中國方面則以美國法律中「無罪推定」的原則為自己辯護。

中國不是「想像的異邦」。深受希拉蕊信任的芝加哥大學教授、國際戰略學者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指出：「未來的中國威脅最令人頭痛的一點是，中國將比二十世紀美國面臨的任何一個潛在霸權國都更強大、更危險。」希拉蕊深信，美國對此不能無所作為、坐以待斃，美國有能力像當初戰勝納粹德國和蘇聯一樣，戰勝中共的挑戰。

## 歐巴馬與習近平雞同鴨講

習近平訪美，引人矚目的一幕，是一群美國頂尖科技公司的最高層聚集在微軟園區與習近平見面並拍集體照。美國排名前十位的科技公司的最高層—這些公司總市值約二點五萬億美元—與十幾家中國科技企業的負責人一起進入房間，他們站成三排，整整等候習近平十分鐘—即便是歐巴馬也不敢讓這些企業巨頭等候十分鐘之久。《紐約時報》評論說：「十分鐘長的過程，展現了中國領導人和他控制的巨大市場的威力。」之後，蘋果首席執行官庫克微笑著開玩笑：「你有沒有感覺房間在晃動？」若是習近平的老祖宗馬克思復活，見到他的東方徒子徒孫與西方大資本家翩翩起舞，一定會氣得昏死過去。

在政府層面，中美兩國簽訂了關於網路安全和氣候控制的兩份協

議。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不同場合多次說，習近平訪美的每一站都出現了驚喜。美國國務院負責亞太事務的助理國務卿拉塞爾（Daniel Russel）毫不留情地打臉說：「這要問崔天凱大使，什麼是他認為的驚喜（Surprise）。」實際上，美中雙方在諸多議題上摩擦多多，而且陷入各說各話，無法達成傳統上兩國領導人峰會一般都會產生的聯合公報、聯合聲明一類的文件。這次習近平訪美，讓歐巴馬對其徹底絕望。

自習近平上台以來，聯俄反美的立場毫不掩飾，在學校展開反美教育、拆毀教堂十字架、驅逐境外NGO、對美國發動密集的網路攻擊並竊取美國政府的機密資料、盜竊美國知識產權製造仿冒偽劣產品。習近平的粗暴與蠻橫，更讓一批多年來親華的美國菁英人士大徹大悟。在美國學術界，由親華轉為疑華、反華的，有沈大偉（David Shambaugh）、蘭普頓（David M. Lampton）、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等人。沈大偉聲稱，「中共的統治已經進入垂死掙扎階段」；蘭普頓斷言，習的內外政策令「中美關係逼近臨界點」；白邦瑞更是在新著中公開承認，「我們錯誤低估了北京的野心」。

儘管歐巴馬是美國百年一遇的無能總統，卻也不是北京閱兵典禮上對習近平點頭哈腰的小國領導人。歐巴馬試圖在私人晚宴上說服習近平在南海停止莽撞的擴張，習近平卻如風過耳。歐巴馬終於認識到習近平不是可以用文明的方式溝通的對象，上任之初希望與中國建立戰略夥伴關係的幻想全然破滅，二〇一一年在夏威夷APEC峰會上那句被全球媒體爭相引用的期待「中國應該停止操弄國際規則，要像成年人那樣行事」也成為泡影，他只好打起精神應對習近平的挑戰。

在美國國內，歐巴馬沒有連選連任的壓力，但白宮這幾年過於軟弱的對華政策，已在選戰中成為民眾強烈不滿的焦點，不僅共和黨百般批評，同黨的強勢候選人希拉蕊亦毫不留情地指責。如果再不「改變」無

效的對華政策，不僅歐巴馬本人的歷史定位將大受影響，民主黨也極有可能被拖累得失去政權。

於是，習近平前腳剛走，歐巴馬就在聯合國大會總辯論的會場上炮聲隆隆，全然不顧客人的面子。歐巴馬嚴厲批評說，不少強國忽略國際法規範，透過軍事力量重製新秩序，他直接點名俄羅斯、伊朗及中國在全世界引起的爭端，「目前的危險把我們拉回黑暗甚至無序的世界」！

歐巴馬提到南海問題時說，美國在南海並沒有領土要求，也不在爭端中做判斷，但美國的利益在於維護航行自由、貿易自由和捍衛國際法。美國必須捍衛上述原則，因此敦促中國和平解決南海爭端。

接著，歐巴馬明確針對中國，暢談普世價值、人權、宗教自由、訪民權利、反對黨的價值、多元民主的優勢等議題。他指出：「國家的力量基於人民的成功。他們的知識、創新、想像、天才、動力和機遇反過來又依賴於個人權利、良政和個人安全。」他語帶玄機地說：「歷史不斷見證那些相信強權即真理的偽先知和沒落帝國的失敗。歷史還會如此。」妄想效仿納粹德國稱霸世界的習近平，大概不會認真傾聽這番言論。

歐巴馬在演講中將中國崛起、俄羅斯重振國力以及伊斯蘭主義勢力興起視為美國和自由世界面臨的三個新的挑戰。他重申，美國擁有世界上最強大的武力，面對危險，美國會毫不猶豫地使用武力保衛自己和盟國。

二〇一五年十月五日，包括美國、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智利、越南和新加坡等十二個國家負責貿易的部長級官員在亞特蘭大宣佈，成功完成「跨太平洋戰略經濟夥伴協定」（T P P）的談判。歐巴馬表示，該協定迫在眉睫，其目的是「不能讓中國等國家制定全球貿易規則」。

從某種意義上說，T P P 是一個「禁止中國入內的世界俱樂部」（故而中國網路上有人諷刺說，T P P 是「踢」習近平的「屁屁」）。由於中國加入W T O 之後，只享受利益，不承擔責任，成為最大的麻煩製造者，所以T P P 從一開始就提高門檻，阻止中國加入。旅美經濟學家何清漣分析說，T P P 的很多條款彷彿是為中國量身訂做的：貿易和服務自由，即禁止各種門檻（中國最善於設置各種門檻來管制經濟，官員將此當作尋租工具）；貨幣自由兌換，即禁止政府操縱匯率（中國加強外匯管制）；稅制公平，即禁止國家給企業出口補貼（中國政府如果不補貼，出口企業將大批垮掉）；國企私有化（中共正想讓國企到「發展潛力大、成長性強」的私企參股控股）；保護勞工權益（中國血汗工廠世界聞名）；保護知識產權（中國是世界第一山寨大國）；保護環境資源（中國水陸空污染還在加劇）；資訊自由（中國多年來保持「新聞自由之敵」與「互聯網之敵」的稱號）。

在中美對峙的背景下，台灣的戰略地位日漸凸顯。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六日，歐巴馬政府通知國會，決定向台灣出售十八點三億美元的防禦武器。此一軍售計劃已延宕了四年之久，歐巴馬政府一直拖延不決，其智囊中甚至有人發出「棄台論」。但現在看來，一切都不一樣了，是習近平的擴張盲動讓歐巴馬下定決心，具有諷刺意義的是，習近平充當了這項軍售計劃逆向的、隱形的推手。

這項軍售協議將幫助台灣進一步發展創新型和不對稱的防禦能力，計劃出售的武器中包括兩艘佩里級護衛艦、標槍反坦克導彈、陶式2B反坦克導彈和AAV-7兩棲突擊車等。國會參眾兩院的重量級議員對此表示歡迎，眾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眾議員艾德·羅伊斯（Ed Royce）稱，這個決定體現了美國對「民主同盟台灣的堅定支持」；參議院軍事委員會主席、共和黨籍參議員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

則呼籲說，政府應當將對台軍售的審批程序更加定期化。

美方的對台軍售計劃，讓剛剛導演了習馬會的習近平吃了一記悶棒，他要一口吞下台灣，看來並沒有想像的那麼容易。習近平命令外交部副部長鄭澤光召見美國駐華使館第二高官、臨時代辦李凱安，提出強烈抗議。中國外交部在一份聲明說，中國將對那些參與對台軍售的美國公司實施制裁。美國政府公佈的對台武器銷售公司包括雷神公司

（Raytheon）和洛克希德馬丁公司（Lockheed Martin），兩家公司均位列世界五大國防和約商榜單。中方的威脅會有效嗎？觀察人士指出，自從一九八九年北京的六四屠殺以來，美國、歐盟等西方發達國家一直對中國實施嚴格的武器及相關高科技的禁運。所以，是美國的這些公司不能賣武器給中國，而不是中國拒絕買他們的產品。中方的揚言，不過是色厲內荏、逢場作戲罷了。習近平對美國的決定無能為力。

習近平以為，他在美國大肆簽訂單、彭麗媛高歌一曲並給華府動物園的熊貓取名字，如此這般就能麻痺美國上下，任由中共瞞天過海、暗渡陳倉。此種想法不是太過天真，而是太過愚蠢。習近平訪美，是中美建交之後中國領導人對美國最失敗的一次訪問。或許，這也是中美之間進入新冷戰的分水嶺。

## 日本不是習近平的「公共污水溝」

在和平時期，我從不認為「愛國主義」是個崇高的字眼。聚集在愛國主義大旗下的，不是卑鄙的政客，就是顛三倒四的瘋子。

—劉曉波

喬治·歐威爾在《動物莊園》中提出「公共污水溝」這個有趣的說法，原本是影射史達林將流亡在海外的托洛茨基當作「公共污水溝」，每當蘇聯遇到困難和危機，史達林就用「托派的破壞」來向人民解釋。後來，這個詞語也泛指一個專制政府在民怨沸騰之時，為了轉移矛盾，同時體現自己的合法性，就會找一個挑動民眾情緒的東西當「替罪羊」。

日本就是習近平隨手拿來利用的「公共污水溝」。在今天的中國，「反日」思潮持續發酵，成為不可挑戰的「政治正確」。有人說，這是因為日方挑釁中國、死不悔改、罪有應得。其實，日方近年來的所作所為，並不比此前幾十年更加過分，比如首相參拜靖國神社、右派編寫篡改歷史教科書等，並非自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才開始。在中日兩國「蜜月期」的八、九十年代，日本就活躍著一批右翼團體，被中國官方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日本前首相中曾根，多次參拜過靖國神社。那時，人們從未聽到中國官方對此痛加批評。

那麼，為什麼近年來中國的反日思潮持續升溫呢？首先，一九八九年天安門慘案之後，中共改變其宣傳和教育策略，不再死守馬列主義、

毛澤東思想，轉而以民族主義為旗幟，企圖以此重獲統治合法性。宣揚民族主義，必然要樹立「敵人」，以此轉移國民對現狀的不滿，並成為統治者擴大權力的充分理由。於是，在近代歷史上與中國有過慘烈戰爭、並在反省戰爭歷史方面存在欠缺的日本，便成為「活靶子」。以中共的意圖而言，他們最希望日本官方參拜靖國神社，若日本官方沒有那樣做，他們反倒失去仇日宣傳的藉口。

其次，隨著中國經濟總量超過日本，中日之間的經濟地位發生易位。七十年代中期以來，中方迫切需要日方的貸款、技術，不惜主動向日方示好，並承諾在歷史問題上「宜粗不宜細」、「一切向前看」。如今，中國財大氣粗、成為外資爭奪的「香餈餈」，日本的投資和技術不再那麼重要。中國過河拆橋，向日本「說不」成為可能。對日本「說是」或者「說不」，都出於功利主義考量，而非基於正義和尊重歷史的原則。中國沒有民間輿論，所謂「民間輿論」都在官方控制、引導和操縱之下。官方不喜歡民間輿論，立即讓其消音；官方喜歡的民間輿論，給予鼓勵與縱容。比如，官方不會批准其他任何理由的遊行示威，唯獨反日的遊行示威可以在軍警眼皮之下「自由」實現。

反日、反美、反台，是中共當局導演、部分民眾出演的「木偶戲」。這樣說也許傷害了某些愛國志士的自尊心。但我想反問的是：如果公民沒有權利捍衛被強迫拆遷的房產和被掠奪的土地（此類訪民，唯有在美國才有機會飛身攔阻來訪的習近平的座車），卻可以「自由自在」地罵日本、美國和台灣，這難道不是一種扭曲、畸形的自由嗎？

中共當局製造反日思潮，固然能裹脅青年人參與其中，卻不能勝過對手並讓自身強大。昔時，義和團盲目排外給中國帶來深重災難，國人並未從中清醒過來。義和團的思維方式和言行方式，殘存於國人心中。即便某些號稱追求民主自由的人士，也將反日思潮當作可資利用的資

源，企圖通過掀起民族主義運動，達成民主憲政的結果。用「邪惡的手段達成崇高的目標」的想法，是另一個版本的共產黨，只能將中國推向更加苦難的深淵。

## 中國和日本，誰是佛地魔？

日本民間非營利團體「言論NPO」和北京大學聯合做了一次輿論調查，關於日本的政治思潮，有百分之六十的中國人回答「軍國主義」。這對日本人來說是令人震驚的結果，而這正是中共對民眾洗腦教育成果。

把日本塑造成妖魔，是習近平刻意追求的目標。在圍繞釣魚島展開宣傳戰時，習近平繞過外交部，以中共外交領導小組的名義，命令數十名駐外大使同步在其出使國的媒體發表攻擊日本的文章。其中，中國駐英國大使劉曉明在《每日電訊報》發表「有償文章」，批評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參拜靖國神社，文章寫得氣勢洶洶：「如果把日本軍國主義比作佛地魔，靖國神社無疑就是其魂器之一，代表這個國家靈魂最黑暗一面。」

日本駐英國大使林景一於四天後發文反擊。他警告說，中國有可能成為亞洲的佛地魔，「東亞已經邁入十字路口，有兩條道路擺在中國面前。一個是尋求對話，恪守法律規則。另一個是扮演『佛地魔』的角色，釋放出軍備競賽和緊張局勢升級的惡魔。而日本從未想讓地區局勢緊張」。那麼，中國與日本，究竟誰是佛地魔呢？日本確實有過醜陋血腥的軍國主義歷史，對外擴張，燒殺搶掠，害人害己；日本國民對那段罪惡歷史的反省，確實不如德國國民那麼深刻和徹底；做為日本「準國

家宗教」神道教聖地的靖國神社，將甲級戰犯放入祭祀名錄，確實也不妥當，需要加以改變。但毫無疑問的是，世界上大部分國家都承認，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日本已脫胎換骨為循規蹈矩的民主國家，無論是當年在戰場上與之兵戎相見的英美各國，還是當年受其荼毒的諸多亞洲國家，包括曾淪為其殖民地的台灣、菲律賓等國，如今都將日本看作朋友、夥伴而非敵人。

反之，共產黨獨裁統治的中國，正取代冷戰時代蘇聯的地位，成為世界和平的首要威脅。是誰將兩千枚導彈對準台灣？是誰放言用核彈攻擊日本和美國？是誰扶植殺人不眨眼的北韓金家王朝？是誰製造霧霾蔓延到東亞各國、危害各國人民的身體健康？

還可發出一系列追問：哪一個國家，將坦克開進首都，屠殺手無寸鐵的學生和市民？哪一個國家，讓怪手肆意摧毀拒絕拆遷的居民的房屋和身體？哪一個國家，每年強迫數百萬計婦女墮胎，將殺死嬰孩當作「基本國策」？哪一個國家，批量生產毒奶粉毒害本國的嬰孩？哪一個國家，逼得流離失所的藏人前仆後繼地自焚而亡？哪一個國家，執行死刑的數字佔全球九成以上，並將死囚的器官賣到全世界？哪一個國家，逼得訪民在其國家元首出國訪問時，衝入其座車底部「告御狀」？

日本誠然不是天堂，中國卻是貨真價實的活地獄。日本的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大江健三郎，敢於拒絕領取天皇頒發的勳章，並走上街頭反對日本政府修建核電站的計劃，日本政府沒有對他實施任何形式的迫害。中國的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被關押在監獄裡，他的妻子劉霞被非法軟禁，瀕臨精神崩潰的邊緣。這兩個國家，誰有自由？誰有人權？誰文明？誰野蠻？答案不言而喻。

由於長期接受共產黨的民族主義洗腦教育，我在少年時代也有過狂熱的反日情緒，但當我到過日本之後，立即為日本風土人情的美善所感

動，並結識了很多善良熱情的日本朋友。日本國內並沒有軍國主義復甦的勢頭，反倒是中國國內的鷹派和憤青，宛如當年嗜血的義和團一般蠢蠢欲動。

所以，我的結論是：日本不是佛地魔，中國才是佛地魔。

### 深切懺悔難道不是道歉嗎？

日本首相安倍晉三訪問美國，受到美方隆重接待，並在國會發表演講（這是習近平夢寐以求求之不得的待遇）。談及二戰歷史，安倍對日本在二戰的角色表達「深切懺悔」（deep repentance），堅稱日本絕不可以迴避其二戰行徑為亞洲人民帶來的苦難，表示繼承其前任的談話。同時，安倍特別表示「心懷敬意永恆哀悼」二戰陣亡美軍。安倍的演講獲得挑別的美國國會議員多次熱烈鼓掌。

安倍訪美受到熱情接待，顯示美日同盟牢不可破。在習近平以亞投行撬動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美國在亞洲和歐洲的盟友紛紛放水和倒戈之時，大國之中唯有日本拒絕加入中國陣營，可見美日之間的高度一致，已然超越了美歐關係。

日方審時度勢、擇善而從，原因有三。首先，日本政府意識到，儘管當年美日兩國的軍隊曾經在戰場上你死我活地廝殺，但戰後半個多世紀以來，美日聯盟為日本的國家安全和經濟發展提供了基本保障。如今，日本發展軍事力量受限，無法單獨對抗中國的威脅，唯有鞏固與美國的聯盟，才能確保東亞的和平。

其次，根據國際關係的常識和「民主和平論」可知，唯有民主國家與民主國家之間才能建立契約關係，民主國家和民主國家之間從未發生

過大規模的戰爭。而一黨獨裁的中國從來不遵守其簽署的國際契約，不是值得信賴的合作夥伴。如果中國不實現民主化，日本永遠不可能跟中國成為盟友。在此背景下，美國在亞洲的存在至關重要。

再次，中共的經濟狀況「金玉其外、敗絮其中」。當中國經濟下行之時，對外國資本的打壓越發變本加厲。中國的金融體系是不透明的，亞投行不會遵循國際準則，其目的只是彰顯中國稱霸的野心。日本不願為之站台，是理所當然的。日本通過自己的平台援助第三世界國家，成就斐然。

對於美日同盟的鞏固，中國深懷疑懼。習近平上台之初，第一個訪問的國家是俄羅斯；北京大閱兵，最尊貴的客人是俄國總統普丁。習近平可以聯俄，卻見不得日本聯美。就在安倍訪美之際，香港《明報》刻意扭曲安倍在美國國會的演講，說安倍只是「深深懺悔」，而「拒絕道歉」。中國國防部發言人更是氣急敗壞地說，「美日同盟是冷戰特定歷史背景下的雙邊安排」，早該被送進歷史的垃圾堆。

強詞奪理，莫過於此。深深懺悔難道不是道歉嗎？當年，中共被國際社會孤立，急著與日本建交，並沒有提出日本先道歉、再建交的先決條件。日本首相和政界、商界人士訪問中國時，每次都主動提出為當年的戰爭罪行道歉，毛澤東反而大言不慚，感謝日本侵略中國。進入二十一世紀，中日關係緊繃，日本多名首相屢屢在公開發言中反省戰爭罪行，中國卻雞蛋裡挑骨頭，說此類道歉不夠真誠和深切。

習近平在「七不講」之宣告中，有「不得講共產黨的歷史錯誤」的命令。自己諱疾忌醫，又有什麼資格要求別人對其推心置腹？日本固然要向中國道歉，但中共更應該向中國人民道歉。中共政權屠戮的中國人的數量遠遠多於當年的日本侵略軍，中共何嘗為反右、大饑荒、文革、六四屠殺道過歉？難道被日軍屠戮的中國人就重如泰山，而被中共屠戮

的中國人就輕如鴻毛？這是一種多麼邪惡的「自我殖民主義」的思維！

習近平不惜耗費重金在聯合國幕後運作（聯合國大會前主席阿什因收受中國商人的巨額賄賂而被美國警方逮捕，中國的黑金政治早已不受國界的限制），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宣佈把《南京大屠殺檔案》正式列入《世界記憶名錄》。習近平正要載歌載舞，未料到卻引火燒身：日本執政黨自民黨對此強烈不滿，提出有必要將一九八九年的六四事件申請載入《世界記憶名錄》。這是對習近平的最佳反制方法：日本若要擺脫因歷史問題處處受制於中國的處境，就應當邁出幫助中國人民捍衛基本人權的第一步。

## 人權外交才是日本對華外交的制高點

二〇一五年六月，日媒《週刊現代》報導，安倍在與媒體的「吹風會」（不公開的媒體談話會）中聊及解禁集體自衛權，「安倍首相對記者這樣說：安保法是針對在南海的中國，我說要通過的，一定要通過」。對中國忍氣吞聲多年的日本，終於下定決心以針尖對麥芒。

日本眾議院於七月十六日通過「新安保法」賦予「集體自衛」的法源，四天之後，防衛大臣中谷元在內閣會議提出「防衛白皮書」。白皮書中指出，北京持續增強軍備、進入海洋「是一種單方面的主張，擺出無可妥協的姿態」。日本政府將在軍事上明顯對中國提高戒備，同時計劃協助提升東南亞國家的國防能力，並在南海周邊推動聯合演習，以制衡中國。日本民調顯示，有六成以上民眾認為，未來日本有可能捲入大規模戰爭，雖然沒有明說敵人是誰，但用腳趾頭都能想得出，中國和北韓是可能在東亞發動大規模戰爭的專制國家。

《環球時報》以「日媒曝光安倍諸多驚人之語，承認謀劃和中國的戰爭」為題，竭力煽動國內的仇日情緒。這篇報導稱，安倍大大方方地承認確實在謀劃與中國的戰爭，並表示要行使集體自衛權，與美軍一起「敲打在南海上的中國」。報導下方，中國網友一片噓聲批評日本和安倍「做為美國的棋子，出來咬人」、「安倍政府以為回到東條時代，離發起戰爭為期不遠了」。

要戰爭的，不是日本，而是習近平。日本前首相吉田茂說過：「在國際社會中，同中共的關係是日本所擔負的責任中最困難的。」日本如何應對習近平的反日攻勢？在我看來，日本的外交政策大可清晰地向人權外交傾斜。日本應當更大膽、更積極地推動中國的民主化進程，並與台灣建立更密切的官方和民間並行的關係。

人權外交是日本贏得中國民間的好感並與中國建立長久友好關係的關鍵所在。日本對華外交不應僅僅針對中共政權，而應著眼於更豐富和全面的「中國」。實行民主制度的中國，對日本和亞洲都將是重要的安全保障。對華展開人權外交，既符合聯合國憲章和普世人權價值，也符合日本的國家利益。同時，它也不違背日中之間所簽署的條約和公報。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在東京發佈的《中日兩國關於面向二十一世紀加強合作的聯合新聞公報》中，即明確指出：「雙方確認人權的普遍性，並認為各國應該通過相互交流增進共識，減少分歧。雙方積極評價中日人權磋商，並願意在平等和相互尊重的基礎上，繼續就人權問題交換意見。」

日本的對華人權外交如何展開呢？我個人有如下建議：

- 日本領導人與中國等領導人會面時，可以考慮直接、公開、堅定地討論人權問題，並提交具體的政治犯名單；
- 日本駐華使館更加積極地與中國民間人士和異見人士會面，支

持中國公民的維權活動，這樣的會面能提升這些人士的安全度；

- 中日之間民間交流實現真正的「民間性」，放棄與那些完全受中共控制的偽民間組織的交往，更多地與真正的NGO 組織和民間人士交往；
- 對援助中國的資金的分配、用途和效果進行周密的控制，並要求中國媒體如實報導，讓更多中國民眾知曉日方的貢獻；
- 容納包括中國在內的亞洲各國的良心犯、政治異見人士和難民，這是近代以來日本的外交傳統之一，近代中國的政治活動家梁啟超、孫中山等人都曾流亡日本，但戰後日本修改移民政策，放棄了這種道義承擔；日本當下應當接納中國的政治難民，並讓他們在日本自由活動、擴大影響；
- 支持和資助在中國翻譯出版介紹日本民主化經驗的書籍，與其期待中國的教育部門及媒體主動改善對日本的評價，不如自己行動起來向中國民眾介紹日本的民主制度；
- 設立類似於「自由亞洲電台」和「美國之音」的、對華廣播的電台及網站，一方面將更多關於中國的新聞資訊傳達給中國民眾，另一方面使之成為介紹日本的窗口，避免日本被中國媒體抹黑。

日本能不能這樣做呢？這些可以推動中國民主轉型的、事半功倍的工作，值得為之嘗試。

創建「自由亞洲聯盟」，破解中共「天朝外交」

昔日征戰不已的歐洲，大部分國家放棄了狹隘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走向一體化進程。

歐盟經過幾次擴張，目前擁有二十八個成員國，政治上所有成員國均為民主國家（二〇〇八年《經濟學人》民主狀態調查），經濟上為世界上第一大經濟實體（其中德國、法國、義大利、英國為八大工業國成員），軍事上絕大多數歐盟成員國為北大西洋公約組織成員。成員國已將部分國家主權交給組織（主要是經濟方面，如貨幣、金融政策、內部市場、外貿），令歐盟越來越像聯邦制國家。

與「大歐洲」呼之欲出的樂觀前景相比，「自由亞洲聯盟」仍遙不可及，民族主義和國家主義思想在亞洲根深蒂固，共產主義、專制制度和軍人干政的病毒在亞洲各國蔓延。即便是已經實現或部分實現民主化的國家，民族主義（如韓國）、宗教衝突（如印尼、馬來西亞）及軍人主政（如泰國、巴基斯坦）等反民主的力量仍然洶湧澎湃。

在全球化進程中，儘管亞洲是最具有經濟活力的地區，但該地區若干國家未完成民主化以及存在歷史宿怨，使亞洲的整合遲遲不能完成。越來越多亞洲人意識到：如果不以建立在普世價值基礎上的亞洲一體化為前提，「亞洲聯盟」只能是望穿秋水。二〇一五年十月，跨太平洋關係夥伴協定（T P P）達成後，日本首相安倍發表聲明：「我們與享有自由、民主、人權和法治等共同價值觀的國家聯合在一起。」「假如中國未來也加入這個體系，將是對日本安全以及亞太地區穩定的一個極大保障。」這個協定是自由經貿區協定，推而廣之，未來能不能創建亞太自由國家或民主國家聯盟呢？日本可以在其中扮演關鍵角色。

日本在亞洲的地理位置，可以跟英國在歐洲的地理位置相比較；日本在亞洲的近現代歷史中的角色，可以跟德國在歐洲的近現代歷史中的角色相比較。

英國是一個獨立於歐陸的小小島國，卻率先建構了君主立憲、三權分立的政治制度以及市場經濟、公司模式和產權保障，成為影響全球經濟和文化走向的龐大帝國。二戰以後，英國在全球的影響力急劇下降，外交日趨謹慎，長期對歐盟的設想持懷疑態度，並以保守立場孤立於歐洲之外。近二十年以來，英國轉而積極參與歐盟事務，成為歐洲與美國之間的橋樑，其重要性重新凸顯。日本可否效仿英國，對亞洲大陸的事務，從置身事外變成積極主動呢？

德國與日本一樣，在二十世紀上半葉陷入國家主義的魔咒，統治階層企圖以戰爭實現國家利益最大化，反而給本國民眾和周邊國家人民造成慘痛的傷害。戰後德國回到發展民主、尊重人權的基本價值上，不僅成為歐盟三駕馬車之一，更在國際事務中積極推廣自由理念，贏得世界的尊重。僅以對華外交而論，德國是歐洲國家中最關心中國人權狀況、最支持中國民主人士的國家。日本是否可以效仿德國，既自覺清理歷史垃圾，又主動充當人權先鋒呢？

習近平時代兇相畢露的「天朝外交」，若無美日等大國的制衡與破解，則東亞永無寧日。無庸諱言，中國若能順利實現民主化轉型，亞洲的民主化進程將出現「多米諾骨牌效應」。如此，日本就能與民主中國攜手奠定亞洲和平的根基。亞洲的未來，寄希望於「自由亞洲聯盟」的建立。此「自由亞洲聯盟」，不同於當年日本軍國主義者們憧憬的「大東亞共榮圈」，更不同於現今習近平追求的「天朝體系」；相反，它以民主、人權、自由價值為基礎，其目標是解決區域爭端與衝突，推廣民主憲政制度，推動亞洲和全球的和平事業。

中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正處在迅速變化之中，亞洲也正處在迅速變動之中。日本同樣在經歷著令人眼花繚亂的改革與調整。在這一歷史的轉折關頭，日本尤其需要具備遠見卓識和世界胸襟的政治家和戰略學

者。日本成為政治大國，僅僅反思二十世紀前半期的不幸歷史是不夠的，僅僅向聯合國及若干落後國家提供更多經費也是不夠的，向習近平示弱更不是可以讓日本長期苟安的錦囊妙計。積極主動的人權外交才是「有主張」的外交，它將重塑日本的國家形象，切實地推動亞洲和世界的民主化與和平事業。這是我對做為鄰居的日本的期望。

## 習近平的敵人遍亞洲

外交停留在採購層面，軍隊停留在家丁層面，經濟停留在廉價層面，

社會停留在原始層面，信仰停留在金錢層面，文化停留在獻媚層面，

思想停留在愚民層面，科技停留在山寨層面，未來停留在做夢層面，

內政停留在鎮壓層面，國際停留在撒錢層面。

結論是：外面沒一個朋友，家裡全是敵人。

—羅昌平

美國作家馬克·吐溫（Mark Twain）說過：「說到愛國主義，那簡直是騙人；這常常是一個紀念搶掠的詞語。世界上的每一寸土地無不體現著它的數度易主。」習近平號稱讀過馬克·吐溫的著作，但似乎沒有讀到這段話，他的中國夢仍是以「霸道」為支撐的帝國夢。

以「反帝領頭羊」自居的中國，從未反省過自身在亞洲擴張和侵略的歷史，更不會承認自己是隱然成形的「新帝國主義」。美國學者譚若思（Ross Terrill）指出，中國極力維護帝國主義的深化，在帝國主義早已式微的二十一世紀，只會拉大它與世界的鴻溝。帝國主義神話是通往未來野心的跳板，「高高在上國」、「苦大仇深國」、「擔驚受怕國」三合一，就變成「有仇必報國」。經過中共半個多世紀的統治，人民認

獨裁者為父母，視西方為反中，視亞洲為後院，中國的宗教就是中國本身。

中國在亞洲沒有一個朋友。北韓不是中國的朋友—中國認為北韓是其豢養的一條狗，隨時可叫牠去咬美國或日本；北韓卻認為中國是紙老虎和冤大頭，它可巧妙地「狐假虎威」。越南不是中國的朋友—儘管兩國都是共產黨執政，但越南寧願跟宿敵美國握手，也不願向中國臣服。新加坡不是中國的朋友—習近平熱衷於引進新加坡模式，但以華人為主體的新加坡卻與美國和西方結盟。即便被國際社會公認為最親中的巴基斯坦，也不是中國的朋友—中共對新疆信奉伊斯蘭教的少數族群的迫害，已引發巴基斯坦民眾的憤恨，民眾多次發起反中遊行示威，到中國使館前焚燒中國國旗。

## 越南為何與美日結盟對抗中國？

二〇一五年七月二十三日，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黎海平（Lê Hải Bình）在答覆媒體提問時表示，中國在屬於越南主權範圍的黃沙群島（中國稱西沙群島）東北海域進行軍演，嚴重侵犯越南對黃沙群島的主權，違背越中兩國高層達成的共識，加劇南海緊張局勢，對區域安全與航海自由帶來威脅。

據英國軍事雜誌《簡氏防務週刊》披露，中國耗資數百億美元在南沙群島展開大規模填海工程（幾乎與三峽工程耗資一樣巨大），興建直升機停機坪、機場跑道及大型港口設施。該雜誌分析師詹姆士·哈代指出：「我們可以看到，這是一個有條理且精心策劃的舉措，建立一個通過南沙群島鏈中心、具備海空防禦能力的軍事堡壘。」

二〇一五年春，越共總書記阮富仲訪美，是越戰結束四十週年及美越外交關係正常化二十週年後，越共黨魁第一次訪美。阮富仲在越南政府沒有正式職務，在白宮卻受到國家元首的禮遇。這次訪問顯示越南進一步向美國靠近，也反映兩國對中國在南中國海日益強勢的共同擔憂。在越南高層領導中，阮富仲是保守派和親中派，如今其立場發生了轉變。越南知道，必須與美國結盟才能遏制中國——畢竟美國在亞洲從未對哪個國家有過領土索求，是相對公正的秩序維護者。

中越兩國都是共產黨執政，兩國之間的貿易高達每年八百億美元，中國是越南第一大貿易夥伴，越南則是中國在東盟的第二大貿易伙伴。但越南一直對北京存有戒心，尤其是中國宣稱對幾乎整個南海擁有主權。二〇一四年春，當中國一意孤行地在南海有領土爭議的區域修建石油鑽井平台之時，越南國內發生嚴重的反華暴動——就像中國發生反日遊行示威時，中國警察故意袖手旁觀一樣，越南警察也不阻止民眾的「過激行為」。參加反華抗議的越南民眾放火焚燒了位於越南中部的幾家中資及台資工廠，另外有其他數百家工廠遭到洗劫。抗議者認為他們攻擊的目標是中資工廠，但有不少台資工廠被波及、成為無辜犧牲品。

訴諸中越兩個上千年爭戰不已的歷史，正如有觀察家指出的那樣，在東南亞國家中，再沒有一個國家的文化比越南更親近中國，也沒有任何國家像越南這樣需要長年對抗中國的統治。整個過程充滿了生命的犧牲、經濟的發展以及政治上的妥協。

越共創始人胡志明長期在中國居住、精通漢語、受北京的支持和資助，但他早就對中國的新殖民主義心態有所警惕。當越南奮起反抗法國殖民者的時候，胡志明對來自中國的援手並非照單全收，他在普遍親中的高層會議上大聲疾呼：「你們這群笨蛋！難道你們不知道讓中國人留下來是什麼意思嗎？難道你們不記得歷史的教訓嗎？」他進而指出：

「上一次中國人來的時候，他們停留了一千年。我寧願聞法國人的屁五年，也不願意吃中國人的屎一輩子！」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習近平訪問越南，兩國簽訂了一系列貿易協議。但是，兩國的領土爭端無從解套。阮富仲五日開門見山要求習近平勿把南海軍事化，但習近平六日在越南國會的演說中沒有任何回應，讓部分越南國會議員對此極為不滿。

在習近平到訪前一週，越南外交部發言人黎海平表示：「我們多次駁斥所謂『三沙市』。『三沙市政府』宣佈完成在越南黃沙群島各島礁的燈塔建設活動，繼續嚴重侵犯越南對黃沙群島主權的行為。」習近平剛剛離開越南，越南國防部長馮光青和日本防衛相中谷元就在河內商定，日本海上自衛隊艦船將停靠於越南軍港金蘭灣，雙方也預計進行兩國有史以來首次海上聯合演習—這才是實質性的合作。

為了應對中國的軍事威脅，越南當局制定了十年擴軍計劃，包括從俄羅斯進口六艘基洛級潛艦以加強海軍戰力，對空作戰方面，向以色列申購雷達與俄羅斯的防空飛彈，也打算購入俄製戰機，並繼續與歐美的軍火商洽談購買更多巡航機與戰機。越南軍方高層人士透露，越南的精銳部隊已經進入「高度戰備」狀態，且「我們已有最壞的打算」。

中越不是朋友，除非兩國都實現民主化，真正的友誼才可能建立—習近平所說的「兩國的革命情誼足以破除一切干擾」根本就是一句三歲孩童都不相信的謊言。

## 習近平能買下巴基斯坦嗎？

習近平訪問巴基斯坦時，宣佈中國將投資四百六十億美元用於中巴

經濟走廊的基礎建設。美國總統沒有這樣的豪氣干雲、慷慨大方，即使有，風險太大的投資計劃也不可能在美國國會通過。而習近平在中國具有皇帝的超然地位，在一切內政和外交議題上獨斷專行——他想投資給哪個國家就投資給哪個國家，他想投資多少錢就投資多少錢，沒有任何人和機構可以監督和制約他。

四百六十億美元這個數字，等於巴基斯坦自二〇〇八年以來吸收的外來投資總額的三倍，許多人相信它將為巴基斯坦帶來經濟奇蹟。這個數字等於中國十三億民眾每人拿出兩百多元人民幣投資（或救濟）巴基斯坦這個「難兄難弟」——如果說中國在這個世界上有一個真朋友，不會是北韓，而是巴基斯坦。有一次，我在華盛頓杜勒斯機場坐出租車回家，正好遇到一位來自巴基斯坦的司機，一路上他滔滔不絕地讚揚中國在印巴戰爭時對巴基斯坦的幫助。冷戰時期，印度和巴基斯坦交惡，先後發生三次規模不等的戰爭，而印度和中國也發生了邊境戰爭。中巴兩國的關係彷彿是「患難之交」。

半個世紀以來，中巴關係從未像今天這樣密切：巴基斯坦官方的歡迎標語極為高調——「中巴友誼比山高、比海深、比蜜甜、比鐵硬」。習意味深長且熱情地讚揚巴基斯坦政府二〇一四年針對邊境地帶的新疆維族分離主義武裝的清剿行動：「我們對此銘記於心。」巴基斯坦總理納瓦茲·謝里夫（Nawaz Sharif）回應說：「巴基斯坦視中國的安全為自己的安全。」那麼，巴基斯坦是否成了中國的新殖民地？

與習近平關係密切的一個高級智囊透露說，中國知道在巴基斯坦投資存在重大風險，但習近平將迎接這些風險看成是宏大發展計劃中的關鍵部分。比起江澤民和胡錦濤來，習具有更大的野心、慾望以及冒險精神。但是，四百六十億投資——相當於中國注入亞投行的一千億資金的將近一半——很可能血本無歸，如果出現那樣的結局，誰來追究習的責任？

中巴之間潛在的不穩定因素至少有三個。首先，中巴兩國並沒有共同的意識形態，不可能成為惺惺相惜的、遵循共同價值的真朋友。兩國的友誼建立在功利主義和地緣政治的基礎之上，即共同的敵人是印度。而當雙方與印度的關係都趨向緩和時，彼此在對方戰略格局中的重要性必然會降低。

其次，中巴兩國都是高度腐敗的國家，這筆巨額的投資究竟有多少用在基礎建設上，有多少落入兩國貪官私囊之中，可想而知。此前，中國通過國家開發銀行投資非洲，當國家開發銀行副行長王益落馬之後，人們才發現這些款項很多並未落實，王益本人以巨資包養多名女明星、籌辦音樂會，中非基金宛如他的私人金庫。近年來，中巴兩國在透明國際公佈的清廉指數排行榜上的落後排名並沒有改善，人們很難樂觀地認為這些錢會被用在刀口上。

第三，巴基斯坦政府對邊境地區並未達成有效的控制。在過去幾年，巴基斯坦發生過多起地方武裝、塔利班殘餘勢力綁架甚至殺害在巴基斯坦工作的中國工程師的事件。伊斯蘭教是巴基斯坦的國教，中國對同樣信奉伊斯蘭教的新疆維族居民的殘酷鎮壓，已經引發巴基斯坦伊斯蘭信徒的反感和憤怒。宗教情感很難用金錢來抹平，支持新疆分離主義的勢力將在巴基斯坦乃至中亞地區長期存在。

中國買不下巴基斯坦，習近平的這場豪賭有可能鎩羽而歸。

## 李光耀為何令中國心情複雜？

李光耀去世之後，中國新華社第一時間發佈消息並評論說：「在對華關係上，他既是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一些時候又令我們心情複雜。」

習近平曾經讚揚說：「李光耀是尊敬的長者，我對他滿懷敬重之情。」李光耀也曾將習近平視為跟曼德拉同等重量級的偉大人物。兩人似乎惺惺相惜。李光耀倡導的亞洲價值觀和威權管治模式，是習近平心儀的榜樣。在習還是儲君時，就組織多批親信智囊赴新加坡參觀、學習和取經，企圖在中國複製此一經驗。一時間，新加坡國立大學和南洋理工大學等新加坡的一流學府，儼然成為中國新一代官員們鍍金的最佳目的地。新加坡政府也以此拉近與中國的關係，凸顯對中國的影響力。

但是，在李光耀辭世這一敏感時刻，新華社為什麼說李光耀令中國「心情複雜」呢？

所謂「心情複雜」這一中國式的、欲說還休的修辭，背後的意思是，李光耀的某些觀點和政策，不僅不符合中共的期許，而且與中共的利益尖銳對立。

晚年的李光耀似乎大徹大悟，雖然不願放棄權力，卻拋棄了此前多年來津津樂道的儒家思想加自由經濟的「亞洲價值觀」。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李光耀表示，在全球經濟的要求之下，亞洲價值觀或儒家價值觀，差不多過時了。新加坡和香港在應付金融危機方面表現最為出色，並不是因為亞洲價值觀，而是因為英國殖民地價值觀，特別是經濟透明和法治。在東亞的大部分地區，儒家價值觀「導致了過分的做法」，尤其是任人唯親——把是否與某人熟識、而不是人們將如何處理資金做為投資依據，結果帶來了巨大的災難。李光耀還承認：「在資訊技術時代，年輕和一副靈光的腦子是巨大的優勢。在我們的國家裡，做決定的是老人，他們行動遲緩，他們會錯過機會。」雖然他把持權力至死不鬆手，但他意識到這並非國家發展的常態。喜歡老人政治的中國官府，聽到這樣的話，當然感到如芒在背。

在處理與中國的關係時，李光耀並沒有將中國當作值得信賴的朋

友。只是因為中國是一條近在咫尺的巨龍，才不得不說一些讓中國耳順的話。從中國開始改革開放起，李光耀就嘗試與中國展開經濟合作，但成果寥寥。新加坡在中國開設的科技園區慘遭失敗，中方肆無忌憚地竊取知識產權及貪瀆腐敗。新加坡人意識到，儘管他們中的大部分人與中國人在族裔上都是華人，但在生活方式、思維方式上，與中國人彷彿生活在兩個世界；反之，他們的生活方式和思維方式更接近英美的白人。就李光耀而言，他是一個親西方、尤其親美的亞洲領袖；就新加坡而言，自從它建國以來，一直是美國的盟友。

在意識形態上，李光耀堅決反共；在國家利益上，他對中國採取「防人之心不可無」的立場。李光耀曾公開表示，新加坡積極加入美國所領導的東南亞條約組織等區域軍事聯盟，目的在於遏制共產主義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他先後與日本、澳大利亞、美國、韓國等友好國家大談「要提防中國」，並主動要求美國多多參與亞洲軍事事務，以抑制中國的野心。

當中國在南海問題上對周邊國家獅子大開口之時，雖然新加坡與中國不存在領海或領土爭端，但出於唇亡齒寒之感，對中國提出批評。李光耀說：「亞洲很多中小國家很擔憂中國可能想恢復昔日的帝國地位，他們擔心可能再次淪為不得不向中國進貢的附庸國。」這些言論令北京十分不爽。

李光耀一生訪問中國三十三次，見過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和習近平等五代中國最高領導人，大概是外國元首中絕無僅有之人，但他內心並沒有將任何一個中國領導人當作推心置腹的朋友。跟李光耀真正有私交的，反倒是台灣的蔣經國和李登輝——後來因李登輝走台獨路線，與李光耀漸行漸遠，但兩人情誼大致尚在。

新加坡一直與台灣保持半秘密的軍事合作關係。新加坡建國之初，

國防軍到台灣接受軍事訓練。新加坡和中國建交之後，新台軍事合作仍未中止。中國雖然不高興，也只能假裝不知道。

因此，中共對李光耀之死心情複雜、百感交集。

## 誰跟你是「命運共同體」？

習近平在博鰲亞洲論壇的開幕演講中苦口婆心地兜售「亞洲命運共同體」的概念，他聲稱：「我們要把握好世界大勢，跟上時代潮流，共同營造對亞洲、對世界都更為有利的地區秩序，通過邁向亞洲命運共同體，推動建設人類命運共同體。」

納粹德國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激情澎湃地宣揚「歐洲命運共同體」，很多歐洲的政治家和民眾信以為真，認為在希特勒的帶領下，歐洲從拿破崙以來從未實現的長久和平將變成現實。然而，短短幾年之後，納粹的鐵蹄就踐踏大半個歐洲。與此同時，軍國主義化的日本似乎大公無私地倡導「大東亞共榮圈」的概念，以「解放殖民地、相互尊重彼此獨立」為號召，以建立大日本帝國、東亞及東南亞「共存共榮的新秩序」為目標。只是，對於不願跟其「共榮」的國家和民族，立即用飛機大炮打過去。今天習近平的「命運共同體」之說，會是納粹德國的「歐洲命運共同體」和軍國主義日本的「大東亞共榮圈」的升級版嗎？

習近平粉飾說，中國自古以來就是熱愛和平的國家。但事實是，僅以漢人建立的王朝而論，就多次征伐高麗、越南及西域各國，每次戰爭都是血流成河、屍橫遍野，連詩人也詠嘆說「可憐無定河邊骨，猶是深閨夢裡人」。中國既然將蒙古人建立的元朝和滿人建立的清朝納入漢人的正統史傳之中，那麼元朝和清朝的窮兵黷武就更是罄竹難書了。

鴉片戰爭之後，中國積弱，成為西方列強蠶食鯨吞的對象。一九四九年中共建政之後，則以報仇雪恨的心志，與周邊國家劍拔弩張。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國與蘇俄、韓國、越南、印度等鄰國都發生過規模不等的戰爭，中共在邊界衝突中習慣採用武力解決問題。

習近平喜歡引經據典，他在這次演講中引用孟子的話「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來證明「不同文明沒有優劣之分，只有特色之別」。但是，文明與不文明（野蠻）之間當然有優劣之分，民主、自由與獨裁、暴政之間當然有善惡之別。野蠻、獨裁、暴政絕非文明的另一種形式，絕非多元文化之一種。習在國內秘密發佈文件，命令媒體和大學「七不講」（包括不能講普世價值），殊不知，沒有這些「不能講」的價值，如何締結建立在共同價值之上的「命運共同體」呢？

習近平對新加坡模式情有獨鍾，在講話中特別向剛去世的李光耀致意：「李光耀先生是受到國際社會尊重的戰略家和政治家，為亞洲和平與發展以及亞洲同世界的交流合作做出了突出貢獻。」然而，習一定忘記了，被他視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的李光耀，在生前對中國試圖恢復天朝模式的外交深感不滿，並向媒體抱怨說：「中國告訴我們國家無論大小一律平等。但當我們做的事惹其不高興時，他們就會說你讓十三億人民不高興了，請搞清楚自己的位置。」

薑還是老的辣。李光耀一句話就戳破了習近平苦心打造的「亞洲命運共同體」的肥皂泡。環顧整個亞洲，沒有哪個國家願意與習近平統治的中國結成「命運共同體」。

## 綏靖政策不可取，普世價值當堅持

習近平就任中國國家主席時，西方觀察家普遍的觀感是，六十歲的習近平頭髮濃密烏黑、面帶溫和笑容，是個戈巴契夫型的改革派。……但是習近平很快就展現他有自己的一套計劃——中國將再度崛起、重返全球權力金字塔頂端的寶座。

—白邦瑞（Michael Pillsbury）

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初期，希特勒巧舌如簧地將自己描述成和平使者，暗地裡擴軍備戰、兵強馬壯；西方民主國家事不關己，高高掛起，採取綏靖政策，結果「搬起石頭砸自己的腳」，災禍一發而不可收拾，大半個歐洲在慘烈的戰爭中淪為廢墟。如今，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領袖、學者和媒體，對習近平政權缺乏警惕，敞開大門、引為上賓。習近平周遊列國，在紅地毯上笑容可掬地告訴世人，大家趕快到中國來發財吧，中國的人權問題與你們無關，假裝沒看見就好了。

於是，中國成了一座新的金山。習近平宣佈成立洗錢機構亞投行，中國擁有一票否決權。除了美國和日本之外，歐亞各大國爭先恐後加入其中，幻想一本萬利，殊不知這是一處深不見底的「爛泥潭」。澳洲政治評論家彼得·海切爾警告說：「西方的領導人們不應該再玩文字遊戲了。」

……我們的世界面臨著法西斯主義的復甦，而陷入經濟泥潭的歐洲和困於政治內鬥的美國，都還沒有意識到它們要面對的危險、憤怒的敵

人是誰。」承平日久的西方民主國家，對這一沉痛而尖銳的呼籲充耳不聞。

## 習近平享有的「全球榮譽」

中國媒體全力打造習近平「美不勝收」的國際形象，總結了習近平上台之後榮獲的種種國際榮譽。

其中，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管理學院艾什中心公佈的「世界十個主要國家領導人形象全球公眾調查報告」中，習近平高踞榜首。中國官媒評論說，這「反映出習近平的領導才能和政績，已受到國際的肯定，亦使中國在國際間的地位更受尊崇」。美國媒體則驚呼：「在西方國家正向全球大力推銷其『民主模式』的時代，一位出自『專制國家』的領袖反而成為舉世公認的『最佳領導人』，出現這種情況，可能有些人感到驚訝。」

據悉，該調查共訪問了三十個國家超過兩萬六千名公眾，徵詢他們對十位具全球影響力的國家領導人的看法，具有相當的代表性。結果顯示，習近平在綜合排名、受訪者對本國領導人認可度、三十國受訪者對十國領導人認可度、受訪者對本國領導人正確處理國內及國際事務信心度等方面，都位列第一。至於美國的歐巴馬和英國的卡麥隆只分別排名第六、七位。從該調查報告中可以看出，中共政權耗費巨資對外營銷軟實力的「大外宣計劃」，有所斬獲。

習近平榮獲了兩項「年度人物」稱號：第一項是俄羅斯「二〇一四年度人物」，這是俄國首次將該獎授予非獨聯體國家的領導人；第二項是美國《時代週刊》「二〇一四年度世界一百位最具影響力人物」，這

是習近平第五次上榜。為習近平撰寫評語的美國前駐華大使洪博培（Jon Meade Huntsman）寫道：「中國的前面沒有中間道路—或者努力失敗，這對這個地區將是災難性的；或者中國成為一個改革了的中央王國，她將成為美國在二十一世紀最大的挑戰和機遇。」

另有一項「權力人物」：在美國《富比士》（Forbes）雜誌「二〇一四年度全球權力人物排行榜」上，普丁名列榜首，歐巴馬屈居亞軍，習近平排名第三。《富比士》雜誌表示，該榜單排名綜合了政治、經濟和文化等因素，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全球大國國內權力格局和國際影響力的變化。

其他榮譽還有一籬筐：由墨西哥城市長曼塞拉授予的「榮譽市民」，及城市鑰匙、勳章和榮譽市民證書；由比利時菲力浦國王授予的「利奧波德大綬帶勳章」及證書，習近平獲得最高級，這個等級的勳章一般授予比利時和外國的王室成員及國家元首；委內瑞拉「解放者」勳章、古巴「何塞．馬蒂」勳章以及哈薩克納扎爾巴耶夫大學榮譽教授稱號等。

官媒評論說：「『習式魅力』之所以風靡世界，歸根結底，還是因為中國願意與更多國家交朋友、做夥伴，願意為『世界夢』的實現貢獻力量。這些頒發給習近平的榮譽，既是對中國在國際事務上傑出貢獻的肯定，也體現了中國在世界上不斷提升的形象和影響力。」大言不慚，徒增笑柄。

如果仔細甄別就可發現：《時代週刊》和《富比士》雜誌的人物評選，只是注重其影響力，這種影響力究竟是正面還是負面，並非評價標準。習近平的入選，並不意味著西方世界認可他的所作所為，只是因為他和他的政權對人類文明和世界影響甚大。其他那些榮譽，大都是俄羅斯、或者委內瑞拉、古巴、哈薩克等獨裁國家或垃圾國家賦予的，不僅

算不上榮譽，反倒是羞恥——這恰好說明習近平與那些獨裁者們屬於同類。

## 卡麥隆當學邱吉爾

習近平的最高榮譽是英國給予的。英國首相卡麥隆將拯救英國經濟的希望押寶在中國身上，對來訪的習近平卑躬屈膝，接待儀式宛如國王。為了討好中國，英國警方逮捕了抗議習近平的六四流亡學生邵江，甚至闖入其家中查抄電腦，堂堂皇家警察淪為共產黨的國保特務。

這一系列景象，讓人想起美國學者伊恩·莫里斯（Ian Morris）在名著《西方將主宰多久：從歷史的發展模式看世界的未來》的前言中，虛擬的一幕歷史場景：中國在鴉片戰爭中大敗英國，一八四八年，維多利亞女王在雨中於倫敦泰晤士河畔的碼頭下跪，恭迎大清駐英總督耆英。「道光皇帝恩准將英帝國納為中國的領地，並准許英國遵從中國之道。」事隔一百六十七年，那一幕終於變相實現！在習近平心目中，這就是「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鐵證。畢竟，在中共的民族主義歷史敘事裡，中華民族的屈辱，是由鴉片戰爭及割讓香港肇始的。如今，習近平以天朝大國中興之主的姿態高調訪英，英國人鞍前馬後、禮炮喧天，終於一洗一百多年來中國被西方列強欺凌之恥辱。

英國向中國「叩頭」，被英國首相卡麥隆的前策略顧問希爾頓（Steve Hilton）批評為「國恥」，希爾頓表示：「事實是，中國是個流氓國家，就跟俄羅斯和伊朗一樣卑劣，我不懂為什麼我們要向他們獻媚，而不是對抗他們，這才是我們應該做的。」他又說：「我認為我們應考慮制裁中國，而不是張開紅地毯來迎接他。」

一個國家的國力或許會衰退，但精神不能崩解，一旦精神崩解，則萬劫不復。卡麥隆當向他的保守黨前輩邱吉爾學習。邱吉爾在歐洲大陸淪陷於納粹德國之際，臨危受命，力挽狂瀾。儘管邱吉爾預料到戰後大英帝國國勢的滑落，但他反對法西斯主義和共產主義的雄心壯志從未低迷。

邱吉爾從來看不起中國，從不掩飾對中國殘暴而無能的統治者的厭惡，從蔣介石到毛澤東，他竭盡冷嘲熱諷之能事。一九四三年，美國總統羅斯福邀請邱吉爾和蔣介石赴開羅會晤，邱吉爾抱怨說：「美國人不應把中國看作幾乎同大英帝國相等的參戰大國，並且帶著偏愛把中國軍隊同俄國軍隊相提並論。」他還指出：「把中國做為世界四強之一是場絕對的滑稽劇。」當時，蔣介石真以為中國躋身世界四大強國，便與英國交涉，欲在戰後收回香港，卻遭邱吉爾嚴詞拒絕。如果邱吉爾答應蔣介石的要求，讓國民政府統治香港，在此後的國共內戰中，既然國軍連整個中國大陸都守不住，又哪裡守得住香港？如果一九四九年香港就赤化了，哪有此後四十八年的繁榮時代？

戰後，邱吉爾發表反對共產主義的「鐵幕」演說，其中最精彩的一個段落是強調英美共享的自由傳統，以及對共產暴政的不妥協。他指出，在那些實行暴政的國家裡，「各種包羅萬象的警察政府對老百姓強加控制，達到了壓倒和違背一切民主原則的程度。或是一些獨裁者，或是組織嚴密的寡頭集團，他們通過一個享有特權的黨和一支政治警察隊伍，毫無節制地行使著國家的大權」。那麼，英美等民主國家應當怎樣做呢？邱吉爾豪氣干雲地宣佈：「我們絕不能放棄以大無畏的聲調宣揚自由的偉大原則和基本人權。這些英語世界的共同遺產，繼大憲章、人權法案、人身保護法、陪審團審訊制、以及英國習慣法之後，它們又在美國獨立宣言中得到舉世聞名的表現。」

今天，卡麥隆應當在習近平面前重複邱吉爾這段擲地有聲的演講，而不是邀請習近平這個獨裁者到英國國會發表演講。給大英帝國保持最後一點尊嚴的是那些議員們，他們在習近平為時十一分鐘的演講當中一次也沒有鼓掌，在其演講結束後也沒起立鼓掌。《金融時報》報導說：「習主席在議會制的搖籃裡，遭遇了尷尬的瞬間。」下院議長約翰·伯考在開場白中說：「民主化運動的象徵—緬甸的翁山蘇姬女士曾經站在這裡，下個月印度的莫迪總理也將站在這裡。」他稱讚翁山蘇姬女士是「人權的象徵」，吹捧印度是世界最大的民主國家，而對中國則表示「希望中國成為不僅強大的國家，而且是給人道德靈感的國家」。言下之意是說，中國是一個沒有道德的國家—習近平聽懂了嗎？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四日，在浦志強案開審當日，英國外交官、BBC記者與其他國家的外交官和記者一樣，在法庭外遭到警察的粗暴推搡。英國政府就此罕見地批評了中國當局。英國外交大臣雨果·斯懷爾（Hugo Swire）表示：「英國外交官和記者遭遇中國安保人員的人身虐待，這是完全不可接受的。……他們不被允許旁聽庭審，這一事實為正當程序和司法透明打了一個大大的問號。」在中國人權議題上，英國終於從躲躲閃閃轉變為大聲疾呼了。

## 納粹德國、蘇聯與中共，誰更壞？

納粹德國、蘇聯和中共，是二十世紀地球上出現的三個最邪惡、最龐大、最具危害性的極權主義政權。納粹德國和蘇聯都已灰飛煙滅，只剩下中共政權「百足之蟲，死而不僵」。納粹德國終結於第二次世界大戰，蘇聯終結於冷戰，那麼，西方民主國家要用什麼樣的方式，終結生

命力似乎更頑強的中共政權呢？

為什麼納粹的罪惡被世人牢牢記住？首先，德國在二戰中成為戰敗國，戰敗國不能掌握歷史的書寫權，非得洗心革面、徹底「非納粹化」，才能重新贏得鄰國的信任；其次，納粹以種族屠殺的方式殺害六百萬猶太人，而猶太人憑藉其焚而不毀的生命力和在文化、商業、科技、政治領域的傑出成就，蒐集受害者資料、創建大屠殺博物館、追捕隱藏的屠夫獄卒，讓大屠殺成為人類必須面對的血淋淋的傷痕；第三，納粹的罪惡是西方（或者說歐洲）內部的「癌變」，仍然掌握全球文化霸權的歐美國家，重視切除自身癌細胞、保障自身身體健康的工作，對納粹的罪惡不敢忽視，在歷史教育和媒體報導領域反覆強調和鋪陳，以便讓年輕一代擁有免疫力。

與納粹的罪惡相比，在全球範圍內，人們對蘇聯共產黨統治七十年的種種罪惡的認識，要淺薄和稀少許多。俄國學者安妮·阿普爾鮑姆在其巨著《古拉格：一部歷史》中對比說，德國哲學家海德格因為支持納粹致使名聲受到嚴重損害，而法國作家沙特支持史達林主義卻仍保有崇高的聲譽。史達林的罪行並沒有像希特勒的罪行那樣激發起人們內心的同樣反應，原因在於「共產主義理想——社會公平、人人一律平等——對於大多數西方人的吸引力，肯定要比納粹的種族主義主張及其取得的以強凌弱的成功大得多。雖然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實行起來意味著一些完全不同的東西，但是，對於美國和法國大革命的知識分子後代來說，譴責一個至少聽起來類似於他們自己的制度那樣的制度相對來說比較困難」。這一分析切中要害。另外，雖然俄羅斯在過去三百年一直追求成為真正的歐洲國家，但歐洲從未將其看作同類，俄國人等斯拉夫民族都被視為「另一種白人」。在那片遼闊的土地上發生的血腥事件，歐洲人並沒有那麼強烈的興趣去關切和瞭解——只要這隻北極熊不咬人，歐洲就

放心了。

與以上兩者相比，西方世界對中共的罪惡更沒有興趣和耐心瞭解。僅以毛澤東人為製造的大饑荒而論，造成三千萬至四千萬人口死難，超過希特勒和史達林一生的罪行。但這一事件在西方的政治和歷史教科書中卻只有短短一行字。唯有六四屠殺，因為太多血流成河的影像資料曝光於全世界電視觀眾面前，西方大國的政治領袖在民意的壓力之下，才嚴詞譴責中共之暴行。六四之後短短幾年，隨著鄧小平在「南巡講話」中宣佈中國繼續引入外資、發展經貿，綏靖政策又成為西方對華外交的主流，緊隨台資、日資，歐美資金源源不絕湧入中國，成為中共的「救命錢」。

時至今日，西方對華綏靖政策中最具代表性的觀點，是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教授、曾在布希政府擔任負責東亞和太平洋地區事務的副助理國務卿的柯慶生（Thomas J. Christensen）「必須尊重中國」的理論。柯慶生認為，美國必須找到一種策略，讓美國能「接受甚至鼓勵中國在國際政治上的崛起、以及享有更大的名聲，但要影響中國的選擇，使其更願意放棄橫行霸道的行為……策略的成功，一方面需要實力和強硬的一種不尋常的組合，另一方面需要有讓中國安心、能傾聽中國聲音的意願」。

用中國古話來說，這一做法不正是「與虎謀皮」嗎？曾因報導天安門事件而榮獲年度英國最佳國際新聞記者的梅兆贊（Jonathan Mirsky），也是一位研究中國問題的學者，他在一篇書評中直言不諱地批判柯慶生的觀點：「我與許多後來被關押的中國異見人士見過面，多次目睹中國在西藏的行為，眼看著中國軍隊在天安門廣場開槍打死和平的示威者，這些經歷讓我很難贊成柯慶生的觀點。」

西方國家為何對中共採取綏靖政策？第一個原因，他們看重在中國

的經濟利益，多年來，中國是投資回報率最高的地方：跨國資本與共產黨合謀奴役數以億計的農民工—不必擔心工會的壓力，自稱代表工人階級的中國共產黨，不讓工人組織獨立工會；他們可以無所忌憚地破壞中國的環境—中國的環保法律是一紙空文，無人執行。一些陷入經濟衰退的西方國家，將中共當作解脫困境的救星，只要有錢賺，更罔顧人權議題。

第二個原因，西方人從內心深處的「隱形種族主義」推衍出「中國例外論」，通俗地說就是：「中國人跟我們不一樣，中國人不需要民主自由，只要有飯吃就好了。」在此意義上，中國人比南非黑人更加「低賤」—南非的曼德拉獲得西方世界的大力支持，西方人至少承認黑人應當享有基本人權；被中共關押在獄中的劉曉波卻成了「隱形人」，西方人認為中國人即使沒有人權也能活下去。

第三個原因，蘇聯東歐共產黨政權的垮台，並不意味著西方左派的偃旗息鼓。西方左派仍具有強大的影響力，當中共的御用文人依葫蘆畫瓢地使用後現代主義、東方主義、後殖民主義等理念來為中共的獨裁體制背書時，西方左派也順勢成為中共的座上賓，從喬姆斯基（Avram Noam Chomsky）到愛德華·薩伊德（Edward Wadie Said），在論及中國議題時，立即就從普世價值的底線上撤退。他們罵西方資本主義頭頭是道、義正詞嚴，面對中共的獨裁暴政卻沉默不語、甚至巧言令色地為之辯護。西方左派在西方主流媒體上塑造了關於中國的美不勝收的幻象。

第四個原因，近年來，中共財大氣粗，不像當年囊中羞澀時那樣，在西方面前自覺矮了一截；反之，如今中共不惜重金，對西方全方位地宣傳滲透，從紐約時代廣場的新華社巨屏廣告到遍佈世界一流大學的孔子學院，從給貧困國家的援助資金到資助海外多如牛毛的中文媒體，中

共做到了昔日蘇聯未能做到的一切：深入資本主義世界的心臟。由此，在全球輿論場中，「熊貓論」壓倒了「惡龍論」。

## 中國能改變國際政治經濟秩序嗎？

美國和西方國家的領導人必須面對這一系列關於中國的問題：中國真的能與民主世界和平共處嗎？人類近代的歷史中，有過一個獨裁的大國與其他民主國家和諧相處的先例嗎？中國對建立在自由主義基礎上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的侵蝕和衝擊，究竟到了何種程度？

江和胡時代謹守鄧小平「韜光養晦」的遺訓，謹慎處理國際問題。美國國防部在二〇〇二年首次公佈的《中國軍力報告》中，引用鄧提出的「冷靜觀察、沉著應付、穩住陣腳、韜光養晦、決不當頭、有所作為」等戰略方針，其中「韜光養晦」所用英文為「hide our capabilities and bide our time」，意即「掩蓋自己的能力，等待時機東山再起」。此後，美國政府在六個年度的《中國軍力報告》中都採用同樣的英文表述。國外還有一些英文書籍或文章將「韜光養晦」譯為「hide one's ability and pretend to be weak」，意即「隱藏能力、假裝弱小」；「conceal one's true intention」，意即「隱藏真實目的」；「hide one's ambitions and disguise its claws」，意即「隱藏野心、收起爪子」。

習近平上台之後鋒芒畢露的外交政策，已然放棄了鄧小平的告誡。美國學者夏偉指出，自從中國改革開放以來，中美雙方都在暢想：隨著時間的推移、中國經濟的自由化、雙方的教育與社會交流，中國或許會演化出更開放的社會，並成為全球事務上更負責任的一分子，從而賦予中美雙方一個共同的目標。習打破了這個幻想，「習近平的『中國夢』

是一個融合了眾多概念的立足於本土的願景，目的是將其民眾團結在財富增長、實力增強、民族統一及全球影響力提升的承諾之下，但並不涉及擴大開放和擁護憲政的內容」。而澳大利亞中國問題專家白傑明

（Geremie R. Barmé）則更為悲觀地指出：「中國的民族主義已經失控很多年了。……做為一個二十多歲時曾在信奉毛澤東思想的大學裡接受過教育的人，我有時候會比較陰暗地想，一系列地區衝突很有可能是未來幾年的現實。」

二〇一五年十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全球治理格局和全球治理體制」進行第二十七次集體學習。習近平講話通篇貫穿著對當下全球治理體制的「不滿」，透露其試圖改變和主導國際秩序的「雄心」。授課者、外交學院院長秦亞青是有名的鷹派人物，曾表示中國外交將更加強調國家核心利益，「中國維護國家核心利益的立場將更加強硬，政治要素更為突出。中國的外交將以變求恆，以策略的調整維護核心利益的恆久」。

如果中國不能實現民主轉型，福山所說的「歷史的終結」就是南柯一夢。今天的西方世界，需要雷根總統式的高瞻遠矚的領袖人物，制定長遠的對華戰略。當年，如果沒有雷根對蘇聯的遏制政策，蘇聯的崩潰仍會發生，但會延後若干年。二〇〇六年，我在白宮與小布希總統介紹中國的宗教自由狀況時，特別提出期許：「盼望總統先生能像雷根總統摧垮蘇聯政權那樣，幫助中國人民推翻中共的專制制度，讓中國及早實現民主化。」那時，小布希的戰略重心在中東地區，未能對此建議給出明確回應。後來，我的這番話受到中國民族主義者的猛烈抨擊，他們給我扣上「賣國賊」的帽子。如果說這是「賣國」，我引以為榮。我並不是說要將中國變成美國的殖民地，而是遊說美國幫助中國完成制度轉型。我深信，未來民主的中國必然像今天民主的日本那樣，成為美國在

亞太地區的親密盟友，受到周邊國家的普遍尊重，並為世界和平做出相應的貢獻。

從二〇〇八年以來，美國是近一個世紀在內政外交方面最糟糕的歐巴馬執政，他更不可能有雷根總統「讓柏林牆倒下」之遠景與抱負。歐巴馬在習近平面前卑躬屈膝，讓美國做為民主世界領頭者的角色黯然失色。中共派出公檢法人員和國安情報人員到美國執行抓捕貪官的「獵狐行動」，嚴重侵犯美國主權。當美國國務院提出抗議時，中國外交部不甘示弱、理直氣壯，儼然視美國為中國的殖民地。

如今，無論是在美國國內，還是在整個民主世界，對一位偉大的、有願景的美國總統的呼喚，已成為歷史與現實之呼喚。前惠普CEO、共和黨總統候選人卡莉·菲奧莉娜（Carly Fiorina）在加州西米谷雷根總統圖書館發表演講，展望其外交政策。卡莉談到，如果當選為總統，將針鋒相對地與中國這個「正在崛起的對手」打交道。中國利用經濟力量，改寫世界格局，但中國人深受「腐敗、污染和劣質產品」的困擾。中國經濟「缺乏自由」，最終將限制其發展的腳步。反之，美國建立在企業家精神、創新力、創造力和自由市場的基礎之上，美國的繁榮是無止境的。美國有能力影響中國的經濟發展，影響中國的商品流通。

冷戰時代，美國政府吸納國際戰略大師布坎南的策略，對蘇聯採取遏制政策。如今，在美國有沒有這樣具備遠見卓識的思想家？普林斯頓大學政治與國際關係教授約翰·伊肯伯里博士（John Ikenberry）在新書《自由巨獸》中，探討了自由主義對當今國際局勢的塑造和影響，特別是面對中國的崛起，美國在國際上應扮演何種領導角色。

伊肯伯里教授認為，二次世界大戰之後，在美國主導之下，形成一個追求自由的國際架構，同時推動許多國家的民主化，而這些國家也成為這個國際秩序的一分子。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韓國、台灣、智利、

阿根廷、巴西、東歐國家都被帶入這個體制之中，轉變成為市場經濟，轉變成為民主政體。冷戰之後，政治自由和市場經濟更是如同墨水般渲染開來。

二〇〇八年，美國遭受金融危及重創，而歐洲經濟更是身陷泥沼；與之對應的是俄國轉頭趨向威權主義，中國更是以高速發展的經濟為獨裁政治背書，並竭力向外輸出所謂的「中國模式」和「北京共識」。西方左派紛紛看好中國、看衰美國及自由主義的價值。但是，伊肯伯里認為，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秩序，注重「開放式的解決」模式，注重互相依賴的安全約束（security binding），已經廣為世界各國接受。中國雖然變成相當強大的國家，但在許多時候表示不認同當前的國際秩序。儘管如此，中國將無法衝撞並取代自由主義的世界秩序，他評論說：

「中國可以在一個開放的世紀體系當中，繼續當一個剝削者，做一個掠奪者。但是他們的模式卻無法成為世界秩序的模式，因為如果每個人都遵循它的模式，就會導致潰散，保護主義林立，整個體制崩潰。」

伊肯伯里強調，任何國際體制，都必須具備「可運作性」，而中國並未提出任何能夠代替既有體制的實際做法。他解釋說：「國際秩序必須要能夠解決問題。所以如果中國想要遊說世界各國，以它自己的制度來取代美國的國際秩序，不只是必須要有力量的支持，要有好的想法的支持，還要具備可運作性，做的事情必須要是其他國家想要做的。」伊肯伯里精心統計過，美國、俄國與中國自一九四五年以來，每五年一次的安全盟友變化情況。美國的盟友從十二個開始，現在已增加到六十四個；而中國的盟友從一個開始，如今仍然只有一個。具有諷刺意義的是，這個名義上的盟友（北韓），與中國的關係也是時斷時續、凶多吉少，兩國結盟乃是出於利用對方向美國施加壓力的功利性考量。當剛愎自用的習近平遇到更加剛愎自用的金正恩，中朝關係頓時進入冰凍狀

態。金正恩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勢清除以姑父張成澤為代表的親中派勢力，中國還來不及出手援救，張成澤等人已被處決。金正恩不顧習近平的勸告，執意啟動核試驗。原本被視為改善兩國關係的北韓牡丹峰（Moranbong）少女樂團赴北京國家大劇院的演出，二〇一五年十二月十二日突然臨時取消，並全團返回平壤，該事件使得兩國領導人幾乎公開對立——中國差不多已經失去北韓這個唯一的盟友了。美國的朋友遍天下，中國則是孤家寡人。所以，伊肯伯里的結論是：「當美國有六十四個盟友而中國只有一個的時候，我看不出來一個變革的世界，我看不出來一個以中國為中心的世界。」

伊肯伯里的核心觀點就是，必須堅持自由民主的普世價值，這是美國和西方應對中國挑戰的最有力的武器。美國和西方用這個武器打敗了納粹德國和法西斯日本，也打敗了蘇聯，肯定也能打敗共產黨中國。而習近平的百寶箱裡，再也沒有殺敵制勝的殺手了。

## 習近平治港，如蠻牛闖進瓷器店

暴君從不因專制而消失，卻往往因愚蠢而滅亡。

—沃爾特·薩維奇·蘭德

中共統治的秘訣，是謊言加暴力，也就是毛澤東所說的筆桿子加槍桿子。

在鄧小平時代，為了將香港騙到手中，主要是運用筆桿子，說不盡的好話，許不完的諾言，就像用胡蘿蔔騙驢子，用棒棒糖騙孩子一樣。到了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中共一步步將繩索套緊，讓香港無法掙扎、逃脫。到了習近平時代，筆桿子退場、槍桿子登場，既然謊言失效，就是暴力發威。習近平如同一頭闖進瓷器店的蠻牛，他的香港政策，使得港人離心離德，本土意識宛如星星之火呈燎原之勢。

二〇一五年最後一天發生的李波綁架案，徹底摧毀了香港人關於「一國兩制」的幻想。紐約大學法學院教授孔傑榮（Jerome A. Cohen）評論說，中國當局至今不知如何對香港書商被綁架事件做出解釋，講出各種版本的故事，但一次比一次顯得更愚蠢。綁架和電視認罪等一系列違反國際法和中國刑訴法的行為，顯示中國執意向世界宣佈它蔑視法治。孔傑榮在接受「美國之音」採訪時表示，有關李波被綁架的醜聞是非常悲慘的故事，「這是中共日益挑釁行為的一部分，運用綁架和其它非法手把那些他們不喜歡的、批評中國的人士抓到中國去」。

有人認為，這些非法事件北京最高層並不知情，是下面的人胡作非

為，敗壞了領導人的名聲。孔傑榮反駁說，這是無人相信的胡說八道：「習近平可以譴責那些行為，他可以解僱那些做壞事的人，但我們沒有聽到任何反應，沒有批評，也不承認，什麼也沒有。事實證明，這些綁架者的所作所為正是他們的領導人想要他們做的，他們想制止有關習近平的書出版。」毫無疑問，是先有了習近平義和團和紅衛兵式的執政方式，才有下面強力部門的為所欲為和邀功請賞。很不幸的是，香港成了被這頭公牛肆意搗毀的瓷器店。

香港人活著，是習近平的恩典嗎？

中共的高官顯貴們在對香港問題發表言論時，通常都是居高臨下、頤指氣使。他們意識不到，這樣偏偏暴露出他們狂傲、虛矯、偽善的真面目，就好像旗桿上的猴子把長尾巴和紅屁股露出來一樣。蒐集這些「大人物」的講話，以及中共官媒對香港問題的評論，將這些語言加入喬治·歐威爾的詞典中，歐威爾一定會心有靈犀地眨一眨眼睛：「對，這就是我筆下的動物莊園！」

二〇一四年八月十九日，中聯辦主任張曉明與梁耀忠等數名議員會面時，梁耀忠問到，中央會否允許泛民主派人士參選特首。張曉明的回應是：「你們能活著，已顯出中央的包容。」（The fact that you are allowed to stay alive, already shows the country's inclusiveness.）西環小吏一語道破天機，既然北京的主人是公牛般的習近平，派駐香港的欽差也不必對你們講究精雕細琢的修辭學。

「不到北京，不知道官小」，若走在北京街頭，張曉明是個無人認識、名不見經傳的小官。在中共如蛛網般的權力體系中，排名一千名也

排不到他頭上；但在香港，張曉明卻是一個口含天憲、威風凜凜的欽差大臣，從特首到巨富，在他面前無不卑躬屈膝、畢恭畢敬—因為他說的不是自己的話，而是習近平要他說的話。換言之，他是習近平安置在香港的留聲機和傳聲筒。

於是，張曉明的遣詞造句，也情不自禁地染上以習近平為代表的「紅二代」的「渾球」風格，也就是毛澤東從底層社會淬煉出來的「流氓無賴氣」。習是毛的好學生，習也有過底層生活經驗，所以習說話的風格粗鄙無文，卻通俗易懂。

獨裁者遇到不同意見，第一反應就是「弄死你」！中國專制政治的鐵律是：皇權時代「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黨國時代「黨叫民死，民不得不死」。在中共治下，那麼多「不服從者」身首異處、死不瞑目：毛時代，林昭被槍殺後，劊子手上門向她家屬討要五分錢的「子彈費」；鄧時代，天安門的抗議學生被坦克碾成肉泥、被機槍打成蜂窩，之後還不准失去孩子的母親悼念和哭泣；江時代，法輪功信徒被折磨凌虐，甚至摘取器官。習時代，則是曹順利和阿安扎西們這樣「被死亡」，死去之前被折磨得不成人形，如同納粹集中營中的猶太受難者。

相比之下，香港宛如人間天堂，香港才是「和諧社會」。張曉明說得不錯，唯有在香港這個彈丸之地，你們這些反對中央的泛民人士，方有一線生機。若不是中央的包容，你們這些甘當帝國主義走狗的香港人，只有「六七」暴動時敵人的悲慘下場：或者如麥基雲等十多名警察那樣被炸彈炸死，或者如商台播音員林彬那樣被縱火燒死，總之都是可恥地死於黨操縱的、正義的懲罰行動。

張曉明和習近平都是恐怖分子，他們服務的就是世界上最大的恐怖主義組織。面對中共政權的國家恐怖主義威脅，我仍然堅信，我們必定能比共產黨活得更久。當年，蘇俄異見作家索爾仁尼琴被驅逐出境之

後，很多人都認為他再也不能回到祖國，但他對強大的蘇共政權在他有生之年垮台持樂觀期待。「共產主義死定了」，索爾仁尼琴帶著勝利的情緒宣稱。

那時，蘇聯的軍事實力臻於頂峰，大部分西方政客和學者都認為這個帝國將永久存在，甚至壓倒美國。索爾仁尼琴卻敏銳地從蘇聯覺醒的年輕一代那裡看到未來的希望，「他們穿過一堆堆垃圾而前行，他們奮鬥著，探索著」，「人們不再害怕蹲在旁邊的吸血鬼和惡魔」。對於一個依靠暴力和謊言維繫的政權來說，當人民不再畏懼暴力、不再相信謊言，它的末日很快就降臨了。

我跟索爾仁尼琴持有同樣的信念。我們不僅不是靠共產黨的包容才活著，恰恰相反，我們將是共產黨和習近平的掘墓人。從劉曉波到許志永，從黃之鋒到林飛帆，那些舉牌要求官員公佈財產的中國公民，那些維園聚匯成海洋的燭光，都表明同樣的信念。「老大哥」不是不可以戰勝的，只要挺身而出，在風雨中擁抱自由，就能看到共產黨政權的灰飛煙滅。

## 習近平挑選的特首比英皇還大？

香港有兩位巾幗不讓鬚眉的、江青式的「女共產黨員」，她們的存在或許能讓習近平從正面意義上發出「竟無一人是男兒」之感嘆。

一位是葉太，一位是范太，她們都接受過純正的英式教育，都曾是港英時代的政府高官；如今，她們都遵循「屁股決定腦袋」的原則，成了中共香港支部的「地下黨員」和北京對港政策的「編外發言人」。

駐港大臣張曉明悍然宣稱香港施行「特首獨裁制」，特首只對習近

平一人負責。張曉明當然知道這個說法挑戰基本法和一國兩制、觸犯港人底線，卻刻意挑釁。近期，習近平的反腐風暴指向國台辦系統，唇亡齒寒的是對港工作部門，其負責人即為張曉明。張曉明大放厥詞，是出於自保心態。如果香港風平浪靜，他就無法向北京顯示其不可或缺的重要性。

張曉明的謬論一拋出，果然香港輿論一片嘩然，張曉明被駁斥得體無完膚。偏偏范太以為駐港大臣可以千秋萬代，張曉明是世代罔替的「鐵帽子王」，便奮不顧身地跳出來為之保駕護航。范太在接受媒體訪問時說，特首代表特區政府，其憲制地位高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張曉明說特首有特殊和超然地位是「有理由」的。她進而舉例說，特首進立法會，所有人都要起身致敬，說明特首地位無比尊貴。

在港大擁有碩士學位的范太，為什麼一發言就露怯呢？難道立法會的議員們向特首致敬，就能說明特首的權力至高無上嗎？范太真將立法會當成她父親徐大統效忠的青幫組織—幫會的徒子徒孫向大佬杜月笙三跪九叩，確實表明杜月笙宛如君王般，擁有對眾人的生殺予奪之權。

而立法會議員向特首致敬，是從英國學來的一種傳統禮儀。英國議會被譽為「議會之母」，奉英皇為最高領袖，「國王在議會」方能完整地體現英國的國家主權。從表面上看，似乎國王高於議會：所有的議案若要變成法律，形式上需要國王的核准；王室特權還包括解散議會、訂立條約、宣戰、授勳等。但是，國王對這些權力的行使，通常是依據首相和其他內閣大臣的建議而「行禮如儀」。深入探究更可知道，國王是從議會和教會手中接過王冠的，國王必須宣誓遵守議會的法律，這又表明議會的權力實際上高於王權。換言之，英國不是由名義上的國家元首國王統治，而是由議會以及從議會中產生的內閣統治。在此意義上，沒有人會否認英國是一個三權分立的君主立憲國家。

那麼，在張曉明或范太眼中，特首難道比英皇還要大嗎？他們口吐蓮花地為特首擴大權力辯解，其真正目的乃是讓習近平成為統御香港的絕對君主。因為，特首最終只是習近平如臂使指的傀儡。

## 誰是香港青年黨衛軍的「雌雄教主」？

共產黨不敢在香港公開活動，共青團也只能利用陸生滲透香港各大學的學生社團。習近平感到，爭奪香港年輕人的心，需要創建新的組織。二〇一五年一月十八日，制服團體「香港青少年軍總會」在駐港解放軍昂船洲軍營舉行成立典禮。令香港市民感到震驚的畫面，是由特首梁振英夫人梁唐青儀（坊間譏稱為「龍蝦」）親自擔任青少年軍「總司令」，全副武裝，英姿颯爽，宛如古代戲劇中的巾幗英雄梁紅玉。

弔詭的是，青年黨衛軍在香港成立這個如此嚴肅的新聞，《人民日報》海外版卻有意用娛樂化的方式來報導。文章用幾度輕佻的語言描述說：「有香港媒體把港人對於制服團體的追捧稱之為『制服誘惑』，因此就成立制服團體來吸引並教育『港童』。」這種充滿色情暗示的語言，若是「龍蝦」總司令看到了，會不會勃然大怒呢？

梁夫人雖已年老色衰，卻也無需穿上筆挺的制服誘惑丈夫。梁夫人要取悅的，是遠在北京的習皇帝。習大大身邊雖然有國色天香的彭，但對梁夫人的制服誘惑，必定不會視而不見。對此，香港政論家桑普諷刺說：「昔日中國『江青』指揮『紅衛兵』，今日香港『唐青』指揮『青少年軍』，時空轉移，簡直絕配。只要看看梁唐青儀昔日盡情『勾結』英國勢力的經歷及其英國護照，以及問問她那三位早已入籍英國的子女為何不『自願』參加『青少年軍』，就可以知道她和她的子女對這個

『軍團』究竟有多『忠心』。」

經歷了讓香港權貴心驚肉跳的佔中運動，梁振英和夫人聯袂組建青年黨衛軍，是要改變此前被動挨打的局面，主動出擊，先下手為強。他們連自己的女兒都敢狠心虐待，整治香港青少年自然是輕車熟路。如果能擁有一支由青少年訓練而成、輔助警隊的準軍事力量，反對派豈能如此猖狂？這個青年黨衛軍組織，計劃發展到十萬人，在以後某個關鍵時刻，招之即來，揮之即去。那麼，橫掃學民思潮、學聯、支聯會等反動組織，還不易如反掌？希特勒當年不就是依靠褐衫隊、黨衛軍奪取並保衛政權嗎？

梁振英夫婦學習的榜樣，當然是習近平夫婦。習夫人是現役的解放軍將軍，一定可以到香港來向梁夫人面授機宜。不過，環顧全球，還有其他兩對夫婦可供梁振英夫婦好好效仿。

一對夫婦是羅馬尼亞獨裁者西奧塞古和夫人埃列娜。數十年來，埃列娜一直是丈夫身邊的堅強柱石。她本人所受教育有限，卻依靠權勢取得化學博士學位。一九六八年，她被選入布加勒斯特市政委員會，四年後成為羅馬尼亞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委員。一九八〇年，她又被任命為部長會議副主席（政府副總理），實際地位僅在丈夫之下。有相當多羅馬尼亞人認為，她事實上助長了丈夫的腐敗和獨裁傾向。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西奧塞古政權被人民起義推翻，夫婦二人倉皇逃亡，在途中被倒戈軍人逮捕。二十五日，這對形影不離的夫婦被軍事法庭判處死刑，在登博維察縣兵營廁所前的一塊空地上被處決。臨刑前，西奧塞古唱起了《國際歌》，據說埃列娜打斷丈夫，哀嚎說：「他們要把我們像狗一樣射殺！」她還對行刑的年輕士兵哭喊：「我是你們的母親啊，哪有兒子殺害母親的？」而士兵冷冷地回答說：「我的母親早已被你們害死在勞改營了！」

另一對夫婦是南聯盟獨裁者米洛舍維奇和夫人米拉。由於一九九〇年代米洛舍維奇治下的塞爾維亞捲入三場戰爭，造成巴爾幹半島局勢的動盪和巨大的生命損失，米洛舍維奇被西方媒體稱為「巴爾幹屠夫」。因選舉舞弊被人民推翻後，米洛舍維奇被送交海牙國際法庭，成為歷史上第一個被送上國際戰爭罪法庭的前國家元首。在該案審理期間，米洛舍維奇心臟病發，死於獄中。而他的夫人米拉及子女，為逃避通緝令而流亡俄羅斯。

與西奧塞古的夫人埃列娜一樣，米拉亦非等閒之輩。她是貨真價實的貝爾格萊德大學社會學博士、教授，是南共聯盟前主席德·馬爾科維奇的侄女，正是憑藉這一特殊身分，扶持丈夫在政壇青雲直上。米洛舍維奇領導的社會黨是第一大黨，米拉則創辦南斯拉夫左派聯盟並任主席，形成夫妻兩人各自擔任黨魁、互相奧援的奇特的「兩黨制」。米拉與子女貪污上百億美金，豢養殺手暗殺政敵和批評她的新聞記者，心狠手辣、無惡不作。不過，比埃列娜幸運的是，米拉保住性命，繼續在莫斯科花天酒地。

上面兩對夫婦的故事已經結束了，如今是狼英和龍蝦，以及習大大和彭的舞台。他們自以為可以像楊過和小龍女那樣夫唱婦和、雙劍合璧，可是，台下的觀眾，能等到落幕的那一刻嗎？

## 中共何時「去蘇俄化」？

北京那些小不點的芝麻官們，在皇城根下彎腰駝背、畏畏縮縮，一到香港，立刻變成八面威風的欽差大臣，彷彿七百萬香港市民都得仰其鼻息。

繼中聯辦駐港主任張曉明公然破壞基本法、兜售特首獨裁制之後，全國港澳研究會會長陳佐洱亦嚴厲批評香港未有「依法實施『去殖民化』」，又指「去中國化」的殖民地主義者「死灰復燃、氣焰囂張」。

中共教訓香港「去殖民化」，也就是「去英國化」，但中共迄今為止卻沒有完成「去蘇俄化」，即便蘇聯覆亡二十多年了，中共的政治體制仍遵循史達林主義。

俄國歷史學家潘佐夫利用蘇聯解密檔案寫成《毛澤東：真實的故事》一書，書中揭露毛澤東得天下，有賴莫斯科出錢、出力、提供武器，國共戰爭就是蘇聯赤化全世界的外交政策的延伸。作者指出：「把中國共產黨改造成俄國式、以領袖為中心的黨（史達林化），才能確保未來與國民黨的內戰獲得勝利。中國共產黨的史達林化，需要強化其領導人的個人崇拜，以及完全壓制黨內反對派。在這些方面，史達林經驗豐富，幫了毛澤東大忙。」換言之，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不是毛自己打拼出來的，而是史達林幫助其樹立起來的。在延安整風之前，史達林隨時可以下令讓毛下台，甚至將其召到莫斯科囚禁和殺害。史達林沒有這樣做，是因為毛的存在符合蘇聯的國家利益。

史達林生前，毛澤東對其畢恭畢敬、言聽計從。檔案文件顯示，一九四九年十二月，毛澤東受邀到莫斯科參加史達林七十歲慶生宴，緊張到出發前必須服鎮靜劑。有一次，在史達林別墅兩人談話時，毛澤東魂飛魄散到必須躺下的地步，史達林親自拿枕頭給他休息。毛在對外關係上對蘇聯「一邊倒」，而史達林從未放棄「社會主義接管全球」的念頭，鼓動北韓金日成發動戰爭，毛聽其號令，擺平黨內反對意見，出兵「抗美援朝」，三年內死傷九十多萬兵力，甚至毛的長子岸英也陣亡。在史達林死後，毛在大躍進時實施城鄉隔離的戶口制、大三線軍工建設、一波波黨內高層清洗等，全都是學習史達林的做法。雖然史達林死

後，中國與蘇聯翻臉，但中共的權力結構，從政治局、書記處、中央委員會到各級黨委的結構，全都從蘇聯複製而來，至今不變。

在毛時代長大的習近平，對俄國的新沙皇普丁佩服得五體投地，當面向其表示，「我跟您很相似」，重演了毛澤東在史達林面前如同小學生般亦步亦趨的情形。近代以來，蘇俄侵佔中國上百萬平方公里土地，屠戮數十萬中國人民，毛澤東和習近平卻甘當「兒皇帝」，那麼，中共這個「兒子黨」有什麼資格教育香港人「去殖民化」呢？

## 李嘉誠對習近平的明褒暗貶

中國官媒連番炮轟李嘉誠，頗有殺雞儆猴、讓其他海外富豪乖乖地「共體時艱」之意。而李嘉誠所作出的公開回應，則是決絕地表示「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與北京當局半個世紀的友情，自此劃上句號。

君子絕交，不出惡言，不是因為李嘉誠是太平紳士、風度翩翩，而是他還不敢在檯面上跟北京完全撕破臉。他的回應，不是寫給那些炮製「討李檄文」的作者看的，而是寫給御用文人背後的習近平看的。

在鄧小平、江澤民、胡錦濤三朝盡享尊榮的李嘉誠，對共產黨內部權力運作的方式明察秋毫。李嘉誠當然知道，以習近平強勢統治的作風，若非其親自首肯，新華社、《人民日報》、《環球時報》這些揣摩上意的中共官媒，斷然不敢自作主張，對昔日的重點「統戰對象」發起如此尖酸刻薄的人身攻擊。這不單單是有可能「喧賓奪主」的「毫無根據的口舌之爭」，也不單單是「不代表國家方向」的「個別人士的言行」，而是來自習近平授意的「奉天承運，皇帝詔曰」。

此番「非李運動」，來勢洶洶，是習近平上台之後整體政治經濟政

策中不可或缺的一個環節。首先，就文革結束之後「改革開放」的國家政策而言，習近平的態度和決策是，政治上絕不改革，經濟上加快「國進民退」。故而，歐美跨國公司倍感風聲鶴唳，港台商人更是坐立不安。外資的好日子到盡頭了。

其次，就李嘉誠與習近平的關係而言，兩人雖然還沒有到針尖對麥芒的地步，但漸行漸遠乃是不爭的事實。三年前，在香港特首競爭中，李嘉誠不願支持習近平選中的梁振英，而執意公開擁戴唐英年，讓習近平耿耿於懷，此後不再像鄧、江、胡那樣給李嘉誠單獨覬見的機會。人際關係一旦破裂，就像破碎的瓷器一樣，再也無法修補。

李嘉誠這篇回應文稿直指批判文章「文理扭曲，語調令人不寒而慄」，是「沒有建設性的語言討伐」。這正是習近平一以貫之的語言風格和思維方式。習還是王儲之時，在訪問墨西哥途中，公開大罵西方國家對中國「說三道四」，是「吃飽飯沒事幹」，十足一個街頭痞子「子係中山狼，得志便猖狂」的嘴臉；習執掌最高權力之後，先拋出閉關鎖國的「七不講」，再祭出畫餅充饑的「共產主義理想」，這一切不正是李嘉誠不願相信的「文革式思維復甦」嗎？

雖然李嘉誠在文稿中七次讚揚習近平，尤其強調「對習主席沉穩的領導能力深感佩服」，但他的心裡話其實是：從此以後，你走你的獨木橋，我走我的陽關道，一拍兩散，各不相干。

## 拋棄「一國」，方有「兩制」

除非得到我們的批准，任何人都不得統治我們。

—約翰·加爾文（John Calvin）

習近平自以為「大國崛起」且大權在握，對內殘酷鎮壓，對外瘋狂擴張。在香港政策上，他親自主導，強硬地拒絕港人的普選訴求，並撕毀當初的普選承諾，命令全國人大這個偽議會通過假普選方案，宣稱「愛國必須愛黨」，「一國」高於「兩制」，關閉對話大門，連鄧小平時代的遮羞布都不要了。

「一國兩制」是鄧小平的遮羞布，是徹頭徹尾的彌天大謊。那時，中國的國力尚不足以抗衡整個西方世界，做為亞洲金融和貿易中心的香港，是一隻中共看重的「金母雞」。鄧小平擠出笑臉來與英國首相柴契爾夫人談判，承諾香港回歸後仍保有資本主義制度和原有的生活方式。由此，鄧小平成功地誘騙英方簽署《中英聯合聲明》，香港遂落入中共掌控之中。

鄧小平是「壞事做絕、謊話說盡」的狠角色：他是毛澤東發動的「反右運動」的急先鋒，致使數百萬右派家破人亡，卻從不認錯道歉；因為靠攏劉少奇而失去毛澤東的信任，在文革中被拉下馬，又卑躬屈膝地寫信給毛澤東和華國鋒，保證永不翻案，希望「出來工作」；西單民主牆初期，利用民意對抗保守派，在黨內鬥爭中獲勝之後，立即翻雲覆雨、凶相畢露，取締民主牆、抓捕民主人士；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

陽真心誠意地推動改革開放，希望將中國帶向民主政治的康莊大道，卻遭到鄧小平這位自我加冕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太上皇非法罷黜。鄧小平的話從來當不得真，「一國兩制」也是如此。

從世界歷史更可清晰地看出，任何一個國家、任何一個時代，從來沒有成功實施的「一國兩制」。西方沒有，東方也沒有；過去沒有，今後也不會有。專制與民主、獨裁與自由、共產主義與資本主義，好像火與冰一樣不可兼容，絕不可能同時存在於一個國家之內。香港無法在「一國兩制」的擠壓中絕處逢生。

習近平高舉「一國」，自以為香港徹底順服，任其擺佈。特首梁振英是忠心的奴僕，建制派控制立法會七成以上議席，香港媒體有八成在中資或親中的資本家的控制之下，更有馬雲出手收購《南華早報》並計劃將其改造成《人民日報》之香港版，如此這般，港人還能逃脫如來佛的手心嗎？中共官方研究機構社科院發佈了一份調查報告，顯示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民以做中國人為榮。這個數字比薩達姆統治的伊拉克和金正恩統治的朝鮮真實多了一他們的數據是：百分之百的伊拉克人都以做伊拉克人為榮、百分之百的朝鮮人都以做朝鮮人為榮。百分之百之外還有其他異見人士嗎？在獨裁者眼中，那些人都「不是人」，他們的結局：或者被埋葬在萬人坑裡，或者被關押在勞改營裡。

與此同時，香港大學民意研究計劃發佈了電話抽樣訪問一千零一十六名市民的調查結果，受訪者三成八自稱「香港人」，一成七自稱「中國人」，自認「中國人」的比率創歷年新低。儘管這份民調的主持人、學者鍾庭耀成為中共嚴厲抨擊對象，中共卻無法改變這個確鑿的數字。越來越多香港年輕人認為自己是香港人，不是中國人，香港與中國是兩個截然不同的概念。香港年輕一代的主體意識已經覺醒，「大中國」不再是一道解不開的緊箍咒，「一國兩制」的世紀謊言，已然走到破產之

邊緣。

## 一國兩制之下，哪有尊嚴與榮耀？

二〇一四年十二月，佔中風暴剛剛告一段落，習近平在北京接見梁振英時表示，中央政府堅定不移支持特別行政區政府依照基本法和全國人大常委會有關決定的規定推進政制發展。習近平特別指出，香港政制必須「有利於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可見，「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拋出的誘餌，「一國一制」才是北京當局的真實想法。

被佔中運動搞得焦頭爛額的梁振英，忐忑不安地赴北京面聖，從習近平那裡嗅到「不換人」的丹書鐵券的氣味，一顆提到嗓子眼的心終於放下了。這個非民選的特首，唯一的靠山就是習近平。

梁振英本是習近平的「黨內同志」，囿於地下黨員的身分，不能當選中央委員、乃至氣勢軒昂地踏進人民大會堂出席十八大。他宛如一頭害紅眼病的大灰狼，心有不甘情有不願。從表面上看，「狼特首」也算封疆大吏，可以獨當一面；但其在黨內的地位恐怕還不如中聯辦主任這個「駐港大臣」，必須時刻聽命於後者——他剛坐上特首位置，第一個去問計的地方就是西環的「駐港大臣辦事處」。狼性兇暴，對手無寸鐵的香港市民齜牙咧嘴，而在北大人面前則只能乖乖地搖動尾巴。

既然習近平一語定乾坤，「國家主權」和「國家安全」如泰山壓頂；那麼，中聯辦官員立即東施效顰地說，只要堅持「一國兩制」，香港的明天一定會更好。香港人應當老老實實地「分享做為中國人的尊嚴和榮耀」，言下之意是說：中國人享有的尊嚴和榮耀遠遠比香港人多——因為從來都是多的人施捨或賞賜給少的人，而非反其道而行之。

既然做中國人擁有無上尊嚴和榮耀，那麼，為什麼還有那麼多中國孕婦們絡繹不絕地跑到香港生子呢？為什麼香港特區的護照在國際上比「大國崛起」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更好用呢？

尊嚴與榮耀是兩個聽上去無比悅耳的詞語。在鄧小平時代，中共宣稱「人權就是生存權」，換言之，「人權就是豬權」。讓你吃飽飯，就是對你好，你就該感恩戴德、山呼萬歲。鄧小平以「能逮到老鼠的好貓」自居，不管黑白，有錢就是硬道理。到了胡錦濤時代，「人權就是豬權」那一套不足以服眾，和諧、幸福、尊嚴、榮耀等眩目的辭彙，鋪天蓋而來，就像張藝謀電影裡大紅大綠的美麗色彩。再到習近平時代，乾脆讓大家做白日夢，美滿富足都在夢中一一呈現。如果說鄧小平是一頭伺機而動的老貓，胡錦濤恰如一隻橫行霸道的河蟹，而習近平堪稱一頭蠢笨而兇悍的大河馬。「北京模式」、「民族復興」，對民眾而言，宛如畫餅充饑、望梅止渴；金山銀山、多財善賈，對於習近平而言，乃是「方今天下、捨我其誰」？

然而，究竟誰在中國能享有尊嚴和榮耀？像孫志剛那樣被毆打致死的大學生，是沒有尊嚴和榮耀可言的；像唐福珍那樣以自焚反抗暴力拆遷的業主，是沒有尊嚴和榮耀可言的；像上百位前仆後繼以自焚捍衛宗教信仰自由和自身文化傳統的藏人，是沒有尊嚴和榮耀可言的；即便是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這樣舉世公認的人間最高榮譽的劉曉波，也沒有尊嚴和榮耀可言——在中共眼中，劉曉波是一個連累妻子被軟禁在家的、無足輕重的「罪犯分子」。

反之，只有習近平享有尊嚴和榮耀，戰無不勝的「習近平精神」的頌詞新鮮出爐；只有李鵬家的公主享有尊嚴和榮耀，她將國庫盜竊一空，卻還企圖給老百姓建立「道德檔案」；只有馬雲、王健林等富豪享有尊嚴和榮耀，明明是太子黨的馬仔，卻堂而皇之地到全世界宣講白手

起家、夢想成真的傳奇故事。

那麼，香港人願意分享這種「尊嚴與榮耀」嗎？回歸以來，香港人「被分享」了太多的禮物：薩斯（SARS）病菌、二十三條、國民教育……每一件北大人の禮物，最後都成為禍港、亂港的根源。如今，對這從天而降的尊嚴與榮耀，對這砒霜般見血封喉的「一國兩制」，香港人的回答應當是：敬謝不敏。

### 「一國兩制」之下能「舞照跳」嗎？

當初，鄧小平信誓旦旦地向柴契爾夫人解釋「一國兩制」的「偉大構想」時，用了一個很形象的比喻：香港回歸中國後，資本主義制度將保持五十年不變，香港人「馬照跑、股照炒、舞照跳」。

如今，香港回歸「祖國」不到二十年，鄧小平的承諾就落空了一大半。唯一還保持原樣的，是跑馬。賽馬是英國人引入的運動，賭馬是香港人習以為常的休閒生活，北京的貪官污吏不感興趣，他們更樂意到澳門金碧輝煌的賭場去一顯身手。紫禁城裡的天朝貴胄們，懶得干涉香港人這點僅存的樂趣——心繫跑馬的人多了，關心普選的人就少了。

炒股呢？香港股市已被中國摻水虛胖的上市公司蠶食了半壁江山。香港人炒股時，戰戰兢兢地押上大半輩子的血汗錢，卻被中國的垃圾股牢牢套住。中國還推出「滬港通」等國家騙術、吸金大法，使香港股市與中國股市形成「一榮俱榮、一損俱損」的孿生關係。

跳舞呢？香港舞蹈節剛一開幕，便傳出由香港芭蕾舞團與德國多蒙特芭蕾舞團合作的揭幕節目「紅樓夢—夢紅樓」中，有關「文革」及紅衛兵等情節遭到刪除的醜聞。無論是緣於特區政府或中聯辦施加的壓

力，還是出於香港芭蕾舞團的「自我審查」，這一事件無疑為香港的文藝創作自由敲響了喪鐘。

該劇碼全長近兩小時，其中一幕，是主角林黛玉的死，致賈寶玉陷入傷痛，對著投影出來的紅磚牆泣訴，並快速投影出約十二分鐘，顯示明清兩朝、民國、國共內戰和文革的影像；該幕尾聲則有多名紅衛兵裝扮的舞者，左手舉起《毛語錄》登台起舞。但首演翌日，即第二場公演，十二分鐘涉及文革的錄影全被刪除，紅衛兵舞者則變成身穿綠色衣服的舞者演出。

喪鐘為每一個香港人而鳴。香港人雖然還能跳舞，但舉手投足、一顰一笑，都必須嚴格遵循北大人擬定的劇本。若是北大人不喜歡的動作，縱然你有驚豔之美，也只能「藏之於深山，傳之於後世」。北大人不僅要控制你能看什麼電視，還要規定你能跳什麼舞蹈。下一步，連餐桌上吃什麼飯菜，他都要來插一手。

與此同時，中國的「大媽廣場舞」悄悄佔領香港的街頭巷尾。香港本土派與擾民的大媽們發生多起衝突。民辦教育專家、網路大V信力建撰文〈從「廣場大媽舞」看「文革流毒」〉揭露這種「大媽廣場舞」的本質：現在五、六十多歲的廣場大媽們，文革時期正是她們少年兒童時代，「可以斷言，她們所以熱衷『廣場舞』除了健身外，更重要的原因是找回在她們兒童少年曾經為之熱血沸騰的『激情燃燒歲月』，或者說是對文革那種大轟大鬧，在偉大領袖指引下將自己意志強加於他人頭上的火紅時代的追憶。」他指出，「廣場舞」基本上就是文革時期的「大喇叭」加「忠字舞」的結合。他呼籲，中國只有在徹底清除文革餘毒，建立真正尊重他人權利的法治社會後，「廣場大媽舞」這一將自己意志凌駕於他人頭上的痼疾，才能真正地銷聲匿跡。然而，廣場大媽舞沒有收斂的跡象，信力健卻被關進了監獄—習近平連公認的溫和派都要抓

捕，他留給知識分子的只有兩種選擇：要麼御用，要麼下監。同樣，港人面臨的也是這兩種命運。

如果真有人傻傻地問：究竟是誰違反了鄧大人「舞照跳」的承諾？答案很簡單，是鄧小平自己，以及鄧小平的接班人們。中共的本質可用八個字來形容，「好話說盡，壞事幹絕」。他們從不相信自己所做出的任何承諾、簽署的任何條約。延安時代，共產黨以「聯合政府」的願景誘騙中間力量，一旦奪取政權，當年諷刺國民黨政權的兩句名言「一黨獨裁，遍地是災」，頓時成為對共產黨的最佳描述。毛澤東自食其言，施展「陽謀」，掀起「反右」運動，百萬知識分子遂成網中之魚；鄧小平出爾反爾，揮起屠刀，鎮壓「反革命暴亂」，數千愛國市民和學生頓成孤魂野鬼。殷鑒不遠，歷歷在目。

所以，相信共產黨和習近平的人，是自作孽，不可活。難怪蔣經國當年接受《紐約時報》採訪的時候，語重心長地說：「與中國共產黨談判，就是自殺行為，我們沒有那麼愚蠢。」

## 捍衛「港制」，走向「兩國」

「一國」破局，「港制」浮出水面。捍衛香港的基本制度和核心價值，成為港人的首要使命。

二〇一三年，香港維園「六四」燭光晚會籌辦期間，出現關於「愛國口號」的爭議，顯示香港人心思變、被中共嚴重污染的「愛國」一詞已無法凝聚民意。

此前，雖遭各方之非議與批評，抱殘守缺的支聯會仍不願放棄「愛國愛民，香港精神」這個從一九八九年延用至今的神主牌。

在這一點上，天安門母親運動發起人丁子霖更具開闊的視野和深邃的思想。她在接受香港媒體訪問時指出，六四事件中，學生曾提出愛國的說法，結果被扭曲為愛國等於愛黨：「你為什麼不把香港精神的主動權，掌握在手裡，這是廣場上學生的口號，人家早就不用了。」她批評支聯會使用此口號是「愚蠢」，應該反思。

支聯會常委徐漢光向丁發電郵反駁，認為丁不瞭解香港及支聯會的情況，並批評她患上「斯德哥爾摩症候群」。對此，丁子霖憤怒地表示，「親人忌日快到的時候，居然遭如此辱罵」，並寄語支聯會：「如果這樣下去，那會自己（支聯會）越來越孤立，你會衰萎的。而且我還講了一句重話，我希望支聯會越做越好，不要濫用六四遇難者的資源。」

隨後，徐漢光辭去支聯會常委職務，並就事件表示歉意。支聯會主席李卓人親自致電向丁子霖道歉，並宣佈燭光晚會上將不再叫「愛國愛民，香港精神」口號，僅保留「平反六四，永不放棄」，會場亦不會掛出「愛國愛民，香港精神」橫額。

這一場爭論頗具指標意義。固然，人人都知道，支聯會所說的「愛國」是愛土地與人民，與共產黨所說的「愛國」是愛黨和政府完全不同；但是，既然「愛國」已成為共產黨的宣傳術語，何必去跟共產黨爭奪這個詞語的闡釋權呢？所謂「近朱者赤，近墨者黑」，黨文化和黨思維，不妨遠遠避開。

中國要求包括港人在內的所有民眾一心一意去愛的「國」，是僵冷的「一國」。「一國兩制」是鄧小平欺騙港人和世界的超級騙術，其本質是「一國為體，兩制為用」。古往今來，從未有過在「一國」之內成功維持「兩制」之先例。即便是共同認可《獨立宣言》和《憲法》的美國北方與南方，因為對奴隸制的立場截然不同，雙方仍不能在「一國」

之框架下和平共處，而必須經過一場血雨腥風的內戰才能重新合一。當時，十八歲至四十歲的南方白人男性，百分之三十在戰爭中死亡。付出如此沉重的代價，美國才能重建基本價值、社會共識以及政府結構。由此可見，民主與獨裁、自由與奴役，如同冰與火一樣不能相融。

「一國兩制」在香港回歸之後的實踐，已證明這條路絕不可行。北京昔日做出「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承諾，正一項項被撕毀殆盡。習近平操縱的「地下黨治港」與「中聯辦治港」雙管齊下，「二十三條」與「國民教育」前後夾攻，流氓「愛港力」暴力襲擊市民集會與駐港解放軍軍演威脅「兩手硬」，非得讓「兩制」變成「一制」、要香港向北京下跪不可。

港人必須捍衛香港的核心價值。二〇〇四年六月七日，近三百位來自香港四十二個不同專業、學術界人士在報章聯署《香港核心價值宣言》，列舉香港的核心價值是「自由民主、人權法治、公平公義、和平仁愛、誠信透明、多元包容、尊重個人和恪守專業」。宣言直指近來香港核心價值備受衝擊，與港人所追求的目標越來越遠，呼籲市民齊以言論和行動維護香港的核心價值，以免令香港變成「失去靈魂的軀殼」。

港人可以一手捍衛「港制」，一手為獨立創造條件。即便中國實現民主化，台灣、香港、西藏、新疆等地，未必就要與中國統一。未來充滿智慧的領袖，可以打造一個如同英聯邦的國際組織，以凝聚華人文化圈的力量——這比欺世盜名的一國兩制更加可行。

## 習近平為何懇求美國打壓台灣？

中國對國際尊重的渴望在賦予中國共產黨合法性的民族主義敘事中佔據中心位置。習近平一直特別強調要達成「新型大國關係」，這種關係意味著中美的地位會變得更平等。

—白潔曦（Jessica Chen Weiss）

進入二十世紀以來，中美關係中出現過兩次激烈衝突：美國轟炸中國駐南聯盟使館以及中美南海撞機事件。當時中美關係的大方向仍然朝著積極方向發展，這兩個具體事件受到最高當局有效管控。然而，當下中美之間雖看上去無大事，但矛盾是更深層次的：習近平認為中國羽翼豐滿，無需韜光養晦，企圖挑戰二戰之後以美國和西方為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這種冒險思維改變了中國自文革結束後的外交政策，勢必讓中國與美國爆發嚴重衝突。

在此多事之秋，習近平訪問美國，希望暫時修補與美國的矛盾，他畢竟還沒有準備好跟美國撕破臉。習近平在西雅圖發表的演講中指出，中美兩國一旦陷入對抗和衝突，將引發全球災難，兩國必須加深彼此互信、減少猜疑。然而，既然言者「言不由衷」，聽者自然「藐藐」。儘管習訪問團陣容強大、美方亦給足面子，但實際成果相當有限。中美在網路安全和廢氣減排上達成相關協議，算是雞肋似的收穫—訴諸中共執政以來的歷史，這個政權既不遵守自己制定的憲法和法律，也從未認真遵循已經簽署的聯合國公約和諸多雙邊協議，因此這兩個協議多半是束

之高閣的廢紙兩張。

中美雙方的互信並未經過此次訪問而有所增強。習提出與美國建立「新型大國關係」，美方無動於衷。比起中國訪民攔車告御狀、聯大演講聽眾稀落、風頭被同步訪美的教宗搶走、以及希拉蕊在社交媒體推特上嚴厲批評習「一面迫害女權主義者，一面卻在聯合國主持婦女權益的峰會？可恥！」等「看得見的羞辱」來，美方不接受「新型大國關係」的概念，對習是更大的挫敗。《紐約時報》在評論中直率地指出：「習歐會成果未達預期，中美分歧難消。」美方對習的本質有了清晰的認識，正像美國國際戰略研究中心亞洲問題高級顧問葛來儀（Bonnie S. Glaser）評論的那樣：「習近平是一個極端民族主義者，極力要實現民族復興的中國夢，哪怕這意味著破壞與美國的關係，以及中國與鄰國的關係。」（相比之下，台灣民眾和主流輿論對習的認識相當淺薄，特別是受《天下》、《遠見》、《商周》等代表政商利益的媒體影響，很多人對習的評價傾向正面，對中國的經濟滑坡的危機缺乏警惕。）

在此背景下，台灣議題不是此次習近平跟歐巴馬討論的重點，但仍在習近平提出的清單上。習近平不可能指望美國為中方僵硬粗暴的台灣政策背書，但希望美方至少「老調重彈」一遍。中國官方智囊、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副院長金燦榮分析說，習近平會晤歐巴馬時，可能視會談情況觸及「九二共識」，預料只會「原則性」地提一下。確實如此，習在中國為所欲為，其對台政策卻一敗塗地：他無法通過操縱「兩岸政商聯盟」繼續左右台灣政局，他無可奈何地看到經過太陽花學運之後，國民黨急統派急遽衰敗，台灣民間力量迅猛興起。習近平無法阻止台灣的政黨輪替和憲政改革，他所剩下的最後一記殺手，就是懇求美方出面幫助干涉這一「中國內政」。

## 習近平早就拜託卡特介入台灣議題

弔詭的是，中共統治者口口聲聲地主張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卻又主動邀請美國參與意見。若是真正的民族主義者，不會漠視這一引狼入室的「賣國行徑」。那麼，中國的憤青們為何鴉雀無聲呢？

當初，習剛剛被選為儲君，由地方大員進入中央政治局常委會和書記處，負責港台政策。有一次，習在人民大會堂會見美國前總統卡特，會談的主題之一居然是台灣問題。

卡特在任時是一名政績乏善可陳的總統，卻以完成與中共建交這一「歷史性事件」被譽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卡特卸任之後頻頻以「民間和平使者」的身分訪問北韓、中國等專制國家，一廂情願地認為可以推動世界和平。殊不知，他屢屢被這些專制政權利用，淪為獨裁國家大肆宣揚的民主世界向其拱手垂裳的文宣素材。

習對卡特說：「台灣問題事關中國領土和主權完整，希望美國與中國一道，堅決反對、有效制止陳水扁推進入聯公投等台獨分裂活動，共同維護台海和平穩定和中美共同利益。」早已不是美國外交政策制定者和執行者的卡特，對習的這番高論只能是一隻耳朵進、一隻耳朵出。

中國愛國愛得發狂的憤青們，不可錯過習儲君這番精彩言論：既然台灣問題是中國的內政，為什麼習主動邀請美國過問？這不是自願將台灣問題國際化嗎？這不是自動承認中共原來要看美國臉色行事嗎？那麼，他們為什麼不走上街頭聲討習近平這個「美帝國主義的走狗」？

習近平呼籲美國干涉中國內政，是蕭規曹隨之舉。毛、鄧、江、胡等前幾任領導人，都曾向美國發出同樣呼籲。當年，毛故作輕鬆地對來訪的美國總統尼克森說：「台灣事小，世界事大。」實際上，美國對台灣的態度，讓毛念茲在茲。直到今天，包括台灣問題在內的中國「核心

利益」的認證書，都需要美國簽字畫押才能正式生效，這本身就是一個黑色幽默。

更可笑的是，當時習近平談話的對象，並非美國現任總統，而是卸任二十多年的「前總統」。當時，卡特甚至不具備「總統特使」之身分。習不瞭解美國的權力結構，還以為卡特可以像鄧、江那樣垂簾聽政，便興致勃勃地跟卡特暢談天下大事。殊不知，美國歷史上從未出現過一個當過總統、便終身都擁有權力的鐵腕人物。「鐵打的白宮，流水的總統」—任何一名美國總統，在任一天，便擁有憲法所賦予的權力；一旦卸任，立即成為一介平民，不再有一丁點公權力。習近平邀請卡特干涉「中國內政」，顯然找錯了對象。

## 美方先聲奪人，肯定台灣民主

如今，習近平終於媳婦熬成婆，收攏權力、敲打元老、朝綱獨斷，唯一令他忌憚三分的就只剩下美國。他不必再通過卡特這樣日薄西山的人物替他傳話，可以到白宮坐上主賓席與美國現任總統侃侃而談。

與美國如何保持剛柔相濟的關係，不僅關乎中共政權的穩固，更關乎習近平對黨政大權的掌控。習近平剛踏上美國，就大筆一揮簽下購買幾百億波音飛機的訂單，難道他想以此換取「贈品」嗎—即美方為「九二共識」背書。

美方知道習想要的是什麼，更知道有些東西不可以做為禮物贈送給習。美國樂見台灣的民主日益深化，美國和台灣在價值觀上的一致性，以及台灣在美國「亞洲再平衡戰略」中的重要位置，使美國不太可能默許中國吞併台灣。即便目前美國的總統是軟弱無力的、可稱之為「美版

馬英九」的歐巴馬，他也不會愚蠢到在台灣議題上任由習制訂規則。

習近平人還沒有出發，美方就先聲奪人，肯定台灣民主。

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賴斯（Susan Elizabeth Rice）在歐習會前夕就美中關係發表演說，美國長久以來的立場未變，仍奉行立基於「三公報」和《台灣關係法》之上的政策。美國的根本利益在於和平與穩定的兩岸關係，反對任何一方片面改變現狀。但中國南海擴建人工島、擴增瞄準台灣飛彈、發行卡式台胞證、擅自劃定航線、行文台灣地方警政機關，都是片面改變現狀、破壞現狀。顯然，她批評的重心是咄咄逼人的中國，而不是正在成為亞洲民主模範的台灣。

在九月二十二日下午華府外籍記者中心舉行的「歐習會」簡報會上，上任後首度與媒體會面的白宮國安會亞太事務資深主任康達

（Daniel Kritenbrink）和國務院亞太助理羅素（Daniel Russel）回答提問時說，當中方在「歐習會」談及台灣展望兩岸關係時，美國長期以來的一貫立場不變。康達強調，美國尊重、不會干涉台灣的民主程序，美方仍信守「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美國的根本利益是兩岸關係穩定；羅素則說，美國會繼續與北京溝通協商，要求北京克制。

康達的前任、現任歐亞集團諮詢公司亞洲事務執行董事的麥艾文，同日在「戰略暨國際研究中心」主講亞太未來面臨的挑戰。由於不具官方身分，他的言論有更大的自由度。原本是鴿派的麥艾文提到台灣二〇一六年總統選舉時說，關於台灣，美國的政策一向非常清楚且一貫。北京領導人及未來台灣不論誰勝選，都須負責找出能維持兩岸穩定的「政治架構」，這對台灣、中國及美國來說才是好事。

這幾位重量級人士的言論，首先堵住中共之口，讓習不可能在台灣議題上拉美國當幫手。美國的外交政策，有功利主義和國家利益至上的一面，也有理想主義和價值外交的一面。在處理與台灣問題時，兩者犬

牙交錯、難以分割。支持台灣的民主化進程、尊重台灣民眾的意志和選擇，既符合美國的國家利益和國際戰略，更契合美國賴以立國的民主自由價值。

## 中共偷樑換柱，弄巧成拙

習近平訪美，美國主流媒體反應冷淡，報導篇幅不足教宗的十分之一；中共的官方媒體則鋪天蓋地，彷彿習近平得到美方禮遇是至高無上的榮耀。

中宣部控制下的大小媒體，組成一部世界上最大謊言製造機。中國民眾不可能看到抗議者的身影，只能看到領取津貼前去歡迎的海外華人群體。中國民眾不可能知道大部分美國民眾不知道習近平是誰，而被灌輸以「習近平是全世界最受愛戴的領袖」的虛假觀念。

在中美雙方對台灣問題的討論上，中國官方媒體公然造假。新華社與中新社等媒體報導，歐巴馬說「美國支持一個中國政策，恪守中美三個聯合公報原則，這一立場不會改變，美國不支持台獨、藏獨、疆獨，也不介入香港事務」。美方隨即打臉，「歐巴馬的說法以二十五日的聯合記者會為主」。歐巴馬說法為：「我也重申我的堅定承諾，信守基於『（美中）三公報』與《台灣關係法》的『一個中國』政策。」歐巴馬沒有說過「美國不支持台獨、藏獨、疆獨，也不介入香港事務」這句話。中共掉進自己挖設的陷阱之中。

如果未來有一天，台灣人民通過關於獨立的公投，那是台灣人民自己的選擇，美國最多就是「不支持」，不會公然「反對」。因為，住民自決的原則，不僅由聯合國人權憲章所確立，而且在人類源遠流長的自

然法傳統中早已存在。美國的獨立戰爭就是基於這一原則而具有歷史正當性和正義性，正如英國保守主義思想家柏克所說：「為把自己納入一大帝國、以體會那虛假的顯赫，卻不惜付出人類的所有基本權利、所有內在的尊嚴，這代價，實在也太高了。」當年美國的開國之父們不願付出這樣的代價，不惜以戰爭方式尋求獨立，將心比心、感同身受，為什麼今天的美國要強迫台灣人付出做奴隸的代價呢？

當代獨立運動和浪潮，不僅席捲亞非拉若干不發達國家，即便在走向鬆散的「超國家同盟」模式的歐盟內部，也方興未艾。蘇格蘭獨立公投以些微的差異功敗垂成，但很快將捲土重來。二〇一五年九月，在西班牙東北部自治區加泰羅尼亞（Catalonia）的議會選舉中，獨立派聯盟贏得絕對多數議席。加泰隆尼亞地區領導人亞瑟·馬斯對支持者表示：「我們勝利了！」早些時候，該聯盟表示，如果以絕對多數勝出，他們將會在十八個月內宣佈獨立。加泰隆尼亞能做到，台灣為什麼不能？美國不會自告奮勇地去干涉西班牙內政、打壓加泰隆尼亞人民選擇自己生活方式的權利，又怎麼會應習的邀請去壓制台灣人民的意志與意願？

習近平的借刀殺人之計，還沒有實施就破產了。

## 習近平要跟台灣合寫什麼樣的歷史？

沒有一個國家如此可憐，以致於它不能允許自由言論。

—莫伊尼漢

台灣黑箱課綱爭議引發「中學生版的太陽花運動」，中共領導人習近平隔岸觀棋，向國民黨支招，在政治局集體學習時強調「要推動海峽兩岸共寫史書」。

據中國官媒報導，中共中央政治局針對「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回顧和思考」進行第二十五次集體學習。習近平主持學習時表示，要整合全國學術機構和研究隊伍，協調各地部門和機構的力量，扶持民間研究，推出高水準的權威專著和通俗讀物。而且，要推動海峽兩岸史學界共享史料、共寫史書，共同捍衛民族尊嚴和榮譽。這個面目越來越趨近法西斯的獨裁者，偏偏要彰顯他是反法西斯事業的忠實繼承者；這個剛剛讓央視播出解放軍演習攻佔模擬的台灣總統府畫面的獨裁者，偏偏要大力倡導兩岸「共同寫史書」。

對習百依百順的馬英九在二〇一五年「雙十講話」中回應說：「大陸當局最近就抗戰歷史提出『共享史料、共寫史書』的建議，我們抱持開放的態度。我們願意在『對等互惠』、『檔案公開』、『不設禁區』、『自由研究』的原則之下進行，並且不排除外國學者專家的參與。」馬英九是故意「難得糊塗」才與虎謀皮嗎？除了以馬英九為代表的見利忘義的兩岸政商集團繼續對習近平三跪九叩之外，習近平還能欺

騙多少中國人與台灣人呢？

## 在「七不講」主導下只能寫偽歷史

中國沒有學術自由、言論自由和新聞出版自由。習剛一上台，就發佈名為「七不講」的內部文件，然後，又出台一共十六條的《關於加強和改進高校青年教師思想政治工作的若干意見》，要求高校以馬列主義和毛澤東思想統一思想，抵制西方自由主義。習近平拼命捍衛毛和毛主義，因為「如果否定了毛澤東，我們的黨還站得住嗎？站不住就會天下大亂」。

在不能講「黨的歷史錯誤」的前提下，還能有真實的歷史書寫嗎？所謂共產黨的「歷史錯誤」，從近往遠推，包括鎮壓家庭教會和法輪功、六四屠殺、文革、大饑荒、反右以及屠殺數百萬國民黨軍政人員、地主和資本家的鎮反運動，這些當然都不能寫入歷史書中。

以習近平企圖讓兩岸合作撰寫的抗戰史為例，中共從來是「外戰外行，內戰內行」，面對日軍的掃盪丟盔卸甲，破壞抗戰則無所不用其極。中共在延安及其他地區集聚力量，奴役和壓榨民眾，種植鴉片斂財，通過「整風」完成法西斯式的一元化體制，由此在戰後擊敗國民黨，奪取中國的統治權。

在國共內戰期間，共軍獲得蘇聯援助，在東北招募大量頗具戰鬥能力的日軍和偽軍（包括朝鮮軍），接收其精銳的武器裝備，成為戰勝國軍的中堅力量（當然，蔣介石也組建「白團」對抗中共。指揮國軍打贏古寧頭一役的，不是湯恩伯或胡璉，而是原侵華日軍將領根本博）。在這場生死搏鬥中，兩黨都只考慮黨派利益，無視國家利益和民族尊嚴。

國共內戰的慘烈程度超越中日戰爭，比如長春圍城餓死三十萬以上居民，超過南京大屠殺二十萬的死亡人數。

「日本侵華成就中共霸業」這一真相，毛澤東多次在接見日本客人時赤裸裸地表達。若兩岸合作撰寫抗戰史，習敢於將偉大領袖的這類「最高指示」寫入其中嗎？

早在一九五六年，毛與訪華的前日軍中將遠藤三郎談話時，便說：「你們（日本皇軍）也是我們的先生，我們要感謝你們。」

一九六〇年六月二十一日，毛接見日本文學家代表團，與左派文學家野間宏等人會談時說：「侵略當然不好，但不能單看這壞的一面，另一面日本幫了我們中國的大忙。假如日本不佔領大半個中國，中國人民不會覺醒起來。在這一點上，我們要感謝日本皇軍。」

一九六四年七月九日，毛與參加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亞洲、非洲、大洋洲訪華代表談話時說：「事實上，日本帝國主義當了我們的好教員。第一，它削弱了蔣介石；第二，我們發展了共產黨領導的根據地和軍隊。在抗戰前，我們的軍隊曾達到過三十萬，由於我們自己犯了錯誤，減少到兩萬多。在八年抗戰中間，我們軍隊發展到了一百二十萬人。你看，日本不是幫了我們的大忙？」

一九六四年七月四日，毛接見日本社會黨人士佐佐木更三等時，拒絕了對方的道歉：「沒有什麼抱歉。日本軍國主義給中國帶來很大的利益，使中國人民奪取了政權，沒有你們的皇軍，我們不可能奪取政權。這一點，我和你們有不同的意見，我們兩個人有矛盾。」

一九七〇年十二月十八日，毛與老朋友、《西行漫記》的作者美國記者愛德加·斯諾（Edgar Snow）會面時說：「那些日本人實在好，中國革命沒有日本人幫忙是不行的。」

如果說以上談話都只是毛與民間人士的閒聊，不足以體現毛的國家

政策；那麼，一九七二年九月二十七日，毛與日本首相田中角榮會面，是正式的國務活動，是「君無戲言」。在兩國最高領導人的會面中，毛竟向日本首相發表出賣國家民族的言論，比之汪精衛更有過之。毛說：「我們要感謝日本，沒有日本侵略中國，我們就不可能取得國共合作，我們就不能得到發展，最後取得政權。……我們是有你們的幫助，今天才能在北京見你們。」

如果中共願意如實地將毛澤東感謝日本侵略軍這部分內容寫入歷史書中，台灣才能考慮與之合作。

## 兩岸合作出版「中華民國已死」的民國史

教育是中共當局對青年一代施行洗腦、培養乖乖聽話的順民以及被民族主義情緒驅動的「憤青」的工具，歷史教育尤其如此。在這種情況下，中國與他國合作撰寫歷史書籍，其質量堪憂。

此前，中國、日本、韓國三國學者與教師曾共同編著一本《東亞三國的近現代史》，此書在中國官方的強力主導下完成，出錢、出力的「大頭」都是中國政府。在參與編纂的數十名學者中，中方全都是體制內御用學者，他們不敢跨出官方劃定的紅線一步；韓國和日本的學者中，少有受社會廣泛肯定和尊重的權威人士，大都是不知名的親中派，他們對於這本書被中國官方利用無動於衷。比如，這本書中涉及中國部分，完全迴避習近平所說的「中共的歷史錯誤」。敘述抗戰歷史時，籠而統之地以「中國軍隊」名之；敘述中共建政之後的治理，則將中共描述成一個一貫偉大、光榮、正確的政黨，宣稱在共產黨中國，「公民享有廣泛的權利和自由」。此種「國際化」的歷史書，有何公信力可言？

其實，兩岸也早已合作過基本上在中國支配下的民國史。這部由兩岸近七十位專家學者合作、費時五年完成的、十八卷八百萬字的巨作《中華民國專題史》，號稱兩岸學術界規模最大的合作。該書主編之一、研究中國現代史的中央研究院院士張玉法認為，這是一件跨時代、有里程碑意義的事。

然而，二〇一五年《中華民國專題史》在中國南京大學舉辦新書發表會時，在新聞稿第一段就明目張膽地寫道：「中華民國史是中國歷史的一部分，始於一九一二年，止於一九四九年。」也就是說，在本書作者眼中，中華民國在一九四九年就滅亡了、終止了。那麼，仍然存在於台澎金馬地區的中華民國政府，究竟是個什麼東西呢？顯然，中共方面並不承認其合法性。由此可見，這部通史仍然是「成王敗寇」的大中國史觀下的產品，它究竟具有多高的學術價值，不由讓人深刻置疑。

兩岸合作寫書，關係並不對等。中國財大氣粗、人力充沛、圖書市場廣大（此套書目前只在中國出版，尚未進入台灣市場），參與其事的台灣學者只能唯唯諾諾、受其支配。我感到好奇的是，參與這套書寫作的台灣學者，好多是領取中華民國俸祿和台灣納稅人稅金的國立研究機構的研究人員和國立大學的教授，具有準公務員身分，為什麼對中國方面的霸凌和扭曲保持沉默呢？為什麼不敢挺身而出、據理力爭，捍衛中華民國的國家主權和尊嚴呢？

## 泛藍是中華民國的捍衛者嗎？

台灣的泛藍人士認為，中華民國是由國民黨和孫文創建的，雖然國民黨在內戰中戰敗、國民政府遷台，但他們始終是中華民國的捍衛者。

然而，種種跡象表明，他們早已不是藍色黨，而是粉紅黨，他們比台灣的本土派人士更不喜歡「中華民國」。

比如，洪秀柱提出「一中同表」論述，堪稱升級版的「九二共識」，讓習近平龍顏大悅、宣慰有加。洪指出，兩岸主權宣示重疊，「我不能說中華民國的存在」！因為這樣會變成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同時存在，「變成兩國論」！所以，她洋洋得意地宣告說：「這都是很有學問的話！」洪秀柱曾在北京受習近平接見，她不敢在習面前施展她在台灣立法院屢試不爽的那套中國功夫，更不敢為在中共眼中輕如鴻毛的中華民國正名。

再比如，此前中共國台辦主任陳雲林訪問台灣，是兩岸分治半個世紀以來中共政權登島的最高級別官員。國民黨政府為取悅這位天朝上使，不僅收起陳雲林視線所及之處的中華民國國旗，還嚴禁手持國旗的台灣民眾接近其下榻的酒店，甚至派出情治人員掃盪陳雲林有可能去參觀的書店，將反共、台獨類的書籍統統下架。恥於讓中華民國的符號曝光的，不正是民選的中華民國總統及其領導的政府嗎？這一幕，讓我想起韓國電視連續劇《世宗大王》，那時朝鮮身為明朝的藩屬國，處處受制於人。年輕有為的世宗大王悉心研製朝鮮文字和朝鮮曆法，以此提高朝鮮在文化上和政治上的獨立性。然而，當明朝派出東廠太監前來稽查和問罪時，朝鮮朝廷又不得不隱藏有關的儀器和資料。這不正是今日台灣的可悲處境嗎？

又比如，中國有不少痛恨共產黨暴政的年輕人，由於長期生活在資訊封鎖之下，找不到批判極權暴政的優質的思想資源，便將光復中華民國當作救命稻草。近年來，「民國熱」在中國成為一個耐人尋味的現象：蔣介石在浙江奉化的故居遊人如織，不亞於去瞻仰毛澤東韶山故居的人潮；陸客到台灣旅遊，與孫文、兩蔣有關的官邸、行館、紀念館，

是必不可少的行程。在中國的「民國粉絲」中，更為激進的一群年輕人，籌組異議性組織「泛藍聯盟」，在公共場合身穿印有中華民國國旗的衣衫、手持青天白日旗，甚至給國民黨中央總部寫信，要求加入國民黨，有些人因此受到中共的抓捕和刑求。然而，國民黨婉拒彼岸「忠黨愛國」人士的入黨申請，對他們遭受的迫害亦視若不見。有熱愛中華民國的中國青年開船到台灣尋求政治庇護，被國民黨當局嚴詞拒絕，並不顧其安危，予以遣返，讓海內外「藍粉」傷心欲絕。

由以上三個例子可以看出，泛藍已成習近平如臂使指的傀儡，泛藍才是中華民國的終結者。習近平剛一發出兩岸合寫歷史的倡議，馬英九、洪秀柱、吳思華、王曉波等人，就如小兵聽將令，急不可耐地行動起來。這就是他們面對民間反黑箱課綱怒潮寸步不讓的根本原因所在——他們寧可得罪台灣主流民意，也不敢惹習大大不高興。

## 馬習會：一場大賭徒與小賭徒的豪賭

只有中國大陸的人民擺脫共產主義時，我們才會坐下來同任何人談判。

—蔣經國

馬習會是一場大賭徒與小賭徒之間的豪賭。

賭徒之大小，乃是以賭徒之性情及賭資之多少而論：習近平行事為人仿效毛澤東之天馬行空、漠視體制、不按理出牌，在黨內清除政敵、震懾元老，個人崇拜在全國蔚然成風，且擁有中國已然躍居世界第二經濟大國的雄厚實力，賭技豪邁而賭資豐厚，故而是大賭徒；相比之下，馬英九是秘書出身、太監性格，執政無能、黔驢技窮，民意支持度跌到個位數，國民黨眼看就要全面崩盤，且台灣經濟也陷於停滯狀態，賭風謹小慎微而賭資有限，故而只能算是小賭徒。

賭徒的心態乃是「馬無夜草不肥，人無橫財不富」，個個都想通過一場賭局而改變命運，獲得本來不屬於自己的東西。然而，賭局從來不會出現雙贏之結果：或者是一方大獲全勝、另一方血本無歸，或者是雙輸。那麼，馬習會這場豪賭，誰贏誰輸？

習近平想要什麼？

習近平執政以來，其內政外交企圖達成三大目標：第一，在共產黨內部，以黨內鬥爭和政治運動的方式，改寫共產黨近三十年來形成的寡頭集體統治模式，重新回到毛時代的個人獨裁；第二，在中國國內，以法西斯式的全面鎮壓，摧毀正在蓬勃發展的民間社會，締造由「無所不能的國家」和「原子化的個體」二元組成的國家主義結構；第三，在外交上，重構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直接挑戰二戰之後、尤其是蘇聯解體之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重建帝制時代以中國為中心的「天朝體制」。

第一和第二個目標，習近平似乎勢如破竹、銳不可當，短短三年，江澤民和胡錦濤兩朝形成的「政治規矩」和權力格局統統被其打破。當然，雖然沒有檯面上的激烈對抗，檯面下卻已經暗潮洶湧、危機四伏，除了「習王（岐山）聯盟」以及「太子黨」集團的擁戴之外，反習勢力遍及各要津、伺機而動。

而習近平遭受的挫折偏偏出現在第三個層面：當中國的實力還遠不能與美國和西方抗衡之際，習急不可耐地亮出底牌，在東海和南海兩處同時發難，使中國面臨兩線作戰之困局。即便是兵強馬壯的納粹德國也無法在兩條戰線上獲勝，更何況腐敗透頂、文嬉武戲的中國？橫挑強敵的結果是引火燒身：美國和西方逐漸認識到，習近平不是可以坐在一起談判的「文明人」，中國則是危險程度超過俄國和伊斯蘭極端主義勢力的頭號敵人。

美國和日本拒絕承認中國自我加冕的「亞洲霸主」地位，習近平在南海和東海連連碰壁、灰頭土臉。對外稱霸的失利，當然可能引發國內反習力量藉機發難。習近平在內外交困之下，想到了擱置已久的馬習會，認為馬習會可以成為其反敗為勝的契機。因此，習近平力排眾議，主動向被冷落多日的馬英九拋出橄欖枝。

習近平與馬英九會面，讓馬英九在其設定的議題內打轉，在其內政和外交兩個方面都是大贏家。首先，將台灣問題內政化，可以大大增強習近平在中國保持個人獨裁地位的籌碼。馬習會意味著中共像磁石一樣牢牢掌控台灣，先讓其動彈不得，然後再吸骨吮髓，進而將台灣打造成第二個香港。這樣，習近平能在國內贏得人數最多的民族主義者的衷心擁護，讓黨內的反對派和社會上的異議群體無法對其發起挑戰。

其次，就外交而言，馬習會將台灣納入中國的「天下體系」，讓台灣漸漸脫離美國的影響和保護。位於東海和南海交接點、地理位置極為重要的台灣，若被中國收入囊中，則美國苦心經營的、圍堵中國的「環東亞大陸島鏈」瞬間破功。習近平在主題講話中說：「不管兩岸同胞經歷過多少風雨，有過多長時間的隔絕，沒有任何力量能夠把我們分開，因為我們是打斷骨頭連著筋的同胞，是血濃於水的一家人。我們應該以行動向世人表明，兩岸中國人完全有能力、有智慧解決好自己的問題，並共同為世界與地區和平穩定發展繁榮，做出更大貢獻。」這句話不僅僅是說給馬英九一個人聽的，更是說給美國聽的。

習近平的這段話其實是說：兩岸議題是兩岸中國人的問題（是家務事），跟美國無關，美國無權過問、更不得插手。即便中國對台動武，那也只是爸爸打兒子，旁人不得干涉。在習近平心目中，不會有「台灣人」這個概念，更談不上尊重「台灣人」的人權、自由和意志。在其眼中，馬英九不是「台灣人」（馬英九也不會認為自己是「台灣人」），而是「次等中國人」（在天朝勢力範圍內、願意接受天朝統御、但又尚未百分之百歸化的「番人」）。

更進一步來看，對習近平而言，馬英九及整個國民黨是習近平「以夷制夷」政策中不可或缺的「買辦」。馬習會除了要達成習近平設定的兩大目標之外，習近平也要拋點肉骨頭給這些「買辦」，讓他們吃飽喝

足之後，老老實實、勤勤懇懇地為其服務。

那麼，習近平會給馬英九什麼禮物呢？

## 馬英九想要什麼？

馬英九在主題發言中說：「兩岸的發展，要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然而，那些在總統府、立法院前面抗議的台灣人，難道不是「人民」嗎？如果馬英九承認他們是「人民」，「人民」為什麼要反對他「以人民的利益為依歸」的舉動呢？「人民」豈不是太「不識抬舉」了？

馬英九還說：「兩岸可能有一些小問題，但要克服，不要因為小問題影響大方向，盼在大格局上能有一致看法。」那麼，在他看來，什麼是「小問題」呢？大概就是彼岸對準台灣的數千枚飛彈了？

此前，小道消息滿天飛，盛傳習近平將給出的大禮是：拆除佈置在中國東南沿海省分對準台灣的飛彈（即便拆除，也只是象徵意義上的。因為就技術上來說，重新設置這些飛彈，只需要極短的時間）。然而，習近平連這種象徵性的禮物都不給馬英九。當馬英九怯生生地提及這個唯一的「敏感問題」時，習近平睜著眼睛說瞎話地回答說，那些飛彈並不針對台灣。習近平的說謊能力比起在台灣被視為「謊話大王」的馬英九來猶有過之。那些飛彈不針對台灣，針對誰呢？習敢於點出針對的任何一個國家的名字嗎？

最讓人不可思議的是，馬英九對習近平的這番話居然信以為真，並在記者會上為之背書：「中國的飛彈是整體佈局，不是針對台灣。」馬英九每年都要去拜謁兩蔣的靈柩，為何偏偏忘記了蔣經國生前的諄諄教

導：「我們在任何情況下都絕不會同中國共產黨進行任何形式的談判，我們過去的經驗已使我們有了足夠的教訓，無論如何不能相信共產黨人。」而且，馬英九正面引述習近平的話，完全推翻此前台灣國防部的報告。二〇一五年八月，台灣國防部發表《二〇一五中國軍力報告書》，其中明確指出，中國對台部署一千五百枚飛彈。一個總統在眾目睽睽之下公開否定自己領導的國防部鄭重其事發表的報告，那麼，究竟是國防部在造謠，還是總統在賣國？

就馬英九提出的一系列懇求而言，習近平一個也沒有做出承諾，既沒有賜予台灣稍大一些的國際空間，也沒有打賞更多的兩岸經貿利益（即便有，也被兩岸政商聯盟所壟斷）。習近平的想法是，我破例見你，已經是給你開光、加持了。這次會面讓世人清楚地看到，共產黨是國民黨的大老闆，國民黨縱然不堪，共產黨仍將挺國民黨到底。台灣選民特別要好好聽著，如果投票給國民黨，就是「自己人」；否則，膽敢對抗中央，必定下場悽慘：或像劉曉波那樣被關進監獄，或像達賴喇嘛那樣背井離鄉，或像黃之鋒那樣遭到媒體圍剿。

中國國台辦剛剛宣佈北京不會介入台灣選舉，馬習會這台除了軍事威脅之外，北京所能做的最大程度干涉台灣選舉的大戲就施施然地上演了。中國社科院剛退休的台灣問題研究員李家泉在接受《紐約時報》採訪時指出，鑒於國民黨候選人朱立倫目前在民意調查中落後於蔡英文，中國政府將習馬會看作是改變選情的一個機會。「之所以選擇這個時機，就是因為眼下國民黨情勢危急。這次會面是為了提振遭遇挫折的國民黨的士氣，另一方面也遏制民進黨的勢頭。」但李家泉承認，這步棋勝算很小，因為台灣選民對於拉近和中國的關係，已經產生反感。他表示：「我不敢說這招真的會起效，但我們總要做些什麼，挫挫民進黨的銳氣。」以中國體制內學者的身分而言，他們不敢擅自接受西方媒體採

訪，甚至說出跟中央不一致的觀點，那可是會遭致滅頂之災的「妄議中央」的大罪。李以剛退休的中央智囊團成員的身分對外媒發話，表面上似乎具有民間性，實際上仍是傳達中南海的想法：即便傳統的統戰政策效果有限，仍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因為國民黨若倒下，中共在台灣多年的政治投資將化為烏有。

無疑，這就是馬英九最想從彼岸得到的東西：共產黨竭盡全力幫助國民黨在選戰中獲勝。國民黨自我浴火重生幾無可能，只能靠共產黨的外力輸血勉強維持生命機能。國民黨總統候選人朱立倫宣稱，馬習會是意義重大的歷史事件，比之稍後的選舉更重要，但這是眾人皆知的妄言——連馬英九都不相信，若果說馬習會是一支箭，那麼台灣大選就是其射向的箭靶。保住國民黨政權和奠定其歷史地位是馬英九的最高目標，為了達成這兩個目標，他不惜向中共輸誠。否則，若國民黨失去政權，他本人可能因涉入多宗罪案遭到司法追究，被判處的刑期很可能比陳水扁還長。

## 虛妄的「九二共識」與虛妄的「中華民族」

此次馬習會，「九二共識」是神主牌。馬英九提出的五大建議的第一條就是「鞏固『九二共識』，維持和平現狀」；習近平的主題發言中亦特別強調「堅持九二共識，鞏固共同政治基礎」。

但是，「九二共識」並非兩岸政府正式簽訂的文件或宣言，它究竟是什麼東西，誰也說不清。對於習近平來說，「九二共識」就是一中架構，這個中國就是共產黨中國，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對於馬英九來說，他在國際舞台上不敢亮出中華民國的牌子，連專機都不敢

乘坐，小小的胸章也不敢戴，只能在島內關起門來玩「一中就是中華民國」的文字遊戲。「九二共識」至多就是兩岸少數政經掮客的共識，而非兩岸民眾、尤其是台灣人民的共識。

馬英九的發言中，有兩處引用中國古書中的典故。一處為：「歷史為兩岸留下了錯綜複雜的世代課題，這正是『尚書』所說的『非知之艱，行之維艱』。」另一處為結尾處：「北宋大儒張橫渠主張『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習先生，為了兩岸人民，讓我們一起努力，為生民立命，為萬世開太平，為中華民族開創更和平燦爛的未來。」與之相比，此前喜歡掉書袋、列書單的習近平這次倒是顯得「樸實無華」。馬英九一句不談台灣近三十年來在民主自由方面的進步，而是用這些從古墓中發掘出來的陳腔濫調與習近平互相吹捧，可見儒家專制文化的毒素深入其心靈和骨髓。國共兩黨既是列寧黨，又是儒家黨。

馬英九在發言中多次提及中華民族的概念，比如其第五點主張：「兩岸共同合作，致力振興中華。兩岸人民同屬中華民族、都是炎黃子孫，應互助合作，致力振興中華。」習近平亦在發言的最後說：「共謀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讓兩岸同胞共享民族復興的偉大榮耀。」那麼，中華民族又是一個什麼東西？

在近代之前，中國人沒有現代民族國家觀念，甚至連「中國」和「民族」的說法都未使用過（「中國」只是地理概念，而非國家名稱）。習慣上所說的「華夏」、「漢人」、「唐人」、「炎黃子孫」，乃至外國人所說的「大秦」、「震旦」、「支那」等，都不是現代意義上的民族國家的稱謂。「民族」這個詞彙是從日文中翻譯過來的，中國的近代民族國家觀念也是在日本比中國率先邁入近代並取代中國東亞霸主地位的刺激下形成的。

中華民族這個概念是清末改良派思想家梁啟超最早提出來的。一九〇一年，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的梁啟超發表〈中國史敘論〉一文，首次提出「中國民族」的概念。一九〇三年，梁啟超又發表〈政治學大家伯倫知理之學說〉一文，更清晰地賦予該說法具體的內涵：「大民族主義者何？合國內本部屬部之諸族以對於國外之族是也。……合漢合滿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一九〇五年，梁啟超又寫了〈歷史上中國民族之觀察〉一文，從歷史演變的角度分析中國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並斷然下結論說：「中華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實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啟超完成了「中華民族」一詞從形式到內容的革命性創造。此前主張「反滿革命」的孫文及革命黨人，接納了梁啟超的這一思路，進而提出「五族共和」的口號。二十年代末，晚年的梁啟超看到國共兩黨偷竊其民族主義的思想蠱惑民眾、奪取權力，撰文尖銳批判，可惜為時晚矣。

但是，在梁啟超構思「中華民族」這個概念的時候，台灣尚在日本統治之下，台灣的居民顯然不被涵蓋於「中華民族」的概念之內。這是習近平和馬英九都不敢或不願面對的「中華民族」概念生成和演化的歷史背景。而且，中華民族是一個子虛烏有的「偽概念」，正如沒有一個所謂的「美利堅民族」一樣，也沒有貨真價實的「中華民族」。強行將這個概念塑造成至高無上的「生命共同體」，那就成為法西斯的基於血緣和生理特徵的種族主義。而現代民族國家的升級版，乃是像美國那樣以共同價值吸引不同族群的人們一起戮力打造的「價值之國」。

篤信大一統的東方專制主義文化傳統的習近平和馬英九，只能從中國的「厚黑學」巨著《三國演義》中汲取「天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歷史循環論，來為今天的馬習會和兩岸關係定調。他們卻茫然不知，如今已經是國家主權觀念日漸式微、個人主義和住民自決以及地球村的

思想日漸深入人心的二十一世紀，他們早已被現代文明潮流拋到千山萬水之外。習近平「七不講」之一的普世價值，以及馬英九不敢在習近平面前講出來的普世價值，才是決定台灣及中國未來命運的終極價值。

## 黃安就是習近平，習近平就是黃安

台灣總統大選前夕，黃安在台海兩岸成為僅次於總統參選人的熱門人物。對於一個過氣的娛樂人物來說，這是做夢也沒有想到的「飛來鴻運」。我只隱約記得少年時代聽過一耳朵甜膩的歌曲《新鴛鴦蝴蝶夢》，卻早已記不得黃安這一號人物。早前在臉書上看到黃安舉報台獨人士的報導，亦只是一笑了之。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廿二日，在韓國演藝圈發展的十六歲的台灣女孩周子瑜，和另三名日本團員上韓國直播綜藝節目《我的小電視》。周子瑜揮舞中華民國和韓國國旗，日本團員則揮日本和韓國國旗，周子瑜還自我介紹說：「我來自台灣。」除此之外無涉及政治的發言。

二〇一六年一月八日，黃安不爽周子瑜揮舞中華民國國旗的舉動，在微博上舉報其「挺台獨」。黃安的舉報不足為怪，卑賤向來是卑賤者的通行證；奇怪的是，黃安的舉報成為習近平高度重視的奏摺，成為中國成千上萬「愛國賊」的「催情春藥」。中共在全國上下封殺周子瑜，中國的憤青們也對周子瑜口誅筆伐。

在失去龐大的中國市場的高壓之下，韓國娛樂公司J Y P強迫周子瑜穿著喪服般的一身黑衣，在鏡頭前朗讀認錯聲明。

我平常基本不看娛樂節目，雖然到過台灣很多次，卻對台灣娛樂界明星的名字知道不多。除了舒淇、林志玲、金城武和張震以外，這次我又知道了周子瑜。

這段周子瑜「被道歉」的視頻傳回台灣，正好是大選前一天，意外

地激發出台灣不同世代、不同政治立場的民眾的同仇敵愾。就連國民黨發言人楊偉中也在臉書上宣佈「我是台獨分子」，並辭去國民黨發言人一職。那些原本不願投票的年輕人，紛紛湧向車站返鄉投票。這一事件意想不到地成了壓垮國民黨的最後一根稻草，並成為蔡英文的催票機器。

小人物往往能以某種特有的方式改變歷史。我們不能輕看黃安，黃安不單單是人們蔑視的跳樑小丑，黃安的身上也展現出了中華文化、專制制度和普遍人性中最不堪的那一面。黃安在中國被當作反台獨的英雄，他賣力地扮演該角色。中國需要有一個人扮演這個角色，如果不是黃安，就會是張安、王安。

在這個意義上，我要說：「黃安就是習近平，習近平就是黃安。」

「黃安就是習近平」的意思是說，黃安知道共產黨和習近平的喜好是什麼，狡猾地投其所好。有什麼樣的奴才，就有什麼樣的主人，奴才與主子在精神上具有同構性，從奴才的品性就能看出主子的品性。黃安是習近平的一面鏡子，習近平不必像法國國王路易十四那樣在宮殿裡佈置很多鏡子，他一看黃安就知道自己的模樣。

「習近平就是黃安」的意思是說，習近平跟黃安一樣，在獨裁專制的大醬缸中長大，與世界文明的主流脫節。黃安不擁有習近平對十三億國民生殺予奪的權力，他對敵視的對象只能停留在「打嘴炮」層面；而習近平不僅具有黃安身上全部的惡，又具備作惡的本領和資源，故而為所欲為、殺人越貨、禍害中國與整個世界。

為什麼說「黃安就是習近平」？

先來看「黃安就是習近平」，可以從三個層面剖析之。

其一，「黃安就是習近平」，是因為黃安的所作所為是對中國「潛規則」的亦步亦趨。黃安不僅僅是一個無足輕重的小痞子，他無比聰明、精於算計，知道在哪裡可以發財，更知道如何才能發財。他善於揣摩習近平的「上意」，一舉一動皆以討好中共為最高目標。

那麼，習近平想要什麼樣的奴才呢？習近平挑選的文宣干將，個個都是太監化、優孟化、流氓化的人物。習近平喜歡閱讀的，不是他「報書單」的那些歐美名著，而是周小平、花千芳等網路痞子的「名著」——流氓與流氓之間聲氣相通。在召集高規格的「北京文藝座談會」時，習近平念念不忘給周小平留下座位，並親自與之握手，給予溫情鼓勵。周小平得到的寵幸，讓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羨慕得唾液橫流，恨不得用諾獎獎章換取習大大親手一握。在香港，也有得到習近平欽點的「愛國女流氓」陳淨心等人，整天像紅衛兵一樣喊打喊殺，利用街頭運動和親中媒體攻擊民主人士和本土人士，雖然港人為之側目，北京卻公開力挺。（頗為諷刺的是，當黃安因舉報周子瑜名動天下之際，陳淨心趕緊與之劃清界限，推卸掉「香港女黃安」之桂冠。）

習近平挑選黃安做為傳聲筒，向台灣社會傳達恐嚇訊息。在中共的文宣風格趨於粗鄙化和惡毒化的習近平時代，黃安的走紅絕非偶然。前輩學者資中筠憂心忡忡地指出：「我覺得我們有一種走向野蠻的趨勢。最近幾年來走向野蠻的趨勢是越來越厲害，你從網上看到人的發言，某一部分人用的語言和被看重的那些人水平越來越低。」中國觀察家張乎安在〈二〇一五年中國政治輿論場的七大怪現象〉一文中以若干例子對此現象加以說明：「只要屁股正確就幹堂而皇之地扭曲事實還理直氣壯地辯駁，如電影《開羅宣言》中的毛澤東登上海報，比如網路當紅『五毛』周小平論述『抗日戰爭中的淮海戰役』（中共所稱之『淮海戰

役』，即為國民黨所謂之『徐蚌會戰』，是國共內戰後期的一場戰爭）、花千芳讚揚中國治理互聯網的決心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等等錯漏百出的水平，也能得到官方的洗地，並倒打『別有用心的境外勢力』一耙。上述列舉的各個事例，意味著整個社會反智的、民粹的、非理性的因子在醞釀，一些神祕的、荒誕的邏輯正在得到推崇。」由此，黃安應運而生，找到一個真正的舞台，前半輩子白活了，唱歌跳舞演戲不是其所長，舉報台獨分子才是其絕活。

其二，「黃安是習近平」，黃安也是百分之百的中國人，持有「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獨裁思維。在這個國家，從最高領袖到普通網民，都不懂得寬容並善待異見和異見者，恨不得除之而後快。若是一個言論自由的社會，每個人都有其政治立場，無論支持台獨還是反對台獨，都可以公開表達，彼此之間亦可平等爭論。黃安偏偏選擇向中國獨裁政權告密的方式，消滅跟自己不一樣的台獨觀點。

而且，黃安的表達方式也極度下流無恥。人稱黃安為「藝人中的李敖」，他則自稱為「台獨剋星」。二〇一四年，台灣前副總統呂秀蓮說要仿效蘇格蘭發起「台灣永久中立國公投」，黃安立馬就噴了回去：

「蘇格蘭公投要英國政府同意，你台灣公投，經過北京方面同意了嗎？這麼幹，簡直就是關起門來『手淫公投』。」對一位與自己政見不同的女性說出如此不堪的言論，他根本不知道什麼是紳士、什麼是文明。昔日國民黨以培養「溫良恭儉讓」人格為目標的「中華文化復興運動」，為何竟鍛造出這麼一個癩三來？

中國的民族主義小報《環球時報》與黃安惺惺相惜，周子瑜道歉的視頻發表之後，立即發表題為〈對陣台獨大陸網友完勝〉之社評。黃安的言論堪與《環球時報》相媲美，而《環球時報》的別名又是《習近平時報》。我一直關注《環球時報》的言論，早在一九九七年就寫過文章

批評之。《環球時報》是中國官方媒體「輿論導向」悄悄變化的風向球：習近平比江澤民、胡錦濤更加愚昧、瘋狂和殘暴，所以習近平時代的《環球時報》也就比江澤民和胡錦濤時代表現出更多的愚昧、瘋狂和殘暴。

其三，「黃安是習近平」，若非習近平的縱容和鼓勵，中共的文宣體系怎麼可能讓黃安翩翩起舞？黃安原本是演藝界的乞兒，公司破產、婚姻破裂，在台灣走投無路，才到中國投石問路。中國的娛樂圈早已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領風騷三五天」，哪有黃安的位置？如何出奇制勝？那就去觸碰政治議題，幫助中共反台獨。中國古代的士大夫是「學而優則仕」，黃安卻是「藝而劣則政」，果然梅開二度、大紅大紫，縱然不能流芳百世，亦可遺臭萬年。

而習近平是中國官場「優敗劣勝」的逆向淘汰機制之產物。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耀邦和趙紫陽那樣有智慧有良心的改革派領袖，在中共的鱷魚潭中，只能「出師未捷身先死，常使英雄淚滿襟」。反之，習近平從縣委書記這個最基層的「七品芝麻官」做起，精通官場最惡劣、最敗壞的權謀術，得以步步高升。黃安在競爭激烈的演藝圈沾染的恃強凌弱、弱肉強食的生存技能，正好契合習近平選拔奴才時需要的「不能獨立思考、只要乖乖聽話」以及「你是我的一條狗，叫你咬誰就咬誰」

（毛澤東的妻子江青被送上法庭審判時，當庭咆哮說：「我是主席的一條狗，主席讓我咬誰我就咬誰。」一句話道盡中共統治的祕密）等最基本的標準。

為什麼說「習近平就是黃安」？

不僅「黃安是習近平」，而且「習近平也是黃安」。說「習近平是黃安」，同樣有三個論據。

其一，「習近平是黃安」，是因為在周子瑜事件中，黃安是始作俑者，習近平是最後成就者，有權有勢的習近平將黃安的所思所想變成現實。

這一次，黃安並沒有像上一次舉報另一名藝人鍾嶼晨那樣，親自到北京國台辦門口高舉「我是反台獨，不是反台灣」的招牌。（在中國政府機關門口乃至各類公共場合，「擅自」舉起招牌，有可能被警察以擾亂社會秩序、破壞公共安全、煽動顛覆國家等罪名逮捕判刑，人權律師許志永就因為舉起要求官員公開財產的標語被捕並被判刑四年。黃安去國台辦舉起招牌而沒有被捕，說明中國官方早已與之達成默契。）中國的微博上每天有億萬言論，黃安算不上大V，照常理而言，他的言論如滄海一粟，不會有任何影響力。

然而，短短兩三天之內，中共的整個龐大體制便高速運行起來，中央宣傳部向娛樂產業和媒體發佈命令，全面封殺周子瑜、周子瑜所在的女子組合，乃至她所效力的韓國娛樂公司旗下的其他藝人。任何一個民主國家政策的決定和實施，都不可能像中國這個極權國家這樣高效率——這也正是中國引以為自豪而許多海外學者紛紛讚揚的「獨裁的優點」。

黃安在中國不過是一介匹夫，至多就是作為「統戰對象」的「客卿」，不具備翻轉乾坤的本事。（黃安聲稱死後要葬在八寶山，其實根本不可能。那是共產黨的革命公墓，豈能讓奴才廁身其中？）統籌各省衛視、報紙、網站的權力，最終掌握在習近平手上。封殺周子瑜縱然不是習近平親自下令，也是出自習的智囊班子的決策。

其二，「習近平是黃安」，是因為他們都信奉「有錢能使鬼推磨」之原則。對習近平而言，就是「以商逼政、百戰百勝」，不要說台灣、

香港，就是美國、歐洲，也得對中國市場低頭；而對黃安而言，就是「有奶便是娘」，站在勢力大的那一邊，總可分到殘羹冷炙。

「習近平模式」或「黃安模式」似乎通行全球。韓國娛樂公司逼迫周子瑜出鏡道歉，並將視頻發佈在網路上，看似違背言論自由的普世價值，卻與當下韓國的對華外交政策相吻合，那就是「事大主義」。習近平對韓國的威逼利誘，引發韓國公司對周子瑜的壓迫，這背後是一個殘酷的食物鏈。

《紐約時報》在一篇評論文章中剖析了韓國一味迎合中國的外交政策。文章指出，自從在二〇一三年初朴槿惠上任以來，韓國政府一直致力於與北京建立更密切的關係，朴槿惠與習近平見面的次數比與任何其他外國領導人都頻繁。二〇一五年秋天，朴槿惠與習近平一起站在北京天安門的觀禮台上，觀看了一場規模巨大的閱兵儀式，她是美國主要盟友中唯一一位出席該活動的領導人。但是，自從北韓最近這次核試驗以來，就連韓國的幾家通常支持這位保守派總統的報紙也發表社論指出，討好中國基本上未能達到遏制北韓的效果。自從北韓核試驗發生後，朴槿惠曾嘗試與習近平安排一次電話交談，但未能成功。

連韓國總統都如此自我羞辱（朴槿惠難道在習近平身上看到自己做為獨裁者的父親的影子？），區區一家娛樂公司的老闆豈能有堅硬的脊梁？J Y P公司強迫周子瑜對著鏡頭道歉的惡行就施施然地發生了。習近平這種可怕的「中國式病毒」就這樣溢出國境，如同柏楊在《醜陋的中國人》一書中所說：「中國傳統文化中有一種濾過性病毒，使我們子子孫孫受了感染，到今天都不能痊癒。」

其三，「習近平就是黃安」，意味著中共政權以及中國的主流民意已然「習近平化」，也就是「黃安化」——像義和團和紅衛兵一樣愚昧、瘋狂、陰險、殘暴。

習近平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段經歷是，十六歲時被迫到延安最窮困的農村當「知青」。他是唯一在農村長期生活過、擁有底層生活經驗的中共最高領導人。毛澤東是大地主出身，很早就離開農村到城市生活，即便在井岡山落草為寇，也是「大塊吃肉、大碗喝酒」的「山大王」。鄧小平同樣是大地主出身，尚未成年便離開農村到城市打拼，掌權後從未回過四川老家。江澤民、胡錦濤是城裡人，用中共的階級分析法，屬於「小資產階級」。唯有習近平，雖然貴為副總理之子，卻因父親遭到政治清洗，淪為「反革命分子」的後代，到農村當了多年農民。

習近平掌權後，常常炫耀那段底層生活經歷，人們也認為既然他知曉民生疾苦，就能為民做主。實際上，那段農村生活，激發出習近平人性中幽暗而卑賤的一面。延安早在三十年代就是中共的割據之地，中共在延安消滅了鄉紳階層和傳統文化及倫理，取而代之的是血腥酷烈的「痞子革命」。告密成為一種生存的必需技能，甚至子女與父母劃清界限、夫妻之間反目為仇。那幾年在被中共鬥爭文化嚴重毒害的延安鄉村的生活，讓習成為毛宣揚的「卑賤者最聰明」的典範，也讓習身上沾染了毛特有的「山大王氣」。

習近平是在與世界文明隔絕的狀態下度過其青年時代的。毛號召破除「封（封建主義）、資（資本主義）、修（修正主義，即蘇聯為首的共產黨集團）」文化，而除掉「封資修」以後，中國就只剩下毛語錄了。換言之，習近平的精神世界裡，沒有民主、自由、公平、正義這些普世價值和觀念，只有階級鬥爭、暴力革命。不是同志，就是敵人，敵人必須用武力消滅。

一旦習近平掌權，整個中共政權、所有的國家機構都迅速呈現出鮮明的「習近平特色」。比如，法治遭到踐踏，就連四川省長魏宏這樣的高官亦「被失聯」，多日之後中紀委才用「反省思過」四個字交待其下

落。更嚴重的是，秘密警察赴海外綁架「不聽話」的人士，甚至擁有外國國籍的人士亦成為被綁架的對象。

黃安不具備「防民之口，甚於防川」的權力，只能用網路舉報的方式打擊他痛恨的台獨言論；而習近平擁有這樣的權力，可以下令秘密警察清除毀壞其聲譽的人，就像當年蔣經國之子蔣孝武策劃江南案那樣。越境綁架意味著中國對國際法的公然踐踏，中國果然成了文明世界最大的威脅——超過了伊斯蘭國。

## 我們是壓傷的蘆葦，我們卻永不折斷

周子瑜一身黑衣道歉的畫面，讓我和台灣朋友們一樣震撼。這樣的畫面，讓台灣朋友聯想到被伊斯蘭國恐怖分子綁架的人質。而我並不是第一次看到，習近平上台以來，強迫被捕的作家、記者、人權律師上中央電視台的新聞節目認罪，這已成為中國的「新常態」，堪稱文革時代紅衛兵讓被打倒的「牛鬼蛇神」遊街示眾的升級版。

如果周子瑜不道歉，下場會怎樣呢？不僅龐大的中國市場會封殺她，而且連人身安全都沒有保障。香港銅鑼灣書店股東桂民海和李波等人的命運，隨時可能降臨到她身上——桂民海和李波計劃出版關於習近平私生活的書籍，涉嫌「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中國特務越境到泰國和香港將他們秘密綁架。周子瑜在房間裡秀一下中華民國國旗，也涉嫌「危害中國的國家安全」，中國特務未嘗不會越境到韓國將其秘密綁架，這不是杞人憂天。

「被失蹤」數月、擁有瑞典國籍的香港書商桂民海終於露面，在央視上痛哭流涕地認罪說，他是因十一年前的交通事故而自願回到「祖

國」自首認罪：「我雖然有瑞典國籍，但是我真切地感到我還是一個中國人，我的根還是在中國。所以我希望瑞典方面尊重我個人的選擇，尊重我的權利和隱私，讓我自己解決自己的問題。」然而，網民發現，桂民海在短短十分鐘的訪問中，衣著、髮型均有大變，似乎並非連續拍攝。律師陳光武更指出，二〇〇三年「醉駕」未列刑事犯罪，亦無醉駕標準，批評中方主導輿論者「基本法律常識都沒有」。

擁有英國護照的香港書店股東李波在香港人間蒸發多日後，從中國給妻子發去家書，告誡外界不得炒作本人「自行回中國配合調查」的「私人事件」，甚至威脅將用法律手段讓媒體閉嘴。中國外長王毅則宣稱「李波首先是中國人」，完全是一種原始社會的血緣論。

被綁匪集團控制的人質，說出什麼奇怪的話來都不足為奇——與之相比，周子瑜還算幸運的了。

英國外相夏文達（Philip Hammond）感嘆說，如果外界猜測的最壞的情況發生（中國特工到香港綁架銅鑼灣書店的李波等人），將是對「一國兩制」原則、《基本法》、《中英聯合聲明》的「極嚴重的違背」（egregious breach），意味著「全部事物都崩塌了」（whole thing had collapsed）。

如果說李波案意味著對香港的「一國兩制」的崩塌，那麼周子瑜事件就意味著對台灣的「九二共識」的崩塌。李波和周子瑜都是陰差陽錯的配角，黃安才是男主角，而習近平是總導演。

此前，中共趕走了法國《新觀察家》周刊（L'Obs）駐華女記者高潔（Ursula Gauthier），因為她揭露了中國在新疆壓迫維族人的真相；中共還不准代表加拿大參加世界小姐選美大賽的華裔女孩林耶凡入境參賽，因為她修煉法輪功。這不是閉關鎖國，什麼才是閉關鎖國？

號稱「強國」，偏偏害怕幾位勇敢的女性。身在中國的勇敢的女

性，有七十多歲的記者高瑜，有二十四歲的人權律師助理趙威，她們或在監獄中，或在進出監獄的途中。我印象中的高瑜，一直是快人快語、精神抖擻的模樣，看上去比實際年齡要年輕二十歲，宛如中國的法拉奇（義大利的傳奇女記者）。但這一次，從獄中出來的時候，高瑜卻已變得白髮蒼蒼、步履蹣跚，可以想像她在裡面遭受怎樣的非人待遇和酷刑折磨。而被羈押半年之後正式宣佈逮捕的趙威，這個網民叫「考拉」的九零後的河南女孩，本該是中國的驕傲，應當被像考拉那樣珍惜，卻被醜陋的政權如塵埃般踐踏。

我們每個人，都是周子瑜，都是高瑜，都是趙威。我們是會思想的、愛自由的蘆葦；我們在面對屠刀的時候，會像周子瑜那樣含淚道歉，會像高瑜那樣在電視上認罪——我在五年前被中共秘密警察、在酷刑折磨和活埋威脅下，也寫過悔過書。我們承認人性的軟弱，我們不是視死如歸的英雄。然而，即便我們在暴風驟雨中會彎腰，也不會徹底折斷，不會永遠屈服，不會以做「動物莊園」裡面的豬為榮。

台灣的朋友們，終於用手上的選票表達了自己的意願，不是投票給蔡英文，乃是投票給民主自由。而中國的朋友們，還要繼續為選票而奮鬥；用選票顛覆政府，才是大多數中國人的「中國夢」。

有人為趙威寫了一首好聽的歌，放在網上自由收聽。這首名為《嗨，山巔的姑娘》的歌，跟《島嶼天光》一樣，讓我百聽不厭，一聽就掉淚。這首歌的歌詞，是寫給每一個熱愛自由的靈魂：

崎嶇的山路，通向著山巔。入雲不見，閉日遮天。

魔鬼冒牌天神，風沙迷住雙眼，不會磨滅心中信念。

瑟瑟的寒冬，沉沉的黑夜。

那個已到山巔的姑娘，她在大聲吶喊，在風中和魔鬼戰鬥，想

把地獄變成天堂。

嗨，山巔的姑娘，我要送你一件紅色衣裳。這寒冬的火，黑夜裡的光。

嗨，山巔的姑娘，我要大聲吶喊為你歌唱。這漆黑的夜，我們不再幻想。

## 結論 誰是習近平？

只要人類崇拜凱撒和拿破崙，他們就會適時出現，使人類陷入苦難。

—奧爾德斯·赫胥黎

中共挑選領導人，從來都是黑箱作業，而非公開選舉。利用有限的材料研究中共新黨魁，常常捉衿見肘。習近平執政以來，「誰是習近平」是一個難解之謎。要回答「誰是習近平」這個問題，就先要瞭解「狂妄症候群（Hubirs Syndrome）」這個概念。

大衛·歐文（David Owen）以長期從事精神醫學的經驗，加上從政三十年、並擔任英國外相的履歷，寫成《疾病與權力》一書。他發現，位居要津的政府首長可能有某種職業病，只要掌握權力，就可能出現自戀、好動、過度自信的跡象，自詡為救世主，最後與現實脫節。他一方面觀察各國領袖在面對重大決策與個人疾病交會時的危機處理，另一方面則審視領導人物的精神與心理狀態，瞭解權力會對他們造成毒害，進而明白民主制度是唯一的解藥。

「狂妄」這個概念是在古希臘文化裡展開的，意思是一個有權勢的人物被過度的驕傲跟自信灌飽，用傲慢與蔑視的態度對待他人。柏拉圖說，「慾望的宰制」是一種非理性的東西，它會讓人透過狂妄的行為做出錯誤的事情。亞里士多德說，人從狂妄行為中尋求樂趣是將自己展現為「佔上風的優越者」。希臘人相信，在人處於權力頂峰之時，神明給

他帶來「狂妄」的詛咒，讓他失去健全的心智。

大衛·歐文根據現代精神醫學判斷，掌權者常因狂妄而「自我毀滅」。「這種狂妄模式在一些政治領袖的生涯裡非常常見。成功使得他們對自己產生過度的信賴，輕視那些與自己信念不合的建議，有時候甚至任何建議都不放在眼裡，所採取的行動像是要挑戰現實本身。」他考察二十世紀數十名國家元首和政要，發現他們的狂妄症給國家和人民帶來巨大災難。

很遺憾，大衛·歐文不是習近平的心理醫生，因為習近平就是典型的狂妄症患者。不過，習近平狂妄到以為不需要心理醫生的地步。習近平將自己看成繼毛澤東與鄧小平之後第三個「劃時代人物」，江澤民和胡錦濤只是微不足道的過渡型人物。

習近平打壓刺耳的聲音不惜使用最卑劣的手段。二〇一三年秋，我完成了《中國教父習近平》一書，對習近平的內政和外交政策做出諸多嚴厲的批評和悲觀的預測。在此書出版前夕，我的合作者香港晨鐘書局總編輯姚文田被中國警方誘騙到深圳逮捕。次年五月，深圳法院以「非法所得三萬元人民幣」的「走私罪」，判處七十三歲高齡的姚文田十年重刑。

「誰是習近平」這個疑問，可轉換成「習近平的治國理念是什麼」這個更具體的問題。中國民間高人輩出，有人在網上發表了一副長聯，足以概括習近平執政以來在內政和外交方面的斑斑劣跡，亦可做為習近平的墓誌銘：「一代昏君，兩載當政，禁三公消費，卻又四處撒錢。五十六族深受其害，現如今七虎難下，八方樹敵，九州人神共怒，十分可恨，百年憲政背道而馳，受盡千夫所指，還自詡萬邦來朝，亙古未有也！萬般冤獄，千層遮幕，封百姓評論，反夸十分自由。九成八率將至大限，到眼下七患纏身，六神無主，五官面目可憎，四鄰皆惡，三姓家

奴玩火自焚，試遍兩面逢淵，也難保一黨獨大，今日且觀之！」我的結論是，習近平不是中興之主，而是亡國之君；不是英明神武的「習武帝」，而是下場淒慘的「習煬帝」。其治國理念可用八個字概括：集權、反腐、鎮壓、爭霸。

## 集權：小組治國，一夫當關

習近平一上台便竭力顛覆江澤民和胡錦濤兩朝形成的、根基薄弱的「共識」，創造出屬於新的傳統和權力模式，讓那些挖空心思為「中國模式」正名的御用文人吃了一記悶棍。

清華大學教授、經濟學家胡鞍鋼，將胡時代政治局常委「各管一攤」的做法概括為「集體總統制」。他認為，中國特色的「集體總統制度」，「以其優異的實踐證明了中國社會主義政治制度的巨大優越性」，「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創新，而是具有深刻意義的制度創新和治道變革」，「大大超越了幾百年來美國等國家政治制度的『一黨控制』、『兩黨分治』、『三權分立』的實踐與理論，彰顯中國人極大的政治智慧和中華民族深厚的文化底蘊」。

親北京的海外學者、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研究所所長鄭永年認為，從制度建設上說，中共權力交班形成了比西方更優越和穩定的中國模式。第一，限任制，領導人任期兩屆共十年。第二，年齡限制，這一點是中國特有的，即政治局常委「七上八下」（若到換屆之時，年齡為六十七歲則可以連任，年齡為六十八歲則必須退休）。第三，中國已經從強人政治到了後強人政治時代，也就是集體領導。鄭永年指出：「只要共產黨執政，這個模式就一直會存在下去，而只要有這個模式，共產黨

就倒不了。」

習近平上台後的集權之路，讓這些「磚家」的理論破產了。

首先，習近平身兼中共中央總書記、國家主席和中央軍委主席等黨、政、軍三大要職，這跟江澤民和胡錦濤一樣，在後鄧小平時代的權力劃分中只是蕭規曹隨而已。

其次，習近平兼有十多個中央級「小組」的「組長」，如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外事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對台工作領導小組組長、中央網路安全和信息化小組組長、中央軍委深化國防和軍隊改革領導小組組長及中央財經領導小組組長等。有中國傳媒以「史上最強組長」為題，列舉這些組長的權力管轄範圍，堪稱無所不包、無所不管。清朝乾隆皇帝自稱為「十全老人」，現在習近平堪稱「十權老人」。

「小組治國」的模式，不是習近平的首創，而是毛澤東的發明。

「小組」是中共黨政系統中常規治理方式之外的補充，並在特定時期擁有跨部門的協調權力。毛的性格天馬行空、不拘一格，不願受到既有官僚體系之制約，以「中央文革小組」架空政治局，發動血雨腥風的文化大革命。毛死後，「中央文革小組」隨之被取消，「小組治國」的模式卻傳承下來。

習近平執政之後，總結胡錦濤執政十年碌碌無為的教訓，除了胡個人性格軟弱的原因之外，是受制於既有的權力結構。因此，他決定創設若干小組，突破原有的部門劃分，以此集中權力。在中共的權力體系中，小組一般都很神秘性，機構設置在官方資料中鮮有詳細記載，公開報導更少之又少。這些小組既不掛牌子，在中共的組織機構名錄也找不到。眾多「小組」沒有固定的辦公場所，也不單獨確定人員編製。很多領導小組雖為常設，但並不需要日常辦公，多數只在出現重大問題時，

以組長牽頭組織聯席會議、多部門聯動的方式完成決策。

在以上這些「組長」之外，習近平還兼任另一些更具機動性的「組長」。比如，習親任「釣魚島應變小組」組長，統轄軍隊、情報、外交及海監執法部門。該小組由領導成員、組成部門、辦事機構三個部分組成，每個部門派出相應的正副職領導參與。該小組可以動用一切資源處理危機，其目的是，在釣魚島出現外交或軍事危機時，能迅速做出反應並做出決策。

與「小組治國」相配合，習近平刻意凸顯黨的總書記的權威，改變了上一屆政治局常委會「九龍治水」的局面：分管各部門的常委自然而然地是該部門的黨組書記，比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兼任國務院黨組書記，人大委員長張德江兼任人大黨組書記，政協主席俞正聲兼任政協黨組書記。那麼，在政治局常委會上，他們都必須以黨組書記的身分向總書記彙報工作。這樣，習成了皇帝，其他六常委成了軍機大臣。換言之，股份制企業成了家族企業。

習近平成為強人，不僅是因為他的個性特徵，更是因為黨內外有這樣一種「時代需求」。《紐約時報》記者儲百亮（Chris Buckley）指出：「習近平的領導方式反映了他的背景，也反映了看似是許多高級官員的共識，高官們認為他們需要一個更敏捷、更強有力的領導人，以應付經濟轉型的難題、外交政策的壓力，以及一黨專政在國內面臨的挑戰等問題。」哪種權力運作模式能拯救黨，沒有人知道。習的集權嘗試被看作是最後一根救命稻草。

習近平在集權之後，總得做事。那麼，他究竟想幹什麼呢？

反腐：廠衛橫行，政治清洗

習近平集權之後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反腐運動。習近平及其助手王岐山宣稱，有人說共產黨不可能戰勝腐敗，他們就是不信邪，就是要創造出一黨壟斷權力之下的廉政圖景。

習近平主導的反腐運動，特別倚重王岐山領軍的中紀委。中紀委這個在江、胡時代的冷衙門，突然炙手可熱。此前，政法委權力大於中紀委。當周永康垮台、政法委降級之後，中紀委凌駕於政法委之上，統攬公檢法和情治系統。中紀委宛如東廠、西廠和錦衣衛「三位一體」，人們但知有「習王體制」，而無「習李體制」。

中國官場流行一句箴言：寧見閻王，不見老王。一個引人深思的細節是：一度春風得意的南京市委書記、江蘇省委常委楊衛澤，被召到省委開會，一看見有中紀委工作人員，立即奔向窗口，企圖跳樓自殺。從此一細節可知，即便高級官員落入中紀委手中，亦是求生不得，求死不能。法律和法治，在這場反腐運動中輕如鴻毛。

習近平上台之後，被其打倒的「老虎」（一般指黨政機關的省部級以上幹部，軍隊的少將以上將領）是文革結束之後最多的；被其打掉的「蒼蠅」（基層幹部）則有數十萬之眾，公款吃喝、公款旅遊、公車消費等民眾非議較多的領域有所收斂，奢侈品消費應聲而落。

但是，習近平的反腐是「選擇性反腐」。其刀鋒所及，包括以下三大重點領域：首先是石油、通訊、煤炭、鐵路、傳媒（如央視）等壟斷行業和國民經濟的命脈所在，也就是民間形容為「肥得流油」的部門，其頭頭腦腦大都是反腐運動打擊的對象。其次是四川、雲南、山西、江蘇等由習近平的政敵長期把持和經營的省分。這些省分被形容為出現「塌方式」的腐敗。第三是軍隊、武警、公安和國安系統，即習近平所說的「槍桿子」和「刀把子」。

習近平從反腐運動得到了怎樣的收益？在此過程中，習近平可謂一

箭三鵬。

首先，通過反腐清洗政敵，瓦解反對派系。落馬高官並不比未落馬者更貪，落馬是因為他們站錯了隊，成為習近平的對立面，而不是貪腐的事實本身。習近平號稱要消滅黨內「團團夥夥」，他認為腐敗必然跟「朋黨」聯繫在一起。但是，太子黨卻可以公開地拉幫結派、干預政治——二〇一五年春節，數千名太子黨施施然地在北京集會，慷慨激昂地發表讚美和支持習的宣言，譴責那些不與習「同心同德」的派系和力量，這樣的「團團夥夥」是習所喜聞樂見的，故而只有他們能擁有集會和結社自由。

其次，反腐是權力的轉移和重組。落馬貪官空出來的位置，習近平塞進嫡系部隊，擴充自身實力。習重用的人馬包括閩江舊部、之江新軍、浦江舊部以及南京軍區的將領。此外，對於出身家鄉及下放地陝西、母親家鄉兼政治發源地河北的官員，也較受重視。王岐山是知青時代曾與習「大被同眠」的「紅二代」好友；中辦主任栗戰書是習在河北正定縣任縣委書記時，鄰縣無極縣的縣委書記，當年兩人常在一起喝酒、聊天；中樞有習在上海的舊部丁薛祥任習辦主任、河北籍的中央警衛局長王少軍、從浙江起跟隨的貼身秘書鍾紹軍任軍委辦公廳副主任；組織系統，有習大學時的同窗兼室友陳希任中組部常務副部長、過去的文膽何毅亭任中央黨校常務副校長；宣傳系統有之江新軍黃坤明任中宣部常務副部長；財經方面，有曾是福建舊下屬的國家發改委副主任何立峰、來自浙江的中財辦副主任舒國增；安全領域，有福建舊部蔡奇任國安委辦公室副主任，來自福建廈門的北京市公安局長王小洪等。

第三，反腐為習近平贏得民心。中國的老百姓，不是具備法治觀念和民主意識的現代公民，而是皇權文化薰陶出來的臣民和順民，他們的不滿僅僅停留在恨貪官、盼青天的情緒中，很歡迎習打擊官僚階層。這

種運動式反腐，在一定時間內，可以平民憤、安民心。習在中紀委大會上說：「全黨同志要以猛藥去疴、重典治亂的決心，以刮骨療毒、壯士斷腕的勇氣，堅決把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鬥爭進行到底。」而民間的馬屁精們對反腐運動的描述是：「蛟龍憤怒，魚鱉驚慌，春雷一擊，震撼四野。」

習近平的反腐，不敢反到自己家族頭上，也不敢真槍實彈地瞄準江澤民、胡錦濤、李鵬、朱鎔基、溫家寶這些「大鱷」。總部設在華盛頓的「國際調查記者同盟」（簡稱 I C I J）發表調查報告，披露在避稅天堂英屬處女島開離岸公司、存藏巨額財富的中共太子黨，包括習近平、鄧小平、胡錦濤、李鵬、溫家寶等的家人或親屬。在披露的機密檔案中，出現了習的姐夫鄧家貴的名字，鄧家貴為 Excellence Effort Property Development Limited 公司的總經理及持股人，鄧擁有五成股權，另五成股權則由另兩位藉房地產暴富的股東持有——他們曾在深圳獲得政府對兩塊土地高達二十億美元的補貼。

消息披露後，I C I J 和英國《衛報》的網站被封鎖，I C I J 的新浪微博帳號被除名。國務院信息化辦公室要求各網站緊急查刪境外傳媒「炒作」有關「太子黨離岸避稅」的內容，包括微博、微信互動環節都要嚴密把關。對發表關於中央領導人和現有體制的「攻擊性評論」並造成「惡劣影響」的網民，立即封號並配合有關部門「落地追查」。所謂「落地追查」，即網路內容服務商發現不良信息後，將帳號 I P 等資料交給網監部門，網上封號、線下抓人。

二〇一五年四月，《紐約時報》記者傅才德（Michael Forsythe）經過長達五年的調查，排除重重干擾和壓力（甚至有人對他發出死亡威脅），發表長篇調查報告〈萬達帝國王健林：游刃於商業與權貴之間〉。報告指出，萬達的八名新投資者中包括一家北京公司，該公司由

習的姐姐齊橋橋、姐夫鄧家貴通過一個控股公司持有。「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夫妻二人將在萬達持有的股份轉讓給一個長期商業夥伴，當時他們股份的估值達二點四億美元，二〇〇九年二人買入時的價格是兩千八百六十萬美元。」之後，《紐約時報》網站被封鎖，記者申請中國簽證被拒。

二〇一五年十月，王健林在哈佛發表演講。據「財新網」報導，王健林指出，習近平的姐姐齊橋橋和丈夫鄧家貴在萬達首次公開募股之前，出售了其所持的股份。「這件事鄧家貴先生是犧牲了巨大利益的。投資熬了六年，眼看可以賺大錢而不賺。」王健林還說：「其實這件事證明的不是腐敗，恰恰證明習近平主席治國嚴，治家更嚴。」

王健林此舉乃是欲蓋彌彰、弄巧成拙。《紐約時報》如此回應王健林的澄清與反駁：「在為公司與習近平親屬的關係做辯白時，王健林也許無意中引起人們注意到有錢有勢的中國人的一種常見做法：股份轉讓，就是為了掩蓋商業利益，有時把股份轉給遠房親戚或商業夥伴。」

《紐約時報》在後續調查中發現：公司記錄顯示，齊橋橋和鄧家貴把控股公司的所有權轉給一個名叫徐再生的僱員—當為了掩蓋所有權，把財產在書面上轉移時，推定的新所有人在中國被稱為「白手套」。

律師和人權活動家許志永，長期呼籲官員公佈財產並通過《陽光法案》，卻以莫須有的「擾亂社會秩序罪」獲刑四年，成為習近平執政以來第一個被判重刑的重量級人權活動家。這個事實像照妖鏡一樣，照出習近平反腐的本相：沒有多黨競爭、沒有三權分立、沒有新聞自由，習式反腐只能是「守著糞坑打蒼蠅」。

鎮壓：冰川時代，動物莊園

對黨內和官場，習近平高懸反腐之利劍，順我者昌，逆我者亡；對民間社會、知識分子、大學、媒體、網路和N G O組織，則是抓人封網，將動物莊園的柵欄修得密不透風。

二〇一三年是中國公民社會遭遇頓挫的一年。此前，胡溫滿足於「擊鼓傳花」，對蓬勃興起的民間社會採取守勢；如今，習揮舞大刀、斬草除根，民間社會進入「冰川時代」。

習近平對民間社會和公共空間的打壓，首先從媒體下手。中國媒體和資訊自由狀況，可以從三個國際性組織的報告中看出來。

二〇一五年春，總部設在巴黎的「記者無疆界」發佈了「二〇一四年全球新聞自由排行榜」，中國位於倒數第五。「記者無疆界」還列出全球三十六名嚴重危害新聞自由的殺手名單，包括伊朗的哈梅內伊、中國的習近平、俄羅斯的普丁、朝鮮的金正恩。

二〇一五年春，總部設在紐約的「人權觀察」在年度《世界人權報告》中指出，在習近平的領導下，中國驟然發動十年來最嚴厲的一波打壓，藉由調查、拘押和判刑，對批評政府人士表現出毫不容忍的態度。中國部主任索菲·理查森評論說：「中國正在人權改革和中共承諾的『依法治國』道路上迅速倒退。……對異見人士的打壓已達十年來最糟地步，而且還看不到終點。」理查森對國際社會的綏靖政策提出嚴厲批評：「習近平治理下的中國日益敵視國內外要求人權和民主的壓力，但國際社會大都對此保持沉默。……助長對基本自由的系統性打壓是既短視又危險的政策，只會鼓勵北京日益強硬。」

二〇一五年一月，總部設在華盛頓的「自由之家」公佈年度報告，中國再度名列不自由國家。中國的「政治權利」為七級，「公民自由」為六級，都是非常低的級別。報告書指出，習近平對民眾不滿的對應措施讓人回想起毛澤東時代，例如開展各種運動，強迫人們在電視上公開

懺悔等。中國政府還改變過去軟禁的方式，運用刑事訴訟和行政拘留等方式限制和鎮壓異議人士，甚至把異議人士關進精神病院。同年十月，「自由之家」在「全球網路自由度」報告中指出，在全球六十五個國家中，箝制網路言論最嚴厲的國家分別為中國（八十八分）、敘利亞（八十七分）、伊朗（八十七分），中國名列世界第一。

其次，在非政府組織領域，鐐銬變得更緊、更沉。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並通過《境外非政府組織管理法草案》，境外NGO在華註冊將由公安部和省公安廳管理，而非傳統上負責NGO的民政部。有關人士表示，這是為了「嚴防西方勢力利用非政府組織這個平台，提供資金，掛著環保、教育、婦女權益等名義，紮根基層，輸出顏色革命」。二〇一五年六月，習近平主持召開政治局會議做出決定，應在社會、文化和經濟組織中設立黨組。換言之，NGO不能脫離黨的控制。這個決定可能會催生大量 Pongo，即由黨主辦的NGO。

第三個方面，嚴密控制教育領域，尤其是在各國民主轉型中提供思想資源的大學。二〇一四年十月，中共中央辦公廳發佈《關於堅持和完善普通高等學校黨委領導下的校長負責制的實施意見》，強調黨委書記凌駕於校長之上、黨委對大學有絕對控制權。習近平在全國高校黨的建設工作會議上推出極左的「陣地論」，即輿論、互聯網、大學講台與知識分子的腦袋都是黨國必須佔領的陣地。任何提倡所謂西方價值觀的作家、律師與教授都是「人民公敵」和「無產階級專政」對象，他們的作品是「大毒草」，不能進入大學、不能接觸大學生。

爭霸：四面出擊，四面楚歌

習近平在對內鎮壓的同時，對外擴張的欲望也不斷膨脹。他企圖恢復漢唐盛世、天朝氣象，不願遵循二戰後由美國主導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歷史上的輝煌如何重現？如果義大利要恢復羅馬帝國，伊朗要恢復波斯帝國，馬其頓要恢復亞歷山大帝國，這個世界將永無寧日。

中國要成為世界霸權，其爭霸的第一對手，就是太平洋另一端的超級大國美國。

二〇一五年春節，中國駐美大使崔天凱在一篇講話中，用一部深受歡迎的中國動畫片中的角色比喻中美關係：在中國的羊年裡，兩國關係會更像「喜羊羊」，而不是「灰太狼」。

那麼，習近平是喜羊羊，還是灰太狼？習是鄧小平以來最反美、最反西方的中共領導人，是狼而不是羊。習接班時，發現家大業大，要「有所作為」乃至「大有作為」。習將大量資源投入亞投行、金磚組織、上合組織、「新絲綢之路計劃」，提出「一帶一路」大戰略。中國旅英國學者張煒指出：「習近平在國際舞台上表現活躍，擺出要擔當地區領導人的態勢，對周邊鄰國採取咄咄逼人的態度。」習不僅要當地區領導人，更要成為世界霸主。他表示：「我們不能當旁觀者、跟隨者，要做參與者、領導者，在國際規則制訂中發出更多中國聲音，注入更多中國元素。」

當然，習近平知道，中國的實力還不足以與美國抗衡。既然還未煉成狼王，就不能與獅子撕破臉，而要做「披著羊皮的狼」——有灰太狼之心，卻戴喜羊羊的面具。習派出副總理汪洋訪美，向美方示好。汪洋在美發表演講說：「引領世界的技術和規則仍由美國主導，對此中國有清醒的認識，中國沒有想法，也沒有能力挑戰美國地位。」汪甚至肉麻地用夫妻關係比喻美中關係。有分析家認為，汪洋代表中國體制內的開明派、改革派或親西方的力量。這種觀點完全是誤判。在習的強勢統治

下，並未進入政治局常委會的汪洋，哪敢有個人主見和立場？汪洋在重要國際場合的發言，都得經過習辦審查和批准。習讓汪講什麼，汪就講什麼；習讓汪充當什麼角色，汪就充當什麼角色。黑臉的習近平，不就需要一個白臉的汪洋嗎？

其次，習要改變與日本及東南亞諸國的既定關係。習近平深知，要成為東亞的龍頭老大，先要將日本打壓下去。於是，習近平挑動國內的反日情緒，玩弄釣魚島和東海領土爭端，中日關係深陷兩國建交後最冷的僵局。同時，習在東南亞和南亞四處出擊，挑動南海的領土爭端，使得越南、菲律賓、馬來西亞、緬甸、印度乃至澳大利亞等國紛紛向美國靠攏。即便是表面上與中國關係親近的北韓、巴基斯坦和俄國，也各有算盤，算不得有共同價值觀的盟友。

我不認同「天朝史觀」，我認為，中國與台灣、香港、新疆和西藏的關係，不是內政，而是對外關係。審視習近平處理台灣、香港、新疆和西藏的政策，是一味蠻幹、全盤皆輸。

對台灣，習近平原來以為用經濟利益搞定國民黨集團就萬事大吉，殊不知太陽花學運之後，台灣公民社會全面覺醒，國民黨的親中政策遭到主流民意的摒棄。習威脅說，一旦台灣政黨輪替，兩岸關係將「地動山搖」。習近平主動促成與馬英九在新加坡會面，將九二共識緊緊套在台灣頭上。習強硬的對台政策與台灣蒸蒸日上的本土意識之間，必然發生劇烈衝突。

對香港，習近平以為拖垮雨傘革命，港人就俯首貼耳。殊不知，香港本土意識深入人心，港獨理念大行其道。北京驚慌失措之下，調動香港左派勢力，對佔中三子、學聯領袖、港大《學苑》雜誌以及港大法學院院長陳文敏發起文革式的攻擊抹黑。而由北京一手操縱的政改方案，意外地被香港立法會否決，建制派內部一團混亂，顯示北京對香港的管

制徹底失敗。

對新疆，中共粗暴干涉維族、哈薩克族等少數民眾的宗教信仰和生活習慣，並掠奪資源、破壞環境，造成嚴重的經濟不平等。習近平的鐵腕統治激發少數民族採取暴力抗爭。習一味高壓、不知疏導，新疆成為中亞最危險的火藥桶。當巴黎發生恐怖襲擊事件之後，習近平譴責此種「野蠻行徑」的同時，念念不忘批評西方不支持中共在新疆的鎮壓是對恐怖主義採取「雙重標準」。然而，很多人權團體和地區專家都表示，新疆發生用砍刀和粗糙的炸彈進行的攻擊，幾乎都是年輕的維吾爾人出於絕望採取的極端行為，屬於一種原始的、本土自發的行為，而非有組織的國際恐怖主義行為。習近平企圖搭上「反恐快車」，以反恐為名殺戮少數民族，此陰謀不會輕易得逞。

對西藏，習近平的政策比親自鎮壓過藏人反抗的胡錦濤更為嚴酷，他踐踏藏人的宗教信仰和文化傳統，藏人在家中為達賴喇嘛慶生都會遭到逮捕。習拒絕達賴喇嘛提出的藏區高度自治的溫和主張，導致數以百計絕望的藏人自焚抗議。中共卻發佈名為《民族區域自治制度在西藏的成功實踐》的白皮書，聲稱現時的西藏是「史上最輝煌的時期」。

表面上看，習近平大權在握、一呼百應，但中國的政治經濟危機已然千鈞一髮。與習近平和劉源都有私交、號稱太子黨戰略家的張木生，近期發出「謹防經濟斷崖式崩塌」的警告，他列出一系列數字支持自己的論點：二〇一〇年中國工業企業三十五點三萬家，現在消失了三分之一，民營工業消失了三分之一，外資工業企業減少了百分之二十二。張說，這種狀況可以用「慘烈」來形容。而中國最大的房地產集團「萬科」的董事局主席王石在接受《中國慈善家》雜誌專訪時指出，中國現在是「黎明前的黑暗，大變革時代即將到來」。王石說，中國走到了羅馬帝國衰亡前夕的境地：「參照羅馬，對比中國現在發生的情況，你會

驚訝地發現，雖然是兩千年前的歷史，卻與現在有很多相似之處，而制度、民主、方法論上，中國還不如兩千年前的羅馬，中國現在的制度設計比他們還要落後，就更不要說和現在進行系統比較。」

習近平很像好大喜功的乾隆皇帝。今天習近平統治的「中共國」，跟兩百多年前乾隆皇帝統治的大清朝也沒有太大的差別。

一七九四年九月，英國使臣馬戛爾尼（George Macartney）站在甲板上眺望一望無垠的大海，他的使節團正在歸途之中。距晉見清國皇帝整整一年時間，除了得到一些中國禮物、從清國勘探到天文地理的知識，與及皇帝態度高傲的回信外，他們要求自由貿易的外交目的並沒有達成。

不過，馬戛爾尼由此行看透了天朝的虛弱本質，他在日記中寫道：「清帝國很想凌駕各國之上，但目光如豆，只知道防止人民智力進步。滿洲韃靼征服整個中國以來，至少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裡，沒有改善，沒有前進，或者更確切地說反而倒退了。當我們每天都在藝術和科學領域前進時，他們實際上正在變成半野蠻人。一個專制帝國，幾百年都沒有什麼進步，一個國家不進則退，最終它將重新墮落到野蠻和貧困狀態。天朝不過是一個泥足巨人，只要輕輕一拳就可以把他打倒在地。」這段話仍然適用於今天的中國。

習近平宣揚的大國崛起、偉大復興，不過是黃粱一夢。全世界都看透了其外強中乾的本質，中共的統治已進入「黃昏時代」。西方開始跟非共產黨的力量打交道，與中國民間社會對話，西方的政府和民間機構正在走出北京的「四環路」，去接觸活的、真實的中國。既然「未來自由中國在民間」，那麼，在獄中的人權鬥士、諾貝爾和平獎得主劉曉波對未來中國的影響，將比習近平更大。當劉曉波取代習近平的那一天，亦即中國民主化啟動的那一天。

## 走向帝制：習近平與他的中國夢

---

作 者 余杰

責任編輯 Raymond Cheng

美術編輯 宸遠彩藝

插 圖 變態辣椒

出 版 者 前衛出版社

10468 台北市中山區農安街153號4F之3

Tel: 02-25865708 Fax: 02-25863758

郵撥帳號: 05625551

e-mail: [a4791@ms15.hinet.net](mailto:a4791@ms15.hinet.net)

<http://www.avanguard.com.tw>

出版總監 林文欽

法律顧問 南國春秋法律事務所林峰正律師

總 經 銷 紅螞蟻圖書有限公司

台北市內湖區舊宗路二段121巷19號

Tel: 02-27953656 Fax: 02-27954100

出版日期 2016年3月初版一刷

定 價 新台幣500元

©Avanguard Publishing House 2016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78-957-801-793-1

\* 「前衛本土網」 <http://www.avanguard.com.tw>

\* 請上「前衛出版社」臉書專頁按讚，獲得更多書籍、活動資訊

<http://www.facebook.com/AVANGUARDTaiwan>